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汎森博士

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



研究生：李顯裕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八月

論文提要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 1925 年到 1929 年在中國所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文章首先考察清華國學研究院產生的學術背景，說明它之所以興起，實與 1920、30 年代由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所引發的國學研究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文中除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理念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主張之間的關連作一探討外，同時與同時期中國另外兩所重要的國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及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學術主張和成績作一比較，以彰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特色。

第二章處理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時期及首任主任吳宓，就其持有的「學衡派」文化與學術理念如何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研究規劃和理念，產生學術精神上的同構及衝突，進而引發吳宓辭去國學院主任職務。其中探討了吳宓的去職，雖然有現實人事紛擾的因素，但同時其背後深層的學術意義，係與中國 1920、30 年代主流的「新漢學」研究的學術風氣息息相關。

第三章則主要是將清華國學研究院特有的導師制度，就其中影響清華國學院最為深遠的五位導師（講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分析這群學人如何「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的在中西學並舉之下，形塑成清華國學院特有的學術風格，而這一風格的形成，實際上也是這群學人在回應當時中國最具勢力的兩股重要學術思潮：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及顧頡剛的「疑古學派」。

第四章及第五章則探討了 1929 年之後，當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形的教育體制結束後，它如何持續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影響

力。文中分兩個層面來考察：一是國學院結束後，三個主要的導師（講師）：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如何繼續進入傅斯年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參與史語所的學術傳統之建構，同時亦探討了傅斯年的「新學術之路」的學術理念，如何與國學院諸位導師學人（包含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其精神或受其影響；二是國學院所培養的學生，其後很多都在近代中國文史學界占有重要的地位，此處著重探了其中的佼佼者，如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姜亮夫、衛聚賢、吳金鼎、劉盼遂、吳其昌、方壯猷、高亨、杜鋼百、劉節、朱芳圃、戴家祥、王靜如等清華國學院所培養的學人，如何延續其導師的學術精神與研究方法，使得清華國學研究院所形塑的學術精神，仍然得以在 1929 年國學院結束之後，持續其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

總之，清華國學研究院從成立之初，因聚集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等五位重要的學者，故頗受中國文史學界的矚目，而所培養的七十多位學人，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成就與影響力，更是超過同時期中國其他的國學研究機構，是以也建構出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傳奇。

謝誌

本論文的完成，首先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黃克武教授、潘光哲教授，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的彭明輝教授、劉季倫教授，在博士論文口試會議時給予切實的指導與修正的意見，受益良多，使得論文初稿的缺失於修正時能夠稍微減少。

博士班就讀時期，也感謝我碩士班就讀時期的母校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的老師賴澤涵教授及吳振漢教授，給予我的諸多鼓勵、指導與協助。

另外在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就讀時期，與諸位學友林丁國先生、唐立宗先生、簡明海先生及周春燕小姐，有諸多的學術討論，啓益甚多。而在博士班就讀時期及論文撰寫過程，多承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的李素瓊助教及張真榮組員、中央警察大學楊惠蘋學姐及呂豐足博士的諸多行政協助，一併致謝。

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王汎森博士。在我博士班就讀時期，上了王老師的「明清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及「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研究」兩門課程，王老師的知識學問極為博雅，治學勤謹，讓我感受到漢學研究的尊嚴。上課時王老師是中西學並舉來闡釋中國的歷史問題，偶而會穿插學壇掌故佚聞趣事，聽來頗令人感到趣味盎然，惟更深一層次觀察，這些故事往往反映學術史、思想史的某些重要面相，而能補傳統文獻史料的不足，且更能趨近真實的歷史圖像。除學問知識上受益於王老師至多外，私底下王老師為人至為敦厚，愛護提攜晚輩，也令我銘記於心。

清華國學院相關的史料出版及研究論著，在台灣學界並不多見，而因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清華大學，新成立了以恢復老清華國

學研究院學術精神的新「清華國學研究院」，故相關的學術討論漸多，且陸續出版了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相關研究書籍及史料，本論文的撰寫已多所受益於此，惟在定稿之際，又見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清華國學書系」，出版了清華國學院學人著作的選集，如《梁啓超文存》、《藍文徵文存》、《姚名達文存》、《羅根澤文存》等書，惜本論文已未及使用。我想未來相關清華國學院的研究論著、史料之出版將會越來越多，一定會方便於對清華國學院更深入的探討，故本論文希望只是對清華國學院研究的起點，往後能在更豐富的史料基礎上續有相關的研究論著。

李顯裕 謹記

2012年10月



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

目錄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論題選擇.....	1
第二節 研究成果評介.....	6
第三節 文獻評估及研究取向.....	16
第一章 「整理國故」運動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	21
第一節 「整理國故」運動下的國學研究.....	21
第二節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41
第三節 東南大學國學院.....	68
第四節 小結.....	77
第二章 吳宓的文化理念與清華國學研究院.....	81
第一節 吳宓與《學衡》.....	81
第二節 吳宓與「新漢學」學風.....	97
第三節 清華國學院的風潮與吳宓的「國學研究」...110	
第四節 小結.....	129
第三章 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風格的建立.....	133
第一節 清華國學院：文化的保守與學術的現代化...133	
第二節 清華國學院導師的學術取向.....	139
第三節 清華國學院導師所形塑的學術風格.....	151
第四節 小結.....	187
第四章 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1929）與中研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學術傳統建立的關係.....	189

第一節	從人員組成、組織編制看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史語所的關係.....	190
第二節	從史學實踐層面看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史語所研究傳統建立的關係.....	194
第三節	結語.....	225
第五章	清華國學研究院學風之延續：以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及姜亮夫為例.....	235
第一節	徐中舒（1925級）.....	237
第二節	謝國楨（1926級）.....	247
第三節	王力（1926級）.....	255
第四節	姜亮夫（1926級）.....	264
第五節	其他清華國學院學生.....	279
第六節	小結.....	298
結論	303
徵引書目	313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論題選擇

百餘年來中國在西方文化衝擊下，正如李鴻章所言面臨「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在這變局下，中國知識份子面臨傳統如何自我調適及轉化的課題，進一步而言，中西文化之接觸，歸結到最後則是傳統與現代的課題。因應西方文化挑戰，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態度，及因應此而採取的學術立場，自有各種不同因應方案以對。

以文化態度而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人，往往較注意所謂進步與保守兩種極端的傾向，前者以西方為楷模，後者則堅持中國文化自具系統無需取法西方。前一派代表人物很多，自陳獨秀、胡適、魯迅、陳序經、傅斯年以下至馬克思主義者都屬之；至於後一派，通常我們注意力總是集中在專講文化系統或哲學系統的少數思想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唐君毅等人¹，但事實上，中國現代思想界並不能如此簡單一分為二。在所謂「西

¹ 研究西化派與傳統派學者著作舉其要者如：Yü-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Wisconsin :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 Fan-sen Wang,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化」與「傳統」兩極之間，還有一批對中西文化問題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他們的文化主張可以其中重要代表人物陳寅恪所言「必須一方面吸收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來示之²，此派人物中，如與陳寅恪友好的吳宓所支持的「學衡派」³基本上如此，更早約半輩的王國維也表現這種嚴謹的分析取向，它們一方面承認西方文化確有勝於中國傳統而為中國所必須吸收之處，但一方面則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特性，外來思想也要經過改變始能適合中國環境而發生作用。

對於中西文化交會所涉及傳統與現代課題的文化立場之選擇，同時亦影響著其個人學術專業上所採取的立場，特別國學(中學)仍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中心課題，故其對國學研究的方法和所持的態度仍是值得研究的面相。而在近代中國國學的研究領域而言，基本上可以區分為新、舊兩派學者，新派學者(以北京大學的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為代表)⁴與舊派學者(以東南大

²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書局，1981)，頁252。

³ 對「學衡派」研究著作甚多，其中暢達而允當的討論見：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84)。

⁴ 相關代表性著作舉其要者如，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Fan-shen Wang, *Fu Sse-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3 初版二刷)，施耐德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學「學衡」派的柳詒徵、吳宓、梅光迪為代表)⁵，這兩派學者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自然是佔有重要地位，雖然新派、舊派史學家只是一個粗鬆的劃分，然以學術研究理念及方法層面而言，譬如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念上其實是以傳統派自居的，像陳寅恪、湯用彤都是⁶，惟正如楊樹達確敏感到學術界中似有兩個不同陣營存在⁷。而這一些同時為新派和傳統派學者所同時重視的學者，更是值得學界寄予重視，針對這一學術界現象，筆者曾經在碩士論文中⁸，以同時為新派和傳統派學者所重視的學者陳垣為例，分析陳垣史學一則為舊派學者柳詒徵、繆鳳林所敬重；一則復為新派學者胡適、傅斯年所推崇，陳垣的個案研究，提供我們更深刻了解在中西文化衝突之中，向來被當時居於思想主流的五四反傳統知識份子，在以傳統（中國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對立意識下⁹，另外一種類型知識份

⁵ 相關著作如孫永如，《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及《劬堂學記》一書除收錄有柳詒徵的自傳與回憶文字外，另有同時代學人或其親人、友人、弟子的回憶、研究文字，值得參考，見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沈衛威，《吳宓傳》（台北：立緒文化公司，2000）；傅宏星，《吳宓評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林麗月，〈梅光迪與新文化運動〉，收錄在汪榮祖主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383-402。

⁶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81。

⁷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76。

⁸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1996）。

⁹ 其實在西方從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以來，在一般社會學和政治學用法中，「傳統」與「現代」久已成為互相排斥對立性東西，韋伯在觀念上尚未能盡脫十八世紀啟蒙思潮的窠臼，即以理性和科學為近代新興事物，而傳統的權威則主要是建築在非理性信仰上甚至迷信上。如此把「傳統」和「現代」在概念上加以對立化，則帶來使人以為「傳統」和「現代」勢不兩立的觀念，社

子治學的典範。從歷史的角度觀察，陳寅恪所言及「必須一方面吸收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所持的中西文化立場，其在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實際上更具有一種典型的意義，準此而論，除陳垣如此外，其實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1929）所集合的一批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大家，以及其培養的後起之秀，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是重大的。

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於1925年，國學院的籌備時期及設立後一年時間左右由吳宓擔任國學院的主任，國學院的設立方式，依據「研究院章程」所言：

本校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時期中，于國學根柢及治學方法，均能確有所獲。¹⁰

是以國學院的教育體制，是融合著中國傳統的書院制度與西方英國的教育體制而成，成立之初就帶有與當時中國普遍所學習西方的教育體制有所不同，而國學院成立後聘請的四位導師和一位講師：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和李濟等人，或則

會科學家魯道夫（Lloyd I. Rudolph and Suzanne Hoerber Rudolph）夫婦研究印度傳統及其現代化的過程提出了傳統之中涵有近代性的因子，而且現代化本身亦決非全屬現代，其中也有脫胎傳統的成分，這自然對「傳統」和「現代」對立化的概念業已作出實質而具說服力的修正，見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收錄在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87），頁48-49。

¹⁰ 〈研究院章程〉，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下冊，頁669。

當時已經名滿中國（如梁啟超）；或則名震學界（如王國維），否則即是剛從國外留學回國帶來了西方最先進的學科知識進入中國（如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這幾位老師在清華國學院中，雖然治學領域或研究方法或有其異同之處，然他們確也型塑了某種清華國學院特有的學風，而教育著七十多位國學院的學子，其中很多國學院畢業的學子，日後在中國人文學術界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這些學子個別的回憶文字和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懷念起一種教育在他們身上的有形和無形的治學風格和精神，使得僅僅只成立四年多時間的清華國學院，比較起同時期諸多類似的國學研究機構（如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東南大學國學院、廈門大學國學院、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而言，就學術的影響力或為後人所懷念上，清華國學院都是領先群倫的。

2009年11月1日中國大陸的清華大學又重新設立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據該院的副院長劉東所言，新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確實是在恢復和重建歷史上這所1925年到1929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¹¹，據此可見他們對這所八、九十年前的國學院學術傳統的珍惜，是以對清華國學院予以放在近代中國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既是對近代中國學術史的一段重要的學術發展有所釐清，同時也對幾乎已成為學術界的國學院之「神話」性質有所探析¹²。

¹¹ 劉東，〈寬正·沉潛·廣大·高明—關於清華國學院的訪談〉，收錄在氏著，《道術與天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77。

¹² 最早把清華國學院作為「神話」來解讀的是現任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參見陳平原，〈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收錄在氏著，《大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21-50。

第二節 研究成果評介

截至目前為止，學界探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論著，具體來說約略有三：一是直接對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機構設立背景、制度、教學、研究狀況等資料性的整理和介紹文章，這一部份研究，台灣學者中以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一書中的第十章〈清華國學研究院〉¹³和中國大陸學者孫敦恒的編著研究的《清華國學院史話》最具代表性¹⁴。近年來蘇雲峰的清華學校及清華大學的兩部研究專著，是在以中國大陸清華大學所出版的清華校史史料為基礎，所爬梳而成清華校史的外在具體輪廓，大致上已告底定¹⁵，惟蘇氏所處理者除1911年至1929年清華時期外，同時涉及1929年至1937年中日戰爭前的清華，而蘇氏所涉及清華國學研究院部分或如何炳棣言及是「研究漢學的國際學人必讀之作」¹⁶，但平情而論，蘇文主要仍是著重清華國

¹³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十章，〈清華國學研究院〉，頁319-376。

¹⁴ 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此書編著成書之前，孫敦恒業已先發表下列文章：〈淺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0卷第1期，1995年，頁13-20；〈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生情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1期，1997年，頁5-12；〈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2期，1997年，頁14-20；〈吳宓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收錄在李賦寧等選編，《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頁63-86；〈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收錄在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一輯，1994年，頁267-340。

¹⁵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一書及《抗戰前的清華大學 1928-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¹⁶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何炳棣院士序〉，頁2。

學研究院外部行政、硬體建設、制度、教學等制度性層面的描述和整理，其史料基礎至為紮實，然對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建構所涉及的文化意涵、內部學術層面治學風格及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貢獻，著墨甚少，故尚留有很大探討空間。

另外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首推孫敦恒，孫氏有關清華校史史料之掌握是首屈一指的，他編寫了一些近乎工具性資料彙編整理著作的「為人」之作，舉其要者，如撰〈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一長文，甚為詳贍，後來此文更擴充為《清華國學院史話》。他另參與審校齊家瑩編撰的《清華人文學科年譜》¹⁷等至為基礎性的史料整理工作，然孫敦恒較蘇雲峰之研究更進一層，他已初步處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設立，在中西文化激盪中的文化意涵，同時也對五位導師及講師的教學風格及治學內容作一介紹，惟因孫氏所論仍是介紹性文字成分居多，尚未將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風格放在近代中國學術史及思想史脈絡中作整體評估，諸如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和東南大學國學院的「整理國故」在治學風格上差異性為何？或如與居於當時中國史學界中心地位的疑古學派在治學方法和概念上是否曾產生聯繫或影響？或如與中研院史語所學術傳統建立關係為何？這些具有學術史意義的課題在孫氏論著中尚未系統化的處理。不過蘇雲峰與孫敦恒二氏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史料性整理、彙編，業已為研究清華國學研究院作了基礎性外部資料準備的開拓工作，便於吾人從內在思想及學術層面更深化研究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精神之意涵。

真正為清華國學研究展開較具深度性研究的史學論著，首

¹⁷ 齊家瑩編撰，孫敦恒審校，《清華人文學科年譜》（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推桑兵的〈陳寅恪與清華國學研究院〉一文¹⁸，此文在考證層面（如對陳寅恪受聘清華國學研究院之緣由）及義理層面（如對陳寅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所援引的歐洲漢學研究方法及其治學方法在當時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皆有新論，史料考證嚴謹，義理推演復見思考複雜之深度，此文可說是研究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個點的突破，惟在線的聯繫（如其餘導師王、梁、趙、李與學生輩如徐中舒、謝國楨、姜亮夫、王力、吳金鼎…等傑出人才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學風關係之研究尚未論及）及面的完成（如前文提及的學術史脈絡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仍未竟其功。

另外近年來較具學術研究高度的論文，分別有陳來與羅志田的研究。在陳來的〈近代『國學』的發生與意義與演變－以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典範意義為視角〉一文¹⁹，係從近代中國國學的發展史考察，認為「國學」一詞意義的內涵，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晚清國學，如鄧實是把國學的興亡與國家的興亡聯繫在一起，此時的國學較具「政治」的涵義；第二階段是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國學主要是作為與西學對照的用法，基本上指涉的主要是「文化」的意義；而第三階段就是 1920 年代以後，國學的概念就變得越來越成為一個「學術」的概念，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研究方法的體系」，在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下，各地國學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然最為人所注目的就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兩者各有這個時期的國

¹⁸ 桑兵，〈陳寅恪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歷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頁 129-143。
本文又收錄在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36-160。

¹⁹ 陳來，〈近代『國學』的發生與演變－以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典範意義為視角〉，《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3 期，頁 24-35。

學研究特色，然而最終清華國學院的「國學的漢學化」（這裡的漢學化係指學習歐洲的漢學、東方學的學術典範），最能與西方漢學、東方學的新學術潮流接軌，是以此成就最大。此文既能從宏觀的學術史的發展脈絡切入，釐清 1920、30 年代中國國學研究的性質，又能深入清華國學院學術建制安排的內在曲折，得出清華國學院國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清華國學院的研究中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而羅志田的〈一次寧靜的革命：清華國學院的獨特追求〉一文，²⁰特別著重國學研究院的主任吳宓，想辦一個融合中西的新式書院，通過培養「正直高明之士」來影響社會，吳宓堅持清華國學院應該要以講授經史小學為主的「普通演講」與向西學開放的「專題研究」相結合的方針，同時師生必須常川住校（院）的密切接觸方式來挽救新教育體系下的師生疏離，並通過分科以教授個人為主來顛覆西式的學科分類。然而這場寧靜革命後來因為校方堅持要走現代西方式的「專題研究」，而取消「普通演講」的課程型式，終造成在任國學院主任一年多的吳宓去職，此文以小見大，繁複的論證出清華國學院四年多時間，院內所決議改變的教育發展方向所引起的最大風潮，及吳宓去職的事件，在這些紛擾的表面現象外，在更深的底層中，實際上蘊含著清華國學院主其事者吳宓的某些文化理想的實踐與落空。此文除考證嚴密之外，復推理層層疊疊，勝義紛出，極有啟發性，惟此問題尚可從更寬廣的近代中國學術史的發展來考察，其中涉及吳宓所代表的「學衡」派文化理念，與當時中國學術主流和教育建制中，掌握

²⁰ 羅志田，〈一次寧靜的革命：清華國學院的獨特追求〉，《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5-13。

學術「話語權」的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漢學」學派間存有的複雜關連。

在史料整理工作進行一段落後，自然會將研究課題加以深化，故第二個研究重點是企圖在治學理念上對清華學風作「哲學系統」化處理的徐葆耕論著《釋古與清華學派》一書²¹，以及胡偉希的多篇研究論著²²。徐氏及胡氏在研究中皆提出了「清華學派」一詞，然此一辭原係由文學家王瑤所提出²³，其意涵雖仍包括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治學風格，惟其主要指涉對象為 1929 年後的清華大學人文學科治學風格，包括史學、文學及哲學領域的學者，諸如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王瑤、賀麟等人，在範圍界定上較為廣泛，此與本論文限定在 1925 年至 1929 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不同的。徐、胡二氏以「清華學派」一義涵蓋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1925-1929）與清華大學時期（1929 年以來）在實質層面會面臨兩個問題需進一步加以分疏：首先是 1925 年至 1929 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 1929 年以後的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各系（史學、文學、哲學與社會科學學科如經濟系等）在學術體制建構上是兩個不同過程的機構，1929 年以後的清華大學人文學風自然仍有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遺風（如陳寅恪在 1929 年後仍在清華大學任教且繼續發揚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傳統），惟因 1929 年後

²¹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²² 胡偉希，〈多元文化的選擇與尋求—論清華學派的文化觀〉，《學術月刊》，1993 年第 10 期，頁 14-20；〈傳統與現代性—再論清華學派的文化觀〉，《學術月刊》，1994 年第 8 期，頁 3-10；〈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三論清華學派的文化觀〉，《學術月刊》，1995 年第 11 期，頁 15-19；〈清華學派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四論清華學派〉，《學術月刊》，1996 年第 6 期，頁 3-10；〈清華學派的日神精神—兼論 20 世紀中國的學術類型〉，《學術月刊》，1998 年第 1 期，頁 30-37。

²³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釋古與清華學派》，頁 41-42。

人文社會學科各學系其學術範圍廣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在學術風格上兩者畢竟仍宜作進一步分疏；其次就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重點史學研究領域而論，1929 年後的清華史學研究雖仍有陳寅恪學術研究傳統存於其中，惟因受歷史系主任蔣廷黻影響，積極提倡治史應援引社會科學概念及工具於其中²⁴，而呈現出更為現代化的史學風格（此時期清華培養的史學家，如梁方仲、楊聯陞及何炳棣最具代表性），是故此與清華國學研究院仍以乾嘉考據舊風為重的風格仍有其治學之間的差異。

而另外就徐氏研究論著中用了「釋古」一詞統稱清華所有時期的學術風格，除如上述可能面臨的問題外，也同時面臨名詞定義上的困擾。徐書的「釋古」意指「在非古與信古的兩個極端之間尋找某種合適之度的慾望，外化為對歷史文本進行重新解釋的衝動，名曰釋古」²⁵，細考徐文所言「釋古」一義，意指在文化態度及治學理念上居於傳統派（信古）與西化派（疑古）之間的一中庸地位。全書以此概念詳論吳宓、陳寅恪及略論清華國學研究院及 1929 年後的清華人文學術風格，然其分析論著較近於哲學或文學上的文本解釋，此與史學研究上考究知識份子對所處「環境」（situation）在文化理念及學術層面選擇的意識反應（conscious responses）²⁶，確有其著重點相異之處。又「釋古」一詞在史學研究上已有前輩史學大家周予同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一文中業已使用，但周氏所言「釋古」一詞意指胡漢民、

²⁴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序言〉，頁 2。

²⁵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頁 44。

²⁶ 關於「環境」、「意識反應」二詞，係參考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說法，請參考氏著，張永堂譯，〈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收錄在段昌國等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頁 3-5。

郭沫若、陶希聖等人較著重社會史的治學取徑²⁷，此與徐文用法迥然不同，周文的「釋古」派在意義上應較接近余英時所稱的「史觀學派」²⁸，故在名詞上定義易生混淆，名詞用法雖可自行定義，然而倘有約定俗成或前輩大家業已有重要論著，似宜先加以討論，周予同是著名的經史研究老輩大家，徐葆耕則是以西方文學研究為主，細考其提出「釋古」一詞定義「清華學派」，似未參考周氏論著觀點，然徐文所言「釋古」指涉清華國學院的學風，仍有相當的意義，從近代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而言，確有傳統派「信古」與新派（如顧頡剛）的「疑古」的兩種古史觀，而在這兩派中間另有如清華國學院的導師（主要以王國維、陳寅恪為主），既不主張盲目的「信古」，也不走衝決網羅的「疑古」路線，而是採取一種既擴大史料範圍，同時又主張謹慎的考察各項史料（包括真史料與偽書）之後，在這基礎上去解釋、建立起可靠的中國古代信史的態度，故名之為「釋古」，實際上仍是合宜地，所以只要在文中加以說明其意義不同於周予同所言的「釋古」之義即可，故本文所言清華國學院的「釋古」學風即是採取這種定義。

而胡偉希的「清華學派」研究同時亦涉及清華國學研究院及 1929 年後清華大學人文學科的研究學風，胡氏論列兩者為一體，然全文基本上是以哲學史層面來處理「清華學派」的文化理念，哲學意味較為濃厚，而較少從史學的角度來切入，胡氏哲學的處理，基本上著重於系統化一兩個概念來指涉清華國學研究院

²⁷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錄在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二刷），頁 554-559。

²⁸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收錄在氏著，《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頁 1-29。

學風，然而史學的處理，其重心係在了解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及學生們，在他們的史學著作中，具體形成怎樣內涵的學術風格，並進而形塑成怎樣的學術傳統，而非以一兩個概念「本質主義」式的來概括清華國學研究院學風，這自然是「哲學」與「史學」處理的角度不同所致。故就以與本論文相關部分而言，清華國學研究院治學理念所落實的具體研究風格及學術發展歷程意義的探討尚留有探討的空間。

第三個研究清華國學研究院之相關論著，則是研究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老師或學生，基本上是傳統的以人物為中心的寫作方式。而這些著作中，直接以清華國學院或其導師為研究著作者，則為邵盈午的《清華四大導師》和鄭家建的《清華國學院論述》兩本書篇幅最大。

在邵盈午的《清華四大導師》一書中²⁹，主要是討論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然此書雖名為「清華四大導師」，惟全書所討論的並不以四大導師在清華國學院時期為限，大致上是這四位導師全幅學術生命的近於學案式論述，雖然書寫討論範圍較廣，惟論及四位導師在清華國學院時期的學術事跡，詳瞻完整，實有類似「年譜」的學術意義和功能。

另外鄭家建的《清華國學院論述》一書，³⁰討論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四人。此書則集中四位清華老師在清華國學院時期的生命和學術事蹟，並將他們在清華任教（職）時期所發表的學術論著，作摘要介紹，對於了解這些老師在清華國學院

²⁹ 邵盈午，《清華四大導師》（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³⁰ 鄭家建，《清華國學院論述》（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0）。

時期的具體生活和學術工作都條理分明論列，既有年譜式的功能，循序讀之，會使人了解傳主學術發展的過程。

以上二書都對清華國學院及其導師的理解頗有助益，惟將清華國學院放在比較的觀點，從近代中國學術史的脈絡來論述的面向，尚留有探討的空間值得進一步去挖掘。

而在這些個別與清華國學院有關的人物研究中，目前研究吳宓、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的論著呈現盈篇累牘的現象。然大體上這些論著都較放在各個學人全幅的學術生命加以論述。自然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皆在這些學者學術生命歷程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然單獨處理一個學者全幅的學術生命畢竟與處理一個學者在一個特定時間的現代學術機構中（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其有機式的互動，且形成一個學術團體並凝聚其學風，兩者除時間範圍不同外，同時每人學術生命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之發展或變化，如王國維及梁啟超在清華時期可說是其學術生命最為成熟階段，王國維「古史新證」正代表著他個人治史方法、概念的具體而微的展現；而梁啟超素以「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昨日之我」的個性，更呈現出他學術的變化，而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生命，則是他們作為爾後成為學術大師漫長歷程的旭日東昇時刻，他們治學重點、方法及概念爾後自然都有積極的發展，故與本論文主要是以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仍有不同，不過學者一生治學理念在某些層面上，仍會維持其一慣性，並非只有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的論著觀點方能使用，惟這一研究史料之運用，仍須視個別人物之具體觀點和立場而定。

而這些主要人物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所集體形塑而成的

學術傳統之性質及意義，在這些為數眾多的以個別人物為研究中心的論著中，已都有程度深淺不一的探討，惟本論文希望在這一方面加強，並在這些具體的研究業績上，就與本論文中相關的部份，採取個別論著有價值的學術成果，進一步綜合來整體評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和地位。

綜觀前述幾項研究成果，大體上對清華國學研究院外在輪廓及制度性層面的基本史料之整理，業已奠定相當基礎，而清華國學研究院內部的文化學術精神面向亦已有初步探索之作，惟仍可進一步探究，另從比較性的觀點立基於近代中國學術史脈絡來整體評估清華國學研究院建構之學術意義的課題，也尚留有剩義。故這亦是本論文嘗試開發探索之處。

第三節 文獻評估及研究取向

目前有關清華國學院的文獻史料部分，直接涉及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 年至 1929 年）的史料，主要包括幾項：一是清華大學校史相關基本史料（如《清華大學史料選編》、《清華人物誌》、《清華大學校史稿》、《清華周刊》中相關的記載³¹，及〈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及《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等）然而這些含有清華國學院的史料部份，都是較涉及清華國學院制度層面的外在資料，而其中比較重要的部分，大體上都已經由蘇雲峰收錄整理在《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一書中的第十章〈清華國學研究院〉以及孫敦恒編著的《清華國學院史話》書中，尤其後一本書更是了解清華國學院目前最重要的工具資料書；二是清華國學研究院代表性人物，如國學院主任吳宓、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講師李濟，和清華國學院的學員，諸如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姜亮夫、吳金鼎、戴家祥…等人，他們的原典著作或日記、書信、年譜及回憶性史料，如 1992 年出版的《吳宓與陳寅恪》³²、1998 年《吳宓日記》³³第三、四冊（1925 年至 1929 年）及 1994 年的《李濟與清華》³⁴、2004 年出版的《從

³¹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輯，《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1994），4 冊；清華大學校史組編輯，《清華人物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1995），3 輯；清華大學校史編輯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新華書局出版，1981）。

³²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³³ 吳宓日記前後共有二十冊出版，其中有關吳宓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工作及他對國學院諸多的意見資料，主要見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三冊及第四冊。

³⁴ 李濟著，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四刷）。

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³⁵皆存有很多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相當多的第一手史料，另外如《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浦江清的《清華園日記》³⁶、姜亮夫、藍文徵、陳守寔、謝國楨、徐中舒…等回憶性文字³⁷，如《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追憶王國維》、《追憶梁啟超》、《追憶陳寅恪》、《追憶吳宓》、《解析吳宓》等書³⁸，其中尤其以2009年出版的《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一書最為重要，是書收錄有回憶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的相關資料外，還從中國大陸《晉陽學刊》編輯部所編輯的《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所編輯的《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這兩套卷帙浩繁的傳記資料工具書中取材，同時又參考其他各種專集、紀念文集，共輯出三十多位有關畢業於清華國學院的學者之傳記資料或重要論述，人數比

³⁵ 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³⁶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台北：華世出版社影印，1985）；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1999）。

³⁷ 其中最完整的回憶清華國學院及其導師的文章，以姜亮夫及藍文徵的文章最為詳贍。請參見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68-180；藍文徵，〈清華國學研究院始末〉，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頁139-147。其餘清華國學院學子的回憶文章也都有零散觸及在清華國學院的學習和學術精神，及導師對學子的學術影響，這類資料分散各處，將於文中依照研究論題示出，在此不一一詳列。

³⁸ 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張杰、楊麗燕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解析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率上已接近國學院畢業學子七十多位中的近半數之多，是很便於研究清華國學院的學術史料，第三是同時代重要學者的論著、文集、日記、回憶錄、來往書信、自傳的資料，如錢穆、黃侃、楊樹達、張爾田…等人，皆可對於清華國學院所處時代的學術氛圍和當下的歷史情境，提供第一手的了解。

本論文在以這些史料為基礎上，仍將依論題所要，採用當代研究清華國學院個別學術人物的學術觀點，大體的研究取徑，亦即盡量在瞭解清華國學研究院所留下的第一手歷史文獻之後，觀察它循著什麼具體途徑變動和發展，也盡可能了解這些變動的曲折及其涵義，然後將其放在一個比較的觀點，從歷史（學術史和思想史）脈絡來評價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關係。

從歷史角的度觀察，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知識菁英所面臨的西方文化之挑戰，正如同古代中國所面臨外來文化佛教的挑戰一樣嚴峻，而古代中國士人（知識份子）面對佛教思想的衝擊，首先是先將印度原始佛教和中國傳統思想進行長期的「格義」工作，於是中國本土化的佛教（禪宗最爲重要）產生，到了宋明新儒家時更利用已經本土化的佛教概念和分析方式，把儒家傳統中引而未發的「心性之學」全面建立起來，並豐富了中國文化傳統，而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經驗特別值得近代中國反思。

實際上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知識菁英，在面臨西方文化衝擊之下，其所作的在學術研究上去調整與改變中國傳統的學術，在意義上與佛教對中國的挑戰與回應，有其相近之處。自然當代中國所面臨的西方文化衝擊，更遠甚於佛教對中國之影響，且更爲複雜。故傳統與現代化課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份

子的中心焦點，而對於這一中西文化交流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居於中國傳統社會中心地位的知識份子，如何以嚴肅學術論著去回應時代挑戰，並表達他們內心的關懷，對於中國文化與學術的何去何從，自有相當深刻的歷史啓示，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輩群聚而成的這一中國知識菁英團體，正好提供一個可以考察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中西文化（包含學術）如何調適及轉化的極佳案例，傳統與現代二者之間的關連性，或可透過本研究得以更深化問題之了解。



第一章 「整理國故」運動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

1920、1930 年代中國史學界有三件大事，第一是以胡適爲主的「整理國故」運動；第二是繼之而起的古史辨運動；第三是中央研究院創立之後，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及其相關的一群學者爲主的新學術運動。追本溯源，胡適提倡的「國故」概念、平民的眼光、清儒的治學方法、歷史學的方法論，及其存疑的態度，這五點有很大的影響¹。而成立於 1925 年的清華國學院實際上亦與胡適「整理國故」運動的思潮有關，然在「整理國故」運動之下，中國產生了諸多的國學研究所，其中南北的重要學統東南大學和北京大學亦在這一「整理國故」思潮下成立，透過對這兩個當時中國南北具代表性的大學，其所設立的國學研究所的學術理念的考察，更能站在比較的觀點對清華國學研究的學風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第一節 整理國故運動下的國學研究

有關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開辦，我們先檢視當時幾份重要的文獻，當時國學院的主任吳宓，首先在 1925 年〈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開學日的演說中說到：

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詳見曹校長所著《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係》小冊中，……至於研究院之切實

¹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85。

之宗旨及辦法，則備具于「研究院緣起及章程」，曹校長之意約分三層：(一)值此新舊遞遭之際，國人對於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採擇適當，融化無礙；(二)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經濟、哲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後於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為達上言之二目的，必須有高深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地，且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闕，此即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²

而在此文中，吳宓認為「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³，而科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就是胡適「整理國故」的重要精神。

而「清華國學研究院章程」的「緣起」中，則提及

近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餘年，今年即設大學部，復以地處京師西郊，有交通之便，而無囂塵之煩，故擬同時設立研究院。良以中國古籍，自漢迄今，注釋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備與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於后人之補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為夥頤，亦尚待會通細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歷代生活之情狀，

²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收錄在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173。

³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174。

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自然方面，如何川之遷徙，動植物名實之繁頤，前人雖有紀錄，無不需專門分類之研究。至於歐洲學術，新自西來，凡哲理文史諸學，非有精深比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精華而定其取舍。要之，學者必比致其曲，復觀其通，然後足當社會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設所以不可緩也。本校有鑒於此，因念大學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設立研究院，先開國學一門，延名師，拓經舍，招海內成學之士，凡國內外大學畢業者，與現任教育事業，或閉戶自修，而有相當之學力者，入院肄業，分門研究，冀于世界文化有所貢獻。⁴

這裡所談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文中所謂「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為夥頤」，就是指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中所談及的新出史料，即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中國境外之古外族遺文等，而王國維認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⁵」，是

⁴有關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院章程」收錄在《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一書中，頁175-182；又同時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下冊，頁665-670；及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頁26-29。

⁵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上冊，頁175-180。

以因應新史料的發現，有必要加以整理會通細密之研究，並且形成二十世紀中國新的學術領域；(二)所謂「歐洲學術，新自西來，凡哲理文史諸學，非有精深比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精華而定其取舍」，實際上是有著國學院主任吳宓的某種文化理念，原本國學院最重要的國學研究是要「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對當時西方具有科學精神的漢學、東方學去學習其研究方法，而歐洲漢學、東方學是著重在考證之學，大致上在研究風格上也與中國清代的漢學考證之學接近，惟方法上更精密(如能利用比較歷史語言學以及廣用各種新出史料)，較不 涉及「哲理」的層面(亦即是中國宋學的義理之學)，雖然在清華國學院所設定的「專修學科」中列有「中國哲學史」一科⁶，但正如曾經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的何炳棣(1934 級)所言清華國學院：「該院的重心無疑是在歷史⁷」，而就以當時胡適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研究而言，基本上在治學方法上，仍是清代漢學考證與西方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結合⁸，而絕不是在談哲理、義理的「尊德性之學」。然吳宓向以在中國提倡西方新的人文主義著稱，而與考證漢學是有隔閡的，是以這裡是存有吳宓某些對國學研究的文化理念於其中⁹。

而國學院的講師李濟曾參與創院，他的回憶如下

⁶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 36。

⁷何炳棣，〈清華史學對我影響深遠〉，《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頁 1。

⁸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八刷)，頁 77-91。

⁹吳宓對國學的看法，詳論見本論文第二章。

民國十四年，為清華學堂開辦國學研究院的第一年；這在中國教育界可以說是一件創舉。國學研究院的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清華為研究所請的第一批教授，有王國維、梁啟超及陳寅恪、趙元任諸先生。我是受聘去做講師的一人。那時華北的學術界的確是很活躍的；不但純粹的近代科學，如生物學、地質學、醫學等均有積極的研究工作表現，受人重視；就是以近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號召，也得到社會上熱烈的支持。這是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北方學術界的一般狀況¹⁰。

李濟在此標舉「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國學研究院的基本觀念，這實際上是處於 1920 年代初胡適所提出的「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思潮中。

而梁啟超 1923 年在當時東南大學演講〈治國學的兩條大道〉時就已經指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路，一是文獻的學問，二是德性的學問。其中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而這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這部分事業最浩博最繁難而且最有趣的，便是歷史」¹¹。

而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受到其導師之教誨與影響，養成了重視學術研究的風氣，其中劉盼遂、杜鋼百、余戴海、汪吟龍、聞惕、吳其昌等人以「實事求是整理國故」為志趣，發起

¹⁰ 李濟，〈回憶中的蔣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雙橡園〉，收錄在氏著，《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卷五，頁 224。

¹¹ 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道〉，收錄在馬克鋒編，《國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90。

組織「實學社」，創辦了一個學術月刊《實學》，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¹²。而在《實學》第一期的「本刊啟事」中寫著「本刊為發皇學術整理國故起見，海內之士與本刊趣旨相同者，錫以弘筭深所忻願。¹³」，這些史料都表明清華國學院的設立和研究是要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研究國學的。

而實際上，「以近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這是受到胡適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的影響，是以在 1923 年起展開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後，科學的主張也影響著歷史研究的工作，此後人們總是選擇那些不涉及心性、不涉及形上，或是不涉及神秘的、不涉及帶有人類學意味的問題，即使在從事解釋時，也對於涉及形上、心性、神秘、人類學的地方，或者視而不見，或者以批判的態度加以對待，或者自然而然地朝向理性、科學的、去形上、去神秘的方面去解釋。同時在論證時，也傾向只相信「證據」可證實的部分，而不將想像放在很正面的地位；那些從事相反方面研究的人，或是研究中展現相反風格的人，在當時學界並不能占最主流的位置¹⁴。而實際上這正是當時以胡適為代表的學派，1929 年錢基博在〈今日之國學論〉中對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文中，認為清代乾嘉考據學具有西方的「科學方法」，並以之作為國學研究的方法，他稱之為「新漢學」，此「新漢學」係「萬流所仰，亦名之曰『北大派』，橫絕一時，莫與京也！」，然與之相對的則是柳詒徵這些「學衡派」或「東南派」，「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適過重知識論之弊…然而議論失據，往往有

¹²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 136。

¹³ 參見《實學》，第一期，1926 年 4 月，「本刊啟事」（未標頁數）。

¹⁴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384。

之！又以東大內畔，其人散之四方，卒無以大相勝！」錢基博文中稱胡適等人以乾嘉漢學加上西方的科學方法為「古典主義者」，是「國學之歧途」；而以柳詒徵、胡先驕、梅光迪、吳宓等人強調的人文主義，反對知識論壓倒一切的學風，稱之為「人文主義」，是「國學之正軌」¹⁵，這反映錢基博的學術信仰，姑置不論，然而文中反映了 1920、30 年代中國學術界的實況，新漢學的不涉及心性學風是「橫絕一時」；而如柳詒徵等人的那些從事相反方面研究的人，或是研究中展現相反風格的人則是在當時學界則「卒無以大相勝」於北大派，故不能占最主流的位置，於是「科學方法」的「整理國故」運動，允為學術界的風潮，清華國學院亦是在此學術氛圍中成立。

而較早就整理國故提出看法的是毛子水，1919 年 5 月出版的《新潮》上他發表〈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的毛子水，雖然不見得認可「國故」的價值，但仍認為國故作為中國過去的歷史和學術史可以成為病理學上的材料，供今人解剖，救治我們思想上的痼疾。因此研究國故不僅能「發揚國光」，更能「發揚國醜」。又國故中的疏證之學有助於「求是」習性的養成，實際上毛氏舉出近時出版講國故學的書籍，如章太炎的《文始》、《檢論》和《國故論衡》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胡適的《墨家哲學》、《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就大體而言，都是精審之作，尤其章太炎少時研究經學，實在是得疏證學所發生的「求徵」、「求是」的性習的，這就是科學的精神。然而這種科學精神仍與毛子水認為最需要的科學精神有距離，他認為「現在

¹⁵ 錢基博，〈今日之國學論〉，《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下冊，頁 830-831。

我們中國人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吸收歐洲現代確有價值的學術」，倘若要研究國故，即必須具有「科學的精神」¹⁶。

毛子水文章，已大概鋪陳了之後胡適所提出「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運動的先聲，新文化派的學人傅斯年在這篇文章後面有一「附識」，亦值得注意，傅斯年並不是在文化價值上肯定國故的意義，所以他對「追摹國故」的「國粹派」是不贊同地。然而從學術研究方面來說，傅斯年認為

中國國故在世界的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言語學等等的材料上，占有重要的部分，或者因為中華國故的整理，的發明，「世界的」學問界上，生一小部分新彩色一如梵文的發明，使得歐洲言語學上得個新生命…。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研究國故好像和輸入新知立於對待的地位，其實兩件事的範圍，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¹⁷。

傅斯年完全肯定毛子水的觀點，大致上他們是主張用歐洲學術（輸入新知）的「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國故。毛子水、傅斯年的觀點隨後即被胡適給予最系統的說明，即近代中國學術史發展的重要文獻：1923 年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然胡適於 1923 年之前早就已經醞釀「整理國故」的思想和進行的內容。

胡適「整理國故」學術運動的起源，大致上以 1919 年 12

¹⁶ 毛子水，〈國故與科學的精神〉，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上冊，頁256-259。

¹⁷ 毛子水，〈國故與科學的精神〉，《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文末所附的〈傅斯年附識〉，頁 264-265。

月在《新青年》雜誌上所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可以看出其發展脈絡，胡適文中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是「評判的態度」，而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表現上則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此種新思潮的「評判的精神」是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應持有的態度，胡適說，「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而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合；第三，主張整理國故。爲什麼要整理呢？因爲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因爲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及其影響結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和真價值。這叫做「整理國故」，胡適特別指出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功夫」¹⁸，「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功夫。」，文中突顯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與當時毛子水、傅斯年主張相同地¹⁹。

基於這樣對新思潮的認識，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了《國學季刊》，而這本刊物就由胡適來撰寫發刊宣言²⁰，

¹⁸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1994），頁 41-50。

¹⁹ 眾所周知，胡適是五四時代反傳統的先鋒，而此際提倡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或許可視為對他過激思想的一種修正。

²⁰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頁

在文中胡適首先舉出明末到清代三百年的成績，一是整理古書，如本子的校勘、文字的訓詁、真偽的考訂；二是發現古書；三是發現古物，如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等材料不少，尤其是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字的出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根據，並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而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發現，也極重要。

這這篇革命性的宣言中，胡適自與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反傳統立場迥異，而發現清代中國傳統學術的長處，他更認為這是具有現代的科學精神。他在 1921 年早先發表的一篇文章〈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²¹中也清楚的舉出清代的漢學家，從顧炎武、錢大昕、王念孫、王引之、俞樾、章太炎在音韻、訓詁學上已經具備了西方科學方法的治學精神。當然這三百年的清代古學研究，胡適也舉出有三個缺點，一是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學者對古韻、古義乃至於古籍註疏，都不是為這些資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他們的眼光，古書的研究都只是經學的丫頭，雖然如古韻學研究後來自成一專門的學問，而子學的研究（如《墨子》的研究）也都獨立成家，但是就大體來說他們都擺脫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見；第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靠理解的危險，故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避免主觀的見解，以致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三是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胡適承認清儒對古音古韻的研究，他們確實有其科學的一面，但他們主要的研究資料則只限於《詩經》。有時雖也把研究的對象擴展到其他與音

229-245；及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遠流，2005），頁 273-280。

²¹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頁 230-231。

韻有關的著作，但是他們絕未想到那些也會有古音古韻的各地方言、口語，尤其是華南各地的方言（如廣東話、福建話）等等方面的研究。當然對於外國語文的比較研究，就更一無所知了。清代學者更未聯想到朝鮮話、日本話和越南話當中也含有很多的中國古代的音韻的了²²。

基於這三百年中國古學研究的缺點，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出「我們新國學的研究大綱」：一、擴大研究的範圍。二、注意系統的整理。三、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²³，這就是「整理國故」的方向。以下分從這三大方面來論述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及學制，如何落實胡適「整理國故」的主張。

在第一擴大研究的範圍上，用歷史的方法來盡量擴大研究的範圍，這項歷史方法（研究的範圍）要包括儒家的群經、儒家以外的諸子，乃至於佛藏、道藏，不管他們是正統還是邪門，古典詞與俗歌俚語既同時並重，古文與通俗小說也一視同仁。胡適批評清代這三百年的古學，雖也有整治史書的、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和心力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古詞典、子書的研究，都只是經學的丫頭。脫離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是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擺脫這種傾向，以平等的眼光，對儒、墨、孟、荀一律平等眼光看待。在近代中國史學界造成「史學革命」的重要著作²⁴。實際上胡適已經脫離中國傳統學術的經學家之領域，而將原本附庸於經學的史學予以獨立化，並

²²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台北：遠流，1994），頁 155-185。

²³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頁 230-235。

²⁴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頁 77-91。

使得晚清民國以來到 1920、30 年代之際的中國史學走向人文學術中心，而經學反而被邊緣化²⁵。

而前文提及在清華校長曹雲祥所著的《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係》小冊中，對國學院的設立宗旨提及需對「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經濟、哲學），須有通徹之了解」，且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章程」的「緣起」中，又提及「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為夥頤，亦尚待會通細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歷代生活之情狀，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自然方面，如河川之遷徙，動植物名實之繁頤，前人雖有紀錄，無不需專門分類之研究」，這些對清華國學院的研究範疇所設立的方向，顯然已經超過過往中國傳統學術以經學為研究中心的範疇，幾位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如梁啟超早年受康有為今文經學的影響，也曾大力宣揚今文經學的「通經致用」觀念，然終究與其師康有為分道揚鑣²⁶，是以梁啟超畢竟不是以經學研究為中心的經學家，張蔭麟評論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梁啟超，就以為梁啟超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亦即是中國學術的第一次重新評價，其論周秦諸子、其論管子、墨翟，其論商鞅、王安石、論孔教、論佛教，皆一掃傳統觀念，而為今日吾人大多數對此諸家之觀念之所基。而梁氏批評中國學術的結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於學術界頗有影響，如胡適自言他立志於治中國思想史實在是受梁氏此文的影响，而 1917、1918 年以後「新漢學」的興起，皆由梁氏此文「導其源」²⁷。

²⁵ 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收錄在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302-341。

²⁶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書店，2008），頁 107-115。

²⁷ 素癡（張蔭麟），〈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

是以梁啟超一生中的講學著述，正如繆鳳林所說「梁氏著作，其中有一義焉，則其研究以史學為中心是也。²⁸」，故他的《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在近代中國學術界中，為現代中國史學的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依據²⁹。

另外國學院導師王國維與陳寅恪雖然於儒學傳統素養有甚大的修為，如陳寅恪稱王國維是為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³⁰」，且對儒家經學典籍自有那時代學人的深度和廣度，但是王國維對待經學的態度，正如同他在清華國學院的弟子吳其昌所言，王國維非經學家；其治經的主旨，乃在推證古史³¹。經學典

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88。

²⁸ 繆鳳林，〈悼梁卓如先生〉，《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100。

²⁹ 梁啟超在這些著作中可看出他深刻批評中國史學傳統，指出中國舊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把歷史弄成「帝王家譜」、「二十四史只是一部相斫書」，他認為「新史學」必須寫出人群進化和歷史事件的因果法則，見梁啟超，〈新史學〉，收錄在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合編）》（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4-5、13。而在史料的範疇中，所謂「蔡邕極有名之十餘篇碑誄，其價值乃不敵王褒之一篇遊戲滑稽的《僮約》。」在他看來，小說也可以成為史料：「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是實，但元明時犯人得一度牒即可借佛門作遁逃藪則為事實。」范進中舉的故事「胡屠戶奉承新舉人女婿，固非事實，但明清間鄉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為社會特別階級，此確為一事實。此類事實，往往他書中不能得，而於小說中得之」，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合編）》，第四章「說史料」，頁94-96。梁啟超的史學思想與理論，實際上亦即是胡適要用歷史的方法來盡量擴大研究的範圍，這項歷史方法（研究的範圍）要包括儒家的群經、儒家以外的諸子，乃至於佛藏、道藏，不管他們是正統還是邪門，古典詞與俗歌俚語既同時並重，古文與通俗小說也一視同仁，這些實際上都成為現代中國史學觀念上的重要革命。

³⁰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一）—韓柳堂集（合編）》（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7。

³¹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國學論叢（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頁183-185。

籍對他而言是史料。而陳寅恪從各種論著中，我們可以斷定他對儒家原始經典和後代的詮釋都是相當熟悉的，然而他治史在有關中國哲學史和宗教史上，甚或道家和佛教的分量是遠超過儒學的。而陳寅恪也不是傳統的經學家，儒家經書對他而言，亦如王國維一樣，是他史學研究的資料，尤其他更能擴大研究範圍，平等看待各個思想體系，而能與王國維一樣，會通於胡適「整理國故」中「擴大研究的範圍」的主張。至於趙元任與李濟更是現代型的學院學人，沒有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或因家學、或因師承，具有深度的傳統中國儒者的經學修養和薰陶，尤其他們受到西方完整的現代學術訓練，更不會有作經學附庸的傳統心態，而只是從西方式的學術訓練去開展其現代的學術研究。

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方面，做「索引式的整理」（如對古籍編索引）、「結帳式的整理」（如把《詩經》所有的古今研究所得匯集起來，對每種古籍編出一部最後的版本來，如《墨子閒詁》）、「專史式的整理」（如在中國文化史研究中，分為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等研究領域）³²，而專史式的整理，顯然已具備現代學術的學科概念，而迥異於傳統中國學術的經、史、子、集或六藝的分類。

這一部分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考試、教學分類中實際上亦呈現此種現代學術的分科概念。考察 1925 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院章程」，在投考考題部分分為三：第一部，經史小學，注重普通學識，用問答題；第二部，作論文一篇；第三部，專門科學，分經學、中國史、小學、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外國語（英

³²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頁 237—239

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學(物理學或化學或生物學)、普通語言學八門。考生于其中任擇三門。而到了 1926 年時清華國學研究院根據「研究院章程」,考生原本可以選考的專門學科為 8 學科,修訂改為 23 科,定為專修學科,分為經學、小學、中國史、中國文化史、中國上古史、東西交通史、史學研究法、中國人種考、金石學、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諸子、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佛教史、佛經譯本比較研究、中國文學史、中國音韻學、中國方言學、普通語言學、東方語言學、西人之東方學、中國音樂考等³³。

從上述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章程」中所規劃的專修學科及因應而來的應考門類,可知這與胡適「專史式的整理」的現代學科分類實際上已極為相似,這裡當然也從歷史的觀點擴大研究的範圍,而且不再獨尊經學一門,胡適「整理國故」運動關於國學研究的學科重建,大致上包含將過往的傳統學術(如經、史、子、集),加以現代的學術分科化,同時經學地位不再具神聖地位,而使得過往依附經學的史學得以具獨立的地位,清華國學院的導師梁啟超在 1920 年所撰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已經表示:「社會日複雜,應治之學日多。學者斷不能如清儒之專研古典。而固有之遺產,又不可蔑棄,則將來必有一派學者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粹,存其真,續清儒未竟之緒,而益加以精嚴,使後之學者既節省精力,而亦不墜其先業;世界人之治『中華國學』者,亦得有藉焉」³⁴。隨後又在 1922 年《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學術愈發達則分科愈精密,前此則

³³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 27、35-36。

³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台二版),頁 139。

蔚然成一獨立科學者，比比然矣。中國古代，中外無學，舉凡人類智識記錄，無不叢納之於史，厥後經二千年分化之結果，史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曆法、官制、典禮、樂律、刑法等，疇昔認為史中重要部分，其後則漸漸與史分離矣。」「今日所需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專門史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³⁵」

又如對照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中的主要普通演講課程，其中有「歷史研究法」，此為第二、第三學年所開的課程，由學生周傳儒筆記，1926年10月8日從《清華周刊》第384期連載到394期（12月17日）；1928年2月10日繼續從427期連載至439期（5月4日），後來合輯為《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³⁶，而這本為清華國學院學生作的普通演講，在有關「文物的專史」中，梁啟超分就「政治專史及其做法」、「經濟專史及其做法」、「文化專史及其做法」、「文物專史做法總說」、「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等部分論說³⁷，這與前面〈《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的「將舊學分科整治」與「今日所需之史」的專門分類，實際上也都是與「整理國故」的「專史式的整理」的現代學科分類精神相同，這體現一種異於傳統史學書寫，形成新的史學寫作體例和精神。

而王國維治學最具有科學的精神，王國維的學生姜亮夫回憶王國維時說他「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如研究金文，即先編成《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

³⁵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合編）》，頁76、82。

³⁶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89。

³⁷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收錄在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合刊）》，頁314-373。

研究宋元戲曲，先作《曲錄》³⁸，此正是胡適「整理國故」運動中所提出在注意有系統的整理上，所做的「索引式的整理」、「結帳式的整理」。

另第三：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胡適舉出在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 Karlgren，如 Baron von Staë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然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會變，可以提供我們參考比較，也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裡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其中如瑞典學者高本漢在二十世紀初期對「中國文字」研究的成績，有清代三百年的中國音韻學者不能望其項背之處，而清末馬建忠利用他對歐洲語文文法的研究而寫出的《馬氏文通》的中國文法，都是博採參考比較資料的例子。又如具備西方的歷史觀念，理解西方的議會制度，就可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³⁹。

對於胡適「整理國故」中這一「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而言，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們，如陳寅恪曾稱王國維的學術內容與治學方法有三大特色：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獫狁考等是也。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監考等事也。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³⁸ 傅傑，〈姜亮夫先生傳略〉，收錄在張湧泉編，《漢語史學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三輯，頁3。

³⁹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頁229—245；及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頁278-279。

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⁴⁰。這些皆與胡適「整理國故」的「擴大研究的範圍」與「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的學術精神主張一致。

又如陳寅恪在〈與妹書〉中說：「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⁴¹，此與胡適在「整理國故」所提出「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精神相合，胡適在〈宣言〉一文中所提出西洋學者Karlgren，如Baron von Staë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這一思維，其實這是歐洲東方學的研究方法，亦即是陳寅恪在歐洲長期學習的專技，他並將這一研究取徑帶回中國並實踐於其學術研究之中。

而另外趙元任的新語言學，亦即是能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如他任清華國學院導師其間，就率助教楊時逢到江浙一帶調查吳語，赴兩廣調查粵語，寫成《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年作為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四種，由清華研究院印行），而他在校所開的「中國音韻學」，據趙的學生王力所言是「歷史比較法在漢語史上的應用，和清代音韻學家所講的不大相同。」在音韻學上博採各地的方言作為研究之用，甚或用西方最新的語言學知識，對中國傳統的音韻學做出創新，這自然也體現了胡適「整理

⁴⁰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書局，1981），頁219。

⁴¹ 陳寅恪，〈與妹書〉，收錄在氏著，《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

國故」運動中「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之學術精神⁴²。

綜合而言，胡適認為治國學必須打破閉關孤立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在具體作法上，第一在方法上採用西洋學者的科學方法，補救我們的沒有系統的習慣；第二是在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⁴³。而胡適的新思潮意義，最重要的乃是輸入西方學理，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他所謂的「科學方法」，在中國清代乾嘉考證之學中也具備這樣的方法，然而胡適認為西方的「科學方法」更包括實驗室的方法，這是中國學術所不及之處。而以他所關心的中國傳統文史研究而論，此時歐洲的漢學、東方學，如瑞典的高本漢就是其中的典範，也是他所亟欲引入中國學術界中。然而胡適在形成他的「整理國故」運動的內涵時，他對於清代中國所具有的如顧炎武、乾嘉漢學的研究方法，他仍是持肯定的態度，所以儘管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代表，然而文化態度上的激進，並不影響著他在治學方法上，對傳統中國學術的肯定，實際上由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開始，之後受胡適影響的顧頡剛「古史辨」運動，到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新學術運動，都植根於深厚的傳統中學，同時又受西方學術思潮的刺激，方能形成現代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革命⁴⁴。

⁴²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94、125。

⁴³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作品集2—胡適文選》，頁244

⁴⁴據余英時先生指出，在1920、1930年代，由於西學已普遍傳入中國的關係，從中國學術系統中出身的人，此時也同樣可以靈活運用西方的觀念和著述方式，在國故研究領域中寫下傳世之作，以史學界而言，陳垣、柳詒徵、呂思勉、顧頡剛和錢穆可為典型的代表，見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人文與民主》（台北：時報出版公司，2010），頁60。是以顧頡剛雖未出國，惟他仍是王國維所言的「中西之學，盛則俱盛」的境界。

而據此觀照清華國學院導師們的學術思想與治學理念，實際上正是體現胡適「整理國故」新國學研究運動的諸多理念，國學院最重要的精神和學術導師王國維說：「余謂中西之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⁴⁵」。以此檢視清華國學院型塑學風的各位導師、講師，他們正就是王國維所言的「中西之學，盛則俱盛」的境界，他們也為中國新的學術時代提供了重要的貢獻。



⁴⁵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收錄在馬克鋒編，《國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0），頁 274。

第二節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1920、30年代的中國，清華國學院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學術現象，同時期另有南北兩所重要大學：東南大學和北京大學，也都成立國學研究所，是以對這兩所國學研究機構的考察，並放在比較的觀點來看，將有助於瞭解清華國學院在當時國學研究思潮脈絡下的意義。

比清華國學院成立更早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也同時主張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根據1920年的「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劃書」，首先指出當時歐美學者注意于中國固有之學術，惟因中國固有學術率有混沌紊亂的景象，致使歐美學者之研究會招其誤解而益啓其輕視之念，所以北大國學計畫認爲非國人自爲闡揚必無真相以供歐美學者之研究。闡揚中國固有學術是北大的重大責任。然過往中國固有學術混沌紊亂的景象，如六經諸子，學者人自爲說，各家自爲解釋，一直要到乾嘉諸老出而後之學術略有條理系統可得。乾嘉的樸學其整理之法頗有近於近世科學之法，可惜未獲科學之補助。是以計劃書中言：

今日科學昌明之際，使取乾嘉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學之方法，更得科學之補助（整理國學需參考科學，使乾嘉諸老而在，亦斷然從此。觀乾嘉諸老之于天文數理學等，可知晚近能紹乾嘉諸老之學莫如俞樾、黃以周、孫詒讓三氏，已有此趨向）。急圖整理，則吾國故有之學術必能由闡揚而更有所發明，樹世界學術之

偉績，揚吾國文化之精神，本校竊自期焉⁴⁶。

從上面所引內容可知，大體上北大國學研究所是立基於清代乾嘉學術之上，並吸收新的西方「科學方法」來整理研究國學，這其實與胡適「整理國故」主張大致相同。首先文中提及歐美各國新發明之學術率由其相傳之學術闡揚而來，而闡揚吾國固有之學術以期有所發明，正是本校所應負之責任也，「近來歐美學者，已稍稍移其注意于吾國固有之學術」⁴⁷，顯然此時北大也已注意當時歐美的漢學研究。

而關於如何「整理學術」，則是將古人學說則以科學方法為之分析，使有明白之疆界，純一之系統，蓋因今日粹于國學之流往往未涉科學之途徑，使徒守成法以謀整理，其成績或且不及乾嘉諸老，故為今之計（一）選派深于國學之教授赴海外留學（二）選派國學優長之學生赴海外留學。深于國學之教授或國學優長之學生使赴海外留學複習科學之方法。而整理學術必先整理其材料，計劃書中列舉了多項辦法：如徵書；訪書（包含了日本人所著關於中國學術之書等）；購書；抄書（包含有敦煌石室所出之各種古書抄本）；公家所有書籍的撥書、徵求贈書）；編書、輯書、校書、刊書、搜求古器物，其中搜求古器物一項，計劃書提及治古人之書即當考其所載之名物制度。考名物制度足以知其所處之社會狀況、因以見其思想學術之所由來。而歐美之治學術，若歷史學、社會學、地質學等，往往恃古器物為印證。近時日本亦

⁴⁶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劃書〉，《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333-334。

⁴⁷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劃書〉，《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333。

注意于此，不惜巨資潛購古器物于中國者，時有所聞，清治名物制度亦嘗恃于古金器，然猶以文字為根據者多。以文字論之，昔人研究之資專取于字書，近世始及金石。昔人孫詒讓，今人羅振玉、王國維皆推及于龜甲，其于文字發明者甚多，而名物制度因龜甲文以發明者更多，則搜求古器物其有助于整理國故者甚多⁴⁸。

從北大國學門成立之後，在實際運作上，有（1）特別閱覽室設立，（2）歌謠研究會，（3）考古學研究室等設立，依據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 1922 年在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考古學研究室已經設立。本校前購得之甲骨及古代畫磚均已置入。校長又請羅叔蘊先生為通信導師。以后尚擬組織一考古學研究會，商請本校之美學家、地質學家、人類學家、化學家、工學家…對於研究或保存古物有興趣者加入之。俾古物之搜求和研究有一定之計畫，可以逐漸進行。一面與史學系聯合，一面還可以和校外古物學會等機關聯絡。⁴⁹

從以上論及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國學研究計劃書概要及沈兼士所言，大致上有幾點值得提出來與清華國學院的國學研究來作一比較。相同之處是北大的國學研究與清華國學的研究，實際上都處在 1920、1930 年代胡適所提出「整理國故」的國學研究

⁴⁸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劃書〉，《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 334-338。

⁴⁹ 〈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事〉，《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 359。

學術思潮之中，所規劃的國學研究同時都先肯定過往清代乾嘉學術傳統的價值，相當程度上也都強調治學要用「科學精神」，然而這樣的中國傳統學術仍有其不足，尤其在西方歐美的學術對照之下，西方的學術更具有現代的科學精神，北大與清華這一點上同時也了解需學習西方學術的治學精神與理念，但在這計劃書中，雖然北大了解西方學術的重要性，但是當時主持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者，主要仍是以章太炎的門生為主，計劃書中當然也瞭解到新學術中有對新史料開發的需要，如其中意識到當時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的「敦煌學」研究⁵⁰，這其實就是清華國學院導師陳寅恪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所舉出的「敦煌學」，他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⁵¹「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⁵¹，以及新興的用「甲骨文」史料的研究取徑。

就此而論，北大確實在學術研究中重視「敦煌學」和瞭解以甲骨文新史料所形成的「二重證據法」的新史學研究取徑，這可以說是參與學術界的「預流」，此與清華國學院在當時中國學術界中處於國際學術界的最先端是一致的，敦煌學的重要，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以來早已反覆宣說，且王國維、陳寅恪都有專門著作能預此學術潮流。以甲骨文史料研究殷商史，並建立史學研究新典範的「二重證據法」更是王國維

⁵⁰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劃書〉，《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335、338。

⁵¹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36。

震驚史學界的取徑，影響深遠，然而北大與清華的國學研究，雖然在國學研究的觀念上相同之處甚多，惟兩者主要仍是在史學研究具體實踐上，以及對更新的西方學術理解的程度上呈現差異，尤其是清華國學院李濟所引入的西方新興學科的「考古學」，北大雖然也重視「考古學」，重視古器物，但仍是從傳統金石學的角度看待，這可以從北大主持考古學研究室的馬衡看出其中的本質。

胡適在撰寫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所發行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因為是代表當時北大國學門全體學者的學術見解而執筆，在某些方面也是胡適與當時北大國學門的章太炎學派的共同看法，是以某些胡適的見解，其與章門的區別在這宣言中遭到弱化，學者已指出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疑古」部分⁵²。

而近代中國學術史的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主要是來自於今文經學派，如疑古大將顧頡剛更是弔詭的繼承晚清的康有為今文經學⁵³，然而今文經學的思想，章太炎的學生朱希祖則曾經多所質疑，如朱希祖所言「我的議論，雖然似偏重古文，看輕今文，然我所棄取的，不過古文家治學的方法重實證，較勝於今文家罷了。⁵⁴」，胡適雖然代表撰寫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所發行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但是當時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要仍是由章太炎的

⁵² 陳以愛，〈「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收錄在黃清連編，《結網集》（台北：東大，1998），頁 540-544。

⁵³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興起》（台北：允晨，1993），頁 209-218；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錄在氏著，《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1997 二版三刷），頁 95-96。

⁵⁴ 朱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收錄在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97。

古文經學派所掌控，是以《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淡化疑古的這一思想，胡適雖然在北大時期因為新文化運動而聲名大噪，但是劉師培、黃侃明確反對新文化運動對古代文化採取的偏激態度，而太炎門人始終在北大文科處於優勢地位，胡適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北大文科這一特點，故進入北大後，都努力與章門弟子建立良好的關係⁵⁵。故胡適也暫時淡化他早年較疑古的思想⁵⁶，提倡章門弟子所熟悉其師章太炎《國故論衡》中的「整理國故」運動，這是很微妙的思想關係，是以在胡適和章門弟子之中，存在著某種緊張性，故在考量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學術取向及成就上，更需要去關注章門弟子對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影響，以及實際上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真正學術建構，方能瞭解其與清華國學研究所在國學研究上的異同。

而實際上清華國學院亦注意當時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發展，1925年10月30日吳宓日記中記載「十二時，赴歐美同學會用午餐。一時，再訪鄭奠。由鄭君導至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參觀，並由容庚、魏建功諸君引導說明，見古器及檔案之屬」⁵⁷。

1925年12月18日吳宓日記中記載「作函介紹吳其昌等赴北大國學研究所參觀。又介紹劉紀澤赴北大及京師圖書館參觀。」⁵⁸，而先前在清華國學院的〈研究院章程〉中也提及「近

⁵⁵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政大歷史系，1999），頁67。

⁵⁶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245-253；陳以愛，〈「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結網集》，頁540-544。

⁵⁷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三冊，1925年10月30日條，頁88。

⁵⁸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12月18日條，頁109。

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⁵⁹」，是以清華國學院的設立，從設立之前到設立期間，始終注意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相關發展。

又前面曾提吳宓在有關清華國學院的〈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中曾言

今之國學，紊亂殘缺，不絕如線，亟待提倡，以茲保存。而發揮光大，固人人能言之矣。然國內提倡國學之機關甚少，而又辦理不善，人才缺乏。或則陳腐，嫌其過舊；或則偏激，強名曰新；或則但務瑣屑之考據；或則徒事浮華之詞章，至於編查檔案，徵集歌謠，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為者，固亦有其相當之價值，而究未盡國學主要之能事也。⁶⁰

吳宓這裡自然是指北大「或則偏激，強名曰新；或則但務瑣屑之考據。」然而北京大學，在當時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源起之地，同時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又是胡適所提倡「整理國故」運動的根據地，雖然章門弟子仍然掌握著北大國學門，但放在當時中國學術界而言，畢竟北大國學門仍是中國二十世紀新學術之路的重要開端和根據地，其重要性仍是不可置疑地。而當時北大國學門在學術領域主要的開拓有幾個部分：（一）、明清檔案；（二）、考古發掘；（三）、方言調查；（四）、民俗學。這裡可以針對北大國學研究所這些學術領域分別論述⁶¹。

⁵⁹ 〈研究院章程〉，《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下冊，頁665。

⁶⁰ 吳宓，〈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184。

⁶¹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346。

這四項學術領域，除了「民俗學」研究方面，是清華國學研究院較少著重之處，而主要應是北大提倡新文化運動有較大的關係。北大學者對民俗學的注意，直接原因有兩方面：一是英國人類學與日本民俗學理論對中國學者的影響，一是新文化運動促使人們對通俗文學加以注意。北大的民俗研究以徵集歌謠為開端，而這歌謠運動中，周作人和劉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俗學自然蘊含著「學術平等」的觀念。而北大國學門另外三項學術領域則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研究重點。

明清檔案是二十世紀中國新開拓的史料，而對於新史料的追求，在當時北大國學門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人觀念上基本上是一致地。二十世紀的新學術的開展自然得利於新史料的開拓，如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也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而文中王國維更標舉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的學問有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等五項新的史料，並據此新史料以開出新的學術領域。在對史料的新開拓上，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們即有清晰的認識，如前文陳寅恪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所舉出的「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而王國維與陳寅恪都是現代中國新史學重要的奠基者，融合新舊史料於一體，而有重大貢獻。

而梁啟超在影響近代中國史學界甚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書中更是論列專章說史料，而在史料的觀點上，梁啟超更舉出有（一）、在文字紀錄以外者；及（二）、文字紀錄的史料。前者包括（甲）、現存之實蹟；（乙）、傳述之口碑；（丙）、遺下之古物。後者包括（甲）、舊史；（乙）、關係史蹟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經；（丁）、類書及古逸書輯本；（戊）古逸書及文件之再現；（己）、金石及其他鏤文；（庚）、外國人著述⁶²。從中我們可以知道梁啟超對於史料的擴張是相當重視地。而這本二十世紀中國新史學的奠基之作中，梁啟超所提出的觀念，後來都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新學術之路的方向。

舉其要者，如對「文字紀錄以外者」的史料，梁啟超則說「惜舊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聖賢豪傑言論行事外不認為史，則此等史料，棄置不顧，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類遺蹟之可貴，而分類調查蒐積之；然後用比較統計的方法，編成抽象的史料，則史之面目一新矣⁶³」。梁啟超的史學觀念已迥然異於傳統中國史學，且後來傅斯年所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對於史料的觀念不限於傳統的文獻資料，而帶來全新的史料學視野，也都在梁啟超的史料學觀念上更進一層。梁啟超對於新的史學研究工具亦有清晰的認識，他說：「今之瓦當磚瓦，殆成考古一專科矣。…地層中之石器：茲事在中國舊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質學漸昌，始稍有從事者。他日研究進步，則有史以前之生活狀態，可以推見也」，而梁啟超對於新的考古學已早能分辨歷史學家與骨董家相異之處，所謂「唯史學家所以與骨董家異者，骨董家之研究，貴分析的而深入乎該物

⁶²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 83-110。

⁶³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87。

之中，史學家之研究，貴概括的而橫通乎該物之外⁶⁴」。梁啓超充分認識新的考古學的意義，是以與清華國學院另一重要講師（導師）李濟在學術觀念上是同其精神的，而兩人維持了很好的交誼⁶⁵。

而梁啓超對於二十世紀古籍的再現，也特別標舉出甘肅之敦煌石室，其與王國維與陳寅恪對於敦煌新史料的重視是一致地，又對於在河南安陽的小屯甲骨文，所謂「殷虛書契」也能重視其中的史料價值，他指出甲骨文：

其發現之地為殷故都，其所繫為殷時文字，字之可識者略已過千，文亦寔可讀。於是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蓋吾儕所知殷代史蹟，除《尚書》中七篇，及《史記》之《殷本紀》、《三代世表》外，一無所有；得此乃乎若闢一新殖民地也。…要之此次之發現，不獨在文字源流學上開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於古代史之全體⁶⁶。

故相對於章太炎對於甲骨文史料的排斥，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等對於新史料的視野，顯然更甚於章太炎，而北大國學門沈兼士等章門弟子在這一點上有比其師章太炎進步的一面，但畢竟仍在章門的籠罩下，相對而言，在史學研究的開拓性就不及清華國學研究院走的遠。

而梁啓超重視外國人著述，他特別舉出外國人著述「其於

⁶⁴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90。

⁶⁵ 李光謨，〈從梁任公的家書看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軔〉，收錄在氏著，《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6-10。

⁶⁶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101-102。

中國古物，其於佛學，其於中國與外國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詣之書，爲吾儕所萬不可不讀。蓋彼輩能應用科學方法以治史，善蒐集史料而善駕馭之，故新發明往往而有也，「日本以歐化治東學，亦頗有所啓發，然其業未成⁶⁷」，這些都顯示正如許冠三所論列的梁啟超「他不但步劉知幾、章實齋之後塵，擴張了史料領域，而且隨宋清金石考古家和羅振玉、王國維以及東西洋漢學家之後，看重『文字紀錄以外』的實蹟，尤其是新發現的各種文物，雖東南海濱村中古屋，亦不放過」⁶⁸。

而在「考古發掘」方面，實際上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亦能了解其學術研究的意義，國學門主任沈兼士 1922 年在〈籌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經費建議書〉中已舉出：「古代器物，爲考古學之重要材料。但此等材料向來皆零星向古董商人購入，于研究上之障礙甚大」，他同時指出（1）古物之發現，多由於無意識偶然的發現，發掘者既無相當之學識，器物因之損壞者，往往有之；至於地層之紊亂，位置之錯移，更無論矣。此爲無意的損失。（2）古董商爲蒙混賞玩家起見，得于甲地者，往往冒稱出于乙土，連帶可以明瞭其時代者，故意錯亂之以希圖善價；學者在此對於地方及年代遂不得不費一番無謂之考證，而不易更進爲比較綜合的研究。此爲有意的障礙。所以爲掃除這些弊病，沈兼士以爲必須集合各專門學者組織一古物調查發掘團，應用智慧的測量，爲考古學的發掘，譬如鉅鹿宋大觀故城，必須先行設計，然後開掘，再施以科學的整理，如意大利之於羅馬邦卑，於學問爲真有益。其他如安陽之甲骨，因風水忌諱而土人不敢發掘之地尙多；澗池

⁶⁷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102。

⁶⁸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台北：唐山，1987），上冊，頁 29。

石器時代之古物，雖經安特生博士發見，而我國學者從未身蒞其境。

而基于這樣認識，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也成立「考古學研究室」，但是「為經費所限制，無力發展，深為可惜」，而沈兼士甚至期望「各國對於庚子賠款均有退還我國興辦文化事業之主張，深望此事實行後能每年撥給北京大學研究所補助經費若干元（倘蒙國內外公私團體及個人捐助經費，亦極歡迎），以為蒐集材料，培養人才，延聘學者，建築房屋之用。」⁶⁹，經費問題，沈兼士在 1923 年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報告〉中，亦再度對「考古學研究室」的發展提出：

國學門一年來關於考古學方面雖著力較多，而成績卻還不甚佳。中國之考古學向無系統；古物之為用，僅供古董家之撫玩而已，我們現在雖然確已逃出這個傳統的惡習範圍之外，知道用科學方法去研究。但為財力所限，未能做到自行發掘，實地考證的地步。…今年河南孟津、新鄭掘獲周代古器甚多，為宋以來最大之發現，于考古學上之貢獻極鉅。前商請蔣代校長撥款請馬叔平先生前往考察，不久當有報告來校。⁷⁰

考察沈兼士在 1922 年、1923 年發表的這兩篇文章，特別值得注意，實際上已經標舉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考古學方面，何以在學術成就上會亞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原因，其中經費問題是

⁶⁹ 沈兼士，〈籌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經費建議書〉，收錄在氏著，《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62-364。

⁷⁰ 沈兼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報告〉，《沈兼士學術論文集》，頁 367-368。

關鍵因素之一。沈兼士主持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基本上已能領略當時世界學術上，新的考古學在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意義和重要性，沈兼士更能理解這種考古學與傳統的古董家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是以他當時就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中設立了「考古學研究室」，並請當時被認為中國傳統金石專家的馬衡（馬叔平）來主持這一研究室。

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此項考古學而論，一是經費問題，二是領導考古學的人馬衡這兩項因素，其與清華國學院的差異，終造成何者才能開拓近代中國新學術之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下面就分別詳論之。經費部分，沈兼士已多所指出北大國學門的不足，然而相對而言，清華國學院所在的清華學校（清華大學）係由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而成，在經費上是相當寬裕的⁷¹，是以北大與清華在經費上的差別，著實影響其學術的成績，而兩校在考古學方面主持其事者，北大是傳統中國金石學專家馬衡，相對的最能代表清華國學研究院在考古學及其發掘上的成就者，乃是由在美國受過專業考古人類學訓練的李濟，而他所進行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研究發掘，後來並正式寫成的中國第一本現代考古發掘報告《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一書，其發掘係由李濟與袁復禮於1926年冬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而西陰村發掘是由清華與美國佛利爾藝術館合作進行的。清華國學院1925年於研究院第三次教務

⁷¹ 有關清華學校的經費來源可以參考，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101-115；而當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生藍文徵後來回憶1920、30年代的學校狀況，曾說：「此後數年間，北京國立八校，因經費拮据，弦歌時輟，惟清華學校，經費獨立，基礎深厚，實大有可為。」，參看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387。

會議中提出研究院發展計畫，提及組建考古陳列室和開展考古調查報告，而西陰村的考古發掘由清華國學研究院組織，經費由佛利爾藝術館承擔⁷²，除了經費問題決定北大與清華的高下外，其次更重要的是，雙方在考古方面的學術領導人馬衡與李濟的差異性及雙方的合作者有關。北大國學門的考古事業發展是與當時的「東方考古學協會」息息相關，而這相當程度涉及當時中日政治與學術交涉的問題，而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所以優於北大國學門的考古成就，則係清華是與美國學術合作的關係，這點值得進一步分析。

馬衡擔任當時北大國學門的考古研究室的主任，而當時北大研究所考古學會與日本東亞考古學會聯合組成「東方考古學協會」，中、日雙方在考古學上有所合作。學術史專家桑兵對於「東方考古學協會」則有極精闢的考證分析。他指出中國古代有金石古物學而無考古學，現代考古學進入中國學正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新國學」的興起關係密切，而當時有三個機構組織與中國考古學有關，分別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考古學研究室；一是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一是農商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後者偏重於史前考古，北大、清華則更為重視文明史考古。從外部影響看，大體上北大與日本交往多，清華與美國關係深，地質調查所則與歐洲關係廣。三者的起步略有早晚，後來的作用則相去甚遠，尤其是北大國學門的考古學研究室，作為中國乃至東亞最早的專門考古學獨立機構，其影響與這一地位很不相稱，關鍵則是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與外部聯繫的成敗得失，也就是與「東方考古學協會」的合作關係。

⁷²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 68-69。

「東方考古學協會」是 1925 年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會和日本東亞考古學會聯合組成。然而此學會一開始即與政治有所關涉，因為在籌備及此後的活動中，日本的朝鮮總督府和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起著重要作用。而在「東方考古學協會」成立之後，實際上中日雙方對於如何利用這一共同機緣並發揮各自的作用，想法並不一致。日方動議日中合組考古學機構，公開聲稱是「為促進東亞諸地的考古學研究，與各國特別是鄰邦中華民國考古學增進友誼，交換知識」，但日方實際上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利用合作名義，便於在中國境內調查發掘活動，尤其想參與舉世矚目的殷墟發掘；二是派遣留學生來華學習和考察。此舉與日本的大陸政策以及風尚轉向東方主義相吻合，因而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其發掘考察及派遣留學生，均由外務省、關東廳和朝鮮總督府提供資助。

「東方考古學協會」作為日本「對支文化事業」的一環，雖以「提攜中日兩國間的精神與文化」為目的，實際上日本官方一開始就視為是「帝國政府的事業由帝國單獨實施」，只是鑒于該事業主要在中國境內進行，須與中國人合作，才要尊重中國朝野的希望和意向。而中方雖然也有引進外國財力與技術的願望，以落實長期不能付諸實現的實地考古發掘設想，卻較少政府意願參與合作，且雙方合作限於學術本身。因此，在「東方考古學協會」的旗號之下，雙方的不和諧時有表露。不過，中日雙方在「東方考古學協會」內部的分歧，最終還是削弱了日本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力，與之關係最為密切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會，成就及影響反而不及清華國學研究院。

而當時日本重視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原因之一是北

大國學門考古學會在北京的考古學機關中具有官學至尊的地位，這被看重政府行爲的日本學者認爲是對華施加影響的有力支撐。與此相對，他們視美國系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中的考古學機構爲「私學」的代表。然而清華國學研究院以人類學講師李濟爲主，設有考古學陳列室和考古學室委員會，由李濟擔任主席，憑藉較多的資金以及美國考古學家的有效合作，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考古學穩步發展，成效明顯，後來成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台柱。

而在日本與北大在考古學交往的過程中，似乎已經察覺選擇北大這所官學的偏頗之處，是以也試著加強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等機構的聯繫，以圖調整彌補。日本當時預期通過組建東方考古學協會達到參與殷墟發掘的目標，也曾通過來訪的北京圖書館金石學研究室研究人員劉節了解有關的狀況，並派梅原末治、內藤乾吉、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人前往參觀⁷³，然而當時主持殷墟發掘的傅斯年一則是著名的「民族主義」史學家⁷⁴，對與日本的學術交流自是排斥⁷⁵；二是當時傅斯年要來成就他拔尖事業的新學術之路的合作夥伴，是他心目中代表新的學術思維和訓練，從

⁷³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五章〈東方考古學協會〉，頁114、126-130。

⁷⁴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506-515；Fan-sh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49-156。

⁷⁵ 這點傅斯年在1930年時，就曾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名義正式致函給東亞考古協會，明確表達史語所無意願加入東亞考古協會，實際上就是拒絕與其合作的意願，參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第一卷，〈傅斯年致東亞考古協會〉函，1930年4月15日，頁285-286。

美國取得人類考古學專業知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李濟，而非當時主持北大國學門考古學會的馬衡，實際上馬衡在傅斯年心目中是一位傳統的金石學專家⁷⁶。

就傳統金石學家而言，馬衡誠然已具有某些現代考古學的知識和思維，如 1923 年馬衡受北大國學門委託，前往河南新鄭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並親自撰寫〈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在文中馬衡就說：

竊以為古物既偶然發現，當于發現之地，集合專家，作有計畫之發掘。雖破銅、爛鐵、殘磚、斷甍，亦必記其方位，纖細靡遺。如此則一：地點不致謬誤，可藉以知為古代之某時某地；二、器物之種類、數量、方位不致混淆，可以明各器物之關係及其時之風俗制度；三、建築物不致有意毀壞，可以覘其時之工藝美術」。而對於當時新鄭古物出土的調查，馬衡亦能重視一、發現之時日，二、發現之地點，三、發現之始末，四、器物之種類，五、發掘之圖及器物之位置，六、器物之製作，七、器物之時代，八、埋藏器物之原因。⁷⁷

從以上馬衡對考古發掘的看法，當可以了解，馬衡自然不是傳統金石學家的格局所能範圍，也初步具有現代考古學的基本知識，但是另一方面馬衡並未受現代歐美考古學的正式學院訓

⁷⁶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收錄在氏著，《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2004），頁 151-152。

⁷⁷ 馬衡，〈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收錄在氏著，《馬衡講金石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 235-238。

練，而他在北大任教時，一直專門講授金石學課程，馬衡當時在金石考古學方面可以說是首屈一指，1927年他將自己講授金石學的講義編印校訂定稿成《中國金石學概要》，而此書出版後，馬上引起轟動，日本、美國等國的專業雜誌相繼加以轉載，馬衡因此聲名遠播，1927年初還曾應日本學術界的邀請，東渡講學半年，在東京大學、九州大學、慶應大學等校作《中國青銅時代》等專題演講。而一般認為馬衡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匯集在遺稿《凡將齋金石叢稿》中，主要貢獻有幾方面：關於金石學的系統論述；銅器與銅器斷代的研究；漢魏石經的研究；石鼓文及其他石刻的研究；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研究；書籍制度的研究，並精於古物與書畫鑑定⁷⁸，從這裡可以看出，馬衡確與現代考古學有段距離，實際上馬衡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國維學術情誼頗深，這可從現存的《王國維全集·書信》及《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中兩人數量龐大書信往返可知，但兩人的學術交涉主要仍在傳統金石學術的討論⁷⁹，其實王國維在近代中國學術上是重要的開創大師，而他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也影響巨大，王國維所謂的「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而王國維文中所謂「地下之材料」則僅有兩種：一、甲骨文字（殷時物，

⁷⁸ 余建偉、沈松平，《馬衡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頁43、46、178。

⁷⁹ 這方面的書信史料充分顯示，王國維與馬衡在學術上的情誼和學術精神的相知相惜，可參考這兩本書信史料書，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台北：華世出版社，1985）；及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自盤庚遷殷後，迄帝乙時），二、金文（殷周兩代）⁸⁰，顯然王國維仍是傳統金石銘文學術傳統的延續，而非現代的考古學對實物形制的研究，所以清華國學院的李濟就曾批評過王國維不懂現代的考古學⁸¹。桑兵從近代中國學術史的發展就曾指出：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自成立之日起，就認定實物與遺跡較載籍之於上古史更為重要，只是一直困於財政與技術，加上其中的專家還有金石彝器的本行，遲遲未將考古發掘付諸實踐。在此期間，北京大學雖然在中國學術界與瑞典學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聯合組織的西北考察團中扮演要角，仍然重採集輕發掘。與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的合作，本來未必不是良好機緣，可以在重建古史的活動中占據重要位置。因為這恰好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從發端而初盛的時代。以成果卓著的殷墟發掘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論，其觀念宗旨的淵源明顯由北京大學國學門、廈門大學國學院、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一脈相承，但具體事業卻主要繼承清華研究院國學科，以致於後人不免誤解抹殺，將北大國學門視為單純疑古。而北大在實行考古發掘方面陷入困頓，其他原因之外，作為合作夥伴的以日本東西兩京帝大合組的東亞考古學會難辭其咎。正是在與之合作的過程中，北大

⁸⁰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頁2、4。

⁸¹ 李濟，〈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收錄在氏著，《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卷五，頁207-208。

坐失了天時地利的良機，最後不得不將首席國立大學
在這一至關重要領域的應有地位拱手讓人。⁸²

而曾經歷 1920、30 年代中國新學術建構的顧頡剛之觀察值得在這裡指出來。1924 年顧頡剛為北京大學譚惕吾等女生演講國學大意時，就觀察出現今國學的趨勢有五派。一是考古學，用古代的實物和文物來解釋古史，…羅振玉、王國維是這一派的代表。二是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研究亞洲漢族以外的各民族的文化，他們在甘肅、新疆、中央亞細亞等處發掘，有巨大的發現。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國羅福成、張星烺、陳寅恪、陳垣等都是這一派的代表。三是地質學，…因發掘地層而得有銅器時代以前之古物，可助古史學之研究，因到各處實地調查而對歷史地理學發生新解釋。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都是這一派的代表。四是學術史，…要求把文化的進程做一個系統的排列。胡適、章炳麟、梁啟超等都是這一派的代表。五是民俗學，…北大國學門中的風俗調查會和歌謠研究會，都是向這方面進行的表示。周作人、常惠等是這一派的代表。這五派學問都是二年來的新進展，舊式學者夢想不到的⁸³。

顧頡剛此時不久前才因為「古史辨」運動震動中國學術界，然他眼光銳利的觀察到當時中國學術界新的發展趨勢，其中他所提出第一個國學趨勢「考古學」則與現代意義的考古學指涉不同，因為現代學術意義的考古學，在中國才剛由李濟開其端⁸⁴，

⁸²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帝五章〈東方考古學協會〉，頁 131。

⁸³ 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03-104。

⁸⁴ 李濟 1923 年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該年 6 月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同年夏季返國就任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秋末始赴河

不過「用古代的實物和文物來解釋古史，…羅振玉、王國維是這一派的代表」，這自然是指王國維當時根據甲骨文來考釋中國殷商古史的「二重證據法」，在當時國學權威章太炎還排斥此一途徑之時，顧頡剛已看出這一新的史學取徑新的意義，而實際上這正是後來清華國學研究院治學風格的一大特色，本文第三章會再詳論。而「第二是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正是當時的歐洲漢學、東方學及受歐洲影響的日本漢學的研究，後來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陳寅恪與當時歐洲和日本的東方學、漢學學者交往頗多。然而當時北大國學門主其事的沈兼士等章太炎門派，並無真正融入當時的歐洲東方學、漢學學術界之中⁸⁵。而顧頡剛所言的「地質學」因發掘地層而得有銅器時代以前之古物，可助古史學之研究，倒是比較接近清華國學院李濟之後所引進來的現代西方的考古學。另外「學術史」則清華的梁啟超與北大都同時兼具，唯獨「民俗學」研究，在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成為北大國學門的特色，而非清華國學院的學術所長。

而在經過二十餘年後，顧頡剛 1945 年總結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發展而撰寫的《當代中國史學》書中，對於民國以來的史學的進步，顧頡剛歸納為幾個助力分別是：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五四運動之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明顯的，是

南新鄭作考古調查。而以中國人為主的正式科學的考古調查，是在 1926 年李濟以清華國學院名義展開的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參見李光謨，〈李濟先生學術年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頁 353-354。

⁸⁵ 陳來，〈新國學之路—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光明日報》，2009 年 10 月 26 日。

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洗禮，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得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出來；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在近百年中，新史料發現很多，主要有各地發現的史前遺物，如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銅器，西北發現的古代文物，內閣大庫與軍機處保藏的檔案，與新出現的太平天國史料；第四是歐美日本漢學研究的進步。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幫助；第五是新文學運動的興起，這是使小說、戲曲、俗文學研究興起的重要原因⁸⁶。

實際上，顧頡剛觀察近代中國學術史發展的這兩條史料，先後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時間，而他也親身參與這一近代中國新學術之路的建構，是以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所歸納民國史學進步動力中的前四項因素：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新史料的發現、歐美日本漢學研究等，也都是當時清華國學院幾位導師及學生輩所遵循的治學風格，惟獨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小說、戲曲、俗文學研究在當時未允為清華國學院的治學重點⁸⁷。

而桑兵同時考察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曾提出「江淮已無足言」，其實主要指當時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學

⁸⁶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3。

⁸⁷ 當然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在早年學術生涯，頗致力於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研究，後來赴日本之後，才轉治中國經史之學，而這一領域的專長，在他國學院時期所授的課程、撰述的論文及指導學生的論文範疇，大體上都不再涉及。惟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再三致意於小說作為史料的重要性，而他的學生謝國楨後來在他的明清社會史研究中，也實踐其師的史學理念多所運用小說的史料，雖然如此，然畢竟與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特別大張旗鼓設立研究室，並由專人負責小說、戲曲、俗文學研究和蒐集是有很大的距離。

術界，占據要津而貢獻水平不稱其職。然而浙江籍人士在當時主要是指章太炎門生，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即是重要的大本營。此時國學門主任是沈兼士，國學門委員會除當然委員外，只有胡適一人非浙籍。二十世紀 20 至 30 年代，正值中國學術界人才輩出之時，占盡天時地利的北京大學，因為人為因素而不能吸引一流人才，真正形成學術中心，不僅有礙於中國學術的發展，也影響到中國學術界的國際地位和聲譽。桑兵並舉出吉川幸次郎在 1928 年到 1931 年到中國北京大學留學時，原本目的是秉持狩野直喜的教誨，想用當代中國學人同樣的方法治中國學，但在北大三年，聽馬幼漁、朱希祖的《中國文字聲韻概要》、《經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史學史》等課程，甚至包括到中國大學聽課，充其量只得到清學的殿軍的餘緒，而不及中國學術的前鋒。而 1933 年來華考察交流學術的國際漢學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原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員，論人則推崇王國維、陳垣，論機構則讚譽中研院史語所、燕京和輔仁，對北大似乎置若罔聞，而甚至浙派宗師章太炎對弟子的表現也頗為不滿⁸⁸。

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北大的「整理國故」運動與清華國學院的「整理國故運動」之所以最後形成差距，從文化態度來看，也是值得關注的面向。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吳宓在文化態度上向來是較為保守的，而北大則是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鎮，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人則是反傳統人物的代表，而開展 1920 年代以來的「整理國故」運動則是胡適的重要學術實踐，然而胡適雖然可說是贊成推動「學術研究」

⁸⁸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帝二章〈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頁 33、39-40。

的「整理國故」運動，然而因為受到他文化態度反傳統思想的「啓蒙批判」之影響，是以一則使他對於如何看待「整理國故」運動，形成前後在思想上的差異，二則也因為他是北大國學門重要的學術擘畫者，是以也影響著北大國學門的國學研究。

胡適在 1919 年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說「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而「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 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而對於新思潮的運動中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應持有的態度，胡適則認為是「評判的態度」。而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主張則是「整理國故」，因為古代學術思想向來沒有頭緒，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這叫作「整理國故」⁸⁹。是以在更重要的 1923 年〈《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胡適更是標舉出治國學，必須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而在方法上要學習西方、日本學界用科學的方法，和新的材料去研究國學（尤其是學習高本漢、和鋼和泰這些西方漢學、東方學者）。⁹⁰

從上面討論，可知道胡適早先提倡「整理國故」運動時，是能用客觀的「學術研究」來看待國學的研究，這一點在同時期

⁸⁹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1994），頁 42、47-49。

⁹⁰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頁 243-244。

胡適討論「整理國故」的文章〈研究國故的方法〉(1921年)⁹¹和〈再談談整理國故〉(1923年)⁹²二文中，都呈現這種學術思想態度。但胡適這一思想隨即遭到陳獨秀、毛子水等人的質疑，是以到了1927年之際，胡適又發表了〈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似乎與前文立場有所差異，文中提及相信「爛紙堆」裏有無數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厲害勝過柏斯德(Pasteur)發現的種種病菌。只爲了我自己自信，雖然不能殺菌，卻頗能「抓妖」、「打鬼」。而「整理國故」這裏面有絕好的結果，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這是化黑暗爲光明，化神奇爲臭腐，化玄妙爲平常，化神聖爲凡庸，這才是胡適所謂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⁹³。而在文化態度，胡適從五四以來一直是反傳統文化的代表，是以當他1920年代之際，剛提出對中國傳統文化「整理國故」的學術主張之際，學界對於他這種作爲自然有所爭議，於是或許在遭受質疑後，胡適又提出「整理國故」是「打鬼」的說法。

現任中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的陳來對此有一說法值得反思，他認爲胡適在五四時的反傳統文化是屬於他「啓蒙批判」的一面，而「整理國故」則屬於「學術研究」的一面，打倒傳統呼籲歐化的文化革命，從這樣的立場來看，國學是被視爲垃圾，

⁹¹ 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347-351。

⁹² 胡適，〈再談談整理國故〉，《國學與現代學術》，頁406-408。

⁹³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台北：遠流，1986)，頁160。

必須破除的舊文。而從學術立場來看，國學至少含有豐富的資料，用新的方法整理國故，形成新的國學，是中國的學術可以立足於世界的最可行的路徑，國學研究將成爲中國近代學術直接增長點。而研究國學並不一定要以從國學中求得天經地義爲前提，但一味地反傳統精神顯然是不能支持國學研究的。在胡適的身上，存在著「啓蒙」與「學術」的內在分裂，而最終是啓蒙壓倒了學術，在胡適的「整理國故」的觀念中，啓蒙與學術交疊變奏，最後「啓蒙壓倒學術」。「整理國故」運動在全國雖然引出不少的試驗、好的結果，但「整理國故」運動的倡導人胡適，卻受限於其啓蒙的文化觀，而最後對整理國故的懺悔，這不僅使他在國學研究方面無法展開拳腳、提高境界，也連帶影響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國學研究未能達致理想的境界。

與之相較，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辦，也是「整理國故」運動下的產物，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吳宓在文化觀上與胡適不同，他們在精神上沒有那種啓蒙與學術的內在分裂、內在緊張，國學之研究對他們沒有任何文化心理上的羈絆，而他們可以義無反顧地追求國學研究的卓越境界，更廣義一點看，1920年代國故研究最高水平的學者（包括羅振玉、柯紹忞、陳垣），他們的文化觀都不是激進的啓蒙文化，而多屬文化保守主義，他們的文化觀不僅沒有導致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排拒，更沒有影響他們對新的國學研究方法的採用⁹⁴。另外如湯用彤、錢穆等人復是如此，陳寅恪所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大概可以說是這些學者他們

⁹⁴ 陳來，〈啓蒙批判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變奏－整理國故運動中的胡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10-11。

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綱領。而基於這種對傳統文化的親和態度，當轉移到國學研究時，它也無形中形成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

從前文可知，自 1919 年起胡適對國學的態度舊充滿了內在緊張，一方面認為中國文化沒有什麼價值，一方面又認為整理國故的必要性（這可從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即可知），固然，一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不必預先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但若認為中國文化根本沒有價值，便很難支撐學者長期深入的研究動力。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之所以在整體成就上不如清華國學院，或許在文化態度上所採取的立場是其中不容忽視的因素。



第三節 東南大學國學院

清華國學院主任吳宓當年在〈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中所指陳的有些國學研究「或則陳腐，嫌其過舊⁹⁵」，一般或以爲是指當時中國南方學術的重鎮東南大學，然而仔細考察，應是指當時國粹派的保守主義，而不是梅光迪、柳詒徵的東南大學「學衡派」。

東南大學國學院也是在當時「整理國故」的學術氛圍中建立，對當時東南大學國學規劃的認識，當有助於我們瞭解清華國學院在 1920、30 年代中國國學研究思潮中所處的地位。

在 1923 年由顧實起草，東南大學國文系通過提出的〈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⁹⁶中，規劃了這所位於中國南方學統的重要大學國學研究的主張和內涵，計劃書中說。「蓋凡一國歷史之綿遠，尤必有其遺傳之學識經驗，內則爲愛國之士所重視，外則爲他邦學者所注意。遠西學風莫不尊重希臘學術，羅馬學術，及其本國學術，吾國亦何獨不宜然。故今日整理國學，爲當務之急，況夙號世界文明之一源，焉可稍自失其面目哉？」，計劃書中特尊重希臘、羅馬學術的古典精神，適與梅光迪、吳宓等「學衡派」主張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義精神會通。而東南大學的整理國學，顯然更富有文化民族主義的考量，這也向來與北方學統的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有些距離，或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對中國文化的溫情敬意較爲接近。然東南大學國學院的規劃認爲，今

⁹⁵ 吳宓，〈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 184。

⁹⁶ 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收錄在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313-321。後文所引東南大學國學之規劃內容，皆出於此文。

日國學之範圍，應當注意於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不獨中國舊有書籍遺落他邦者，亟當收回。凡是他邦人如近則日本朝鮮越南，遠則歐美諸國，有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亦當在整理之列。當然這裡看出東南大學國學院的整理國學，對於當時歐美、日本亞洲有關中國國學書籍的重要性亦能了解。而其所規劃的整理國學，則分爲

客觀：以科學理董國故—科學部

以國故理董國故—典籍部

主觀（客觀化之主觀）：詩文部

在「科學部」部分，計劃書中則提及近世學術大概分爲科學、哲學、文學三部，實際上則將哲學、文學亦以科學視之，故今日學者之間，爭言以科學理董國故。故在國學計劃書中對所謂的以「科學」理董國故則有相當的保留。計劃書中批評傳統中國經典，後來經過學官博士利祿之徒的詮釋後，已經是一經說至百餘萬言。例如《堯典》兩字之說到了十餘萬言。而蔡邕所謂的「章句皆用意傳，非其本旨」。而此「章句鄙儒」則與「訓詁通大義」之通人是不相同地，對此在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國學規劃看來，近世他邦的人士，往往掇拾中國故記，撰成科學書，如《中國文學史》、《中國文明發達史》之類，然甚爲膚淺失當，很少卓然可觀者。由是觀之，則非國學湛深之士，若貿然輕言以科學理董國故，那將是「所不致爲漢博士之續者幾希。非郢書燕說，貽譏方聞，則斷章取義，譁眾取寵而已」，是以他們認爲科學家原理多屬假定不確定，就如同漢博士說經，家法森嚴，莫衷一是，就算是國學湛深之士，精通科學法則來理董國故，並作成種種科學書，然結果猶不免是見仁見智之談。據此可知東南大學國學院對於當時

西方的漢學、東方學所採用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中國是相當保留地，此與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以及清華國學院肯定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並以歐洲漢學、東方學為典範是頗為不同地。

實際上東南大學的國學研究計劃書，對科學方法治理國學的意見是呈現曖昧地，有時是頗為懷疑的，但同時又不免又提出要「科學整理國故」的主張。或許東南大學是強調中國本位文化為體，然「科學方法」在此時中國已是至高無上的價值，是以他們也符合時代潮流而提出科學的整理國故主張。

而東南大學國學院對國學研究採取的方法，則是先從本國無數亂書中來抽列條理，因為要成一有系統原理原則的學術書籍，必先為巨大之長編，對此所規劃的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約有三方面：一，學說；二，圖譜；三，器物。其中的器物則取考古的方法，或共同搜羅古代圖譜器物。而考察東南大學這種國學研究，大體上還是在傳統中國經史考證學的範疇中。

而東南大學國學院擬造作各種學術書目如下：《中國民族史》，《中國語言文字史》，《中國思想學術史》，《中國文學史》，《中國詞史》，《中國曲劇史》，《中國美術史》，《中國天文數學史》，《中國法制史》，《中國經濟學史》，《中國交通及國際交通史》，《中國農業史》，《中國商業史》，《中國工業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教育史》，《中國宗教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風俗史》，《中國風俗史》，《古今人名地名大辭典》，《國學大辭典》，《文學大辭典》等等，而這些都是長編之作，是審正名實或模仿外國的百科全書，或編纂類書，都屬於東南大學國學院所認為的科學整理國學的一環⁹⁷。

⁹⁷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國學的歷史》，頁 314-315。

從上而知，東南國學院的國學研究思維，自然已經擺脫了過往中國學術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術認知，而能從西方學術的分科來重新研究中國傳統學術，這其實正是胡適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提倡的「專史式的整理」，這點呈現出東南大學國學院國學研究規劃某些現代化的趨勢，然東南大學國學院的研究方法仍與中國二十世紀新的學術取徑有段距離，其與北大國學門非但有研究方法上的差距，更與清華國學院在新的學術取向上顯有距離。

東南大學國學院的規劃，也能了解「考古學」的重要性，然深入來看，他們仍不脫中國傳統金石學的範疇，在國學院的工作，亦未見有真正如同清華國學院李濟的西陰村的實際田野考掘，退一步而言，雖然北大國學門在考古學方面，未能有重大的成就，然主其事的馬衡起碼是一個努力要從中國傳統金石學傳統積極學習西方現代考古學知識的過渡人物⁹⁸，而實際作為上，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有考古學會專門機構的設立，同時與日本的東亞考古學會合組「東亞考古學協會」，相當程度上有一些成績和發展，與此相較東南大學國學院在此二十世紀新的學術領域中，並無實際的成績，所以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國學研究恐仍是較在中國傳統學術的範疇中。

而另外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國學規劃中，在「典籍部」部分，計劃書提到

蓋今日學子之大患。正在徒誦數冊講義，報章，雜誌，
及奉某某學術書為神聖，而未嘗課讀古書。即課讀古

⁹⁸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頁336。

書矣，亦以著有科學系統之色彩，狃于成見，信口開河。譬如戴西洋有色眼鏡，視中國所有，無一不可變為西式。是其弊也，上焉者比諸魏晉玄風，程朱理學，皆戴有印度有色眼鏡，而讀中國書。下焉者比諸唐宋八家，明清八比，亦嘗勞精敝神于頭項腹尾之系統，徒造成所謂投時利器，小試聖手也，豈不難哉。且科學本為不完全之學，今日學者間之所公認，尤必有以補其闕，故更進之以國故理董國故說……

篤而言之，以國故理董國故者，明澈過去之中國人，為古服華裝，或血統純粹之中國人者也。以科學理董國故者，造成現在及未來之中國人，為變服西裝或華洋合婚之中國人也。國學囊括古今，貫澈過去、現在、未來三大時代，故二者殊途同歸也。⁹⁹

實際上，東南大學國學院是著重傳統的「考文之要，首在疏證」的治學取徑，而走的方法則是段玉裁的「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義之是非」，這就是東南大學國學院要走的「理董古書，在乎以周秦人之書，疏證周秦人之書」，及「要以何一時代人之書，即以何一時代人之書疏證之。以其字句疏證字句，以其篇章疏證篇章，以其義理疏證義理」。「然而時代同，則所用之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義理亦必同。一經疏證而奧隱自闢，真偽立見」¹⁰⁰。這樣的國學規劃主要是著重中國傳統古書經籍鑽研的功

⁹⁹ 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國學的歷史》，頁 316。

¹⁰⁰ 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國學的歷史》，頁 316。

力，而非借助於當時西方、日本所謂以科學方法研治中國傳統的路徑，這也造成東南大學國學院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清華國學院希冀引進當時西方、日本的漢學和東方學的研究方法，大異其趣。據此東南大學國學院所規劃的「以國故理董國故」的辦法，約分為三端，分別是疏證、校理與纂修¹⁰¹。

從上可知東南大學國學院不欲「戴有西洋、印度有色眼鏡」來看待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學規劃，其希望「以國故理董國故」，細繹其意，仍希望能站在中國傳統的學術上，用過往的經典注疏的取徑，在古書原典上下工夫，或可說近於一種漢學考證的傳統方法，盡量不受當下時代的思潮（尤其是西方的科學方法）的影響。

顧實另有兩篇文章，更可以補充他對國學研究的看法。以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師生為主力的國學研究會，成立於1922年10月。國學研究會由陳鐘凡、顧實、吳梅、陳去病和柳詒徵指導，編輯發行會刊《國學叢刊》。此外每周還邀請校內外學者進行學術講演，包括吳梅〈詞與曲之區別〉、顧實〈治小學之目的與其方法〉、柳詒徵〈漢學與宋學〉、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等十次，這十次演講集結為《國學研究會演講錄》第一集付梓出版。而顧實在〈《國學研究會演講錄》序〉中，則以為大凡學術思想都有時間和空間上的劃分，國學在空間上與西學相對，在時間上只向歷史，由此框定了國學的大致範圍，然對於學校的教育，顧實批評說：「加以邇來出身學校者，未嘗根本課讀古書，平素所習者，數冊講義，及時行報章雜誌而已。一涉講者引經據典，便覺莫明所謂。若再從經典著論，更墜入五里霧

¹⁰¹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國學的歷史》，頁317-318。

中矣。¹⁰²」，顧實同時在〈《國學輯林》發刊辭〉中言及「故如考據家、性理家、詞章家，故皆當認為國學之鉅。然猶有大者，則群經百家之奧義，聖哲英豪之遺型，尤當尊為國學之精義¹⁰³」。

是以顧實的思想，「課讀古書」傳統讀書人的功夫，遠甚於於追求潮流，引入西方的科學方法於其中，且「群經百家之奧義」允為「國學之精義」，其方法正需要是「以國故理董國故」的方式，始能成其功。

綜觀而言，以當時中國 1920 年代初而論，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未久，而當時的國際思潮氛圍對中國知識份子頗有影響，這可以舉例當時中國知識界的領袖梁啟超來說明。當時梁啟超剛訪問歐洲回來，出版了《歐遊心影錄》宣稱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的文化已瀕臨破產，書中〈科學萬能之夢〉一篇，對迷信科學者給予有力的針貶，而歐洲正寄望東方文化的復興來解救西方，此對新文化運動以來被壓抑透不過氣的文化保守派，梁啟超的言論不啻是福音，故此時就出現一股被籠統稱為「東方文化派」的思潮，如遠在南方的《學衡》即是持守此文化立場，而此東方文化派不能說是反科學，但往往在字裡行間透露出菲薄科學的意味¹⁰⁴。

而《學衡》主要即是以東南大學的學人為其重鎮，是以考察東南大學國學院計劃書正是有此況味，他們的文化立場，向來是

¹⁰² 顧實，〈《國學研究會演講錄》序〉，《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 438-439。

¹⁰³ 顧實，〈《國學輯林》序〉，《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下冊，頁 723。

¹⁰⁴ 王汎森，〈錢穆與民國學風〉，收錄在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49-250。

較接近「東方文化派」，故在其國學規劃中，雖然仍提出「科學」的整理國故，但總是很有保留的，相對而言，他們是堅守傳統研治中國舊學的方法。故東南大學國學院顯然認為「以國故理董國故」高於「以科學理董國故」。而所謂的「以國故理董國故」，即是用疏證，校理，纂修等方法去課讀古書，以追求「群經百家之奧義」，而且他們又認為此高於「考證家、性理家、詞章家」，或可推論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國學研究規劃是希望在考證（漢學）的基礎上，上攀義理（宋學）的追求。他們主要的治學取徑仍還是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範疇之中，他們並未積極，且甚或懷疑有需去援引當時西方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學術，實際上顧實所規劃的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國學研究，並不追索當時歐洲的漢學、東方學的研究取徑。所以相較而言，北大與清華的國學研究，都是在清代考證漢學傳統的基礎上，都希望能與當時最先進的歐洲漢學、東方學來接軌，雖然最後結果兩校有深淺之別，但與東南大學相較，東南大學國學院的研究方法顯然是較傳統、保守的。

另外東南大學國學院計劃書中有「詩文部」的設立，其中提及：

詩文之設，非以理董往籍也，欲將以衡量現代之作品，移風易俗，責無旁貸，效在潛默，漸而不頓。…詩文之求美，由其本質，無間優美壯美，宜採兩大主義：一、樂天主義；二、成仁主義。若夫詩文之類目，總言之，則為韻文散文；分言之，則如小說戲曲之類皆是也。¹⁰⁵

¹⁰⁵ 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國學的歷史》，頁 320。

在國學院特設「詩文部」，與當時的北大、清華的國學研究中相較，確實是較不同的，然對照當時新文學已經開展七年，東南大學的《學衡》反對新文化、新文學已為國人所注意，而由東南大學成立的《國學叢刊》大量刊登舊體詩文，故儘管計劃書未寫明是新詩還是舊體詩文，但東南大學的幾個刊物實際表現出的全是舊體詩文。因此，整理國學的「詩文部」，實際上就是古典詩詞、文章的原有形式的繼續保存，並在東南大學的師生的文學創作中體現，即堅持寫作舊體詩文¹⁰⁶。此相較於北大有意識的提倡白話文，或清華於此並未特別有主張而言，東南大學國學院更加呈現出其傳統的一面。



¹⁰⁶ 沈衛威，〈學分南北與東南學風—現代大學學術的南北差異〉，收錄在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編，《新國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第4輯，頁280。

第四節 小結

1920 年代初期胡適提出了「整理國故」的主張，並且發表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新國學研究綱領〈《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文章，這裡面自然有著胡適及其追隨者的學術新見解，然胡適「整理國故」的學術宣言及主張，實際上在某些個別的重要層面是晚清以來，如章太炎、羅振玉、王國維、梁啟超這些學人早已在從事的新學術研究方法，不過胡適一方面能抓住時代的思潮變化，另一方面加上自己受西學的影響，綜合創造提出「整理國故」的學術主張。而胡適「整理國故」的主要內涵是希望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此際歐洲和日本的東方學、漢學研究則是胡適所規劃的中國國學研究應學習的典範，據此他提出新的國學研究大綱〈《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其中對於如何研究國學標舉出三個面向：一是擴大研究的範圍；二是注意系統的整理；三是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

然而當 1925 年清華國學院成立之時，中國正處於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所引發的國學研究的風潮之中，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東南大學國學院及其他國學研究機構都是在這一學術氛圍下的產物，清華國學院亦是如此，然而清華國學院的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在國學研究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雖然在很多方面是與胡適「整理國故」的學術主張同其精神，然而王、梁、陳未必是直接受到胡適的影響，很多是他們對時代的思潮變化有其敏感性，在自己深厚的中學基礎上，同時受到風起雲湧的西學啓發下，而自己思維出來並加以實踐的迥異於傳統中國舊學研究的新方法。然而當胡適「整理國故」的主張在 1920 年代初期形成

學術界的主流思潮之後，這一思潮或許更加強化、系統化清華國學院諸位導師（講師）他們原有新的國學研究、思維取向，以致清華國學院導師的學術路徑與胡適「整理國故」的學術主張，在某些方面彼此交融為一體。

清華國學院的諸位導師基本上都受西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至深，他們也都能體認到應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去研治中國傳統中國文化，且能以歐洲和日本的東方學、漢學為其師法的典範，這點與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國學研究主張相同，只是在師法歐洲和日本的東方學、漢學的層面，和西方新的學術知識（如考古學和語言學）部分，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因為受限於經費的不足，以及北大國學門的主要學術領導人物沈兼士、馬衡知識視野的侷限性，是以在國學研究的成績上是不及清華國學院的。而東南大學國學院因為治學取向更為傳統，對於吸收西方的科學方法、歐洲的東方學、漢學，以及西方新的學術知識方面去研治中國國學的態度和上，呈現曖昧性，故在國學研究上對於開拓二十世紀中國新的學術之路，其成績就遠不如清華國學院和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胡適「整理國故」的學術主張，雖然是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其主要的基地，然而當「整理國故」成為一個時代主流思潮的運動後，其他的學術團體不免都處於這一學術氛圍之中，是以他們的學術實踐都或深或淺的呼應這一學術思潮，實際上也成為「整理國故」時代思潮的一環，清華國學院諸位導師正是如此。清華國學院諸位導師在具體的學術主張和實踐上，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主張同其精神，如「整理國故」運動所提及的具體研究方向上：在擴大研究的範圍上，清華學風也能從史學的視角去突破過往經學家研治經書的思維，將經書予以史學化的處理，並

能平等看待各家的思想統；而在注意系統的整理方面，有關「專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和「專史式的整理」方面這些西方現代學科的學術建制，清華國學院也在「研究院章程」所規劃的專修學科和應考學科上都用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予以分科整治，諸位導師的學術思維也都能突破過往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形式，而能有西方現代學科的知識概念；三在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方面，如利用歐洲的語文文法來參照研究中國的語文文法的比較歷史語言學之取徑，在史料的應用能廣及地下挖掘的各項新史料及異國的各項史書、史料，研究的視野也能從民間庶民文化，如小說、戲曲著眼，這些也都體現在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的學術精神之中。

是以清華國學院誠然是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思潮下的產物，然相較於同時期中國最重要的南北兩所重要大學東南與北大的國學研究機構而言，清華國學院諸位導師的學術研究方法，反而是最能實現胡適在「整理國故」中提及的關鍵的幾個重要學術主張，如治學上嚴守西方的科學方法、師法歐洲和日本的東方學、漢學的研究典範，在研究方向能擴大研究的範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和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等等，儘管清華國學院諸位導師（講師）未必去強調胡適所謂的「整理國故」的口號，然而他們的研究風格實際上是與 1920、30 年代中國「整理國故」這股國學研究思潮有著密切的關聯，同時他們也透過具體的學術實踐在形塑中國新的國學研究傳統，為二十世紀中國新的學術之路邁出了極重要的一步。

第二章 吳宓的文化理念與清華國學研究院

1925 年清華學堂增設研究院，最先成立的是國學門，當時負責籌備規劃主持院務的是學衡派大將吳宓。在《吳宓日記》、《吳宓與陳寅恪》和《吳宓自編年譜》中，吳宓對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時期和創院初期的院務工作、學術事蹟有很詳細的記載，可以作為重建當時吳宓的文化理念與清華國學院建構的關係。

余英時先生曾指出吳宓在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特別貢獻，最重要的有三件大事：第一是創辦《學衡》，提倡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人文主義；第二是參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建，為國學研究開一新紀元；第三是主編《大公報·文學副刊》，造就了不少文、史、哲的人才¹。其中第一、二項則與清華國學院有關聯，是以吳宓個人的文化取向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建構關係是值得注意。

第一節 吳宓與《學衡》

吳宓於 1924 年 8 月受清華校長曹雲祥徵詢任教意願，他在日記中記載：

日前函顧泰來君，述此間實況，及欲往清華之意。顧君即赴外交部，與清華校長曹雲祥君言之。曹君謂暑假前即欲聘予，因知予已就東北事，故止。今若往清

¹ 余英時，〈記吳宓的「殉道」精神〉，收錄在氏著，《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頁 134。

華，頗歡迎，能立刻往，趕秋季開學，則尤佳。²

這是吳宓任職清華國學院的發端，此際吳宓正任教於東北大學，而到同年（1924年）9月底，吳宓日記記下「夕，上清華曹校長一函…，決即于明年二月，來清華任職。並開示予所願授之課程，以備派定云云。予寒假后即赴清華之意已決。³」，到1925年元月，清華國學研究院開始籌備，以吳宓為籌備主任。此時研究院教授已定有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位，其中吳宓特別推薦陳寅恪（然聘書寄去後，陳寅恪因事滯留，明年（1926年）秋始到校，而吳宓已經離開研究院主任之職）。⁴而吳宓任職研究院主任，對於主任的職權亦頗為在意，因為這涉及能否讓他的文化學術理念在清華國學院實踐的關鍵。

是以吳宓在1925年2月9日日記上就說：「上午，再到清華。見曹，提二條件：（一）名義為籌備主任。（二）須有全權辦本部分之事，並負專責。否則，仍回奉。曹允之。」⁵，吳宓向校長曹雲祥提出擔任清華國學院主任必須能負專責，顯然不願只是做行政庶務的工作，更想實現他的理想。而他任主任職後，第一個想要聘請的人就是陳寅恪。

1925年2月14日日記上說：「昨與Y.S.與P.C.談陳寅恪事，已允」⁶。而在同年4月27日上針對陳寅恪應聘清華國學研究院

²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二冊，1924年8月29日條，頁281。

³ 《吳宓日記》，第二冊，1924年9月29日條，頁295。

⁴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8.2重印），頁260。

⁵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三冊，1925年2月9日條，頁4。

⁶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2月14日條，頁5。

導師事又記下：「陳寅恪復信來，以（一）須多購書。（二）家務，不即就聘。一介紹陳來，費盡氣力，而猶遲惑。難哉！」⁷有關清華國學院時期，吳宓在行政上給予陳寅恪的協助，在《吳宓日記》中記載甚多。

然而吳宓之所以會如此看重陳寅恪，主要仍是視陳寅恪為同道之人。

1934年吳宓在一篇〈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的《詩話》中十分稱道陳寅恪學問之博及自己受益於陳寅恪之多。他說：

始宓于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即於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記。⁸

吳宓對於陳寅恪除對其學問佩服外，其實他們仍有相近的文化立場，由於和梅光迪、吳宓等人的私交，以及思想傾向的接近，陳寅恪早年對於「學衡派」的基本立場是相當同情的⁹，這

⁷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4月27日條，頁19。

⁸ 吳宓，〈空軒詩話十二：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收錄在氏著，《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196；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三刷），頁79-80。

⁹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頁28-29。其實陳寅恪只在《學衡》發表兩篇短文〈與妹書〉、〈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考試題〉和一首長詩〈王觀堂先生輓詞〉，

也是吳宓一力推薦陳寅恪到清華國學院任教的原因，或許認為可以共同來實踐其文化理念。

有關吳宓何以到清華國學院任職，在他 1925 年 8 月 2 日給最敬愛、影響他的老師白璧德的信中提及：

我摒棄奉天來北京到清華學校，既不是由于首都通常的吸引力（政治機遇；上流社會的漂亮女孩；高級飯店和書店等等）；也不是為了清華學校能較好提供物質待遇和身體享受。而是那些便利條件能幫助我為《學衡》工作得更好和效率更高。我的意思，例如一座非常好的圖書館；一位由學校付酬而純粹出于熱忱和友誼自願利用餘暇為《學衡》工作的助理；與志趣相投的人們特別是文人相識的機會，由此為《學衡》鞏固撰稿人和稿源。我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學衡》的工作上，而這些是我真正在意的東西。研究院將進行的研究工作全部限於國學領域——國學研究的不同學科，它們致力于研究事實，而非討論鮮活的思想，此外還有許多學校政治活動，而我主要關心的是《學衡》，因此我在研究院的事務和方向方面，採調和的和謹慎的方針。…我恭敬地請求您對研究院和《學衡》的工作經常給予指導和忠告。¹⁰

他並未直接參加「學衡派」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個運動主要仍是以梅光迪和吳宓為主。

¹⁰ 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吳宓致白璧德〉函，1925 年 8 月 2 日，頁 35-36。

從信中可知，吳宓是以清華國學院作為他發展《學衡》的基地，且他認為清華國學院「致力於研究事實，而非討論鮮活思想」是指從事新漢學式的考證工作，而非宋學式的思想、義理的討論，這一點是吳宓所不甚認同的學術之路，與他《學衡》雜誌的學術主張有所距離，這問題在本章第二、三節中再來詳論。

故儘管後來因為對於國學院的發展路線，造成吳宓與清華教務長張彭春，國學院導師王國維、趙元任，講師李濟意見有所不同，終導致吳宓離開國學院主任一職，而其中不免有諸多風波，包括吳宓對國學院學生的失望，期間東南大學也想重聘吳宓任教，但是吳宓仍堅定留在清華，在他給吳碧柳的信中提到：

京中安謐，清華穩固，故宓決長留清華。柳、湯、梅（光迪，已回國）約宓赴改組后之東南大學任教員，已決然辭謝。即使清華已因內部風潮而亂，宓退出清華之日，則決赴東北大學，與弟等同處。

而對於何以吳宓不重返之前曾任教的東南大學的原因，吳宓在這封信中透露「東南用人必黨，而庫空如洗，實不如清華之安閑豐裕也。」¹¹

此函寫於 1927 年 7 月 31 日，已是吳宓卸下國學院主任的工作之後，函中其實殊可進一步推究，清華因為係由美國所退回庚子賠款而成立，在改制為大學部之前，尚隸屬於外交部，其實是一所非常西化的學校，同時經費雄厚，北大、東南大學瞠乎其後，

¹¹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吳宓致吳碧柳〉函，1927 年 7 月 31 日，頁 109-110。

是以相當程度能維持其獨立性，及經費無後顧之憂，所以有吳宓所稱「清華穩固」、「清華之安閑豐裕也」之語。

吳宓任職清華國學院主任自 1925 年到 1926 年期間的院務狀況，《吳宓日記》的記載隨處可知，是我們了解這一段清華國學院實況的重要實錄史料。當時吳宓仍然在北京負責《學衡》雜誌。這份原由主要是東南大學學者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如吳宓、梅光迪、柳詒徵、胡先驕、劉伯明、繆鳳林、湯用彤、張蔭麟、孫德謙等在南京所創立，目的是為對抗胡適新文化運動學派的刊物，而清華國學院中的幾位導師如王國維、陳寅恪和學生實際上或多或少在這份雜誌上發表文章。而有關《學衡》的宗旨，在《學衡》雜誌簡章中提及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而在體裁及辦法上則言「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同時「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群書」，最後希望「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而雜誌總編輯兼幹事則由吳宓擔任¹²。從中可知「中西並舉」是為《學衡》雜誌的精神，而吳宓任職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時，除了繼續《學衡》雜誌的編輯工作外，亦想將《學衡》雜誌的精神帶進研究院中，並把清華國學院視為發展《學衡》的基地。

由於《學衡》是反對新文化運動而起，一般都認為其代表著文化保守主義，然吳宓所持的保守主義，係與守舊主義迥不相同，1926 年 11 月 21 日在日記中寫：

¹² 《學衡》雜誌簡章，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上冊，頁 352-353。

十一時，至貴仁關十五號陸懋德宅，赴讀經團之會。是日由宓主講，略述 Babbitt 師之人文主義之學說。……是日新增之會員有程濟君，字伯嘉，江陰人，交通部員，極熱心孔教，力主讀經，並擬措借張宗昌等武人之力，以舉行此舉。若此君者，于讀經固熱心，然終嫌迂拘錮閉，于其他之文化思想問題，則掩耳不欲聞。甚矣，真正通人之難得也。¹³

顯然吳宓與極端保守孔教，想用政治力提倡孔教者，並不視為同道，甚或加以批評。而吳宓的「學衡派」成立的背景就是對抗胡適的「新文化派」，是以吳宓對於新文化運動則是批評甚劇，他在〈論新文化運動〉這篇重要文獻中，則火力全開批評說：

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鳩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其初為此主張者，本係極少數人，惟以政客之手段，到處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

¹³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三冊，1926年11月21日條，頁254。

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抉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

故今有不贊成該運動之所主張者，其人非必反對新學也，非必不歡迎歐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對該運動之所主張者，而即斥為頑固守舊，此實率爾不察之談。…所謂新者，多係舊者改頭換面，重出再見。常人以為新，識者不以為新也。俗語云：「少見多怪。」故凡論學，應辨利害得失。以此類推，而不應拘泥新舊。舊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則尤不可。夫新舊乃對待之稱，昨以為新，今日則舊。舊有之物，增之損之，修之琢之，改之補之，乃成新器。…

故若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凡論學論事，當究其終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過去以測未來。…故後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今新文化運動，其于西洋之文明之學問，殊未深究；但取一時一家之說，以相號召。故概不免舛物迷離，而猶不足當「新」之名也。¹⁴

這段引文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吳宓對新文化運動所使用的白話文的批判，認為其行文「非馬非牛，不中不西」，吳宓的引文充分說明他堅持文言文的書寫信仰；二則是批評的主角明顯是針對新文化運動領導者胡適，而對於其所引進的當代的杜威實

¹⁴吳宓，〈論新文化運動〉，收錄在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3-6。

驗主義則視為「糟粕」、「毒鳩」，無法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而甚至大有謬誤之處，與之相對的，實際上吳宓心中所認為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精髓者，係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主張西方的古典人文精神，然而杜威實驗主義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都是當時西方新思潮的一環，就某種意義而言，胡適的「新文化派」與梅光迪、吳宓的「學衡」派間的衝突，可以說是杜威式的實驗主義與白璧德的人文主義之間，從美國移到中國來¹⁵；三是指新文化派「又握教育權柄」，這點另有深義，將在本章第二節中再詳論；四是吳宓對西方新學是表示歡迎接受的，惟需在舊有的基礎增損之，始能推陳出新創造新的。而實際上吳宓等人的「學衡派」也是對西方文化（學術）開放的，只是胡適的新文化派在西化傾向走得更遠，相對而言，「學衡派」就顯得是保守，是以清華國學院的建立在，在校長曹雲祥的《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係》中明白表明要對「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此與吳宓學衡派立場相同，而在另一方面，則國學院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的文化立場，亦與吳宓無甚衝突，甚至很多地方是相合的，所以吳宓大概會認為清華國學院可以作為其發展《學衡》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處所，然而吳宓以清華國學院作為其發展《學衡》的基地，其主要目的是要推展其師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理想，如吳宓任清華國學院主任不久，即在 1925 年 8 月 2 日致函其師白璧德介紹清華國學院的國學研究，同時指出他主要關心的是《學衡》的工

¹⁵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錄在氏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504。

作，並希望白璧德能給予指導¹⁶，就算吳宓卸下國學院主任一職後，在他 1931 年 8 月 15 日給白璧德的信中，仍向老師說：

我也購買和閱讀人文主義鬥士們寫的書，受益匪淺。任合時候只要可能，我就經常概述和翻譯這些新文章的主要思想，通過《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介紹給中國讀者大眾。我現在即將回中國去，一回國我一定馬上全力以赴地以更大的熱忱去促進傳播人文主義思想和道路。¹⁷

吳宓一生中始終堅持在中國推動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思想，幾乎近於宗教式的熱忱，吳宓更寫了一篇〈論白璧德·穆爾〉文章，詳細介紹白璧德的思想，他認為白璧德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核心是：

略以西洋，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益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微。人不知所以為入之道，於是眾惟趨功利一途。而又流於感情作用，中于詭辯之說，群情激擾，人各自是。…科學發達，不能增益生人內心之真福，反成為桎梏刀劍。…蓋物質與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至極精確，故科學之盛如此。然以物質之律施之

¹⁶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吳宓致白璧德〉函，1925 年 8 月 2 日，頁 33-38。

¹⁷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吳宓致白璧德〉函，1931 年 8 月 15 日，頁 52-53。

人事，則理智不講，道德全失，私欲橫流，將成率獸食人之局。蓋人事自有其律，今當研究人事之律，以治人事。然亦當力求精確，如彼科學家之于物質然。¹⁸

這裡吳宓所推崇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是將科學與人事作一區隔，只取科學的精確，去除感情之浮說，而在人事部分，則由何處可得爲人之正道的答案，他說「宜博採東西，並覽古今，然後折衷而歸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圖亞理士多德，東方有釋迦及孔子，皆最精于爲人之正道」¹⁹。

吳宓受白璧德這一思想影響，故他的學術思想並不是如胡適、傅斯年等人摒棄傳統價值、道德、心性的範疇，純作事實的客觀學術研究（新漢學研究），他一生重要作爲，如《學衡》的主編，參與清華國學院的建構，就如同余英時先生所言的是一種「殉道」的精神，而客觀的學術（國學）研究，尙在其次，於是吳宓全力投入《學衡》的編輯工作，及全力引薦「學衡派」學人到清華任教，因爲這是他爲文化理念努力的「殉道」精神，而清華國學院則是他寄望實現此理想的處所，這些在吳宓的日記中多所記載，以下茲引幾條日記，以明其況。

1924年12月2日吳宓尙在奉天的東北大學時就去函給吳碧柳，提及「昨晚宓作英文長函，上清華曹校長，力薦柳、劉宏度、吳碧柳三公爲清華大學明春成立之國學教授，並各繫一小傳，稱頌甚至。」²⁰

¹⁸ 吳宓，〈論白璧德·穆爾〉，《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24-25。

¹⁹ 吳宓，〈論白璧德·穆爾〉，《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25。

²⁰ 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吳宓致吳碧柳〉函，1924年12月

1925年7月3日日記「宓願自發奮用功，《學衡》續辦不衰」

21

1925年8月23日日記「宓為《學衡》，忍辱含垢，惟明神知之耳。」²²

1926年1月4日日記：

近頃事變紛疊，宓亦不敢再有所布畫圖謀，一切聽其自然而已。惟《學衡》幹事一職，柳公（按：指柳詒徵）復以相諉，宓決再兼任。蓋他人決無如宓之耐苦而熱心也。欲求無廢事，非以身任之不可矣。²³

1925年9月14日吳宓日記載：

4-6 赴校務會議（9）。本校最可傷心之事，厥為糜費耗財，而不能聘得優良教員。有學有識之士，如張孟劬、柳翼謀先生，及湯用彤、樓光來諸君，不獲受聘。而紈袴流氓式之留美學生、毫無學問者，則來者日眾。而校內各方又皆橫生意見，各殖勢力。對於高士，則妄加阻礙，而不使其來前；對於庸碌之小人，則不厭成全，俾其人到此為吾私黨。于是清華之人才，遂成

2日，頁100。

²¹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三冊，1925年7月3日條，頁40。

²²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8月23日條，頁60。

²³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1月4日條，頁121。

江河日下之局矣。²⁴

1926年3月26日訪問柳詒徵，以所撰《學衡雜誌五大特色》等稿，與柳詒徵共同刪改。將結束時，柳詒徵忽然覺得不妥，理由是「汝愈誠，人愈疑汝偽」，然而「宓憤極，以為今世中國人竟如是之奸詐耶？然宓對於《學衡》事，只求顧全大局，盡可犧牲已見，以及已之辛苦勞績。²⁵」

1926年11月16日吳宓日記：

晚8-10訪陳寅恪，與談《學衡》停辦事。…。則今茲停辦，當由中華經營不振、資本缺乏、印刷縮減之故。旋梅教務長來，向寅恪商請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國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不得不為本校惜，且為事局苦也。寅恪並謂《學衡》無影響于社會，理當停辦云云。旋寅恪共梅至趙宅去。久候不歸，宓怏怏而返。夜中久醒，不能成寐。悵念身世，感憤百端。以宓之辛苦致力，而世局時變，江河日下，阻逆橫生。所經營之事業終于破壞，同志友朋，均受社會排斥，秉其學德志節，歸于日暮窮途之境。可痛哭之事，孰有甚于此？且恐以宓之生性多感，又富詩情，從此將下墮于抑鬱憂憤，如陶潛之飲酒、效阮籍之猖狂，即有所吟詠著作，亦同于浪漫派 Byron、Shelley 之怨憤，Lamb、Hazlitt 之瑣細，成為世所摒棄、獨善其身

²⁴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1月26日條，頁138。

²⁵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3月26日條，頁162。

之人。而宓等之本志，則欲效 Matthew Arnold 之正大光明，平和剛健，為世人之導師，因勢利導，順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業全挫，豈不辜負初心也哉！但顧一身，著作詩文小說以自樂，不談世事，不問實功，固宓之所好，然終不免翹然為之耳。²⁶

日記中吳宓反對新文化派傅斯年及全力想引入「學衡派」重要的學人柳詒徵來清華，且其中又呈現他性格中浪漫情感豐富的生命本質，他以《學衡》雜誌辦刊物的理想，希冀作為「世人之導師」的依據。

1925年12月14日吳宓日記「旋宓往謁校長，談研究院發展計劃等。校長以將辭去，謂一切可俟緩后再議。又謂柳公（按：指柳詒徵）在東南（大學）鼓動風潮，斷不可聘其來此云云。」²⁷

1925年12月29日吳宓日記「12-1，謁校長。……。校長謂柳公亦可聘來。」²⁸

一直到1927年已卸下國學院主任的吳宓對《學衡》仍然如宗教情懷的護持著，日記上說：

中夜不寐，細思人生學問理想，雖高遠博大無限，然事業須有定而持之以恆，精神名譽要必有所寄託。《學衡》為我之事業，人之知我以《學衡》。故當冒萬難而

²⁶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11月16日條，頁251-252。

²⁷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12月14日條，頁107。

²⁸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12月29日條，頁115。

竭死力，繼續辦理，不使停刊。²⁹

1925年3月17日在給劉永濟、吳芳吉、劉樸的明信片上，吳宓更激清表態「總之，勿認《學衡》為宓一人之事，《學衡》停版，宓即投身窗外池水中耳。…至於宓之生死苦樂，可以不問，宓生不能感動朋友，維持一小小雜誌，何顏苟活哉！」³⁰

上面不厭其繁的引述了吳宓的日記，很明顯得看出吳宓特重《學衡》雜誌，以及希望引薦「學衡派」的學人如柳詒徵等人到清華來任教，而反對新文化派如傅斯年來清華任教。而在日記中學衡派這些人或事出現頻率很高，其實是因為這些都是吳宓認為的「同道」之人，或文化理念之所寄，因為吳宓心中有一重要的文化事業就是要與其敵人，胡適、傅斯年的新文化派相抗衡，因為吳宓認為他們和胡適新文化派的文化學術理念是背道而馳地。

吳宓與新文化派的差異，厥在對舊道德的持守上，而新文化派於文化立場上是持激進的反傳統思想，而在學術研究上，則是主張不涉價值走「科學方法」的治學取徑，這與吳宓主張的白璧德人文主義是不同地。如在道德持守上，吳宓對於王國維身後撫卹金，因為校長主持不力，竟遭外交部批駁，僅准兩個月八百元的作法很不以為然。吳宓批評今人但計一己之功名權利，而毫無道德責任；且官場及機關辦事人員遇事推諉卸責，他認為「救國救世，惟在改良人心，提倡道德。惟道德之增進，為真正之改

²⁹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10月12日條，頁419。

³⁰ 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此函係明信片，收件人姓名、住址書於正面：湖南長沙明德學校，劉永濟、吳芳吉、劉樸先生同閱，頁102。

革。此外之所謂革命，皆不過此仆彼興，攘奪利己而已。³¹」，實際上吳宓認為對舊道德的持守，更重於所謂客觀的國學研究，是以「學衡派」雖也提倡客觀的國學研究，但這一研究是不能忽略舊道德的實踐。

故吳宓之所以願意在清華任職，儘管另有他就機會仍不願前往，主要原因是因為《學衡》的事。1926年3月16日吳宓日記寫下，接獲陳茹玄前月來函，欲聘吳宓為東南大學文科主任，兼外國語文系主任。胡先驌也來函勸駕，但吳宓「以《學衡》事為重，居此既安適而多暇，則決不思他遷矣。故即函陳、胡二君，辭而謝之。³²」；又同年4月19日吳宓日記記下接到汪兆璠情詞懇切的函，要聘吳宓為東北大學英文系主任，月薪大洋四百元，比在清華的現銀三百元優渥，然吳宓仍不願赴邀，「蓋此間尚可安居，為編輯《學衡》計，殊便利，未可率爾移地也。³³」

故余英時先生稱吳宓為了《學衡》殉道，真是一語中的，而清華國學院則變成吳宓發展《學衡》雜誌文化理念的寄身之地，至為明顯。

³¹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6月17日條，頁356。

³²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3月16日條，頁161。

³³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4月17日條，頁165。

第二節 吳宓與「新漢學」學風

清華國學院開辦之初，乃源於五四思潮之後，提倡科學的呼聲，響徹雲霄之際，同時「整理國故」也被世人所重視。1923年北京大學率先成立研究所國學門，而1924年秋天，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想把計劃中將設立的國學研究院辦好，特請胡適代為設計，胡適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為研究院繪一藍圖，其特點，如置導師數人（不稱教授），常川住院，主講國學重要科目，指導研究生專題研究，並共同治院，置特別講師，講授專門學科。後來研究院的規章，大致即本此藍圖。曹校長敦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很謙遜地說：「非第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³⁴，胡適雖然未正式成為清華國學院的導師，然1920年代之初，他已漸漸變成當時中國學術界的中心人物，並對清華國學院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向來被認為新文化運動反傳統思想的領袖胡適，於1920年代之初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並引起當時中國學術界一股國學研究機構設立的風潮，然而他當時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所提出擔任國學院導師的人選，並不從文化觀點作為擇才標準，而是以當時治學的取向著眼，其實晚清民初以來當時中國學術界已形成了一種新的學風，名為新漢學，這一學派基本上是以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為口號，而胡適刻意提倡清儒的治學方法，認為清代

³⁴ 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387-388。

中國三百年的樸學是與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方法同其精神地³⁵，而這對後來學風有相當大的影響，以至於一般多稱其所領導的學派為新漢學或新考據，而其以胡適、傅斯年及和他們聲氣相求的一批學者為代表。批評他們的人稱他們為「新漢學」或是「乾嘉餘孽」。大致上他們治學有幾點特色：一個是「為學問而學問」；一個是重視史料；其三是對馬列史觀的排斥。³⁶此不同於盛世乾嘉漢學，也不同於晚清的經世之學。而胡適在 1920、1930 年代中國學術界則被視為為新漢學的領袖。

因應這樣的學術氛圍，在 1920、1930 年代，中國史學界產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出現的一些新的解釋風格，其主調是：學術研究是一回事，道德是一回事，信仰又是一回事，簡言之，是「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尤其是傳統的義理價值與歷史事實的分離。而這種學術風格與兩種研究方式有關：首先將古往今來的載籍文獻「對象化」，都視為「材料」，把一切化為研究對象及研究材料後，所追求的是科學知識，而非道德修養，所以不再關心，甚至刻意擺脫道德或倫理意涵。第二，是把一切研究對象「歷史化」。「歷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 是當時流行的方法論，

³⁵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 143-156，此文中胡適舉出清儒考證雖然具有西洋自然科學的精神，但因為清儒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而文字的資料是死的，然西方自然科學的材料不限於蒐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材料，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證據的方法。

³⁶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98；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469；及王汎森教授在〈錢穆與民國學風〉一文中，則將胡適視為新漢學的領袖，收錄在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32。

它要求以歷史發展的態度去看待事物，認為所有文學、哲學、人物，都是時代環境的產物。所以不能回到一個原點看事物，也不能承認所謂天經地義、亙古不變的道理與價值，同時要把一切歷史或人事還原到其歷史脈絡中，看它的真相是什麼，卻不管它對現代有沒有意義。一切「歷史化」的結果，導致在價值方面要明顯地區分「歷史的價值」與「現世的價值」。³⁷

基於這樣的學術氛圍，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文中，批評胡適等新文化運動者是「又握教育之權柄，…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抉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³⁸之言，值得進一步分析。這可分成兩個方面討論，一是當時中國新興學術體制建構所形成的某種「文化霸權」的問題；二是這種「文化霸權」的主要內涵是一種新漢學，而當時若要進入這種主流的「文化霸權」領域，就必須要服從這裡面的學術軌轍，否則只能在學術的邊緣地帶。清華國學院建構之初，胡適與吳宓這兩位在學術、思想上讓人感到絕對對立的兩人，理論上應有很多的矛盾，但何以後來歷史的發展，兩人同時都參與清華國學院的學術建構，這一問題值得再分疏。

時代的主流學術思潮經常會引導著眾多學人，趨向於這種學風所規範的治學方法、技術和風格，若要進入主流的學術論述取得學術的發言權，就必須走這一學風的治學方式，如余英時在討論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的《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就曾指

³⁷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377。

³⁸吳宓，〈論新文化運動〉，《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 3。

出，戴震原本是有義理的偏愛，但在清代乾嘉中期的學術主流以考證為尚的時代氛圍下，戴震必須收起他的義理的興趣，而靠向考證學的主流³⁹。又以胡適為例，民國初年的國故學風氣，各家研究都是建築在乾、嘉以來的考據、辨偽的基礎之上，是以要在當時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則必須在考據學上一展身手，方能立足，故胡適雖以白話文學運動暴得大名，但這畢竟屬於通俗文化的範疇，而在上層文化中，胡適是以 1917 年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考據文字，向當時國學界的最高權威章太炎正面挑戰，這才是他能進入北京大學任教的關鍵，故胡適取得上層文化的發言權及日後順利成為學界領袖，皆源於他的學術風格符合當時學界考證學的主流風尚⁴⁰。

同時代的梁啟超同樣受到新漢學思潮的影響，1941 年張蔭麟就曾說：

任公於學，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學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謂其考據之非，非稗販東人，則錯誤紛出，幾于無一篇無可議者。實則任公所貢獻于史者，全不在考據。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驚博，最不宜考據。晚事考據者，循風氣之累也。雖然，考據史學也。非史學之難，而史才實難。任公在「新漢學」興起以前所撰記事之巨篇，若《春秋戰國載記》，若《歐洲戰役史論》，元氣磅礴，銳思馳驟，奔磚走石，眉飛色舞，使人一展卷

³⁹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台北：東大，1996），〈內篇六：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頁 95-150。

⁴⁰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八刷），頁 29-42。

不復能自休者，置之世界歷史著作之林，以質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麥可萊、格林、威爾斯輩，皆瞠乎后矣。⁴¹

張蔭麟的學術文化立場近於學衡派，故有此對梁啟超從事考據學的遺憾之言。然他對梁啟超才性非長於考據之學，然卻不得已需「循風氣」從事考據之業，是以錯誤百出的觀察至為深刻，文中所言的「風氣」自然就是張蔭麟在此文所指的「新漢學」考據學風，這已經是當時中國學術界主流的話語權，並占有學術體制的主導權，亦即是吳宓所謂新文化派「又握教育之權柄」的實際狀況，是以不同學術立場的學人都必須正視這一學術研究的「典範」操作，否則只有更加邊緣化。

這裡可以再舉出兩位同時代學者胡厚宣與錢穆的回憶和實例，對中國 1920、30 年代以來的學風作進一步瞭解。甲骨學大家胡厚宣回憶 1930 年代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學風，曾提及：

當時北京有所謂京派，講切實，重證據，為新樸學，新考據。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適為翹楚，他常說少談政治多讀書，拿證據來，表現在史學方面的是整理國故的國故學、疑古學、古史學。⁴²

⁴¹ 張蔭麟，〈跋《梁任公別錄》〉，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18-119。

⁴² 胡厚宣，〈我和甲骨文〉，收錄在氏著，《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 110。

胡厚宣此處所言的「新樸學」、「新考據」，即是前文張蔭麟所說的「新漢學」，都是著重講切實、重證據的學術風格。

而民國另一學術重鎮錢穆從一個中學教師，最後進入大學，先成爲燕京大學的講師，接著在北大與新派領袖如胡適分庭抗禮，最主要是因爲他的幾種傑出著作能「預流」，在「預流」之餘，又能以堅實的學術證據提出更進一層的見解。如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草稿被顧頡剛欣賞，而《劉向歆父子年譜》更是受到當時主流的新漢學領袖胡適、顧頡剛的重視，亦即是這些著作是錢穆「預流」之作，也是具有新漢學風格之作。然而後來錢穆的《國史大綱》則非純粹新漢學風格，而是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是以錢穆終於偏離了當時學術建制化的主流新漢學。錢穆能進入北大，而又能與胡適等人分庭抗禮，以及抗戰勝利之後未再得北大聘函回北方，都源自於錢穆治學與當時新漢學的親疏而定。是以新文化運動之後，「科學」的銳猛之勢，橫掃千軍，胡適指出考證學合乎近代科學的精神，他所提倡的以科學整理國故的學風逐漸形成一種強勢論述，是當時新的「價值層級」的最高層，與先秦諸子有關的考證或其他種種「客觀之學」則是主流。在這個「價值層級」的下位則是戴有主觀色彩的心性義理之學。這個新價值層級挾現代學術建制的幫助，取得了龐大的說服力與壓迫力，它吸引、調動各地的學術人才，向它所標榜的學風靠攏，並默默進行具有排他性的篩選。故如錢穆這個遠在江南的讀書人也接觸到這個新學風，並受到它的吸引，向帶有「科學性」的新考證靠近⁴³。

是以吳宓批評胡適等新文化運動者是「又握教育之權柄」

⁴³王汎森，〈錢穆與民國學風〉，《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頁 211-270。

等情，已經標舉出這是當時中國學術的主流，中國近代學術史的1920、1930年代之後，在胡適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運動形成學術風潮之後，胡適參與下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顧頡剛的「疑古學派」大概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建制和思潮，這三個具影響力的學術運動，大致上都是「新漢學」的學術風格，是以當時學人欲取得學術發言權或體制地位，就必須向這批「新漢學」取向的治學風格靠近。

對於這樣的學術風氣，吳宓又是如何自持的呢？首先在文化態度上，吳宓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實際上是抱持著同情的態度，他注重道德、心性、修養層面的「宋學」，但以吳宓為代表的這群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衡」派，絕不等同於「守舊」派，「學衡」派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他們並不反對吸收西方文化，甚至是正面的看待吸收西方文化，只是對傳統文化態度則迥異於胡適的新文化派，吳宓等人「學衡派」的西化是歸屬於白璧德古典新人文主義，不同於胡適的杜威實驗主義。而實驗主義中的理論，是胡適理解科學方法的來源⁴⁴，而這恐怕是吳宓所認為的糟粕、毒鴆，然而吳宓的學衡派與胡適新文化運動的「新

⁴⁴ 胡適，〈實驗主義〉，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 61-112。然而胡適心中的科學方法，最終流於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立場，與西方真正對科學的理解實際上是有距離地，或許吳宓「學衡派」也不一定理解西方科學的真正本質，他們應該只是一種人文的直覺及受白璧德的學術傳統影響去質疑科學。林毓生對胡適此一科學主義的立場、科學方法有相當深入的分析批評，見〈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玄學論爭」的省察〉，收錄在氏著，《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 277-302；〈中國人文的重建〉，收錄在氏著，《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二版二刷），頁 18-25。

漢學」派，在一個最高的層次上，同樣自覺的要接受西方文化，這或許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吳宓之所以願意投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建制的因素。其實清華國學院在籌設時期的規劃，與胡適對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的建議及他的「整理國故」的理念是有關連的，然而此時胡適與吳宓兩人思想間的緊張其實是暫時隱藏未發的，因為吳宓在接受西化的過程中，是視胡適新漢學科學整理國學的研究趨勢，與吳宓他們「學衡」派重視心性、精神、道德，而輕視物質、科學的精神風格迥然相異的，雖然這裡存在著彼此的差異，但是因為 1920、1930 年代，當時中國整個學術界的「價值層級」係以「新漢學」的學術取徑為主流，而在正式的學術建制上，亦以此為導向，故吳宓亦不得不將他原本重心性、義理、精神取向的「學衡派」風格，暫時與胡適的「新漢學」風格，勉強並立，就如同前文所言述，在時代主流思潮的壓力之下，要取得發言權與學術位置，就必須接受這一最高的「價值層級」。

是以 1925 年以吳宓名義所寫的〈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一文中，吳宓明確指出國學院的辦學宗旨之一就是將西學融入國學，他強調應對西學進行精深的研究，以便能「採擇適當，融化無礙」。而清華國學院的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⁴⁵，其中「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即是胡適新漢學派最重要的治學精神，然而這篇說明清華國學院設立旨趣的文章，根據吳宓的日記記載可知，不能完全視為是吳宓個人的意見表述。實際上國學院設立的宗旨是吳宓與王國維、梁啟超商

⁴⁵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 174。

量而定⁴⁶。是以這篇吳宓在清華國學院開學日的正式演講，是吳宓以清華國學院主任的名義，代表大家來陳述設院的旨趣，因為吳宓雖然是研究院的主任，然而國學研究院特有的導師制度，其中的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在學術界輩分、聲望皆遠高於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而當時的梁啟超與王國維也都能認識到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的科學治學方法的意義和價值，而這也是胡適「新漢學」派所推崇和學習的研究取徑，是以在國學院的設立宗旨和章程，必然會融入當時中國新學術之路的新漢學學風。

究實而論，吳宓不必然是真正會欣賞這種新漢學的國學治學風格，然而從吳宓的日記記載可知，他實際上是以清華國學院作為他全力推展《學衡》的基地。他對《學衡》的宗旨和理想是近乎宗教式的堅持，這恐怕是超過清華國學院所要提倡的新漢學式的國學研究，這裡又涉及吳宓如何看待國學這一問題，在下一節中再作討論。

以 1920、1930 年代當時中國學術界對「國學」一字的主要用法而言，係指一種研究的體系與研究方法⁴⁷，而吳宓雖然身為清華國學院的主任，然而他在國學涵養的深度以及與其親近的「學衡」派學人的舊學根柢，就有論者提出質疑。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魯迅，雖然主要是從事文學創作、雜文書寫，間有

⁴⁶如吳宓在 1925 年 2 月 11 日的日記「下午，再謁王國維（商章程事）」，同年 3 月 1 日的日記「訪王國維（章程 Final）」，同年 3 月 7 日的日記「晨訪王國維（催《緣起》）」，參見《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 年 2 月 11 日條，頁 6；1925 年 3 月 1 日條，頁 7；1925 年 3 月 7 日條，頁 7。

⁴⁷ 詳細的論證，可參考陳來，〈近代「國學」的發生與演變—以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典範意義為視角〉，《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3 期，頁 24-35。

中國古典文學、小說史的研究，但畢竟出自晚清民初國學權威章太炎之門，對舊學仍有一定的評賞眼光。魯迅 1922 年在〈估《學衡》〉一篇頗具批評嘲弄的文章中就說：

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骨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總之，諸公掙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⁴⁸

五四新文化派學人與《學衡》學人，確有彼此意氣用事之言論，一些情緒性的言論可以不論，然而魯迅所指出的「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確值得注意。

盱衡當時 1920 年代之初，一種受西方科學方法、歐洲東方學影響下的新的國學研究取徑正在形成，而吳宓的舊學實際上是不如柳詒徵、梅光迪、湯用彤等人，論者就曾指出，「學衡」派的群體，除了柳詒徵，其他幾位傳統的舊學並不比新派人物強，實際上新文化派的胡適、顧頡剛的舊學根底是至為深厚的。吳宓辦《學衡》時，是剛從國外回來的文學青年，舊學根柢和大十多歲的魯迅不能比，和大三四歲的陳寅恪和胡適，也無法匹敵。就其性格而言，吳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長做死學問，對於舊文化的鑽研，他和新派的胡適、顧頡剛之間的距離，隨著時

⁴⁸魯迅，〈估《學衡》〉，收錄在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解析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639、641。

間發展，差距更大。而吳宓的舊學根底較弱，剛回國那陣，他跟著胡先驌和邵祖平寫過江西詩派風格的舊詩。當時不僅新派看不上，舊派同人也不把他放在眼裡。梅光迪就對外人說過《學衡》越辦越壞，原因當然是吳宓不行。吳宓不擅長訓詁音韻，也不屑於做考據一類文字，《學衡》發表談甲骨文的文章，引起外國學者的注意，很認真地寫信來請教，這讓吳宓感到很惱火，因為他理想中的《學衡》，應該是「有關國事與時局」，應該擔負維護中國文化優秀傳統之大任，且不是舊派學人的自留地，整日來幾首小詩幾篇遊記，玩點考證索引，大談文章章法⁴⁹，吳宓大致上是強調道德修養的義理之學，近於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宋學」，然而在「新漢學」當道之下，以此標準而論，他有時也不免會覺得自己的學問是空虛地。

對此吳宓在1927年10月31日日記中，頗有夫子自道的況味，他說：

與寅恪談，並與他人較。自覺（一）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其識見之偏狹，行事之樸陋，雖自詡真誠，而常為通人（如寅恪、宏度等）所笑。（二）我腹中空空，毫無實學。但務虛理空說，而絕少真獲。既不通西國古今文字，又少讀中國書籍。（三）我之所思所行，勞精疲神者，皆無益處，皆不可告人之事。宜痛改之。⁵⁰

日記中道及「但務虛理空說」，應是吳宓以考證學的標準來

⁴⁹ 葉兆言，〈閱讀吳宓〉，《解析吳宓》，頁65、69。

⁵⁰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10月31日條，頁429。

看待自己，尤其以陳寅恪當時在清華國學院時，以著多種西國古今文字的能力，且精熟於中國書籍，使用當時西方最先進，對中國學術界衝擊最大的歐洲漢學、東方學的治學方法去研治中國國學，他在治學風格上是較近於胡適的新漢學的方法，相較之下，吳宓顯有不足，故他始有此感嘆自省，因為吳宓在本性上是與新漢學的治學取徑有些隔閡。

吳宓重視舊道德宗教、浪漫的文人個性，使得他與新派人物產生甚大鴻溝，1927年7月3日吳宓與日本漢學家橋川時雄宴敘日記上載有：

宓以一己之志業告橋川，謂中國人今所最缺乏者，為宗教之精神與道德之意志。新派於此二者，直接、間接極力摧殘，故吾人反對之。而欲救中國，捨此莫能為功。…中國受世界影響，科學化、功業化，必不可免。正惟其不可免，吾人乃益感保存宗教精神與道德意志之必要。提倡人文主義，將以救國，並以救世云。橋川君述安岡正篤君之為人，得富翁之助，主辦金雞學院，注重道德之修養。意其人之思想必與宓相近似，遂約由橋川君介紹通函為友。⁵¹

當思想上是重視宗教道德，提倡人文主義時，吳宓就可與外人橋川時雄成爲朋友，反之則視爲與胡適新派學人同一集團，並視如寇讎。

故後來1927年底當《學衡》的大將胡先驕因胡適待其頗好，

⁵¹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7月3日條，頁364-365。

且他認為《學衡》缺點太多，抱殘守缺，為新式講國學者所不喜。並建議將現有的《學衡》停辦，完全另行改組事，而大大傷了吳宓的心之時，吳宓在日記上就寫下：

夫維持《學衡》之種種愚誠苦心，以梅、胡諸基本社友，乃亦絲毫不見諒。…同室操戈，從旁破壞，今世成風，豈《學衡》社友之賢者意不免此。…宓之本心，實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貫之精神及信仰，而成為光明端正，內質誠而外活潑之人物，所模仿者，為安諾德，為白璧德，為葛德，為曾文正。⁵²

是以吳宓秉持著注重舊道德、心性、人文主義價值的信念，故批評胡適新文化派反中國舊道德的立場，而在治學風格上亦與當時中國主流的胡適新漢學差距甚大，而這一矛盾後來浮上檯面後，也相當程度地促成吳宓的去職。

⁵²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11月14日條，頁437、438。

第三節 清華國學院的風潮與吳宓的「國學研究」

觀察吳宓的心性與學術興趣，確實偏向浪漫主義，在感情上與毛彥文的關係更見其生命本質⁵³，他對《學衡》的投入也是一種浪漫主義的體現，全力對抗胡適等人的新文化派，接近一種宗教式的偏執。吳宓幾乎沒有 1920、1930 年代那種意義下的新國學研究著作，他介紹西方古典人文主義、西方文學、中國古典的儒家思想，未有新漢學的治學方式，是以他將清華國學院當成體現他文化理想的陣地，或許研究院中「本院略仿舊日書院」的主張，其中傳統書院制度才是他心中所寄託的理想實踐之地。所以後來當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等人主張研究院應辦成與大學銜接的多學科研究院，與吳宓想辦成一個有自己特色的國學研究院是有距離的。在清華校方欲對國學院的體制、發展方向有所改變之際，吳宓 1926 年初發表了較屬個人意見的〈研究院發展計畫意見書〉，細述他個人對國學研究的意見。

此際清華校方教務長張彭春，研究院中導師王國維、趙元任、李濟都贊成國學院專做「專題研究」⁵⁴，而吳宓與梁啟超則主張除專題研究外，仍應授「普通國學」，當吳宓以〈研究院發展計畫意見書〉示梁啟超時，「梁以長函復宓，極表贊成。且謂

⁵³ 有關吳宓與毛彥文的感情關係及引發的議論，其背後所反映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互動課題嚴肅意義之探討，可參見吳振漢，〈吳宓與毛彥文—鉅變時代下的兩性關係〉，《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23 期，2001 年 6 月，頁 235-267。

⁵⁴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頁 58-59；《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14 日條，頁 126。

校務會議如堅持原議，則彼下年即辭去研究院之教職云云。⁵⁵」，所以 1926 年有關清華國學院未來的規劃，在當時引起院內甚大的風潮，對學生亦造成甚大的爭議和風波。

學生對此爭議的看法，1926 年 1 月 19 日吳宓日記記下：

上午辦公如恒。召劉盼遂來，以油印之《意見書》示之。旋學生劉盼遂、程憬等四五人等來見，詢對於研究院辦法。彼學生之所注意者，不外學位畢業等。惟要求（一）勿改名為國學研究院，（二）聘請教授須得學生同意，則殊使宓為難。上厄於強有力者，中不合於教授，下沮於學生。宓雖欲不辭職，得乎？⁵⁶

又 1926 年 1 月 20 日寫下「彼學生之所志非高，又多贊成專題研究。固無操縱或利用之心，即管理應付若輩，亦殊不易，益使宓決然有去志矣。」⁵⁷

學生的反應在 1926 年 1 月 22 日另有高潮，該日吳宓與研究院學生談話，而學生對於研究院的發展趨勢等並不注意，他們只重視學位及資格的取得（如欲以現今研究院作為正式之大學院，取得畢業文憑；欲以他年應考游美或出洋游學，而以研究院證書作為畢業文憑，而證明其已有大學畢業資格，可以一體與考或徑許升學；欲取得學士學位，或更高之碩士學位）。然當時現實狀況非吳宓所能決定，未能全如學生所願，是以引發學生風

⁵⁵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13 日條，頁 126。

⁵⁶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19 日條，頁 130。

⁵⁷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20 日條，頁 132。

潮，對吳宓攻擊，態度驕傲，使吳宓興起「無論如何辦法，宓對於清華之辦研究，實不能不謂失望，而今之所謂專治國學、修行立名之士，其行事之不可問，蓋有過于新文化之黨徒也。⁵⁸」

而對於學生來函指責吳宓未盡護守學生權益一事，吳宓日記寫下：

原期為學校稍盡微力；又思講明國學，可以造成正直高明之士，改善俗尚，培養民德，藉符宓夙昔之所想望。經此一年，宓所感受，都不必言。而宓之不樂長任研究院事，則久已自有決心。…。聞是日上午，吳其昌曾持研究院學生會致吳宓函之底稿，往見校長，請將吳宓徑即免職云云。又研究院學生謂若宓戀棧，即將封鎖研究院主任室云云。（或謂彼輩之意，擬迎胡適來為研究院主任，以便與校中接洽要求，較為得力，而在外間名望較大，為畢業生薦事求職，亦較優勢云。）然宓自辭職書上后，即不再赴研究院，而在西客廳住室靜居讀書。⁵⁹

這些日記可知吳宓以為「講明國學，可以造成正直高明之士，改善俗尚，培養民德」，正可見是吳宓心中理想的「國學研究」，不是新漢學的考證，而是道德、修為的層面，而對於學生汲汲於現實的學位功利，而未措意於道德修為以使自己成為「正直高明之士」，吳宓是至為失望的，並認為學生的行事更不及他最大的敵人「新文化之黨徒」，這樣的氛圍亦造成吳宓的掛冠求

⁵⁸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1月22日條，頁134-135。

⁵⁹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3月10、11日條，頁157-158。

去。

1926年1月5日清華校務會議通過張彭春的提議：此後研究院應改變性質，明定宗旨，縮小範圍，只作高深之專題研究，而不授普通國學。在吳宓反對此決議未果之下，於是決定去職，並寫下了〈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一文，相對於之前繫於吳宓名義發表的〈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設院開學日的演說，這篇文章更能真正彰顯出吳宓心中所謂「國學研究」的典範為何。

吳宓的〈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的演說，必須考慮到國學院其他導師的想法、時代的學術主流風潮，雖不無含有吳宓某些國學研究的文化理念，但畢竟是折衷下的產品，這是他以清華國學院主任官方職務名義來發表。而〈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是已經在校方決定改變國學院發展的方向，並引起爭議之後，吳宓較忠實的將他心中所期望的國學研究的理念寫出之文。

在〈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文中，吳宓認為：

今之國學，紊亂殘缺。…然國內提倡國學之機關甚少，而又辦理不善，人才缺乏。或則陳腐，嫌其過舊；或則偏激，強名曰新；或則但務瑣屑之考據；或則徒事浮華之詞章；至於編查檔案，徵集歌謠，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為者，固亦有相當之價值，而究未盡國學主要之能事也。竊以為今日研究國學，急宜二事懸為目標：(1) 則整理全部材料，探求各種制度之沿革，溯其淵源，明其因果，以成歷史地綜合。如梁任公之《中國文化史》之體例，及其他急宜編著之《中

國文學史哲學史》皆是也。(2) 探討其中所含義理，講明中國先民道德哲理之觀念，其對於人生及社會之態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為比較，而有所闡發，以為今日中國生民群治之標準，而造成一中心之學說，以定國是。如梁任公所擬講之《儒家哲學》，即合於此類也。…清華設備及經費，均已足用，又有王梁二先生在此，更逐漸添聘精博宏通之教授，則為此也甚易，是清華對於國學，對於社會，對於中國之前途，實負有此重大之責任。⁶⁰

吳宓的這個意見書中，有幾點值得討論。一是在吳宓眼中，當時國內的國學機關「或則陳腐，嫌其過舊」，當指國內國粹學派的國學研究；而「或則偏激，強名曰新；或則但務瑣屑之考據」，當指國內胡適新文化派的新漢學研究。而吳宓希冀的國學研究則是超出這兩者的風格，而走上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路徑，或傳統中國儒家的人文主義。

二是吳宓希望能著成像梁任公《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學史哲學史》的專書，這與胡適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所提出的整理專史的著述體例在精神上是一致地。這些都是突破中國傳統著作體例的現代學術型式，吳宓雖與胡適新文化派在文化觀點上勢若水火，然在建立中國學術的新風格上，兩人仍有其共通之處。

三是吳宓認為國學研究要講明中西「先民道德哲理之觀念」、「人生及社會之態度」，以作為「今日中國先民群治之標準」、「以定國是」，實際上是希望國學研究有其「經世」的功能，而

⁶⁰ 吳宓，〈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 185。

非只有純粹的學術考證的面向，這是吳宓一貫的文化學術立場，亦是他的人文主義的關懷。而此則與胡適「新漢學」派堅持先在學術研究上秉持客觀的立場，而不要涉及道德、價值的主觀層面，兩者正形成最大的差別。在 1925 年吳宓的〈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文即曾提及清華校長曹雲祥在《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係》中談及研究院之宗旨，在研究中、西文化之後，「然後於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這表示清華國學院的國學研究係強調「經世」的目的⁶¹。惟對於如何達成這一設置目的的國學研究方法，實際上，胡適的新漢學派或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如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他們都是秉持「價值」與「事實」分開的方法，儘量在思想的自覺意識中，不讓主觀的因素涉入學術研究中，這與後來傅斯年在〈史語所工作之旨趣〉文中，所提倡的不涉仁義禮智主觀成分的所謂「科學的客觀」學術研究同其精神⁶²。然而在吳宓的理想國學研究構思中，則以為「價值」與「事實」是不可分的，在國學研究中，吳宓更重視所謂「生命的學問」的人文理想。吳宓在 1925 年 8 月 2 日給白璧德的信，其中有介紹清華國學院時就說「研究所將進行的研究工作全部限於國學領域—國學研究的不同學科，它們致力於研究事實，而非討論鮮活的思想」⁶³，「致力於研究事實」當指國學研究的考證工作，而「討論鮮活的思想」則指

⁶¹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頁 173。

⁶²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1980），第四冊，頁 266。

⁶³ 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吳宓致白璧德〉函，1925 年 8 月 2 日，頁 35。

「宋學」式的義理探究，是以吳宓對於清華國學院的國學研究性質，相對於他的理想國學形態確是隔了一層。

而引發清華國學院風潮的起火點是教務長張彭春，欲將國學院只作「高深之專題研究」，而「不授普通國學」的爭議，對此吳宓在 1926 年 1 月 6 日日記上寫：

宓雖贊成研究院以高深專門研究為目的，而主兼辦普通國學，至專門科國學系成立之日為止。張君則主決不容納普通國學。二人議不合。下午 4-6，校務會議開會（6），議研究院各提案，而張仲述一力推翻。其結果，通過。此后研究院只作高深專門研究，教授概不增聘，普通國學亦不兼授。于是宓所提出之計劃盡遭摒棄。而研究院之設，僅成二三教授潛修供養之地矣。

64

其中所言「僅成二三教授潛修供養之地矣」，大約指國學院變成少數專家潛心作學問之所，不再使國學有「對社會、中國前途負有重大責任」的功能。

實際上吳宓任職國學院主任一段時間后，即已興辭退之意，1926 年 1 月 6 日原作函要給校長，然寫成而未發，然此函可見吳宓的心境，函中提及「況研究院宗旨無定，計劃難行。主任一職，不過侍應教授，編寫文牘，雖非傀儡，儼同機械，縱日夕費時費力，不敢畏勞，而所能裨益學校者，固極微細也。⁶⁵」實

⁶⁴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5 日條，頁 121。

⁶⁵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6 日條，頁 122。

際上這裡反映了清華國學院中，真正決定國學院學術方向的主要仍是諸位導師，國學院主任之職仍偏向在行政工作，這自然與吳宓的人文理想有所距離。

而在國學院爭議進行過程中，國學院導師中，梁啟超頗贊成普通國學之議⁶⁶。但 1926 年 1 月 7 日的發展，吳宓日記記下這一重大的轉折：「開研究院教授會議……趙、李力贊校務會議之決案。王默不發言。獨梁侃侃而談，寡不敵眾。宓亦無多主張。其結果，即擬遵照校務會議之辦法。……專作高深窄小之研究。⁶⁷」，此事到 12 日王國維亦主張專題研究之時，吳宓已覺得「研究院內外如此，事不可為矣」⁶⁸。所謂「專作高深窄小之研究」即是指清華國學院將從事漢學式的考證工作，是以吳宓認為「事不可為矣」，當指無法達成他的學衡派的人文主義理想。

吳宓之所以反對國學院辦學方向的改變，係因為國學要有「經世」的功能，而吳宓這一看法實際上正是當時「學衡派」的主張，例如柳詒徵在〈講國學宜先講史學〉中就以為：「講歷史的好處，不是可以換錢的，也不是可以騙文憑的，主要的好處就是彰往察來，所謂考諸往而知來者」，文中也批判疑古辨偽學風，「所以只講考據和疑古辨偽，都是不肯將史學求得實用，避免政治關係，再進一步說是為學問而學問，換句話說是講學問不要有用的」⁶⁹。而疑古辨偽之風就是當時胡適、顧頡剛新漢學的重要

⁶⁶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7 日條，頁 123；1926 年 1 月 8 日條，頁 124。

⁶⁷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7 日條，頁 123。

⁶⁸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1 月 12 日條，頁 125。

⁶⁹ 柳詒徵，〈講國學宜先講史學〉，收錄在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469、473-474。

面向之一。

胡適、傅斯年、顧頡剛五四新文化派的「整理國故」是一種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的「新漢學」，講究「事實」與「價值」分離的客觀學術研究。代表這一思維者如傅斯年後來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所謂的「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同志」⁷⁰，或顧頡剛在〈一九二六年始刊詞〉中說「研究學問的人只該問這是不是一件事實；他既不該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該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這是一種純粹的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故他認為「我們原不要把學問致用，也不要再在學問裡尋出道德的標準來做自己立身的信條」。而對於現代學術機關，顧頡剛以為學術機關是確以提倡學術為專責的，學術機關的個人是確以研究學術為他的專門的工作的。那麼，他們就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依然埋頭於學術上的問題原沒有什麼錯處，這些觀點是針對質疑他們從事純粹考據而無益於國家社會時，顧頡剛所提出的辯解。顧頡剛以為「考據的工作原是我們這個學術機關的生命，只要我們這個機關有一天的存在就該做一天的本分的工作」⁷¹。

由胡適開其端，顧頡剛、傅斯年加以延續發展的新漢學研究，其對國（史）學研究態度，自然不同於吳宓、柳詒徵「學衡派」強調國學研究的「經世」功能，這對吳宓而言，他個人並不主張考證的新漢學，而清華國學院終歸要走專門學科「高深而窄小」的研究取徑，而這一新的學風不是他所能欣賞的。

⁷⁰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266。

⁷¹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下冊，頁685、686、691-692。

這次關於「專門研究」與「普通國學」的爭議，是清華國學院內部的重大爭議，其中既有人事的因素，更有文化學術理念的的不同。

吳宓敬重王國維，儘管在校務會議中，王國維是支持國學院做專題研究，而趙元任亦是如此，但吳宓對趙不免有怨詞，然對於王國維則無一語埋怨，甚至王國維自殺後，吳宓更深情哀悼，日記寫下：

宓隨同陳寅恪，行跪拜禮。……宓思前年來京，清華學校命宓迎請王先生到此講學。今甫二載，而送王先生靈柩至此廟中。宓始終襄隨其間。亦云慘矣。宓又思宓年已及王先生之三分之二，而學不及先生十之一。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維持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精神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靈，他年苟不能實行所志，而洩忍以沒；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苟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鑑之。

而在這天日記中吳宓更抄錄王國維的遺囑，其中有「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而此「實宓之大榮矣。⁷²」。

吳宓對王國維行跪拜禮以表達對最高的崇敬，主要是源於王國維體現一種中國文化道德禮教的精神，而吳宓亦自許承擔起這責任，這也是他期許清華國學院的學生，但是在與研究生接觸

⁷²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6月3日條，頁346。

諸事後，1925年10月28日吳宓日記有：

學生王庸、吳其昌、程憬等七人來見。請求學校廢止請假辦法，准研究生自由出校（並函學監請求）。宓與理論再三，仍不省。宓乃答以俟呈校長，交訓育委員會討論后再復。嗟嘻，研究生志趣卑下，不專心立學，殊負本院之目的也。⁷³

國學院研究生只在乎請假瑣碎事宜，而未能有更高的志趣，專心於立學修養，吳宓認為與清華國學院的教育理想相違背，是以使吳宓更感到「研究院諸生殊幼稚也。⁷⁴」

而涉及吳宓去留的人事問題，同時與清華的校長位置有關，當時校長曹雲祥將赴英國，擬推荐張彭春自代，然這恐怕引起校內發生衝突，所以另有推舉陳錦濤代理以抵制張等情，吳宓1925年11月18日在日記記下：

宓以張繼任，苟能捐棄嫌怨，禮賢下士，開誠布公，則亦幸事。如其不能，則外方繼任之人，似范源廉為宜。宓本不喜捲入世網，故此事亦擬不參與。惟靜待自然之變遷。即張任校長，如竟不能相容，則亦只有另求枝栖，自行所志而已。嗚呼！世事之多變也。⁷⁵

而對於此事風波，持續蕩漾，吳宓隨後在11月22日記下

⁷³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10月28日條，頁87。

⁷⁴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1月29日條，頁142。

⁷⁵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11月18日條，頁96-97

「梁任公來約，五時往訪。知范源廉以師大之故，故不就本校校長，而主張改組董事會，約周詒春回任。又梁任公謂至十分必要時，彼自身愿任校長，但以事簡而不妨學業為前提云。」⁷⁶

此事隨後吳宓的日記記載又見他心思的曲折：

晚 8-9 得東招，謁梁任公。梁甚愿就校長，詢校中內情甚悉，但擬以余紹宋任機要主任。又云此事如決辦，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適可聘來研究院云云。此后，覺連日奔走校長事，殊無味。此席恐終為余日章所得。我等勞碌，何益？即梁就職，且招胡來，是逼宓去。張任校長，其不利于宓，尚未至此地也。大好時地，不能安居讀書，奔走何苦哉？宓乃爽然自失矣。⁷⁷

而一直到 1927 年底，此時吳宓已離開國學院主任之職，惟當吳宓訪陳寅恪時，陳寅恪力主梁啓超擔任校長，吳宓仍有「恐梁來而黨徒遍布，趨奉者成群。⁷⁸」之嘆，而對於劉頴之、吳其昌力主以梁啓超長校者，吳宓也有「其行事亦但求成功，不計手段之嫌。嗚呼難哉！⁷⁹」的嫌惡譏諷。

從這些日記記載可知，吳宓頗關心清華校長的人事繼任問題，因為人事問題恐怕會影響吳宓在學校的院務工作之推動，或擔憂引進吳宓的敵人胡適等人入校，這些因素實際上也埋下吳宓

⁷⁶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 年 11 月 22 日條，頁 99。

⁷⁷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 年 11 月 24 日條，頁 101。

⁷⁸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 年 11 月 2 日條，頁 430。

⁷⁹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 年 11 月 3 日條，頁 431。

去職國學院主任的原因。

在清華國學院中，原本梁啟超與吳宓的文化理念是較為接近地，比如梁氏想在這新的機關中，參合著舊的精神，把中國儒家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中體現出來對於智識追求方面，固然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但梁希望是科學不但應用于求智識，還要用來做自己修養的工具。最後梁對國學院的期許是，有關國學院的發展同樣要秉持著需要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與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兼籌並顧⁸⁰。而對於國學的研究應走的路，梁啟超認為有兩條：一：文獻的學問，應用客觀的科學研究方法去研究；二是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⁸¹。梁的國學研究牽涉到「德性的學問」，這與胡適新漢學的態度迥然相異，而近於吳宓「學衡」派所強調的新人文主義，甚或吳宓將梁啟超思想引為與「學衡派」學風的同調，在談到柳詒徵時吳宓就寫到：

近今吾國學者人師，可與梁任公先生聯鑣並駕，而其治學方法亦相類似者，厥為丹徒柳翼謀先生詒徵。兩

⁸⁰ 梁啟超，〈梁先生北海談話集〉，收錄在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607、610。這篇文章係梁啟超於 1927 年夏，偕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北海之遊，當日所發表的談話一篇，該文以後刊入《清華研究院同學錄》中，吳其昌記其經過，稱師生共遊，「俯仰詠嘯于快雪浴蘭之堂，亦往往邀名師講學期間。」曾邀張君勳為同學講宋賢名理，「蓋穆然有鵝湖、鹿洞之遺風焉」而此篇即由梁啟超自述，以為諸同學之勉策。這自然可看出梁啟超對清華國學院莊重的期許。

⁸¹ 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收錄在馬克鋒編，《國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90。

先生皆宏博通雅，皆兼包考據義理詞章，以綜合貫通之法治國學，皆萃其精力於中國文化史。⁸²

但是現在爲了倘若梁啟超就任清華校長，將聘胡適來校一事，致使吳宓心中有所顧忌⁸³，此更見與吳宓對胡適新文化派勢不兩立的態度，決無相容之處。吳宓與胡適本無宿怨，只因受梅光迪影響，終身與胡適爲敵⁸⁴，致發出「爲政作惡之士大夫，及新文化教育家，誠罪惡之尤者矣。⁸⁵」的批評，甚至當 1927 年北伐國民黨黨軍將北上之時，吳宓日記又記下：

黨軍到京，宓身甚危，至少亦恐受辱。家中且虞為若

⁸² 吳宓，〈空軒詩話十七：柳翼謀詒徵〉，收錄在氏著，《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201-202。

⁸³ 實際上梁啟超受聘於清華國學院導師，除了梁啟超長期與清華的特殊關係外，很早就講學於清華，然胡適當時推薦梁啟超給清華校長曹雲祥亦是重要關鍵，此前胡適被聘為「清華大學籌備顧問」，曹校長曾向他請教如何創辦研究院國學門，並想請他擔任國學研究院導師和主持研究院。然胡適說「非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參見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 19。又梁啟超的文化態度雖曾多變，惟近於晚年的清華國學院時期，大致上他是對中國傳統有諸多肯定，且對學術的態度，並未能如胡適新漢學取徑將「事實」與「價值」作一嚴格區分，但梁啟超與胡適終生在政治的接觸、學術的見解、彼此的友誼，都有相當多的交涉，兩人的關係，與胡適和吳宓的關係全然有所不同，梁、胡兩人關係，可以參看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收錄在李又寧編，《胡適與他的朋友》（台北：紐約天外出版社，1990），頁 19-69。

⁸⁴ 余英時，〈記吳宓的「殉道」精神〉，《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頁 137。

⁸⁵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 年 2 月 1 日條，頁 145。

輩之徒眾搗毀傷害，固宜遠避，勿居北京。…。總之，北京必不可居，居之殊危。蓋宓雖與政治無關，而文學思想之仇敵甚多，乘機報復，得而甘心，亦固其所耳。⁸⁶

日記中所謂的「文學思想之仇敵」，毫無疑問地，就是指胡適新文化派的學人。吳宓仇視新文化派，雖有其理知方面對其反傳統思想的批判因素，惟恐也包括非理性的偏執之處，談到可能政治上的風波，也恐新文化派的報復，殊已至令人浩嘆的境地。

其間有關曹雲祥、張彭春、梁啟超在校長繼任問題上，牽涉極多紛擾，在吳宓日記中保留甚多記錄，其中學術理念的差異與人事權利的角逐，有時事互為表裡的，吳宓身在其中，終不免在他學術理念不獲實踐之下，加上人事的紛擾，最終逼得他掛冠求去。⁸⁷綜合而言，吳宓從任職清華國學院主任到最終去職，是因為原本形式上的暫時調合最終卻遮蓋不住思想本質上的衝突與矛盾。

畢竟吳宓是一位少見的理想主義者，曾以「殉道殉情」四字，自概其生平，而吳宓與當時東南大學的梅光迪、湯用彤、柳詒徵等人都是《學衡》的靈魂人物，刊物主要的目的是對抗新文化運動胡適這群新派學人，而美國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

⁸⁶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4月7日條，頁328。

⁸⁷ 這部分校長繼任糾紛史料，可參考《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11月20日條，頁97；1925年11月13日條，頁99；1925年11月24日條，頁100-101；1925年12月15日條，頁107-108；1925年12月16日條，頁108；1926年1月26日條，頁138；1926年1月27日條，頁139-141；1926年2月4日條，頁145-147。

人文主義是這批《學衡》最重要的精神資源。而吳宓認為除了《學衡》外，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他實踐「道」的地方。而作學問，尤其是作漢學式的考證之學（新漢學）都不是國學研究的重心或要走的路徑，他這樣的對國學研究的態度，在他任職國學院主任之初的給友人函中，就有很清楚的表達。

在 1925 年 12 月 30 日吳宓給莊士敦的信中寫下：

我不喜歡任何行政工作，而且對目前從事的所謂國學研究不感興趣，因為它避開了所有對古代聖賢和哲人偉大道德理念的哲學討論，卻將目前中國的問題和政策作為重要方向，而在那方面，只是做些枯燥無用的研究，或是對我們寶貴的傳統進行毫無根據並有害的攻擊。我到清華的原因是想在一所平靜的學校找到一種舒適的生活，使我得以利用所有可用的時間和精力，編輯承您嘉許的《學衡》。⁸⁸

這是一段重要的自我表白，首先所謂的目前的國學研究，「只是做些枯燥無用的研究」而避開「所有對古代聖賢和哲人偉大道德理念的哲學討論」，顯然係指當時學界的主流胡適為主的新漢學學派（因為信中直指其「對我們寶貴的傳統進行毫無根據並有害的攻擊」），然細考吳宓所言，他也極可能認為清華國學院的國學研究，大部分仍是在新漢學研究典範的壟罩之下，從事枯燥無用的研究，因為在清華國學院的課程中並沒有甚麼「古代聖賢和哲人偉大道德理念的哲學討論」課程，教師與學生所教、所

⁸⁸ 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吳宓致莊士敦〉函，1925 年 12 月 30 日，頁 151。

寫都還是以歷史考證為主。是以在吳宓對於當時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學術的看法中，亦可反映他的學術傾向，他說：

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一世，予獨喜先生早年文學（如論屈原融合南北，兼古典浪漫之長等）。哲學論著。以其受西洋思想影響，故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又先生所作詩詞，雖少而精，使先生移其才力於文學哲學，所成或更宏偉，亦未可信。⁸⁹

吳宓推崇王國維不在他的新漢學式的古史及文字考證的論著，而在王的浪漫文學研究，這更可看出他思想的歸趨。

又 1931 年 2 月 25 日吳宓從巴黎寫信給浦江清，信中提及：

昨謁伯希和，其人乃一精明強幹之人，又係一考據學者，宓不喜之。彼初見宓，極冷淡。宓乃自陳為《學衡》編輯，彼略重視。彼疑《學衡》已停，宓告以未。繼宓又言及靜庵先生及陳寅恪文藝。彼視《清華學報》《述學社國學月報》為有價值之雜誌，彼以李濟、董作賓為上等學者。…末后，彼詢寅恪兄住址，宓具以告。⁹⁰

在信中吳宓對伯希和的考據學者身分並不欣賞，而伯希和所重視的王國維、陳寅恪、李濟、董作賓，都是比較在歷史考證

⁸⁹ 吳宓，〈空軒詩話十一：王國維詠史詩〉，《吳宓詩話》，頁 192。

⁹⁰ 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吳宓致浦江清〉函，1931 年 2 月 25 日，頁 181。

學或對西方的學術知識、方法有所理解的中國學人，而伯希和對於吳宓的學術理念顯然是感到陌生地，故待其很冷漠，這些都反映了吳宓在當時中國學術光譜上所處的位置為何。

實際上，吳宓生平與歐洲漢學家、東方學家交往不密，惟獨對俄國東方學家鋼和泰（Staëi-Holstein）推崇有致，吳宓與鋼和泰的交往密切，且甚至翻譯鋼和泰論文為漢文的〈一七三四年班禪喇嘛告諭譯釋〉，刊登在1925年7月第43期的《學衡》雜誌上，並給予鋼和泰甚高的評價，推崇他是西人中研究東方學的大家，精通西藏文及梵文，又通中國文及漢譯佛典。寓中收藏藏文佛經、及大小各種佛像畫卷甚多，終年閉門研索古籍，個性澹如也⁹¹。而吳宓在日記中留下一些與鋼和泰交往的片段⁹²，也曾經出力欲聘鋼和泰任教清華，在1927年8月19日記載：

昨因鋼和泰電邀，乃于今晨八時半，至東單牌樓，船板胡同內，筆管胡同七號訪之。談校中聘請之事。鋼薦其友福克司博士 Dr. Walter Fuchs。己則願為研究院講師，並擬聘燕京之某女教員佐之。宓以此辦法，即電告教務長梅貽琦，得許。宓遂與鋼各寄一信以聘福克司。鋼示宓以新購得之達賴、班禪各圖像。⁹³

⁹¹ 王啟龍、鄧小咏，〈《鋼和泰學術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107-110。

⁹² 吳宓與鋼和泰交往的日記蒐羅整理，可見王啟龍、鄧小咏，〈《鋼和泰學術評傳》〉，頁110-112。

⁹³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8月19日條，頁391-392。

吳宓與鋼和泰在學術上的彼此合作在此可見。吳宓對於當時西方的漢學、東方學的取徑，看來並不是能到相悅以解的程度，畢竟當時西方漢學、東方學所走的研究方法正如吳宓信中所說是伯希和型的考據學者之取徑，頗近於清代乾嘉考據漢學，惟更具多語言上的文獻資料比較，在方法上更為精密，然與吳宓的崇尚道德、宗教、精神的人文主義，宋學的精神，迥不相同，然或許是鋼和泰是一「終年閉門研索古籍。個性澹如也」的學人，與伯希和「乃一精明強幹之人」的「考據學者」，個性和治學取向上差異甚多，是以吳宓與伯希及鋼和泰的關係，形成或疏或密原因在此。

綜觀而言，當清華國學院的學術體制要走向更專科化，及治學上向新漢學靠攏時，此與吳宓對國學研究的學術理念及人文理想是有所差距地，再加上清華校長繼任的人事紛擾之後，吳宓也只有離開國學院主任職務了。

第四節、小結

對於吳宓生命的認知，1927年6月14日吳宓與陳寅恪的對談，可得其底蘊，當天他日記寫下：

晚，樓光來來，同出散步。又同訪陳寅恪，談久。宓設二馬之喻。言處今之時世，不從理想，但計功利。入世積極活動，以圖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懷抱理想，則目睹事勢之艱難，恬然退隱，但顧一身。寄情于文章藝術，以自娛悅，而有專門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則欲二者兼之。心愛中國舊日禮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積極活動之新方法，維持並發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計成績，不得不謀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馳而相衝突，強欲以己之力量兼顧之，則闢如二馬並馳，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馬背而繫之，又以二手堅握二馬之繮于一處，強二馬比肩同進。然使吾力不繼，握繮不緊，二馬分道而奔，則宓將受車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劇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則欲不並踏此二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寅恪謂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所寄託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靜安先生，是其顯著之例。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範圍，特有大小輕重之別耳。⁹⁴

⁹⁴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7年6月14日條，頁355。

「二馬並馳」的比喻正表示吳宓處於近代中國學術界的內在矛盾，他想用國學研究來體現他「心愛中國舊日禮教道德之理想」，但當時中國時代學術思潮的走向是悖於吳宓的理想，是以吳宓則感到「受車裂之刑矣」的痛苦。

綜觀吳宓任職清華國學院主任從籌備時期到正式成立、離職約一年餘時間，他確實是帶著遺憾、失望而卸職。清華國學院其文化立場偏向保守，王國維、梁啟超、吳宓、陳寅恪類此；而其學術取向上則趨新，梁啟超的新史學革命的理論開拓、王國維與陳寅恪的在清代乾嘉考證學的基礎上，結合西方頗具科學精神的東方學、漢學的研究取徑，開拓出中國的新學術之路；而趙元任的語言學和李濟的考古學更是當時中國，最先引進西方新學科的奠基者，而吳宓居其位主持國學院的職務，心中亦想辦理一個突破傳統，融和中西的新式學院，通過培養「正直高名之士」，將他理想中的《學衡》雜誌理念和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理想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中實踐。然吳宓堅持講授傳統經史小學為主的「普通國學」與向西學開放的「專題研究」相結合的方針，以師生必須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觸方式挽救新教育體系下的師生疏離，通過分科以教授個人學術專長為主來顛覆西式的學科分類，學者羅志田稱這是一場小小的制度革命⁹⁵。

然而當清華終將走向現代型式教育體制的大學時，其學術趨向將更專業化分科化，而在胡適「整理國故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研究已經趨向於「事實」與「價值」分離的新漢學研究主流思潮之下，吳宓那種想結合傳統書院制度與西方現代學術制度的

⁹⁵ 羅志田，〈一次寧靜的革命—清華國學院的獨特追求〉，《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5-13。

清華國學院，原希冀塑造重視道德、人格修養的國學風格，以實現他欲將道德予以提升及人文理想的實踐，他這種融合「事實」與「價值」的國學研究理念，終歸須讓位於現代學術新體制，而去從事當時專科化的主流新漢學取徑，故他心中時有「二馬並馳」的困境，當情況無法改善時，吳宓至此也只有離開國學院主任一職。而吳宓的去職涉有人事的糾葛，然人事紛擾的背後不免是涉及文化、學術理念的差異。

當清華國學院結束後距今八十多年的時間，大家總不斷懷想這一學術機構的傳奇，除了著名的四大導師和一位講師外，大家仍也歸功於清華國學院當時結合傳統與現代的模式，在學術研究面向，清華國學院繼承了中國乾嘉以來的學術傳統，並吸收了西方東方學、漢學的科學研究理念和方法，在趨新一方面特顯精采；而在文化理念及教育體制方面則，則能中西並舉，採擇其長，或許這真是「一次寧靜的革命」，而吳宓雖然在具體學術研究方法及理念上不合於時代的思潮，然而他所身懷的古典人文主義理想，則或多或少留在清華國學院中，雖然燈火闌珊，但卻不絕如縷。

第三章 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風格的建立

1924年清華學校決定辦理研究院的國學門，當時校長曹雲祥則向胡適請教如何辦理研究院，並商請胡適來清華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導師，胡適辭退並建請由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等人擔任導師工作，最後由梁啟超、王國維應聘，章太炎未應聘，然胡適在幕後參與對清華國學院的建構，則不可忽略。雖然最後由與胡適新文化派對立的學衡派主將吳宓擔任國學院主任，而吳宓的文守保守主義，與加上國學院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的文化、政治的保守傾向，是以使得清華國學院一般總被認為是保守主義的學術團體，然本文第二章業已就吳宓的文化理念與清華國學院的學術建構關係作過探討，這裡想再進一步略加分疏，某種為人所認知的清華國學院這一文化「保守」形象的底蘊為何，這也有助於我們了解清華國學院的學術風格。

第一節 清華國學院：文化的保守與學術的現代化

清華國學研究院校風之奠定，有其特有的歷史背景，清華作為留美的預備學校，及由庚子賠款支助而設立，其受西方文化影響自不待言，然而從研究院中主其事的人員中，更可看出其學術風格。在西潮衝擊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機構制度性層面自然帶有西方文化的現代化成分。1925年吳宓對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設立宗旨及治學方向，在國學院開學之日的演講〈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一文中提及：

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詳見曹校長所著《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係》小冊中，……至於研究院之切實之宗旨及辦法，則備具于「研究院緣起及章程」，曹校長之意約分三層：（一）值此新舊遞遭之際，國人對於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採擇適當，融化無礙。¹

另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院章程·章程〉中也提及：

良以中國古籍，自漢迄今，注釋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備與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於后人之補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為夥頤，亦尚待會通細密之研究，……。至於歐洲學術，新自西來，凡哲理文史諸學，非有精深比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精華而定其取舍。²

從上可知，清華國學研究院是在新文化運動下爲了適應對西方興未艾的文化熱，正確對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想通過這一學術機構來培養國學門專門人才，通過對中國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而使中西文化相互溝通，經過綜合、比較與創新來對中國前途有所啓示，而以吳宓身爲研究院籌設時期負責人及正式成立後的研究院主任，如此也顯示出清華國學研究院所蘊涵的文化和學術理念。清華立校時所具有的西方背景外，同時也蘊涵了素

¹孫敦恆，《清華國學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頁15。

²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清華漢學研究》，第一輯，頁271-272。

為學界認為是傳統派文化理念的質素。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其立刊宗旨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³，此與清華國學研究開辦宗旨比較可知，清華國學研究與「學衡」雜誌在文化精神上有其會通之處，這裡可以看出吳宓對清華國學院某種影響的痕跡⁴，同時清華國學院在教育制度上也參考了中國傳統書院的制度，加上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文化保守傾向，所以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伊始就濡染了文化保守主義之色彩。

而清華國學院這一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術團體，似乎呈現出與胡適新文化派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以往從思想史角度將胡適、傅斯年代表的「西化派」和梅光迪、吳宓代表的「學衡派」視為對立的兩面，其實是有著簡化其中思想史上的複雜性，在某個面向，例如白話文和文言文爭議上，兩派確實呈現出涇渭分明現象，但是兩派在另外重要面向則有其精神上的同構，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則研究晚近付梓的梅光迪致胡適四十六封信函，對這一問題有了新的發現⁵，值得在此作一介紹，可以使得我們對「文化保守主義」有新的理解向度，更可以加深我們了解清華國學院處於西方文化衝擊所必然的西化傾向時，如何與其持守的某種保守主義並存。

³ 《學衡》雜誌簡章，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上冊，頁 352-353。

⁴ 孫敦恒，〈吳宓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收錄在李賦寧等選，《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 63-86。

⁵ 梅光迪致胡適的四十六封信函，可參見羅崗、陳春艷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 111-182。

1930 年代之際，一般人總認為「學衡派」支持任何胡適、傅斯年等「西化派」反對的事物，故梅光迪、吳宓的「學衡派」被包括胡適和魯迅在內的五四領導人，輕蔑地視為守舊的胡鬧，但是在研究這些新發現梅光迪致胡適的函牘後可知，在 1919 年之後，梅光迪曾寫了幾封長信給胡適，其中有討論到現代中國的儒學問題，此時胡適由於還籠罩在父親的影響下，仍相當程度是程朱新儒學的信徒者，而梅光迪的意思則是激烈抨擊程朱正統的說法，且敦促胡適移向顏元與李塨之學，因顏李強調社會與政治現實實踐在孔孟初始教誨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並以此反對程朱新儒學毫無根據的冥想。一開始胡適抗拒這種建議，然而這為他十年後熱心提倡顏李學派播下種子。

其次梅光迪不只相當不滿漢儒和宋儒，而且也嚴厲批評當時中國極為風行的國粹學派，因他認為國粹派仍舊不加批判地跟隨儒學典籍的傳統註解，梅光迪的目標在於儒學傳統與西方文化的高度綜合，對他而言，這勢必要兩階段才能實現：徹底潔淨過去兩千年來的儒學傳統，以及牢固掌握歐學，探其文化之源，他說，中國古籍現在必須以西方組織人類知識的系統，諸如文學、哲學、法學等等，加以研究，梅光迪的西化傾向是不容否認的；第三是，梅光迪在胡適文學革命早期，他事實上是個熱忱的參與者，他應是同情文學革命，但是無所節制地美化白話，他則無法贊同，從相關新的證據中可知，是因為胡適不斷激進的主義，在比較的程度，才把梅光迪推向極端的保守主義⁶，故梅光迪、吳宓的學衡派並非頑固保守的舊派，其主張吸收西方文化的精

⁶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錄在氏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501-505。

神，與胡適、傅斯年的西化派是相同的。

故從余先生的研究可知，知道五四西化派如胡適、魯迅心中所認定的「學衡」是一頑固的「保守派」，其實從思想史發展角度觀察，我們發現兩者其實主要差異，不如胡適、魯迅在當時歷史時空架構中所認定差距如此之大，胡適、傅斯年的西化派與梅光迪、吳宓的學衡派在某個文化趨向上是一致地，差距的只是程度深淺之別，如對西方文化兩派同樣皆是主張加以吸收，且對中國傳統同樣主張需要加以批判，余英時先生很精準的指出胡適與梅光迪「學衡」的例子，可以視為杜威式的實驗主義與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之間，從美國移轉到中國的對抗，因為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是杜威實驗主義信徒，而「學衡」的梅光迪、吳宓則是白璧德人文主義的遵從者⁷，他們同時都是屬於西化的一群，只是西化的內容有所不同，「保守」、「進步」只是相對性的。瞭解這點，我們知道在思想光譜上任意將「保守」、「激近」加以絕對化，其實是簡化思想史上的複雜意涵，是以，清華國學研究院文化的保守主義與胡適、傅斯年新文化運動的「西化派」，在追求西方文化這個意義上其實是接近的，是以如清華國學院的幾位導師，誠然在政治、文化取向上是保守的，但絕非「國粹派」式的守舊，他們都有接受西方文化的認知，而在具體的學術層面上，其治學的方法、概念也都能使用或引進西方學術最新的研究取徑和觀念，故這也可能是後來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傅斯年中研院史語所的帶有西方現代研究方法的取徑，何以能產生密切關聯之因，畢竟兩者同樣都是對西方文化採取開放的態度，進而在學術層面

⁷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人文與理性的中國》，頁 503-505。

上，都能取西方學術治學之長，是以清華國學院能在「保守」（傳統）與「現代」（西化）之間取得平衡點，進而在學術研究上有所貢獻。

另外有關對於清華學風的探討，徐葆耕的論著《釋古與清華學派》⁸一書是企圖在治學理念上對清華學風作「哲學系統」化處理之作，徐氏在研究中提出了「清華學派」一詞，然此一辭原係由文學家王瑤所提出⁹，其意涵雖仍包括了清華國學研究院治學風格，惟其主要指涉對象為 1929 年後的清華大學人文學科治學風格，包括史學、文學及哲學領域的學者，諸如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王瑤、賀麟等人，在範圍界定上雖較為廣泛，但仍有參考價值，徐書的「釋古」意指「在非古與信古的兩個極端之間尋找某種合適之度的慾望，外化為對歷史文本進行重新解釋的衝動，名曰釋古」¹⁰，在當時中國史學脈絡下來看，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風格確實不與疑古派的治史同調，故在「信古」與「疑古」之間作一折衷的「釋古」，確實相當程度呈現某種清華的學風，下文將進一步考察這一問題。

⁸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⁹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釋古與清華學派》，頁 41-42。

¹⁰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頁 44。

第二節 清華國學院導師的學術取向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五大導師及講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在近代中國學術史及思想史上所代表的文化意義是無與倫比的，他們共同聚集在一個現代化的學術研究機構，這一機構所培養出來的七十多位學生很多後來在近代中國學術上（如史學、哲學、語言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皆成爲大家（如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吳其昌、姜亮夫、吳金鼎、王靜如），這在學術傳承上的意義自然深遠。

而細考清華國學研究院學風的建立、治學取徑及研究方法的奠定，除吳宓、胡適在研究院設立方向參與實際的建構及提供意見外，在實際治學風格、治學方法及治學傳統的形塑上，這五位導師（含講師）居功厥偉，而他們個別都受到歐洲漢學、東方學、日本漢學或西方現代學術學科（語言學和考古學）之影響，這正呈現出清華國學研究院現代性學術性格的一面，而五位導師中，國學院初期則以梁啟超與王國維影響最爲深遠，其後趙元任、李濟、陳寅恪共同參與這一清華學風的塑造，究實而論，梁啟超在「新史學」的理論和理念層面的啓蒙最大；而王國維在「新史學」的具體研究實踐上成效最著。

梁啟超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度過的，雖然在專業史學上恐如李澤厚言及除《清代學術概論》稱得上是成功著作是例外，其餘梁啟超的著作創新性並不夠，梁的意義主要是在史學一般理論和方法的倡導者¹¹，易言之，梁啟超的歷史意義是

¹¹ 李澤厚，〈梁啟超王國維簡論〉，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

作為近代中國在西潮衝擊下，轉型時代的啓蒙大師地位，正如後來的胡適的歷史地位及意義亦可以如此來看待¹²。而梁啓超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所成書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自有其在近代中國史學史上里程碑的重要意義，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幾位導師中，梁啓超則是最與學生親近且在精神層面上作為青年學子的導師¹³。

梁啓超在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觀念上，都有其現代化的一面，迥異於中國傳統史學家。1926年會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東來，萬國考古學會歡迎他，在歡迎席上，梁啓超演講〈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¹⁴，細考這篇文章，雖然梁啓超將考古學在中國成為專門學問，認定起於北宋時期，並舉出如歐陽修《集古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的《宣和博古圖》等都是屬於所謂的考古學，並舉出現在的羅振玉、王國維、馬衡都是很著名的考古學家。然而從現代考古學的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著作和學者都應是屬於中國傳統意義下的金石學傳統和金石學家，雖然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有關，但後者所牽涉的範圍和知識遠廣於前者。不過在梁啓超此文中，他認為考古學所研究的對象係分為石類、金類、陶類、骨甲及其他。其中金類中的「古錢」的研究，雖無文字的留存，但對其實物的考察，可以推想那時的經濟狀況，又如研究「銅鏡」，看它的花紋，

三民書局，1996），頁 457-460。

¹²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 62-64。

¹³ 這一方面資料可見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第六章〈師生情誼〉，頁 143-172。

¹⁴ 梁啓超，〈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收錄在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 374-388。

一時代與一時代不同，鏡上所刻的動植物，亦不一樣，可以看出雕刻風的轉移，以及中國同外族往來的狀況。因為受外族的影響，技術上有很大的變遷。尤其在古陶、磚瓦、模範、明器等的實物研究，對考古的幫助很大。

最後，梁啓超希望將來全國高等教育機關，要設考古專科，把歐洲人所用的方法，盡量採用。他並舉例如何在舊方法上做改革，如從前利用器物上的花紋文字，以斷定他的年代，而今後若遇到沒有花紋文字時，當在他的質料形狀色澤上尋出標準，推定他的年代；同時要新方法的引進，例如地質學的知識，可以用崖層狀況，以判定時代的早晚，有人類學的知識，可以考出頭顱骨骼的派別，這類科學於考古方面助益甚大。這裡梁啓超實際上已經接觸到現代考古學上的核心內容，包括地質學、古生物學、Typology（類型學）的領域¹⁵。梁啓超雖然在現代考古學的知識有其侷限性，而且他也從未親身參與田野的考古發掘，但他絕對是新史學應包含著考古學理念的啓蒙者。據李濟所述，1925年佛利爾藝術館和清華國學院共同派遣李氏做些田野調查，並給他任何選擇發掘地點的權力時，當時梁啓超則是個非常熱心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把李濟推薦給山西省長閻錫山，於是李濟和熟悉中國現行政治和社會狀況的朋友商量后，選擇山西省為自己第一個考古發掘地點，方使此次西陰村的史前考古能順利進行。¹⁶

其實早在1923年李濟就參與新鄭的發掘史前遺址工作，然而在挖了少量的試驗坑後，就傳來土匪即將到達該地的消息，於

¹⁵ 李濟，〈考古學〉，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88-90。

¹⁶ 李濟，《安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48。

是工作就中斷了，是以李濟感覺此次考察旅行並不順心¹⁷。同樣的問題，亦發生在 1929 年 10 月年李濟的三次安陽殷墟的發掘，由於深受舊的挖寶傳統影響的河南省政府組織和支持的一個發掘隊，使李濟團隊的第三次挖掘中斷三個星期。雖然這場政治性干擾很快就解決¹⁸，但得挖寶的傳統觀念牢固得很。是以李濟從新鄭的挖掘以來就深刻的體會到考古挖掘「這種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現實的政治和社會狀況」¹⁹。從中可知學術發展中會受到政治、社會觀念的波及，是以要不是梁啓超全力鼓勵李濟到山西西陰村進行考古，並以其自身關係介紹閻錫山給李濟認識，排除了可能的政治、社會的介入，現代中國人第一次主持的科學考古山西西陰村的挖掘，能否順利成行，尚是未知數。而梁啓超 1925 年初其實也還身兼中國考古學會會長，並在家書中對後來成為中國重要考古學家的梁思永，介紹李濟山西的考古發現，並曾與李濟仔細研究梁思永回國一年要作的考古安排，認為梁思成跟著李濟、袁復禮二人同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是以清華在 1920 年代中

¹⁷ 李濟，〈新鄭的骨〉，《李濟與清華》，頁 3-4。

¹⁸ 此次事件李濟於 1929 年在安陽工作了兩季之後，在該年十月間，突有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派人帶河南省教育廳之告示前來禁止中研院繼續工作，並擬自行發掘。此事的導火線是 1929 年 5 月間，因為軍事突興，安陽駐軍不知去向，縣長亦逃，土匪並起，李濟乃將發掘器物之一部分運往北平史語所。河南地方人士認為此舉違反當初將古物留在河南的約定，故一面向研究院交涉，一面設法自行開掘。此事李濟 1929 年曾向傅斯年報告，他深知以何日章的史學眼光，所想找尋的必是字骨，然此殷墟已「寶藏幾空」，所以李濟與董作賓已商量暫時停工回北平。此一問題涉及不同時代學人對待史料的眼光，從而看出一個時代新學術風格的形成，王汎森教教對此有極細緻精彩的分疏，參見〈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收錄在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182-201。

¹⁹ 李濟，《安陽》，頁 47、54。

期由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理論進一步推出，加上梁啓超對考古人才的舉薦和田野工作的扶持，以及因西陰村發掘這一首倡活動的重要成就和影響，使得要稱近代中國考古學的科學發掘和研究活動發軔於清華國學院，恐不爲過。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和梁思永的《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就是最具說服力的成果，而梁啓超於此誠然在幕後發揮無形的影響²⁰。

而對清華國學院學風的型塑，影響力恐怕最大的導師應是王國維了。雖然梁啓超在新史學理論和方法是有重要的啓蒙之效，但他在具體的史學論著較無突破性發展；而陳寅恪的歐洲漢學、東方學需要具備多種古今中外的語言工具，非當時清華國學院學生所能真正了解；而趙元任的新語言學則需要常在外地做語言（方言）的田野調查，且因爲這新學科對受傳統中國小學、聲韻學影響的清華學子，一時頗爲感到陌生和隔閡；而李濟的考古學，除了在課堂理論知識傳授外，更必須要有龐大的經費、人員去做實際的考古田野發掘，基本上是一集眾的工作²¹；而王國維的經史舊學根柢，再加上一些新的學術方法，則是當時學生中最感親和的，且王國維又以紮實的學術論著，示範了新史學研究的典範，是以他對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影響最大。

在國學院中，除了受王國維論文指導的學生很多外，也頗多

²⁰ 李光謨，〈從梁任公的家書看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軔〉，收錄在氏著，《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6-10。

²¹ 因爲考古是一集眾的工作，在經費、人員、技術、知識上的條件門檻很高，所以後來才由國家支持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發動的殷墟發掘，才真正是中國考古發掘最成功的例子，當然最居功厥偉的是傅斯年的史學理念有以致之，在實踐上傳氏所找的李濟則具體實踐傅斯年的新學術之路。

購買閱讀王國維的學術論著《觀堂集林》，以及諸多學人和學子去聽王國維的課程，茲引幾條史料以見其況²²。

1925年9月14日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的「普通演講」是「古史新證」課程，聽者甚眾²³。

1925年9月14日吳宓日記「9-10上王先生《古史新證》課，聽講。」²⁴

1926年7月26日吳宓日記「九時半，王靜安先生講演《中國之尺度沿革》。宓隨同聽講。到場者並有馬衡、徐鴻寶等」²⁵

1925年10月16日吳宓日記「9-10上《說文》課。」²⁶。

1925年9月16日吳宓日記「9-10上王先生《說文練習》課。」²⁷相對於其他清華國學院導師的課程，王國維確實受到較大的注意。

而與梁啟超不同的是，王國維是新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具體運用者。王國維的文化態度和思想傾向歸之於傳統派，甚且具有滿

²² 1926年11月24日〈王國維致蔣毅孫〉函中說：「前日此間研究院學生有函弟，欲以特價購買《觀堂集林》，其意在以四元之價購買一部，共二人（學生共四十餘人，其中有已購者，有不購者，故其數如此。）欲弟函商尊處，弟不便拒絕，特為代達，允否請尊裁」，又在1926年12月11日〈王國維致蔣毅孫〉函中說「清華研究院學生欲以廉價購《觀堂集林》，慨承允許，該生等甚為忻感。」以上二函，參見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台北：華世出版社，1985），頁447、448。

²³ 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頁146。

²⁴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三冊，1925年9月14日條，頁71。

²⁵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6年7月26日條，頁197。

²⁶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10月16日條，頁80；1925年10月17日條，頁80-81。

²⁷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年9月16日條，頁72。

清遺老的心境²⁸，此人盡皆知，然而王國維文化態度上的傳統性並未阻礙他治學上的創新及現代化，王國維治學向來最稱嚴謹性及科學性，他前承清代考據之學的經史研究傳統，根基至為深厚，但他同時受西潮的衝擊，且與日本漢學界關係深厚，在治學上互相影響²⁹，故治學理念及方法上有突出清代乾嘉學術之處。陳寅恪曾對王國維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有三點精要概括：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等³⁰。陳寅恪與王國維情誼可謂「風義生平師友間³¹」，故他這段對王國維的描述，最能得王國維的學術精神要義。

王國維在學術方法上最為人稱道及影響巨大的首推具有創新意義的「二重證據法」，而「二重證據法」則建立在新出史料（甲

²⁸ 對於王國維處於中西文化衝突下的文化心態，詳細討論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台北：桂冠出版社，2000），上冊，第一編第二章，〈一個新舊文化激變下的悲劇人物〉，頁 65-133。

²⁹ 王國維與日本漢學之關係可見：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書中收錄有王國維致函日本漢學家諸多信函，如給鈴木虎雄、林泰輔、神田喜一郎、內藤虎次郎的函札；及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65-86。書中有藤田豐八、內藤湖南、鈴木虎雄、狩野直喜、橋川石雄、松浦嘉三郎、木邨得善、神田信暢、岡井慎吾等人致函給王國維；錢甌輯，〈致鈴木虎雄—王國維佚札七通〉，收錄在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第 2 輯，頁 129-135；以及〈王國維致內藤湖南佚札〉，收錄在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第 3 輯，頁 1-7。

³⁰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19。

³¹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寒柳堂集》（台北：里仁，1980），頁 11。

古文)的基礎上³²。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是對中國古代殷周史實際操作立下最具典範意義的研究，王國維生命最後的兩年是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渡過，此正值其學術思想最為成熟之際，他在研究院所開設的「古史新證」課程對研究院學風及爾後中國史學研究影響深遠³³，尤其是後來具勢力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研究上，仔細考論，仍有清華學術風格的痕跡於其中，史語所領導人傅斯年雖與王國維實際交誼並未多，但在治學概念的啓發及觀點上，王國維確實影響著傅斯年，這可從王國維名著《殷周制度論》與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論文中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中看出³⁴，此點本文第四章中會再詳論。王國維史學研究取徑之新，可從其對待新史料（諸如地下考古資料）甚或使用新史料（如甲骨文）的心態中得知，可見他史學現代化的層面。然而王國維對待傳統異端史料如《山海經》一書，同時亦認為其中史料可經細加考證後仍可使用，此又與激進的疑古學派對待史料態度明顯不同，這又呈現王國維治學傳統的一面，是以我

³²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上冊，頁 175-180。

³³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裘錫圭，〈前言〉，頁 1-18；李學勤，〈談王國維先生古史新證〉，收錄在孫敦恒等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 120 週年學術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2-9；以及吳懷祺，〈王國維古史新證和二重證據法〉，收錄在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頁 232-246。

³⁴ 王汎森，〈一個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05-320；以及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錄在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551；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25。

們可看出王國維學術研究中傳統（舊）與現代（新）的交融為一

35。

其實在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對於新史料（例如殷墟發掘的史料）與舊史料（例如二十四史）所持有的態度，曾經出現「史料的盡量擴充」及「不看二十四史」的兩種傾向並存的詭論現象，「史料的盡量擴充」治學傾向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各種學術努力中也明顯的體現，然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及清華諸君（尤其是陳寅恪）則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³⁶，這裡主要涉及新史料與舊史料何者能成為歷史證據，此是民初以來學界爭辯的重要課題³⁷。以王國維而論，他在史料觀點的看法，其實是有著非常現代化的觀點，譬如他在1925年七月時，曾在國學院發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他則明確指出「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於地下之學問者」這種史學概念，王國維更指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等新出史料³⁸，這些新史料在王國維的學術研究也屢屢為他所使用，而這些與後來中研院史語所的新學術之路的研究也息息相關，這點本文第四章會再討論。

³⁵ 羅志田，〈《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頁181-192。

³⁶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北伐前後中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編輯委員會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91-107。

³⁷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157-209。

³⁸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上卷，頁175-180。

而傅斯年後來在史語所所領導大規模的殷墟挖掘與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理念是同其精神的，當然傅斯年在「二重證據法」的證據範圍不只是限於實物甲骨文的文字資料，傅斯年已經超越王國維的現代史學概念並且更上一層，他已有現代考古學的知識，而這一學術傾向則與另一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李濟息息相關。

除王國維外，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皆有其代表性，這同時亦可探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風格及現代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

梁啟超與王國維對清華學風皆有定型作用，而隨後由海外回國的趙元任、陳寅恪及李濟，吸收了西方最先進的漢學、東方學研究方法或現代西方最新學術學門³⁹，在當時中國學術脈絡下，使得清華國學院可說是既有傳統學術的根柢，又有最先進的研究工具和概念，此時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老成典型的文史老輩（梁啟超與王國維）與後起新秀（陳寅恪、趙元任與李濟）所形成的學風，正可以用朱熹詩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

³⁹ 關於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吸收西方最新的東方學（漢學）或學科的討論可參考：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錄在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2011 二版一刷），頁 320-329；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 52-56；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97），頁 223-266；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收錄在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210-220；梅祖麟，〈中國語言學的傳統與創新〉，《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頁 477-484；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編者後記〉，收錄在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 311-332；許倬雲，〈尋真理的李濟先生〉，以及張光直，〈人類學派的古史學家—李濟先生〉，二文皆收錄在《李濟與清華》，頁 178-180、195-201。

來表示，陳寅恪、趙元任與李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幾年任職中，則是他們漫長學術歷程開始發揮撼人影響之始，陳寅恪的歷史學、趙元任的語言學及李濟的考古人類學在學術史上都有其創新的意義，雖然清華國學研究院於 1929 年結束，然陳寅恪繼續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及中文系任教，後來並任職中研院史語所⁴⁰，而趙元任與李濟則直接進入中研院史語所工作，三人皆與中研院史語所有密切關係，對中研院史語所學術傳統的建立，可說親自參與其中⁴¹，其學生輩徐中舒同時更長期在史語所工作⁴²，透過這一些清華學者的學術建構，實際上除對本世紀之初疑古學派的學風產生修正作用外⁴³，同時對爾後主導著近七十多年近代中國史學

⁴⁰ 關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傳統繼續發揚在陳寅恪身上自可得到證明，如 1929 年後清華大學所培養後來成為史學大家的楊聯陞及何炳棣都承認陳寅恪的清華學風對其治學之影響，此點可見楊聯陞，〈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29-31；以及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序言〉，頁 2；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頁 67-68；另陳寅恪與傅斯年、中研院史語所關係，可見王汎森，〈陳寅恪與傅斯年〉，《聯合報·副刊》，37 版，1995 年 12 月 14 日-15 日；王汎森編註，《陳寅恪的未刊往來書信》，《當代》，第 123 期，1997 年 11 月，頁 64-68；及第 124 期，1997 年 12 月，頁 52-61；《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5-120。

⁴¹ 卞趙如蘭，〈趙元任和史語所〉；以及王道還，〈史語所的體質人類學家—李濟、史祿國、吳定良、楊希牧、余錦泉〉，二文皆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 95-102；163-187。

⁴² 唐嘉弘，〈從徐中舒的治學看史語所的學風〉；以及陳力，〈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究〉，二文皆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311-318、319-329。

⁴³ 如疑古學派領導人顧頡剛即承認「內心對王國維的欽敬和治學上所受影響之深」，見白壽彝，〈悼念顧頡剛先生〉，《歷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頁 103；另可參考王汎森，〈民國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的中研院史語所，同樣發揮重要影響。

總而言之，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取向對於新的史料廣泛使用與蒐集，同時引進西方新的學術知識和研究方法於其中，據此謹慎去解釋考證中國古史，故稱之為「釋古」以異於當時居於中國史學界主流地位的疑古學派並無不宜，他們對於史料的概念與傳統史學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同時又從西方或日本吸收新的學術概念工具和知識，其治學已呈現了相當現代化的精神。下面將進一步歸納這群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們如何形塑具體的學術風格。



頁 403-406；劉俐娜，〈王國維治史思想、方法與古史辨派〉，《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頁 260-275；另陳寅恪批評疑古學派之思想，見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後〉，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寒柳堂集》（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 148-150；牟潤孫，〈論清代史學衰落的原因〉，收錄在氏著《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學，1990），頁 69-70。

第三節 清華國學院導師所形塑的學術風格

(一) 對西學的接受

王國維能成就如《殷周制度論》的名著，正得力於他早年的西學訓練。現代「國學」與傳統考證之間的一大區別即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之有無或強弱。「概念化」是達到「綱舉目張」的不二法門，系統的知識由此建立。王國維雖然後來完全放棄了哲學，但早年反覆閱讀康德與叔本華使他在「概念化」方面高出同輩的考證學家，似乎是很難否認的。⁴⁴然王國維很早就知西學重要性，他以爲「若禁中國譯西書，則生命已絕，將萬世爲奴也。⁴⁵」

王國維的弟弟王國華在爲《王靜安先生遺書》寫序時，幾段文字頗能勾勒出王國維的學術精神。他提到其兄：

二十二入《時務報》館，兼學東瀛文字，好叔本華、尼采之書，是為先兄治新學之始。…先兄治學之方雖有類于乾嘉諸老，而實非乾嘉諸老所能範圍。其疑古也，不儘掘其理之所難符，而必尋其偽之所自出；其創新也，不僅羅其證之所應有，而必通其類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歐學術精湛之助也。⁴⁶

⁴⁴ 余英時，《會友集（上）》（台北：三民，2010），〈自序〉，頁21。

⁴⁵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致許同蘭〉函，1898年3月1日，頁2。

⁴⁶ 王國華，〈《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2。

是以王國維「得于西歐學術精湛之助」故能「非乾嘉諸老所能範圍」，在他著名的〈殷周制度論〉⁴⁷中，全文以「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西方現代史學的基本概念，去整理繁複的歷史發現於其中，這種西學的思維取徑，則為中國古史研究開創新的視野。

王國維接受西學的學術風格，也給當時異國日本學者的眼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日本京都學派的重要學者狩野直喜在〈回憶王靜安君〉中就提及王國維：

作為一個學者，王君偉大卓越之處，我想凡是中國的老一輩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絕對不提自己會外文，可是因為他研究過外國學問，他的學術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國大儒更加考靠。也就是說，他對西洋科學研究方法理解很深，並把它利用來研究中國的學問，這是作為學者的王君的卓越之處。當今中國，因受西洋學問的影響而在中國學中提出新見解的學者絕非少數，可是這種新湧現的學者往往在中國學基礎的經學方面根柢不堅、學植不厚，而傳統的學者雖說知識淵博，因為不通最新的學術方法，在精巧的表達方面往往無法讓世界學者接受。⁴⁸

狩野直喜很敏銳地觀察出王國維在西學方面的造詣之深，同時又能在中學方面厚植精湛，故使王國維學術能中西並舉，超邁群倫。

⁴⁷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下冊，頁 128-143。

⁴⁸ 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先生〉，《追憶王國維》，頁 294-295。

而陳寅恪對於西學的重視，從他留學歐美時多年時間即可知悉，當他回國之後所開授的課程如「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金剛經之研究」、「高僧傳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識十二論校讀」，無一不受當時西學研究的影響，而他本人對於西學的看法，在此舉兩條史料，以概其餘。

陳寅恪在 1931 年五月《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刊》上有一文〈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中談及：「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⁴⁹。」，又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論及：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⁵⁰

正是這種對待西方世界的文化、學術的態度，是以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的入門弟子 1927 級的蔣天樞，對其業師陳寅恪學術精神有一評語：「先生治學方法，用思之細密極於毫芒。雖沿

⁴⁹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36。

⁵⁰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52。

襲清人治經途術，實匯中西治學方法而一之。⁵¹實可謂確評。

而趙元任與李濟則是在西方受過完整的新學科教育，並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將這些知識帶進清華國學院中，所以清華國學院的受西學之影響，在其學術風格的型塑中，允為其中重要的標誌。

(二)、與歐洲和日本的漢學、東方學接軌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提倡，在史料的蒐集中，歐洲人與日本的著作的重要性。梁認為歐人：

其於中國古物，其於佛教，其於中國與外國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詣之書，為吾儕所萬不可不讀。蓋彼輩能應用科學方法以治史，善蒐集史料而善駕馭之，故新發明往往而有也。…日本以歐化治東學，亦頗有所啟發，然其業未成。⁵²

文中雖對日本的《東洋史》、《支那史》頗為批評⁵³。然他終

⁵¹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二刷），頁 89。

⁵²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1984），頁 102-103。

⁵³ 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時，頗為日本史學家桑原鷺藏所訕譏，主要是對梁書中史事的錯誤而發，見王森然，〈梁啟超先生評傳（節錄）〉，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2。梁啟超與日本漢學的關係可以說非常的疏離，當他過世之時，日本東西兩京的中國學界幾乎無任何反應，其中的曲折可參見桑兵，〈梁啟超的國學研究與日本〉，收錄在氏著，《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究意識到日本漢學的崛起。梁啓超的國學研究視野廣及東西方漢學、東方學，此與同時代的章太炎等學者頗有差別，章氏以爲中國經典博大精深，文字古奧曲折，決不是外國人所通曉的。在他們看來，外國人出於好奇心而研治中國學問，大概像張騫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的要領。然章太炎評論孔子、儒學仍不免受到遠藤隆吉、白河次郎等人的影響⁵⁴。是以如何對待東西方的漢學、東方學在中國學界不免有所差異，而當時清華國學院導師們王國維、陳寅恪、梁啓超，其於東西方漢學、東方學修養或有深淺之別，然於吸收以資比較的態度則一致。下面再論及王國維、陳寅恪兩位導師與歐洲、日本的東方學、漢學的關係。

與王國維關係最爲親密的羅振玉，對王國維知之甚詳，辛亥革命后羅振玉以滿清遺臣身分東渡日本，而王國維隨行，此是王國維學術生涯最大的轉折。而在日本時，羅振玉稱王國維：

公居海東，既盡棄所學，乃寢饋于往歲予所贈諸家之書。復盡出大雲書庫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恣公搜討。復與海內

社，2010），頁 243-258。

⁵⁴ 劉正，《圖說漢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中〈余英時先生序〉，頁 1-2；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尙書（初刻本 重訂本）》（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137-138。其實章太炎寄寓日本的時代，頗接觸到日本批判儒學的思想家遠藤隆吉、白河次郎諸人的著作，所以《尙書》第二篇「訂孔」，即仿《論衡》的「問孔」而來，參見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錄在氏著，《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 三版），頁 97-98。有關章太炎的反孔思想與遠藤隆吉、白河次郎著作的關係之考證，請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 初版二刷），頁 176-185

外學者移書論學，國內則沈以庵尚書、柯蓼園學士，歐洲則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東則內藤湖南、狩野子溫、藤田劍鋒諸博士及東西兩京大學諸教授。⁵⁵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了沈增植和柯紹忞兩位是王國維在國內經常所交往的學者外，當時與王國維頗有學術交流進行切磋學問的學者，大都是歐洲與日本的域外漢學家、東方學家，而王國維在日本漢學界更享有大名，這可從王國維過世後，日本漢學界更在當時 1927 年（昭和二年）的八月及九月的《藝文》第十八年第八、九號編輯專號中，有多位重要及年輕新秀漢學家發表一系列的追悼文章可知⁵⁶。

其實早在 1898 年之際，王國維就由羅振玉帶領下訪問京都大學諸位教授⁵⁷。現存的王國維書信集中，在 1912 年時王國維即與鈴木虎雄函札往來，或論學，或交換學界出版訊息。類似王國維與日本漢學界的學術往來，在王國維的書信中留下甚多的紀錄。如與神田喜一郎函中請求代購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並要渠購買日本的《文學雜誌》、《東洋學報》，⁵⁸可見王國維隨時在注意日本漢學界的研究動態。

是以王國維與日本漢學界交往甚密，終生未絕。其中京都

⁵⁵ 羅振玉，〈《海寧王忠愍公傳》序〉，《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頁 7。

⁵⁶ 有關日本漢學學者悼念、回憶王國維的多篇文章，現在大體上都已翻譯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一書中，頁 284-349。

⁵⁷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致汪康年〉函，1898 年（未標月日），頁 20。

⁵⁸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致神田喜一郎〉函，1926 年 3 月（未標日）、1926 年 4 月 10 日、1926 年 6 月 29 日、1926 年 9 月 14 日函），頁 426、427、430、442。

學派的領袖人物如內藤湖南、狩野直喜更是服膺王國維的學術，如 1918 年王國維就曾寫到：「內藤博士有欲延維至大學之意，蓋出於相慕之真意。渠於近數年，維所作之書無不讀者，且時用維說。⁵⁹」內藤湖南是近代日本重要的京都學派的奠基者，對於王國維的學術如此推崇，是以王國維的學術也影響這日本漢學界的京都學派，在二十世紀初當時中國學術界影響日本漢學京都學派者中，王國維恐是最重要者。

而放在國際研究中國學術的視野上，王國維更是有他現代化的一面。當時王國維在國學院中講授《尚書》時，從當時其學生吳其昌的記載，可知王國維於傳統中國經籍之外，對於域外的歐洲、日本的漢學發展頗為注意，並援引參互比較，如在考證「文字之流變」時，在有關漢朝的隸書（在當時即為楷書）方面，王國維所根據的既有敦煌石室所存《唐寫本隸古尚書》，也注意到日本尚有唐《寫本禹貢》，法國亦存有《堯典》一篇，英國亦有數篇⁶⁰。是以他有〈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后〉、〈敦煌所出漢簡跋〉、〈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等文，他既注意域外的漢學發展，同時對當時新興的「敦煌學」研究不遑多讓。

其實王國維治學取法東西方漢學者甚多，如與當時西方漢學巨擘伯希和因敦煌學起頭的學術交往，伯希和(Paul Pelliot)作為王國維的老朋友，經常提到王的名字，並引用他廣博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又如沙畹(Chavanne)為斯坦因(Stien)考察團蒐集

⁵⁹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致羅振玉〉函，1918年9月28日，頁274。

⁶⁰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收錄在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頁231-232。

的中國資料所寫的著作，必需要添上羅振玉、王國維的修正和補充意見⁶¹。

王國維深刻認識到歐洲東方學的重要，在 1919 年給羅振玉的信中已言：

前日在君楚處見伯希和八年前之就職演說，始知近年西人於東方學術之進步。伯君此文益將近日發明及研究之結果總括言之，於學術關係極大…。近來言語學之發明與古籍吻合，豈非大快歟。維因擬作《西胡考》，將古書所云胡者集為一書，亦快事也。⁶²

此可見王國維注意及西方漢學、東方學的發展，並受影響而有所著作。更甚者在 1922 年時他寫信給馬衡，提及：

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各國學之甚善，惟需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議，亦與古物學大有關係也。

63

此際王國維正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通訊導師，而馬

⁶¹ 伯希和，〈王國維〉，《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頁 352、354。

⁶²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致羅振玉〉函，1919 年 8 月 17 日，頁 292。

⁶³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致馬衡〉函，1922 年 12 月 12 日，頁 336。

衡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導師，兩人的學術書函往來甚為密切，是以王國維有此建議。然從中可知王國維在進入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之前，他的學術視野已廣及當時的歐洲漢學、東方學，更遑論他很早就在羅振玉的帶領下，與日本東京、京都學派的漢學家交往頻繁⁶⁴，是以在進入清華國學院後，爰將此一學風教育給學子。

而陳寅恪與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共事一年時間左右，兩人最為相知相惜而成爲忘年之交，他受王國維的影響是很自然的。王國維在治學方面嚴守科學方法分寸，而陳寅恪的史學觀點則表現出更徹底的現代的和西方的色彩⁶⁵，是以王國維 1927 年 6 月投湖自殺後，在其生前遺書上言「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⁶⁶」，正見其對陳寅恪的信任付託。然因爲王國維 1927 年自殺，1929 年初梁啓超也因病過世，此時李濟因考古需赴外地作田野調查，及趙元任也在各地作方言的調查，是以國學院後期導師的學術傳承則由陳寅恪身兼大任，所以這裡再就陳寅恪的學術精神進一步探究。

1921 年 9 月陳寅恪由美國赴德國，並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等，在歐洲大約四年⁶⁷。陳寅恪在歐洲

⁶⁴ 在日本時，二十世紀初，羅振玉即引見王國維認識日本漢學家箭內互、內藤湖南、白鳥庫吉等人，見清華國學院 1925 級的周傳儒，〈王靜安先生傳略〉，《追憶王國維》，頁 245。

⁶⁵ 余英時，〈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11；而汪榮祖亦稱王國維與陳寅恪兩人感情之深，除了「私誼」外，「文化」上更是相憐相惜，見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頁 63。

⁶⁶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頁 355。

⁶⁷ 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76。

所接受的東方學的素養，當時已在留學生中頗為出名⁶⁸，更可見他在回國入清華國學院前，早已要將這門學問系統的帶入中國。

而 1923 年陳寅恪的〈與妹書〉是了解他早年治學的重要文獻，信中說：

我現在必須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經》兩部及日本印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若不得之，則不能求學。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並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西藏文《藏經》，多龍樹馬鳴著作而中國未譯者。即已譯者亦可對勘異同。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及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

⁶⁸ 如 1922 年 5 月 9 日，《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姚士鰲（從吾）3 月 12 日自柏林致朱希祖信。信中述及當時中國留德學習歷史科者情形，對於陳寅恪尤為推重，信中提及：「此刻留德學生習歷史者，…陳君寅恪，江西人，習語言學，能暢讀日、英、法、德文，並通希伯來、拉丁、土耳其、西夏、滿州等十餘種文字。近專攻比鄰中國各民族之語言，尤致力於西藏文。…。陳君欲依據西人最近編著之西藏文書目錄從事翻譯，此實學術界之偉業。陳先生志趣純潔，強識多聞，他日之成就當不可限量。」，參見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85。

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⁶⁹

此文可見陳寅恪早年學術取向「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的路徑，這是很道地的歐洲漢學、東方學的治學取徑，而在研究領域，關注中國與域外的西域國家的相關歷史交涉，則除了繼承晚清以來沈增植、王國維西北史地的研究傳統外，也觸及當時歐洲東方學最核心的研究課題。

在吳宓日記中，亦有陳寅恪研治歐洲漢學、東方學的記載，如 1925 年 10 月 23 日吳宓日記有「上午草擬上校長函。托為九月十五日，請校長核准，撥款四千元，匯給陳寅恪購書，並詳本校不可不多購西人所著漢學及東方學書籍雜誌之理由。」同年 10 月 26 日吳宓日記又有「上午以請購西文漢學書籍之說帖，面呈校長，備轉呈外交部」⁷⁰。

陳寅恪在 1930 年為陳垣寫的〈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提到：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

⁶⁹ 陳寅恪，〈與妹書〉，《陳寅恪集—書信集》，頁 1-2。

⁷⁰ 《吳宓日記》，第三冊，1925 年 10 月 23 日條，頁 84；1925 年 10 月 26 日條，頁 86。

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⁷¹

是以在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前，陳寅恪就已經做好了相關的學術準備，而等到陳寅恪入清華國學院時期，所開的主要普通演講有「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金剛經之研究」、「高僧傳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識十二論校讀」等，其中「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講述西洋各國對於東方學之研究，凡西人關於中國國學之重要著述均為之介紹及給予評說；「高僧傳之研究」，以近年中亞考古學、東方語言學所得之材料及研究之結論與中國舊籍互相證明，藉供治中國文化史者之參考⁷²，而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所開設歐洲東方學的課程及其上課狀況，學生曾留下一些記錄。

據清華國學院學生姜亮夫（1926 級）回憶當時陳寅恪講《金剛經》的情況舉出，陳用十幾種語言，用比較法來講，來看中國翻譯的《金剛經》中的對話對不對，譬如《金剛經》這個名稱，到底應該怎麼講法，那種語言是怎麼說的，這種語言是怎麼說的，另一種又是怎樣，一說就說了近十種。⁷³

而另外陳寅恪當時在清華講學的實況，在 1928 年正月初五日，當時國學院 1926 級的陳守寔的日記，也曾記下當時他問學

⁷¹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6。

⁷²孫敦恆，《清華國學院史話》，頁 92-93。

⁷³姜亮夫，〈憶清華國學院〉，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74。

於陳寅恪的紀錄：

予問柯紹忞《新元史》如何？詩（師）云：柯不諳滿蒙文，所謂《新元史》者，在中國舊籍中搜簡（檢）材料為稍無遺憾耳。問屠敬山寄《蒙兀兒記》如何？師云屠氏取材于法人譯著，自較柯氏為佳，然法人本轉輾重譯，亦僅為二三等之材料。⁷⁴

從上面的史料可知，觀諸當時西方漢學、東方學學界，如伯希和在「敦煌學」領域，高本漢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治學，這部分是當時國際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思潮，是以陳寅恪此處所顯示的，也就是治學要與西方的漢學、東方學接軌，得此「預流」，王國維晚年的治學甚或受陳寅恪與沈增植的影響，而轉向中國西北歷史地理、邊疆史地和敦煌學的領域，這誠然都是清華國學院所形塑的具有國際學術性的風格，此放眼當時中國性質類似的國學研究機構，如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東南大學國學研究院，清華國學院都是領先全國的。在此我們也可以透過向來對於近代中國史學史、學術史發展流變，至為關切的史學大家顧頡剛的觀察，更了解王國維、陳寅恪的學術工作在近代中國學術史的定位和意義。

1924年6月19日，顧頡剛在為北京大學譚惕吾等女生演講國學大意時，就觀察出現今國學研究的趨勢有五派。一是考古學，用古代的實物和文物來解釋古史，…羅振玉、王國維是這一

⁷⁴陳守寔，〈記梁啟超、陳寅恪諸師事〉，收錄在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42-43。

派的代表。二是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研究亞洲漢族以外的各民族的文化，他們在甘肅、新疆、中央亞細亞等處發掘，有巨大的發現。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國羅福成、張星烺、陳寅恪、陳垣等都是這一派的代表。三是地質學，…因發掘地層而得有銅器時代以前之古物，可助古史學之研究，…。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都是這一派的代表。四是學術史，…要求把文化的進程做一個系統的排列。胡適、章炳麟、梁啟超等都是這一派的代表。五是民俗學，…北大國學門中的風俗調查會和歌謠研究會，都是向這方面進行的表示。周作人、常惠等是這一派的代表。這五派學問都是二年來的新進展，舊式學者夢想不到的⁷⁵。

顧頡剛此時所觀察到的當時中國國學研究新趨勢，所提及陳寅恪等人的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的新思潮，很精準的指出其與當時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是同一學術範疇，而陳寅恪進入清華國學院後，更進一步使得清華的學術風格濡染更多的西方歐洲的學術風格，此較當時的中國其他國學研究機構，顯然是更進一層，畢竟歐洲的漢學、東方學的學術傳統，具備多語言的工具是這個學術傳統的特色，陳寅恪〈與妹書〉中提及的「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這是陳寅恪特顯精彩之處，誠然陳垣、張星烺所作的中西交通史係屬歐洲東方學研究的重心，然而他們畢竟沒有像陳寅恪具有多種語言的工具，所以只能在乾嘉學術傳統中將其研究方法推至最極限，而得到難能可貴的學術成果，然放眼當時中國學術界，大概只有清華國學院陳寅恪的學術條件，他是真正在西方漢學、東方學的學術傳統中受其直接薰陶，並將中國清代傳統考證

⁷⁵ 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03-104。

學與歐洲漢學、東方學作了最成功的接榫，並進而影響著清華國學院的學風。

(三)、對疑古史學的批評

顧頡剛掀起的疑古史學派在 1920、30 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中，是當時一股勢力龐大的學術思潮，這學派對當時中國學人的衝擊很大，導致不同學術立場的學人對此採取不同的學術方法以對。而清華國學院的諸位導師學人，於此學術氛圍中也對疑古學派的學術主張作出他們的時代回應，從中相當程度反映了清華國學院的學術風格，基本上他們是對疑古學派的思想有所保留地。

如一般認為較為保守的傳統派學者張爾田，他曾提及王國維的「彼最不滿意者，為莊寶琛龔自珍之治金文，以其強作解事也。⁷⁶」，文中所指莊寶琛與龔自珍其實就是清代今文經學學者，而莊寶琛係今文經學大家莊存與姪子，而莊寶琛的甥子亦是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都是屬於常州之學，錢穆說：

莊存與為學，不屑於考據，所以不能如乾嘉之學的篤實，又不能效法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代經籍以為論說，故其學有怪誕之風。⁷⁷

而對於清代學術身於其中且有親切了解的梁啟超則說：

⁷⁶張爾田，〈雁塔寒音（書札六通）一鳴呼亡友死不瞑目矣張孟劬復黃晦聞書〉，《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頁 80。

⁷⁷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0 年台十版），下冊，第十一章〈龔定庵〉，頁 523-525。

今文學啟蒙大師，則武進莊存與也；存與著《春秋正辭》，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者；與戴段一派所取途徑，全然不同。…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按：指龔自珍）。⁷⁸

然龔自珍亦屬常州之學，而常州之學的精神則是「輕古經」，而到龔自珍更是「重時政」⁷⁹，由常州學派莊存與、劉逢祿一路下來的今文學家，一方面致力於學術考辨，另一方面則是學術與現實政治結合，使得晚清經世思想得以借孔子之屍，還其變法之魂⁸⁰。

而今文經學是二十世紀「疑古學派」的思想遠源，而當王國維在國學院中開授的「古史新證」課程時，正逢顧頡剛的疑古史學震動中國學術界之際，而王國維的「古史新證」課程，就是針對當時這一史學的思潮而發的。這個課程後來成書為《古史新證》，書中開宗明義說：

研究中國史最為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別。…。而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

⁷⁸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商務印書館，2008），頁96-97。

⁷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第十一章〈龔定庵〉，頁532。

⁸⁰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台北：麥田，2002），頁113-125。

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⁸¹

又在該書第二章的〈禹〉中，王國維引用金文秦公敦（簋）銘文「禹責」即《大雅》之「維禹之績」，而《商頌》之「設都于禹之蹟」，文中則以金文資料對證《詩經》、《尚書》的「二重證據法」，來論證「知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⁸²，王國維對禹夏歷史的推認，自然係針對顧頡剛疑古學派而發的，其理甚明。

其實早在 1911 年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就言：

是以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為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捨之所以然。⁸³

故王國維採取的既不是疑古的態度，且非信古的取向。1926 年約 8-9 月間王國維在〈致容庚〉函中指名批評《古史辨》中也

⁸¹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1-3。

⁸²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頁 5-6。

⁸³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上冊，頁 211。

說：「今人勇於疑古，與昔人之勇於信古，其不合論理正復相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⁸⁴」。又在 1926 年 8 月 18 日王國維在〈致羅福頤〉函中言：「近有人作一種議論，謂許書古文為漢人偽造，進更而斷孔壁書為偽造。容希白亦宗此說。擬為一文以正之。⁸⁵」，信中所言「斷孔壁書為偽造」等情，即是今文經學家的重要看法，而王國維對於容庚亦從此說的立場，正擬為文反駁，正可說明王氏反對今文經學家的看法，同時對於受今文經學影響的疑古學派也不表贊同。

所以從以上幾條史料，綜合而言，王國維「古史新證」的課程中，正是總結他過往以地下考古所得的甲骨文資料與《史記》等紙上文獻的資料，以「二重證據法」來考證中國古代殷商史的研究經驗，並建立中國古代更可靠的信史，從學術上來修正疑古學派過激之處。

而國學院另一重要導師陳寅恪對於當時中國的疑古史學的學術立場，亦有所保留。在 1925 年 5 月 3 日，陳寅恪寫了〈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詩云：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
要待諸君洗斯恥。
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
獨此區區是祕方⁸⁶。

⁸⁴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台北：華世出版社，1985），〈王國維致容庚〉函，1926 年 8-9 月間，頁 437。

⁸⁵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王國維致羅福頤〉函，1926 年 8 月 18 日，頁 435。

⁸⁶ 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121-122。

對於這首詩的確解，自是以余英時先生的說法最具權威，余先生指出這兩首詩是陳寅恪感慨當時中國史學的衰落，以致史學系畢業生都要到日本去進修中國史。他認為這是中國學術界的奇恥大辱。第一首詩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是「田巴魯仲兩無成」，必然是指當時中國史學界的兩個有影響力的流派，從〈王觀堂先生輓詞〉中的「魯連黃鶴鷓鴣溪胡」句中，陳寅恪就自釋魯連的典故出自韓愈〈嘲魯連子〉：「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鶴子。…」，而陳寅恪釋言：「蓋王先生之入清華，胡所薦也。⁸⁷」，是以「魯連」即指胡適「整理國故」的一派（另一派田巴則指馬克思主義學派），其中大概也包括顧頡剛《古史辨》的分支，因為顧頡剛明白宣稱他是追隨胡適的方法的⁸⁸。而陳寅恪如今說「田巴魯仲兩無成」，如此批評胡適、顧頡剛一系的史學研究取徑，自然是對疑古史學的學術風格有所質疑。

而另外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曾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⁸⁹」，且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有言：「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⁹⁰」，向來解釋者都認為「不古不今之學」是指他的研究專業中國中古史領域⁹¹，因為陳寅恪也確實在中國中古史，尤其在唐史領域寫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⁸⁷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寅恪先生詩存（合刊）》（台北：里仁，1980），頁 10。

⁸⁸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30-331

⁸⁹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52。

⁹⁰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9。

⁹¹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頁 89-90

經典之作，然而，陳寅恪自言絕非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的說法是否符合實情，值得一究。

與陳寅恪有「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的俞大維對陳寅恪的看法應該是很值得相信的，他說陳寅恪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的書，而在經書中，陳寅恪認為《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其大致上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份所編纂而成，所以要探索偽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而同時陳寅恪對《公羊》三科九旨之說很少興趣。⁹²

從俞大維的回憶，當可知陳寅恪嫻熟於中國經學典籍，且顯然對於來自於公羊學派的今文經學的疑古思想是不同意的，而其背後也指涉了當時的疑古學派的學風。

是以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陳寅恪這麼說：

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個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徵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後，故不能犁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譬諸圖畫鬼物，苟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

⁹² 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先生》，頁4、6。

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而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誇誕經學家之所為者。⁹³

此序文中所提的謹愿之人，而治經學，當指古文經學派；而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指今文經學派，陳寅恪雖批評古文經學治學的缺點為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但顯然他更不同意今文經學的誇誕風格，其理甚明。所以他這裡所指出的今日競言古史的吾國治學之士，其論類乎清季誇誕經學家之所為者，就是指當代的疑古學派的史學⁹⁴。

所以從以上所論，陳寅恪的「為不古不今之學」，更可能指涉的是他治學既不走古文經學派，更不從今文經學派，若以當代中國史學而論，在陳寅恪的眼中，或許古文經的章太炎學派過於執著於經書的資料，近於保守；而受今文經影響的顧頡剛《古史辨》學派陷於疑古，失於激進。而陳寅恪與王國維則要在這「信古」與「疑古」之外，要用新的史料觀及新研究取徑「二重證據

⁹³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8、239。

⁹⁴ 有關陳寅恪與顧頡剛在中國上古史的學術交涉方面，在現存的兩人書信集（《陳寅恪書信集》及《顧頡剛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共五冊））中都未有彼此的往返函札，而在顧頡剛的日記上也只有提及「贈送《古史辨》第三冊」給陳寅恪，見《顧頡剛日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第二卷，1932年12月31日條，頁729-730；另外顧頡剛頗推崇陳寅恪的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見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90；及在年譜留有顧頡剛提及陳寅恪的東方言語學及史學，及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記載，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頁103、242。除此之外，兩人的學術交涉並不多。而陳寅恪在正式文章中似乎未曾點明過顧頡剛，都是用比較曲折的方式指涉顧氏的疑古學派。

法」，為清華國學院開創出另一條穩健的新學術之路，

(四)、新史料觀與「二重證據法」

清華國學院的導師中梁啟超是近代中國史學革命的理論建構者，儘管在史學實踐上，緣於他前半生奔波於政治的紛擾之中，未能專心治學⁹⁵，然他終究係一「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啓蒙思想人物，在史學領域亦復如此。成書於 1922 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以在清華國學院講學為主而後來成書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對現代中國史學新觀念的提倡，影響頗深。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梁啟超頗措意於史學研究的「史料」問題，文中對史料的搜集範圍，早已超越傳統中國史學家的理解。在此書中提到的史料有一、「在文字記錄以外者」及二、「在文字記錄者」。在「在文字記錄以外者」中如現存之實蹟（全部留存者）及口碑、實蹟之部分的存留者（如萬里長城）、已湮之史蹟，其全部意外發現者（如直隸鉅鹿發現一古城）、原物之保存或再現者（如殷周間的禮器、地層中之石器）、實物之模型及圖影。而在文字記錄中，有舊史、關係史蹟之文件、史部以外的群經、類書及古逸書輯本、金石及其他鏤文、外國人的著述⁹⁶。

梁啟超所論甚繁，惟其中諸多對史料的論述，後來都成為中國新史學「史料觀」的共同認知。如梁氏認為群經中的《尚書》、

⁹⁵ 梁啟超自述：「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啟超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間有屢為無聊的政治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見氏著，《清代學術概論》，頁 115-117。

⁹⁶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111-148。

《詩經》、《周禮》等書，他不再用傳統經學家的眼光來對其研究，或視為不可質疑的經典地位，而是認為這些經書其實也都是史學研究的史料之一，一如王國維、陳寅恪都是以史學的眼光來看待經書。再則儘管晚清以來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對中國古書的辨偽，早已在中國掀起巨大影響，稍後顧頡剛更在此思想脈絡下更臻一層，造成影響巨大的古史辨運動，然梁啟超早年雖從師於康有為，後來又與康有為思想分途⁹⁷。是以對於偽書，他在清華國學院時期有著《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的演講著述，全書論析古書的辨偽及考證年代甚細，但認為只要考證精確，偽書仍然是可以做為史學研究的史料⁹⁸。此同於王國維、陳寅恪在疑古運動高峰之際，仍強調古書甚至如《山海經》等仍可做史學為研究之用，而非一味的疑古。

又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論及金石文史料和河南安陽殷墟的挖掘，他認為：

吾儕所知殷代事蹟，除《尚書》中七篇，及《史記》之《殷本紀》、《三代世表》外，一無所有；得此乃忽若闢一新殖民地也。此項甲文中所含史料，當於敘述殷代史時引用之，…要之此次之發見，不獨在文字源流學上開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於古代史之全體，吾不憚昌言也，金石證史之價值，此其最高矣。⁹⁹

⁹⁷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107-109、115。

⁹⁸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收錄在氏著，《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九冊，頁 5009-5078。

⁹⁹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101-102。

梁啓超這裡所言明顯即指王國維以甲骨文對證《說文》以明文字源流學；以及甲骨文對證《史記》《殷本紀》的著名〈殷卜辭中所見先公王考〉兩篇文章。又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對王國維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第一項即舉「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獫狁考等是也」，故梁啓超、陳寅恪都不約而同指出王國維這一治學取徑的特點。

而王國維在 1923 年爲商承祚所寫的〈殷墟文字類編序〉中論及：「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裏。惟能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後世。¹⁰⁰」是以這種對待地下新史料的態度，且主張新舊史料並重的研究方法，亦即是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相爲表裏，始足以證明經史所記載的史實之可信度，這種研究方法的「二重證據法」，誠然是清華國學院的重要學術方法和精神。而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所開設的「古史新證」中所標舉的「二重證據法」，並由國學院的弟子所繼承，這點將在第五章論及清華國學院學風的延續時再詳論。

在現代史學界中，「二重證據法」已被認爲應該要走的治學方法，然而若放在當時中國學術界來觀察，一些有影響力的學者實際上並不認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例如在當時中國學術界中頗有勢力及影響力的章太炎傳統學派即是，章太炎謂「至若今人譁傳之龜甲文字，器無徵信，語多矯誣」，「若彼龜甲文者，

¹⁰⁰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 268。

果可信否耶」，「至於龜甲，則矯誣之器，荒忽之文而已。¹⁰¹」章太炎對於「甲古文字」的學術運用顯然是反抗地，而他的第一大弟子黃侃在對新出龜甲史料的態度，則較為複雜。雖然大致上黃侃是能接受利用敦煌資料、甲骨文史料去治學¹⁰²，是以在黃侃所批注過的《說文》上，幾乎每頁都有用金文、甲骨對照《說文》之處¹⁰³，但相對而言黃侃更是注重書本的資料，學界所稱的「章黃之學」，係與王國維的新史料觀「二重證據法」有所差距。

例如黃侃在王國維過世不久之後的日記中，曾在有關閱讀劉盼遂所記的王國維說尚書之語後，則有評論王國維之言：

國維少不好讀注疏，中年乃治經，倉皇立說，挾其辯給，以炫耀後生，非獨一事之誤己而已。始西域出漢晉簡紙，鳴沙石室發得臧書，洎上厝獲龜甲有文字，

¹⁰¹ 章太炎，〈小學略說〉，收錄在氏著，《國學略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 21-22。

¹⁰² 如在音韻學方面，黃侃在 1933 年 4 月 18 日日記中寫到：「檢篋中得錢念劬（恂）所著韻目表，因隨筆補之以八種韻目：一、內府藏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二、敦煌出本（今在法蘭西巴黎）王仁煦切韻；三、馮桂芬刻日本影抄宋本徐鍇說文解字韻譜；四、蔣符影印唐寫本唐韻；五及六、七，王國維影抄付法蘭西巴黎國民圖書館藏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八、徐寶鴻攝影（原片）敦煌出刊本韻書殘片十六枚」，這條日可看出黃侃對敦煌所出韻書的新史料的掌握，參見黃侃著，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下冊，頁 890。又對文字學方面，黃侃在 1929 年 4 月 25 日日記寫下：「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1929 年 11 月 26 日日記寫到：「在中央大學借得殷墟書契前編四冊，擬與石禪抄此，並抄劉鶚藏龜，則龜甲之書於是乎全。」，參見《黃侃日記》，第中冊，頁 544、599。

¹⁰³ 陸宗達，〈我所見到的黃季剛先生〉，收錄在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10。

清亡而內閣檔案散落于外，諸言小學、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為忽得異境，可陵傲前人，輻湊於斯，而國維幸得先見。羅振玉且著書且行賈，兼收浮譽利實，國維之助為多焉。要之經史正文忽略不講，而希冀發現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為古人奴，六經注我。此近日風氣所趨，世或以整理國故之名予之，懸牛頭賣馬脯，舉秀才不知書，信在於今矣。¹⁰⁴

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所列舉的新史料（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所書卷軸及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幾乎都是黃侃日記這裡所提及的新史料，然黃侃所重視的仍是傳統的「經史正文」，並據以譏諷王國維的「不好讀注疏」，僅挾新史料炫耀後生，在他眼中，王國維係與羅振玉一樣是「兼收浮譽利實」之流，批評嚴峻於此可見，而這實際上代表晚清以來曾經是中國最有活力最重要的「章黃學派」，與王國維注重新史料，並據以開創「二重證據法」的治學風格的差異。

而年輕時留學中國，而曾向黃侃問學的吉川幸次郎，他當時（1929 年左右）對黃侃的看法亦能對當時中國學術氛圍有更深的了解。吉川氏認為考證學在日本，總認為是在文獻對證之外，一定要有實物的證據，否則不能叫做考證學。但當時他到中國去一看，並非一定要如此。發掘文獻內在的證據，比什麼都強。這種態度在日本人對考證學的理解時，是不明顯的。而真正要具能力去實踐這種考證學的人，在吉川氏與黃侃接觸見面後，他認為

¹⁰⁴ 黃侃著，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第中冊，1928 年 6 月 18 日條，頁 313。

黃侃即是此種會思考、會讀書的人，不是注重書本以外的資料，而是在書本之內認真用功的人。吉川氏記得黃侃說過一句話：「中國學問的方法：不在於發現，而在於發明」，是以當時在日本被作為權威看待的羅振玉、王國維兩人的學問，是傾向資料主義的。發明是對重要的書踏實地用功細讀，去發掘出其中的某種東西，所以善讀書的黃侃，甚至可以把《廣韻》全部背下來。¹⁰⁵大致上，黃侃與王國維治學取向不同，黃主發明之學，主張用傳統方法處理新、舊材料，善於從常見書中發掘出新的東西，對舊材料的重視勝過新材料；王氏主發現之學，提倡「二重證據法」，主張用新方法處理新材料，不僅材料新，觀點更新，無疑對新材料的重視勝過舊材料¹⁰⁶。

實際上在當時中國學界，章太炎、黃侃的「章黃學派」仍擁有極大的勢力，而當時中國另一位秀異的史學家錢穆亦有此種「章黃學派」的傳統史料觀，錢穆在 1930 年代初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又有人來書，云君不通龜甲文，奈何覲顏講上古史。余以此書告講堂諸生，謂余不通龜甲文，故在此堂上將不講及。但諸君當知，龜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講。¹⁰⁷」然而使用龜甲文以證古史正是王國維震撼學界的學術取徑，故錢穆認為王國維此種「二重證據法」的考訂，證明湯以前商代歷世君主其名字已經具詳於司馬遷的史記，雖殷墟新發掘可補史記之缺，但也證明史記有據而有信，所以「今欲考殷商一代治亂興亡之大業，則惟有見

¹⁰⁵ 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頁 62、79。

¹⁰⁶ 司馬朝軍、王文暉合撰，《黃侃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 254。

¹⁰⁷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三版），頁 142。

於遷書，而無以考於龜甲。¹⁰⁸」，是以在錢穆眼中，王國維講歷史考證自清末以來，雖然是無與倫比，但使用的路徑是第二流的¹⁰⁹。

實際上由新出地下史料所推演而成的「二重證據法」，在當時中國學界所引起的反應，我們可以再引同時代的兩個學者的說法以見當時另一面的學界心聲。一位是與王國維有學術交誼，然一般被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舊派學者張爾田，在文化態度上張爾田是極為批判胡適、陳獨秀新文化派的舊派學者¹¹⁰，他對於王國維所使用的「二重證據法」，在他給王國維的函中有極強烈的批評：

近閱雜報，兄竟為人奉為考古學大師矣。日與此輩研究礮石，得無有隕獲之嘆耶！弟嘗謂周孔以前有何文化，不過一堆礮石而已。此種礮石愈研究愈與原人相近。再進則禽獸矣。…故考古學者破壞文化之初步也。人但知宋學末流為空疏，而不知三百年學術末流為破壞。此亦亭林諸公創始者所不及料也。雖然天下事固未有無病者，惟講去其病而不廢其法，方為善學斯意也。惟我與兄能知之耳。¹¹¹

¹⁰⁸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再版），頁147。

¹⁰⁹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頁63。

¹¹⁰ 在張爾田給王國維的函中提及：「自大學為陳獨秀、胡適輩一班人盤據，專創妖言，蹈溺後進，有識者殆無不切齒，亦可見怨毒之于人身也。」，參見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張爾田致王國維〉函，編號三（未標日期），頁239。

¹¹¹ 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張爾田致王國維〉函，編號三十八（未標日期），頁258。

在另封致王國維函中，張爾田再說：「兄以甲骨金文證明上古史迹，弟則以種種事變之集合證明古哲之無空言。¹¹²」

張爾田函中嚴厲批評王國維所代表的考古學的治史方法¹¹³，並將其與禽獸相提並論，可見內心的極度反感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他個人則顯然仍在傳統重視書本資料的思維中。

然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也有引起其他學者的認同和讚揚，如與陳寅恪、清華國學院學生徐中舒頗有學術交往的文字聲韻學大家楊樹達，從他評價黃侃與王國維的學術取徑，或更能代表此後中國學術界所趨向的治學風格。

楊樹達在 1935 年的日記有評價黃侃之言：

按清儒學問本分兩派：皖派江、戴，主實事求是；吳派惠氏，言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發展；吳派主墨守，則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創見。惠弟子為江聲、余蕭客輩，抱殘守缺而已。俞蔭甫私淑高郵，太炎師蔭甫，實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季剛受學太炎，應主實事求是；乃其治學力主保守，逆轉為東吳惠氏之信而好古。讀《詩》必守毛、鄭，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學必守許氏。於高郵之經學，不論今古文家法惟是之從者，則力詬之，此俗所謂開倒車。世人皆以季剛不壽未及著書為

¹¹² 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張爾田致王國維〉函，編號三十九（未標日期），頁 259。

¹¹³ 當然張爾田所指不是現代意義下的考古學科，而是以金石、甲骨文的新出史料去治史的考古學，張爾田畢竟是傳統型的學者，看來並不了解現代考古學的意義和內涵。

惜，余謂季剛主旨既差，雖享伏生之年，於學術恐無多增益也。¹¹⁴

此處楊樹達從學術史的譜系發展對黃侃的定位，值得注意，且與吉川幸次郎觀察黃侃是謹守他認定的書本知識為根據，且治小學遵循許慎《說文》之說，未及其他金文、甲骨文資料，此誠是楊樹達所不以為然之處。而楊樹達另外的讀書日記有幾條更可見黃侃治學意趣，如：

林景伊來，告余云：黃季剛於沒前大買龜甲書讀之。嘗告渠云：「汝等少年人盡可研究甲骨，惟我則不能變，變則人將詆譏我也」…余謂，季剛始則不究情實，痛詆龜甲，不免於妄；繼知其決非偽物，則又護持前錯，不肯自改，又不免於儒矣。¹¹⁵

以龜甲文名家的王國維，適與公開不願正式承認龜甲文研究價值的黃侃，在中國古文字學研究上成為兩種不同研究取向，背後涉及不同的史料觀點，然而在楊樹達眼中，兩人評價在下面一條讀書日記中表露無疑：「讀王靜安《爾雅艸木蟲於釋例》，穿穴全卷，左右逢源。千百黃侃不能到也。¹¹⁶」楊樹達所謂「千百黃侃不能到也」，道盡他個人學術取向近於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而遠於黃侃的書本資料主義。他又在 1941 年日記中有「閱

¹¹⁴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935 年 11 月 1 日條，頁 75。

¹¹⁵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1937 年 12 月 27 日條，頁 89。

¹¹⁶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1944 年 1 月 19 日條，頁 147。

王靜安《殷先王先公考》。讀書之密如此，可謂入化境矣。¹¹⁷」所以 1953 年的讀書日記有「草《甲文說自序》，謂治甲文必通文字、音韻學以識字、通文義，以古書為基礎證合史事。能此者惟王靜安、郭沫若。余雖所得無多，而治此學之途徑不誤。¹¹⁸」，楊樹達個人治學正是走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取徑。

所以像王國維使用龜甲文字以考古史或證中國音韻之學，在當時學界確有不少的反對聲音，然而這也證明王國維新史料觀而成的「二重證據法」，在當時中國是一條很新的學術之路。但也有如既不屬於「章黃學派」，也不出身於清華國學院，基本上是不屬於中國當時任何學派的楊樹達，仍走向王國維的治學取徑。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在之後中國史學界所引起的迴響，這可以根據中國上古史專家楊寬的回憶得知，他指出在 1920 到 1940 年代的古史研究的新學派蓬勃成長時期，其中以王國維為首的釋古派與疑古派（顧頡剛）、社會史派（郭沫若）是當時三個影響巨大的新興學派¹¹⁹。

而在清華國學院中，王國維的這種「二重證據法」，可說施於國學院的師生之間，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姜亮夫後來回憶提到陳寅恪：

先生治學極勤，自教授清華研究院后，尚從伊鳳閣習滿文，亦從靜安先生問甲骨金文，孫氏《名原》刊本

¹¹⁷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1941 年 2 月 16 日條，頁 119。

¹¹⁸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1953 年 4 月 27 日條，頁 260

¹¹⁹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台北：大塊文化，2005），頁 99-106。

有墨錠，同學朱芳圃、戴家祥、劉節皆有所補苴，而最后由先生審定，則甲骨、金文亦成專門矣。¹²⁰

孫詒讓係近代中國第一個利用劉鶚所編輯的《鐵雲藏龜》來進行甲骨文字研究的學者，而孫氏所著的《名原》是以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資料與《說文》古籀互相比勘，分析偏旁，以證說古文字之形體，探索古文、大小篆之沿革演化，開甲骨文考證古文字之先例¹²¹。是以從王國維、陳寅恪老師輩，到弟子朱芳圃、戴家祥、劉節都致意於此用甲骨文來考證古文字的「二重證據法」。

在此也可略加觀察日本的學界對於「二重證據法」的看法。吉川幸次郎是屬於京都學派的重要學者，對於京都學派的內涵有親切的認識，他所謂的考證學「在文獻對證之外，一定要有實物的證據」這完全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是以王國維能對日本京都學派有重要的影響，並與日本學人學術交涉至為緊密¹²²。

是以當現今史學界已能普遍接受「二重證據法」的治學典範時，我們當更能了解王國維所形塑的清華國學院這種學風，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

在疑古史學震撼中國史學界之際，因為他們懷疑中國古書的真偽，是以如顧頡剛在辨偽古書之後，提出「我們現在既沒有『經書即信史』的成見，所以我們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還

¹²⁰姜亮夫，〈思師錄〉，《姜亮夫文錄》，頁 24。

¹²¹張舜徽，《清儒學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孫詒讓學記第十〉，頁 362。

¹²²關於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古史研究，對日本漢學學者的影響，參見嚴紹盪，《日本中國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181-184。

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¹²³」，而這使得顧頡剛提出「累層造成說」，而顧頡剛的「累層造成說」，透過諸子託古改制的理論，與歷代學者之附會解釋，全盤否定了古代的信史性¹²⁴。。

對於顧頡剛所掀起的這一史學革命，陳寅恪在 1930 年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就說：

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逕認為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故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斷斷致辯於其橫切方面。¹²⁵

陳寅恪這裡所謂的「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自然是肯定偽書若能了解其作偽的時代和作者，仍可以據以作為考證「信

¹²³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頁 85。

¹²⁴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頁 220。

¹²⁵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48。

史」的史料，此雖與顧頡剛疑古史學在偽書中建立「傳說的經歷」，在思維上有某些類似，但就建立史實的面向上而言，陳寅恪是與王國維《古史新證》中所言的對史料之看法相同，他們畢竟比疑古史學走上更深一層要積極地去建立可靠的古代信史，在史料觀上呈現出更現代性的一面。

而陳寅恪在 1935 年的〈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言：「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¹²⁶」，此處所謂「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丟掉經師的正統觀念，這種觀念所包含的範圍很廣，尊三代、尊周、尊孔、尊經、尊倫理綱常都是，這是一種無形的網，但卻是一張有力的網¹²⁷。是以民國學風一個很重要的趨向，就是經學研究的史學化，陳寅恪的〈楊樹達論語疏證序〉中稱楊樹達「先生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¹²⁸」，實際上這也是陳寅恪對待經書的態度，而非用傳統經學家的「經學」學術傳統取向，而是以史學思維來處理經書的史料。

前文曾提過，其實陳寅恪對清人的兩部經解《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是時常閱讀地，且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每字必求正解。但經學古籍對他而言只是史料，這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學術界的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走向中心¹²⁹，陳寅恪亦以

¹²⁶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9。

¹²⁷ 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頁 133。

¹²⁸ 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2。

¹²⁹ 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收錄在氏著，《權勢轉

此自任，而王國維亦是如此，這都體現了一種新的史料觀。

王國華稱其兄王國維：

並世賢者，今文家輕疑古書；古文家墨守師說，俱不外以經治經。而先兄以史治經，不輕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經皆史之論，雖發于前人，而以之與地下史料相印證，立今后新史學之骨幹者，謂之始于先兄可也。¹³⁰

而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的弟子吳其昌在〈王靜安先生學述〉文中也特別指出王國維非經學家，他治經的主旨乃在於推證古史，如王國維在〈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未有一部專著，可純粹視為經學著作。僅有〈爾雅草木鳥獸蟲魚釋例〉一卷，但此書與其目為經學，為注釋《爾雅》之書，毋寧視之為史學，為上古事物名稱及方言語音之源流變遷史。所以與王國維並世的曹元弼、張錫募兩先生之古文經學；康有為、廖平兩人的今文經學；章太炎、黃侃兩人的小學，王國維都不與之通聞。而其師友，沈增植、羅振玉以外，反而為柯紹忞、張爾田等人，注要是方以類聚，都是史學家。所以王國維本非為經學而是為史學，他治經傳，是以經傳為古代史料的來源關係¹³¹。從學術

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頁302-341；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頁110-156。

¹³⁰ 王國華，〈《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頁2。

¹³¹ 吳其昌，〈王靜安先生學述〉，《國學論叢（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頁183-185。

的交友圈來看待學術取向，是很可以切入的角度，故吳其昌所言，可以知道王國維學術中的史學研究傾向。

所以顧頡剛在王國維過世後的悼念文章中說：

他（案：指王國維）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作經書（聖道）看，而當作史料看，聖賢不當作聖賢（超人）看，而當作凡人看，他把龜甲文、鐘鼎文、經籍、實物作打通的研究，說明古代的史蹟，他已經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許多。¹³²

顧頡剛雖然自認最爲崇拜王國維，畢竟他疑古的立場與王國維是隔了一層，但是他一向具有史學史的獨到眼光，故頗能得王國維學術精神的底蘊。而陳寅恪與王國維都已經超出清代乾嘉考證漢學的範圍，所謂「六經皆史之論」，正是將經書予以史學化的處理和眼光，這種新的史料觀，雖前有所承，但陳、王在這方面的史學思想意識之高度，在當時 1920、30 年代中國學術界中，允爲一個重要的學術風格，他們並將其帶入清華國學院中，是以清華國學院的學生治學取向，也確實是以史學爲其最重要的特色。

¹³²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追憶王國維（增訂本）》，頁 114。

第四節 小結

觀察清華國學院成立時間的 1920、30 年代中國的學術氛圍，有兩位學人所引領的學術文化思潮，在當時中國學術界頗有影響，分別是胡適與顧頡剛。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持有的反傳統及西化的文化主張，以及在學術上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都衝擊著當時中國學術界的生態。而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則在胡適的學術影響下，進一步提出了撼動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疑古運動，胡適與顧頡剛所引發的學術文化課題，自是 1920、30 年代中國學人所不可忽視的挑戰，實際上清華國學院的成立及其學術風格的形塑，在相當的層面上都是對此胡適、顧頡剛引發的學術課題所作的回應。

在清華國學院籌備成立之際，胡適與吳宓都參與其中，兩人在文化態度上，雖分屬西化派與文化保守主義，然兩派對於中國對應西方文化的態度，容或有程度上的深淺之別，惟其主張應該吸收西方文化的立場，實際上是一致地。是以文化態度上持反傳統並主張西化的胡適，在此思維下，於學術主張上進一步提出要以西方的科學方法，及師法歐洲（西方）東方學、漢學為重要內涵（主張）的「整理國故」運動，實際上這影響著清華國學院設立的宗旨及其學術的發展方向。

而繼胡適「整理國故」運動之後，顧頡剛所引發的疑古運動更全面衝擊中國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的研究方法和思維。胡適、顧頡剛突破過往中國經學研究傳統的藩籬，將經學予以史學化的處理，在史料的視角上，有其創新革命的一面。而清華國學院的諸位導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在史料的認知上，

有其迥異於中國傳統史學的全新觀念，且秉持著以史學的眼光來看待經書，這些新的史料觀自與胡適、顧頡剛引發的學術思潮同其呼吸。他們共同引領著一個時代新的學術之路，這一思路在學術系譜的承繼上，更可看出是爾後 1928 年之後傅斯年所創建的中研院史語所的學術精神之淵源所在。

然清華國學院的學術精神在回應胡適、顧頡剛的學術運動中，有與其精神會通的一面，如對西學的接受、與歐洲和日本東方學、漢學接軌之處，然亦有對顧頡剛疑古史學的過激思想提出修正之處，如對疑古史學及其背後思想遠源的今文經學提出批評，並進而創造性的在新史料觀的思維下，提出了頗具創新意義「二重證據法」的學術研究取徑，而這些也分別體現在清華國學院諸位導師的學術實踐上，並傳承於國學院的學生之中，形塑成清華國學院的學術風格。

第四章 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1929）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傳統建立的關係

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1929)在近代中國成立雖然只有短暫五年左右時間，但她在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學術現代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史學上的意義值得探討。儘管研究院成立時間不長，然而她從創所以來即網羅吳宓、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近代中國學術界具關鍵性地位的學人共同發展這一專業學術機構，故成立之初即受學界矚目，成立時間雖短，然而當我們深一層次的看，儘管清華國學研究院於 1929 年結束，表面上學術機構的建制消失了，但是國學研究院的核心師資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仍然參與當時中國另一個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術研究傳統建構，由傅斯年 1928 年所開創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則是引領二十世紀初以來的近代中國史學現代化最重要的學術重鎮，一直到現在，史語所的史學研究仍居近代中國史學研究的核心地位，而傅斯年在創立史語所除了他本人的史學觀念作主導外，同時他不免受到當時中國幾個重要史學研究傳統（如北京大學的國學研究，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的影響，傅斯年出身北京大學，向來與北大新派的國學研究關係密切，自不待言，然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關係則有待深一層次探究。

傅斯年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如吳宓、王國維、陳寅恪的文化風格是迥然相異的，例如傅斯年是五四時期反傳統思想的西化派著名領袖之一，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掌旗手，此與清華諸公如梁

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人，在文化理念上傾向保守甚或是有遺老風格是截然異趣的，但是這種文化態度的差異，在另一層面的學術（史學）研究上是否也呈現如此鉅大的距離，或其實是可能有其精神同構，值得深探。而傅斯年史學革命的「激進」形象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研究」兩者之間，或許有其表面上的印象差異，但深一層研究，是會某種程度修正這一印象。

在眾多影響史語所史學研究傳統建立的因素中，傅斯年在他成學過程中自然受到老師胡適及他在歐洲留學學術思潮的影響（如蘭克的史學），但是從傅斯年與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代導師（講師）的學術關係，及在成立之初期史語所傳統風格進一步確立的過程中，皆可發現史語所在人員組成（如第一代的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第二代的徐中舒、吳金鼎、王靜如）、組織編制上（如設立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四個學門），以及具體的史學實踐過程中，毋寧皆可看到清華學風與史語所研究的傳統某種特殊關係，但何以會造成史語所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如此關聯，恐仍必須從近代中國學術脈絡中去尋找，所以在對近代中國史學最重要的史語所研究傳統建立的溯源過程中，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史語所學術傳統建立的關係為何？在本章中將進一步探究。

第一節 從人員組成、組織編制看清華國研究院與史語所的關係

以下擬從史語所人員組成如陳寅恪、李濟、趙元任、徐中舒等人居於史語所核心，以及組織編制如歷史學組、語言學組、考古學組、人類學組的編制考察兩者關係。

有關史語所的成立過程，1927年八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創立了，而同時期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後，傅斯年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的關係，當中研院「組織條例」一披露，傅斯年很快地在1928年正月到上海，說服蔡元培，「借用在廣州之語言歷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歷史語言研究所。」蔡元培立刻贊成，並囑照一切原定計畫照樣進行，按照這個辦法，其實是一個研究所掛兩面牌子，傅斯年返回廣州後，立刻覺得與中山大學這麼密切結合不妥，因此馬上再給蔡元培一個報告，改為合作關係，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雖暫時借用中山大學的圖書等設備，人員也有重疊，但經費、課題都要獨立，圖書的蒐集也要自己展開，蔡元培也同意，於是三月底聘請傅斯年、顧頡剛和楊振聲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員，「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名遂在1928年六月第一次院務會議出現，可以說是「無中生有」的一個機構，其催生者即是傅斯年，此時傅斯年猶任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所長，胡適戲稱他是「狡兔二窟」¹。

至於在組織架構上，史語所草創有九組、八組或七組的說法，九組說見於1928年五月傅斯年所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屬於歷史者五組，即文籍考訂、史料徵集、考古、人類及民物，和比較藝術；屬於語言者四組，即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和語言學，八組說出自同年十一月傅斯年的史語所

¹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11-22。

第一期報告書，即漢語、人類學、民物學、漢學、民間文藝、史料學、文籍考訂、敦煌材料和考古。七組說則是十八年六月遷移北平後，第一次所務會議的發言紀錄。

不論七、八或九組，短短不到一年之內如此岐異，顯然是理想為配合現實所作的調整。譬如負責文籍考訂組的顧頡剛和傅斯年因治史理念及個性不合而分道揚鑣，而傅斯年苦心羅致的陳垣欲委以敦煌材料組，終不能來。及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接聘，1929年春天遷北平，人事底定，乃全盤檢討組織架構，而確定設立三組，第一組史學、文籍考訂等屬之、第二組語言學，民間文藝等屬之；第三組考古學，人類學、民物學等屬之，而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分別擔任第一、二、三組之主任，七十多年來的史語所其基本規模至此確立²，故從人員結構和組織架構來看，人員結構在史語所的初創，經歷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到以清華大學國學院的轉變，成員背景與治學方法則從「土派」轉變為「洋派」，此一轉變大約在1928年十月後漸次完成。

這時傅斯年三十三歲，李濟與他同齡，陳寅恪三十八歲，趙元任三十七歲，這個新研究所是一群壯年學者組成的學術團體，它給中國學術界帶來的衝擊不只是年輕有銳氣而已，傅斯年撰寫〈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揭示他的目標、方法，提出要發掘新問題，蒐集新材料，使用新工具，要把歷史學和語言學做得像自然科學那樣客觀和精確，使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能在

²杜正勝，〈史語所過去、現在與未來〉，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3-4。

中國建立起來，而傅斯年對學術的基本看法應是獲得清華國學研究院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的認同，否則以清華的聲譽和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地位，不可能齊集到傅斯年的麾下，而史語所的新團隊也不可能順利的組成³，然而從人員組成與組織編制上，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所以會如此順利的與傅斯年中研院史語所形成這種密切關係，這自然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風格，與傅斯年中研院史語所欲開闢的新學術之路，在學術理念上同構方能致此，這點下文繼續深論。



³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22-23。

第二節 從史學實踐層面看清華國研究院與史語所研究傳統建立的關係

本節擬從史語所（一）史學研究的理論層面和（二）具體的史學實踐，如殷墟的挖掘、語言（方言）的調查，考察兩者的關係。

有關傅斯年何以會創立提倡新學術之路的史語所，杜正勝先生研究值得我們重視。他研究指出在 1920、30 年代左右當時在中國居於主流地位的史學學派則是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傅斯年在出國去歐洲留學之前與留學之初與顧頡剛的疑古史學思想是一致的，可說是「疑古的傅斯年」，惟當 1919 年至 1926 年在英、德留學時期而漸改變他疑古的思想取向。傅以為疑古學派的「累層構成說」即犯了以史料之「無」，而論斷史實亦「無」的謬誤，故傅斯年提出要擴充史料去建立史實，杜正勝曾指出傅斯年的史料思想之產生，係來自於顧頡剛疑古思想的挑戰，所以傅斯年提出「史學即史料學」的主張，以求實的態度破疑古的虛陷，因為疑古思想以為資料即是反映傳述資料者的心態，不同時代的資料聯串起來，只是描繪了這些心態的「經歷」，實無資料所說的史「事」可言，故傅斯年則不從此途，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重建歷史⁴。故傅斯年的史料說，即是在如此的思想環境中而提出來，具體的宣示即是〈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

⁴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第 116 期，1995 年 12 月，頁 10-29。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言及的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材料，靠團體爲他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集眾的研究工作自是傅斯年看待現代史學工作的性質，故他結合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幾位學者進入史語所，作出「集眾的工作」，而在〈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更進一步指出（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

而有關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宗旨，第一條即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因爲亭林和百詩在很早的時代已經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們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是照著材料的份量出貨物的。他們搜尋金石刻文以考證史事，觀看地勢以察古地名。亭林以語言按照時和地變遷的這一個觀念看得頗清楚。

宗旨第二條是擴張研究的材料，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⁵

現在重讀七十五年前的〈旨趣〉一文可知，〈旨趣〉中有一些常被批評的部分，像「反對疏通」，像「證而不疏」，像「推論是危險的事」，像反對「普及」等，史語所近五十年來的發展早已不受其限制⁶，但旨趣中論及史學研究中的幾項要素至今仍有

⁵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1980），第四冊，頁253-266。

⁶ 詳細論證可見，王晴佳，《台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台北：麥田，

價值：第一、傅斯年提到運用新工具，呼籲人們充分運用自然科學所提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譬如地質學、地理學、考古學。第二是要發掘新史料，擴充新史料。第三是發掘新問題，第四是新領域的開展，如當時西方學者所拿手的「虜學」及南洋學，又如當時西方學者所重視、而千百年來中國學者所忽略的，「如神祇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⁷，這些都是傅斯年所奠定的史語所研究傳統很重要的質素。下文則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幾位導師的學術理念與傅斯年的學術交涉關係再作進一步研探。

梁啓超是中國近代史學現代化的先聲，在理論層面他對史學研究的意義之闡釋是有著重大貢獻，我們可考察梁啓超的新史學概念尤其是他對史料及史學和其學科關係來看其與傅斯年史語所風格的異同。

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史料」這個概念多所闡釋，「史料」根據他的定義便是「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留傳至今日」，梁啓超對「史料」的認定無疑擴大擴充史料的範圍，依據傳統史學的成見，充其數僅算是珍奇賞玩的金石器物，惟在梁啓超對史料的新觀點下，甚至包括新近出土的敦煌簡牘、殷墟甲骨、地下考古都變成珍貴的史料，宋人著錄的金石文字，以往視為書法珍品，至今則成為絕佳的研究資料，殷墟書契的發現，在文字源流上別開生面，影響所及且可涵蓋全體中國古代史，故他歸結「金石證史」價值最高。而在梁啓超的史料觀審視下，便是動搖傳統史學經典的權威形象，帝制時代被尊

2002)，「中編—科學史學的轉折，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特別是頁43-84。

⁷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256-260。

爲「正史」的「二十四史」，梁啓超只認爲是「史料」而已，梁啓超認爲史料自不能不「求備」，他不但步劉知幾、章實齋後塵，擴張史料領域，而且隨著宋清金石考古家和羅振玉、王國維以及東西洋漢學之後，看重「文字紀錄以外」的實蹟，尤其新發現的各種文物，雖東南海濱村中古屋也不放過⁸。而傅斯年的史料觀顯然是與梁啓超這種新史學精神同其呼吸的，傅斯年全面擴張史料，而非只受限於傳統經書領域及書本文獻史料中，當然與梁啓超一樣突破傳統史學的藩籬。

而傅斯年與王國維的學術交涉關係更值得重視。除了王國維以外，從未見傅斯年對任何學者如此傾心，傅斯年給陳垣的信中表示了他對於西洋學術羨妒交加的情緒，既肯定他們在東方學研究上的成就，然傅斯年以爲「並漢地之歷史材料亦爲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同時又「慚中土之搖落」，故他希望建立一個機構，聚合一群學者急起直追。但傅斯年在悲嘆「中土之搖落」時，卻認爲王國維與陳垣是兩位足以傲視西方的學者，他說：「幸中國遺訓不斷，經典猶在，靜菴先生馳譽東海於前，先生（陳垣）鷹揚河朔於後」⁹。單以甲骨文來說，傅斯年在董作賓《殷曆譜》序中說，自孫詒讓始得甲骨文字以來，並對甲骨文研究之後，「若夫綜合研究，上下貫穿，旁通而適合，則明明有四個階段可尋，其一爲王國維君之考證殷先王

⁸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1984），頁111-148。

⁹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0），〈傅斯年致陳垣〉函，1929年（未標月日），頁407。

先公，與其殷墟文字考釋之一書¹⁰」。

而在學術觀點上，傳統中國有一種牢固的成見，認為夏商周三代出於一元，認為殷、周皆起於西土，而且認為西土是孕育強盛朝代的地方。但是王國維是一位思想新穎的史家，他運用地理的觀點，將一些自古以來認為一脈相傳的系統拆解開來，傳統的一元系譜被他空間化了，在他著名的〈殷周制度論〉中，王國維不但是將商、周兩個過去習以為是前後相承的朝代以地理上分為東、西，而且從制度上廣泛論述殷、周之不同，而王汎森教授研究透過一本 1927 年 8 傅斯年從廣州到上海首度購讀的《觀堂集林》原書中，看到傅斯年在《觀堂集林》中〈殷周制度論〉部分中的眉批可知，後來傅斯年發表一系列的如〈「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周東封與殷移民〉及〈夷夏東西說〉皆有受王國維從地理觀點理解古史的影響，而深化傅斯年原有周人在西、殷人在東的觀點¹¹。王汎森教授的研究更強化 1945 年寫於抗戰勝利之後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書中的觀點，顧氏舉出在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上，王國維利用他的二重證據法研究甲骨文和文獻的結果，主張殷以前的帝王宅京皆在東方，只有周獨崛起于西土。而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徐中舒，在王的指導下的論文後來修訂成〈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發表在清華國學院刊行的《國學論叢》中），以為「由載籍及古文字說明殷周非同民族」，

¹⁰傅斯年，〈《殷曆譜》序〉，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1980），第三冊，頁 217。此文談及甲骨文綜合研究的四個階段，除孫詒讓、王國維外，另有郭沫若、董作賓。

¹¹這部份討論主要引述自王汎森，〈一個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2003），頁 305-320。

而等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更鋪張古代民族有東西二系之說，不僅以為周興于西土，連夏也是興于西土的，只有殷是興于東方，從祖先神話證明殷與東北民族同出一源¹²。這種學術觀點的影響痕跡是很明顯的。

而傅斯年在 1940 年出版《性命古訓辨證》一書，其中認為夏代之存在是可信的¹³，這看法是近於王國維而遠於顧頡剛。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總論」上說「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此係針對顧頡剛疑古學派而發的，而顧頡剛疑古學派則是否定有夏朝的存在，王國維對此則是不贊同，故他在《古史新證》第二章的「禹」中，則論述肯定夏禹的存在¹⁴，此則與傅斯年的看法頗為相近。

基本上，傅斯年早年傾向疑古，但後來不滿意於懷疑，並主張重建古史，當然是史語所殷墟考古的成果影響著傅斯年的古史觀，但是王國維的〈殷卜辭所見先王先公考〉、〈續考〉等文字也對傅斯年思想有微妙的影響。¹⁵總體觀察，傅斯年接受了顧頡剛「古史辨」的洗禮之後，更進一步運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

¹²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25。

¹³ 傅斯年在《性命古訓辨證》第三章〈諸子天人論導源〉中有言：「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於殷禮』者如何，則『殷因於夏禮』者，不特不能斷其必無，…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頗高，而為殷人所承之諸系文化最要一脈，則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參見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1980），第二冊，頁 301-302。

¹⁴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6。

¹⁵ 王汎森，〈一個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315。

對古代民族的劃分、互相交涉、遷徙等進行大規模的整體觀察，其想像力尤其繁富¹⁶。而這一過程基本上是讓傅斯年的古史觀，從「疑古」的傅斯年到「重建」的傅斯年，甚而傅斯年的改變影響了他的老師胡適的文史觀點，讓原本胡適與顧頡剛較為親近的學術觀點，後來變成胡適與傅斯年彼此靠近，而漸漸遠於顧頡剛「古史辨」的疑古精神¹⁷。

而在〈旨趣〉文中，傅斯年提及：

以說文為本體，為究竟，去做研究的文字學，是書院學究的作為。僅以說文為材料之一種，能充量的辨別著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中國文字學之進步，正因為說文之研究消滅了汗簡，阮吳諸人金文之研究識破了說文，近年孫詒讓王國維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繼續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擴張，學問愈進步。¹⁸

而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講授的中國文字學，自然是以《說文》為主，但除了根據《說文》外，不同於當時章黃學派基本上是以純粹的書本文獻為本的古文字學，王國維也同時根據金文、

¹⁶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北：聯經，2007），頁41。

¹⁷ 這方面的研究分析，可參考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321-340。

¹⁸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256、258。

甲骨文來論證古文字學¹⁹，而後來又根據書本以外的這些甲骨文資料考證古史，如在《古史新證》中第三、四章論述殷墟甲骨文所見商朝先公先王即先正，證明了《史記》所具的《世本》全是實錄，王國維更進一步推論由殷周世系的確認，也可以推認夏后氏世系的確實，這又是當然之事。又雖然是謬悠緣飾的書如《山海經》、《楚辭·天問》，以及成於後世的書，如《晏子春秋》、《墨子》、《呂氏春秋》，晚出的書《竹書紀年》，這些典籍所談到的中國古代史事也有一部分確實，所以今天雖然未得二重證據法來加以證明，但這些都是不可以完全抹殺的²⁰。這是王國維最著名的學術發現，也是他擴張研究史料（如金文、甲骨文史料）建立中國史學界古史研究的「二重證據法」。

而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書的〈史料論略〉中，對於王國維運用地下的史料（傅斯年名爲直接史料）發明古史是頗爲稱讚的，一方面傅斯年說「玩古董的那麼多，發明古史的何以那麼少呢？寫鐘鼎的那麼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補證經傳的何以只有許瀚、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幾個人呢？」，對此傅斯年歸因於他們既能使用如地下挖掘出來如甲骨文的直接史料，同時也對間接史料（如經傳資料）也有一番細工夫，兩重證據配合下，方能成其功；而另一方面傅斯年批評章太炎對新發現之直接材料深固拒絕，並說殷墟文字是劉鍊雲假造。所以傅氏更舉王國維的〈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兩篇，說實在是近年漢學中最大的貢獻之

¹⁹ 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講授的古文字學狀況，可以參看當時國學院學生劉盼遂的記載筆記，〈說文練習筆記〉，收錄在王國維講述，吳其昌、劉盼遂記，《觀堂授書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頁 113-124。

²⁰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頁 6-58。

一，並以爲「假如王君不熟悉經傳，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悉經傳者不用這些材料，經傳中關涉此事一切語句之意義及是非是不能取決的」²¹，傅斯年用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說法，實際上就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史料精神。所以傅斯年認爲「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運用細密的綜合與分析者，有王國維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爲從事研究者之楷模」²²。故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是與傅斯年擴張研究史料的觀點同其精神，中研院的殷墟發掘，透過考古挖掘更多元的史料，是比「二重證據法」更臻一層的史學研究方法的實踐。

同時王國維認爲偽書、謬悠緣飾之書如《山海經》、《楚辭·天問》等書，如加以考證後便也能成史學研究的有用史料，更可以進一步來重建中國古代的信史，這種史料觀點背後實際上是在回應疑古學派質疑中國古代經籍真偽的衝擊而來。

而傅斯年也能肯定《山海經》、《楚辭·天問》的史料價值，在〈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文中，傅斯年就指出：

即如史紀殷本紀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經的王亥，天問的桓和季，不特是死的，並且如鬼，如無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寧王君之發明，則敢去用這些材料的，是沒有清楚頭腦的人。然而一經安陽之出土，王君之考釋，則史記山海經天問及其聯類的此一般材

²¹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傅斯年全集》，第二冊，頁8-10。

²²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1980），第一冊，頁58。

料，登時變活了。²³

傅斯年一向認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於是在此研究方法應用之下，原本不足信、死的史料在王國維的研究中都可成爲史料，都活過來了，而傅斯年的史學從古史的「疑古」到「重建」的思維過程，相信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典範對他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這可以從前文傅斯年多篇古史文論中，反覆提及王國維立下的研究典範可知。

綜觀王國維透過「二重證據法」廣拓各種可用的史料，而傅斯年在〈旨趣〉一文中也主張盡量擴張史料，大概的背景都與顧頡剛的疑古史學有關，然王國維與傅斯年他們都是要用謹慎的史料考證，並進而建立可靠的信史，在學術精神上是一致地。

而傅斯年所建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結合「語言」與「歷史」而成的新學術之路，然而著重語言文字之學爲治史之始的觀點，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一書就是此思維下的產物，而實際上王國維爲學亦是如此，王國維的學生吳其昌（1925級）在其師過世之後，爲紀念先師所寫的〈王觀堂先生學述〉文中就舉出：

先生考證古史之學，皆建設於小學之上。換言之，即以小學爲工具爲基礎也。…故有清一代二百餘年以提倡經學，其結論即不過由「識字以通辭，通辭以通經」

²³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傅斯年全集》，第三冊，頁225。

二語而已。而先生之考古也，亦由識字通小學起。²⁴

王國維的治學取徑亦是語言文字與歷史結合的方法。在這一點上王國維與傅斯年頗為相近，畢竟兩人都出身於清代乾嘉漢學傳統，對於語言文字的小學都頗有修養，只是傅斯年曾留學歐洲，深知德國蘭克史學著重歷史與語言結合的研究路徑，以及歐洲東方學、漢學能以多種語言文字從比較的觀點，用多方面的史料視角來豐富歷史的研究，傅斯年的研究方法較王國維更臻一層。

至於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學術交涉關係，亦可看出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如何體現在中研院史語所的學術精神中。以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蒐藏為主的陳寅恪書信業已在 2001 年正式公佈了，在刊佈的二百三十通信中，雖然只是陳寅恪書信的部分，但是從這批書信集中仍可看出陳寅恪致傅斯年有七十七封信之多，從信函中可知傅斯年與陳寅恪私人交誼之深厚²⁵，陳寅恪是傅斯年刻意羅致到史語所的一位大家，傅斯年不只一次說陳寅恪是三百年來的第一人，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組找他來領導，是傅斯年相當得意的事，而陳寅恪則把最滿意的文稿給史語所出版，參與所的重大決策，不過他以家庭之故，不願離開北平到南京就任，仍留在清華大學教書，但仍領史語所最高級薪資。傅斯年並且特別為他張羅優厚的待遇，相對於朱希祖和羅常培，真是有天壤之別，朱原準備從北京大學轉任史語所，只因要求兼

²⁴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國學論叢（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第一卷第三期，1928 年，頁 185。

²⁵ 《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5-120。

課，傅斯年便拒聘，羅也因在北大任教而與傅絕裂²⁶。

陳寅恪從 1929 年起便應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一直到陳寅恪滯留大陸，在台北繼任該組主任的陳槃仍不敢真除，自稱代主任，直到 1969 年陳寅恪去世兇耗傳來，才將「代」字去掉，雖然陳寅恪真正待在史語所的時間並不長，傅斯年特許他在大學以專任研究員暫支兼任薪水名譽上課，而歷史組的實際組務則由傅斯年代辦，在「傅斯年檔案」中尚有數張蓋有陳寅恪私章的公文紙，是陳寅恪預留作為推薦升等之用，不過，在一些重要的會議及決定上，陳寅恪仍盡可能參加。在陳寅恪所有來往函札中，給傅斯年的信當屬大宗，陳寅恪一生只寫過幾封信給胡適，及連相契至深的陳垣，陳寅恪寫信給他的信也遠少於傅斯年。從函中可知，傅斯年真是對陳寅恪照顧呵護，無微不至²⁷。

在學術上，陳寅恪亦是反對顧頡剛的疑古運動，從陳寅恪 1930、40 年代的文字來看，他對民國學術界最反感的是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史學，陳寅恪對疑古辯偽風氣的批評，在〈劉叔雅莊子補正序〉可以看出，陳寅恪說：

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著書名世者甚眾。偶聞人言，其間頗有改訂舊文，多任己意，而與先生之所為大異者，…嘗亦能讀金聖嘆之書矣。其注水滸傳，凡所刪

²⁶ 杜正勝，〈舊典範與新典範〉，收錄在《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週年演講會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 7。

²⁷ 王汎森，〈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519-520。

易，輒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謂古本者，非神州歷世共傳之古本，而蘇州金人瑞胸中獨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與先生（案：指劉叔雅）所為大異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談商周邃古之樸學，其所著書，幾何不為金聖嘆胸中獨具之古本，轉欲以之留贈後人，焉得不為古人痛哭耶？²⁸

對古書任意的懷疑是今文經學家的通病，而文中所言「改訂舊文，多任己意」及「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的「明清放浪之才人」，其針對性即是指受今文經學影響的治「商周邃古之樸學」的疑古學派。

陳寅恪對疑古問題的注意，還透露在兩段談論清代經學的文字，他在〈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說：

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聯繫。²⁹

²⁸ 陳寅恪，〈劉叔雅莊子補正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29。

²⁹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寒柳堂集》（台北：里仁，1980），頁 144。

將疑古的學風比喻為浪漫之文學，而非客觀的史學，大抵上是指近於文學的虛構，此決非譽詞，其理甚明。

而在陳寅恪的〈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析論清代經學至為詳細，陳寅恪說：

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猶不確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徵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後，故不能犁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³⁰

文中「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當指古文經學派；而「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係指疑古的今文經學家，其中雖然對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皆有所批評，然而古文經學派失之於對歷史的解釋過於謹慎保守不足，而今文經學派則失之於對於歷史解釋過於扭曲大膽太過，兩者相較，古文經學派對於史料的紀律與史學

³⁰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8。而牟潤孫亦曾指出陳寅恪此文中的「誇誕之人治經學」者，係指康有為、崔適等人的今文經學，和受其影響的顧頡剛、錢玄同的疑古學派，可參見牟潤孫，〈論清代史學衰落的原因〉，收錄在氏著，《海遺雜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0），頁 69-70。

詮釋仍稱嚴謹，但是今文經學派，扭曲史料的意義，甚至從政治、經世的目的去詮釋歷史，已近於「我注六經」的狀況，實際上已不符合史學的紀律，是以陳寅恪批評今文經學派較甚。

又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後〉中說：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³¹，

陳寅恪文中舉其先祖先君以來，即反對康有為的今文經學之說，而他的思想是承其家學門風而來的。而疑古學派健將顧頡剛即是對康有為思想吊詭式的繼承³²，是以陳寅恪隱含的意義是不同意顧頡剛的疑古史學。

而傅斯年本身從疑古的傅斯年轉變為重建的傅斯年，所以當年在北平大學任教時，他即已對顧頡剛的疑古思想多所保留，如他就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頗為認同，錢穆《師友雜憶》這段話足資證明：

³¹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後〉，《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寒柳堂集》，頁 149。

³² 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錄在氏著，《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1997），頁 95-96；以及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1993），頁 209-218。

余至北平，即與孟真相識。孟真屢邀余至其史語所。有外國學者來，如法國伯希和之類，史語所宴客，余必預，並常坐貴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紹余乃《劉向、歆父子年譜》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當時經學界之今文學派，乃及史學界之疑古派。³³

傅斯年與陳寅恪在治學理念上謹守史料證據，以考證方法追求可靠的歷史圖像，而非如疑古學派在懷疑古書之後，進而摧毀中國古史的激進態度，雖然疑古學派的「看史蹟的整裡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的主張³⁴，在史學上仍有很積極的意義，惟不同於清華國學院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人對古史積極「釋史」態度或傅斯年的史實重建的思維，他們主張在辨明可靠的史料或偽書的狀況下，仍可擴張史料來積極重建中國古代信史，在這一點上兩邊顯然是有差異地，傅斯年與顧頡剛由親到疏，雖然與個性差異、學術理念有關（一主拔尖主義；一主普及主義）³⁵，然傅斯年終於擺脫顧頡剛疑古學派的籠罩，其學術轉向的動力則是外有西方史學的啟發，內有清華國學院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典範影響，及王國維、陳寅恪等人對疑古史學的批評與修正，他終於推出中研院史語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³³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三版），頁 146。

³⁴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85。

³⁵ 對於傅斯年與顧頡剛學術的合分，可參見，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頁 4-23；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325-328；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第 116 期，頁 10-29。

史料擴張的觀點，及運用最新的研究工具，拔尖主義的找來清華國學院的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來實踐他的史學理想，以重建中國可靠的信史。

傅斯年與陳寅恪曾同時間在德國柏林留學，留學生曾經稱傅斯年與陳寅恪是「甯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³⁶，兩人皆曾受德國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而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和〈周東封與殷遺民〉文章中有「種族—文化說」的分析觀點，而陳寅恪在他著名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同樣具有這種「種族—文化說」的分析方式，是以陳寅恪與傅斯年在德國時期都受這種分析方式的影響³⁷。

又陳寅恪在史學研究上的治學方法，可以說是「實證」與「詮釋」參互以求，交互為用的。「實證」是求取知識的常法，「詮釋」則是通解文獻涵義的竅門，這兩種方法在中國和西方都各有傳統，而源流則彼此不同。陳寅恪在德國留學很久，對西方「實證」與「詮釋」的兩大傳統至少都有過接觸。例如他在文獻考證方面可能受到蘭克（Ranke）一派史學的影響，這在當時有「科學的史學」之稱，是注重「實證」的知識的。但另一方面，他強調「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的真了解，這又露出德國詮釋學傳統中所謂Verstehen的痕跡了³⁸，惟陳寅恪治史雖然是「實證」與「詮釋」交互為用，但他仍堅守史學注重史料

³⁶ 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24。

³⁷ 周樑楷，〈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歷史觀點—從西方學術背景所作的討論（1880-1930）〉，《台大歷史學報》，第20期，1996年11月，頁101-127。

³⁸ 余英時，〈明明直照吾家路〉，收錄在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2011二版一刷），頁49。

考證的基本紀律，這方面陳寅恪除是受蘭克「科學史學」的影響外，同時他係出身於清代乾嘉考證學術傳統，這兩個中西史學傳統皆重文字語言的考證基礎，是以陳寅恪治史仍是先從掌握語言文字的史料意義出發，這是他「實證」的一面，據此基礎才進一步進入「詮釋」的階段。³⁹

據此觀察傅斯年在 1928 年設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將「歷史」與「語言」結合定位為史語所的學術風格取向，很明顯的即是受到當時德國這一學術思潮的影響，故陳寅恪與傅斯年在這一點的學術路徑與認知是相同地。

實際上，傅斯年係 1923 年從英國到德國進入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研究，據羅家倫說傅斯年到德國後，受到柏林大學當時兩種學術風氣的影響，（一種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都是震動一切的學說；一種是德國歷來以此著名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另外傅斯年亦受到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⁴⁰。

又傅斯年治學強調要「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觀點，他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便說：

³⁹ 蘭克的史學思想主要是受近代科學的方法和十五、六世紀以來的 Philology 的發展影響。Philology 簡單地說相當於中國的所謂訓詁、考據。亦即是文字、語言的考證學，這一方面簡要的討論，可參見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錄在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頁 249-250。對於蘭克史學扼要的討論，可參見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2），頁 56-65。

⁴⁰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再版），頁 21-22。

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鈎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賴克莫母森之著史立點。⁴¹

此處傅斯年舉出的「賴克」（即蘭克），可見他對蘭克史學的注意。⁴²故綜合羅家倫的觀察，以及〈《史料與史學》發刊詞〉所言，因為傅斯年與陳寅恪 1920 年待初期同在德國留學，而蘭克的史學是當時歐洲（德國）史學極具影響力的學術思潮，是以必然在兩人學術思想的形塑過程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同時陳寅恪的史學認知應該也相當程度地影響著傅斯年。故兩人在史學思想上的同構，自然引發陳寅恪是傅斯年心中要實踐他的新學術之路的重要旗手之一。

其實遠在德國時，陳寅恪與傅斯年的相處，似乎就對傅斯年的治學方向造成某種改變，傅斯年在柏林最後一、兩年，我們發現他的注意力逐漸從原本的物理學轉到比較語言學方面。從傅斯年、陳寅恪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一些相彷彿

⁴¹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 356。

⁴²蘭克史學是於十九世紀初葉西方史學運動的狂潮中，開創了語文考證學派，從語言文字入手，追尋史料形成的來源，批評史料的可信的程度，以期呈現往事的真相；當事人與最接近事件的目擊者所提的，最為珍貴；案牘、古物一類的原始史料，變成歷史的瑰寶。在當時，這是極富科學精神的新史學。從而效法之者如風起雲湧。而傅斯年在德國當受到這一史學思潮影響，他所開創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很明顯地在學術取向上與蘭克史學有關，參見杜維運，〈傅孟真與中國新史學〉，《當代》，第 116 期，1995 年 12 月 1 日，頁 58-59。

之處。在傅斯年的遺物中有一藏文筆記本，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授課教授相同，足見他們可能上過同一教師的課程。陳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師呂德斯⁴³（Lüders），而在傅斯年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所授的課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當時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陳寅恪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學者便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從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可以判斷，他當時開始大量購買這一方面的書籍。⁴⁴

而陳寅恪治史能夠以比較語言學的考證方法為之，此正是傅斯年所欲追求的研究取徑；而另一方面在史料詮釋上，正如余英時提及陳寅恪很能發揮「詮釋」史料、「點活材料」的史學精神⁴⁵，而傅斯年在〈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文中「點活材料」的

⁴³ 陳寅恪曾說：「昔年德意志人於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得施教授 Prof. Henrich Lüders 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寅恪嘗遊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參見陳寅恪，〈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07。

⁴⁴ 王汎森，〈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所收藏的一批書信〉，《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系譜》，頁 518-519。

⁴⁵ 嚴耕望在評論近代中國著名的「史家二陳」：陳垣與陳寅恪時，論及史學考證之術有述證與辨證兩類別、兩層次。述證的論著只要歷舉具體史料，加以貫穿，使史事真相適當的顯露出來。此法最重史料蒐集之詳贍，與史料比次之縝密，再加以精心組織，能於紛繁中見其條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結論。辨證的論著，重在運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達成自己所透視所理解的新結論。此種論文較深刻，亦較難寫。而陳垣近於述證，陳寅恪側重辨證。陳寅恪的歷史考

詮釋方法，是頗受到胡適的稱許。傅斯年在柏林時曾與陳寅恪討論「古史辨」，每周數次，或受其影響⁴⁶。而實際上傅斯年以為古代著作觀念與今不同，「偽」的觀念實不適用，這種看法很可能在留德時曾與陳寅恪討論過。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上冊審查報告〉文中說「馮君之書，其用材料，亦具通識，認為偽材料應另作詮釋，還原其真」，此語與傅斯年後來的〈戰國文籍中之偏式書體——一個短記〉一文相較，可知兩者在史料辨偽態度上是同其精神地。而另外如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辯證》不是訓詁學的研究，而是思想史研究，特別是語言學和歷史學配合起來研究思想史。這一類運用語言學及歷史學結合的歷史研究，陳寅恪也擅勝場，他有幾篇文章談「格義」的文章，就是先把名詞訓詁的意義確定，再講文獻的哲學意義和歷史脈絡。如關於六祖「傳法偈」問題，經陳寅恪分析偈文內容后，發現漏洞百出，就是使用語言學和歷史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而此種方法與傅斯年的相通處，極有可能是兩人早在柏林多年彼此互相影響的結果⁴⁷。

證往往分析入微，證成新解，故其文勝處往往光輝燦然，令人嘆不可及，參見嚴耕望，〈史學二陳〉，收錄在氏著，《治史答問》（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 三版），頁 85-86。嚴耕望所論適與余英時見解相合。

⁴⁶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頁 42。

⁴⁷ 余英時，〈學術思想史的創建及流變〉，收錄在氏著，《余英時文集（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368-369。然眾所周知，傅斯年在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提出「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同志！」、「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見氏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 266。傅斯年所言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看法，主張史學研究工作在自覺的層面上是要反對疏通、解釋的工作，直接讓史料去講話，證明歷史，然而在實際的史學作品上，則是很難擺脫史學的解釋這一層面，如在傅斯年的《性命古訓

而陳寅恪剛回國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時，他所作的史學研究正是「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東方學研究，此正是歐洲「東方學」如日中天之際，大師輩出的時代⁴⁸，而眾所週知，傅斯年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烈⁴⁹，此時傅斯年也正好希望將原本居於領先地位的歐洲東方學重新取回，使得「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⁵⁰，而歐洲的東方學正是傅斯年心中新學術的典範，故這亦是兩人契合之處，從中可看出傅斯年與陳寅恪在學術理念上的相合之處，爾後透過陳寅恪進入中研院史語所，無形之中又將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帶入史語所中，與傅斯年原有的學術主張交融為一。

考古學的挖掘一般皆注意中研院史語所安陽殷墟的挖掘，這也是史語所重要的歷史貢獻，但是近代中國真正第一次的科學

辨證》一書而言，據許冠三指出此書「簡直可說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釋字與疏義各卷前後竟判若出諸二人之手。在上卷，『二重證據法』與語言門徑的配合，幾乎到了天衣無縫的地位。通過數量空前的各類材料的歸納與對比，他非但充分發揮了客觀比較法的科學效用，證明了『性』『命』二字的原訓及含義的初步演變，而且不辨自明地顯示了語言門徑的卓越性能。可是中、下兩卷，通常只見大段大段的疏解和議論，他似乎已完全忘卻了〈旨趣〉所標榜的『證而不疏』原則」，見氏著，《新史學九十年》（台北：唐山出版社，1987），上冊，第七章〈傅斯年：史學本是史料學〉，頁226。所以在史學理論層面上，主張實證主義的傅斯年，實際上在史學的實踐上，仍與陳寅恪一樣是「實證」與「詮釋」互用，不過他們仍是堅持在基本的史料考證上，必須盡量做到科學的「實證」，這仍是他們治學的重要精神。

⁴⁸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320-323、325。

⁴⁹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系譜》，頁506-509。

⁵⁰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266。

考古挖掘其實是由清華國學研究院發其先聲⁵¹，就這一點而言，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史語所在學術史上是有某種傳承，而連繫這種傳承的關鍵人物正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李濟。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當時已具備現代的史學精神，1925年11月12日舉行的該院第三次教務會議，由吳宓主持，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和李濟出席，議決國學研究院發展計畫如下：設古物史料陳列室，舉行外出考察，派遣教授赴新發現古物之地，觀察古物出土時的實在情形，或調查某地之方言語音等，及與外界協同進行考古事業。會中吳宓報告說：「美人畢世博（C.W.Bishop）願與本校合作，赴中國各地發掘古物，本校出人才，而經費全由畢君擔負」，對此大家同意與之合作⁵²。在1925年6月24日研究院的舉行第十二次教務會議，討論設立考古學陳列室問題，考古學陳列室之設，為研究院創辦之初計畫中的一項，討論中大家認為：「欲研究吾國古代之文明，人類進化之程序，典籍以外，猶必資藉于實物及遺跡之考察也」，會中並且議決陳列室由研究院與歷史學系合作，由兩部教授共組一考古學室委員會，推李濟為主席，每年經費預算約六七千，議定進行之方針有三：（一）購買拓片，此為陳列室入手之第一步辦法，現已購得約五百餘種；（二）規定考察公費，遇有古物出土，立即派員前往考查；（三）進行實地徵集⁵³。基於這些相關政策，李濟則進行實地的考古挖掘工作，並分別寫成了〈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1927年）、〈西陰村史前遺址

⁵¹ 陳洪波，《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1928-192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70-84。

⁵²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收錄在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第一輯，頁291。

⁵³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清華漢學研究》，第一輯，頁302。

的發掘〉（1927）、〈西陰村史前的遺存〉（1927），尤其是〈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是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成功田野考古工作的初步總結，發掘是由李濟與袁復禮 1926 年冬在山西夏縣進行，報告曾作為清華學校研究院的叢書第三種於 1927 年出版。

李濟在西陰村的考古方法是使用「皮蔥」發掘、「三角測量」及深具意義的「層疊記載」法，這是至為現代的科學考古學概念⁵⁴，在李濟心目中所使用的考古學方法必須一、從地質學上研究；二、從古生物學上研究；三、Typology（類型學或標型學）等層面來斷定古物的年代⁵⁵，這些考古學的知識、方法在當時中國學術界確屬首創，而這實際上就是傅斯年在〈旨趣〉一文中所要的新的研究工具，並據以得到擴充史料的目的。

李濟在 1928 年〈中國最新發現之新史料〉中強調：「就歷史這門學問的立場而論，不與古董客一樣，材料不在完整大個，大小是同等價值的」⁵⁶，其實李濟考古學所建立的新史料觀念，正是與傅斯年在〈旨趣〉一文表達對侷限於紙上的文字史料的不滿同其精神，故傅斯年主張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他提到「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所以要無限擴大史料，範圍廣及「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皆在蒐羅之列，故「近代史學所達到

⁵⁴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 33-79。

⁵⁵ 李濟，〈考古學〉，《李濟與清華》，頁 88-90。

⁵⁶ 李濟，〈中國最近發現之新史料〉，《李濟與清華》，頁 95。

的範圍，自地質學以至目前新聞紙」⁵⁷，這是傳統史學未達到的高度。杜正勝指出傅斯年看出李濟兼具有「我所能而歐洲人所不能，和歐洲人所能亦能之」的本事，李濟的史學觀點則與傅斯年非常接近，而從現有的檔案中分析，史語所創所的四巨頭中，學術觀點和發展策略與傅斯年最契合者，恐要推李濟。⁵⁸

因為傅斯年推動殷墟調查發掘之初，雖是滿腹雄心壯志地想要找尋新史料，但是就實際的考古學研究方法而言，傅斯年似乎是沒有什麼經驗的，所以他聘請了發掘過西陰村遺址的李濟來總持其事，這個決定對中國考古學後來的發展，可以說是具有相當的關鍵性，因為李濟把殷墟發掘領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國考古學帶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這個方向，就是以層位學和類型學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正是這些新的研究方法，原本當史語所在決定考古組主任產生經過時，所中提名二人，一是著名的北京大學金石學教授馬衡；一位即是年輕而具有近代考古學知識和挖掘經驗的歸國留學學者李濟，然而傅斯年設立史語所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學術，而非找聞名的老教授來裝點門面，故李濟的考古學對傅斯年而言，則是一項全新的治史工具和知識，而考古方法及其所得地下材料則完全符合傅斯年〈旨趣〉一文中屢次提及的治史新工具和擴張材料的史學思想，故傅斯年最後選擇與他原無淵源的年輕李濟擔任考古組主任⁵⁹，雖然傅斯年在實

⁵⁷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253。

⁵⁸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上冊，頁30；以及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李濟〉，收錄在氏著，《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2004），頁174-215。

⁵⁹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上冊，頁28-30。

際的田野考古工作上並無經驗，但他對考古學的認識及其在史料觀上帶來的新視野是有所認識的，這點與李濟的學術精神相同。

如傅斯年 1929 年在〈考古學的新方法〉一文中，提及：

中國人考古的舊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之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國人以世界文化眼光觀察，以人類文化做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⁶⁰

不迷戀文字的史料，重點是「得整個的文化意義」為研究目的，這種史料學上的革命，誠然超越中國的金石學傳統，以及中國傳統史學家的治學思維，就連最具有現代西方科學治學精神的王國維，雖然他的「二重證據法」已有突破性的發展，但終究在史料觀念上，仍不及傅斯年與李濟的觀點更全面性。

李濟畢竟在西方受過完整現代學術訓練的學者，他是一位具有強烈史學傾向的考古歷史學家，考古學對李濟而言，是研究歷史的工具，如他之所以選擇挖掘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實際上是要為尋找傳說中的夏朝文化的歷史證據⁶¹，或許這是受

⁶⁰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 293。

⁶¹李濟，〈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李濟與清華》，頁 29-30。又戴家祥致李光謨的函中（1989 年 2 月 27 日）中寫到「李老師首先說明，選擇山西為工作對象的動機，是《史記》上講到：『堯都蒲坂，舜都安邑』，這些行政名城都在山西」，這些已大致說明挖掘山西的史學研究上的考量，請參見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一書中戴家祥「致李光謨」函，頁 170；而在李濟挖掘山西西陰村前，

到王國維殷商史的考證的啓發影響所致。觀諸《西陰村史前遺存》考古報告，李濟記載了挖掘的經過、儲積的內容、遺存的大概情形、陶片、帶彩的陶片、石器等内容，這些都不是傳統中國史學家所認知的史料，然這些都成爲李濟歷史研究中的新史料。1925年王國維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中列舉的新史料是：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之書及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等都是文字史料⁶²，這些當然已經對中國傳統學人心中的史料觀有所創新，而1928年李濟的〈中國最近發現之新史料〉中所列舉的新史料則是以他在西陰村所挖出的瓦器、骨、陶片、蠶繭等實物，而基本上並不是文字史料⁶³，是以1929年李濟就說「現代考古家，對於一切挖掘，都是求一個全體的知識⁶⁴」，這更是史料學思想意識上的更大進步。

而傅斯年的「得整個的文化意義」與李濟的「求一個全體的知識」，在學術精神上是同條共貫地，是以李濟後來就順理成

曾經與地質學家袁復禮先在汾河流域（臨汾以南），先做一次普通調查，之後再做進一步發掘的決定。考察之後，李濟寫了此行的隨筆式文章，其中就紀錄了「22日到夏縣。傳說的夏朝王都。據傳大禹廟及禹王后裔和許多大臣陵墓都在這裡，當地稱夏后氏陵，...不過說實在的，從外表判斷，我根本無法肯定這些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這些都能指出李濟挖掘西陰村是為研究夏朝歷史的目的，參見李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李濟與清華》，頁26；李光謨，〈晉南之旅和西陰村遺址的發現〉，收錄在氏著，《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88、91。

⁶²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上冊，頁175-180。

⁶³ 李濟，〈中國最近發現之新史料〉，《李濟與清華》，頁94-95。

⁶⁴ 李濟，〈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收錄在氏著，《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卷五，頁3。

章的加入中研院史語所擔任考古組的主任，後來並主持殷墟的挖掘。而李濟的加入史語所時，同時也將他原本在清華國學院中與其合作的美國佛利爾藝術館的經費支持帶入中研院之中。李濟在西陰村的史前遺址挖掘，在政治革命高潮的中國，雖未引起特別的注意，卻意外成就李濟個人的名聲－考古工作方法的現代化、研究興趣超越歷史時代而延伸到史前時代的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家。

佛利爾藝術館的館長知道李濟的事蹟後，通過畢士博表示希望會見李濟，並邀請李濟到華盛頓。1928年夏李濟到華盛頓與佛利爾藝術館洛奇（John E.Lodge）館長愉快會面。交談後他答應繼續支持中國學術機構與佛利爾藝術館之間在任何考古新項目方面進一步合作⁶⁵。故李濟進入史語所之後，佛利爾藝術館因著李濟的關係，仍繼續支持史語所的殷墟發掘，而中研院只需負擔李濟其名義上的責任，是以在傅斯年1928年11月7日給楊銓的函中提及李濟與佛利爾藝術館畢士博的合作計畫時說：「這樣辦下去，考古學一組必可大發達，歸光于中央研究院也。Bishop 關係實已無條件之資助，亦佳事也。⁶⁶」，當然畢士博（Bishop）的「無條件之資助」最關鍵的因素其實就是李濟，因此殷墟的第二、第三次挖掘經費大都由佛利爾藝術館提供，對於現代中國科學的考古學貢獻很大⁶⁷。李濟在清華國學院中所播種的考古學種

⁶⁵ 李濟，《安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48-49。

⁶⁶ 參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第一卷，〈傅斯年致楊銓〉函，1928年11月7日，頁164-166。

⁶⁷ 中研院史語所與佛利爾藝術館雙方後來之所以中止合作，主要是佛利爾藝術館目標是收集中國古代藝術品，與史語所的工作旨趣大相逕庭，而畢士博對李

子（山西西陰村史前的挖掘），後來緣於他與史語所傅斯年學術理念的一致，是以這一種子後來在中研院史語所成長茁壯為學術成績斐然的河南殷墟挖掘，李濟與傅斯年的學術合作，更讓中國古代史的歷史面貌全然改變，其對中國史學界的貢獻無與倫比，可以說傅斯年史語所的學術理念是由清華國學院的李濟來加以實踐。

而傅斯年在〈旨趣〉一文中批評了章太炎，說他的《文始》是開倒車，他的《新方言》是「東西南北的猜去」，而傅斯年提出「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⁶⁸，然而中國傳統的樸學小學是語文學，只顧書本上的資料，遇到活的語言和方言，一則不會描寫，二則不知道怎樣去利用，史語所帶頭的新語言學則要把活的漢語方言資料和文獻上的資料結合在一起運用，因此成就始能超過清代乾嘉之學，在國際上可以和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並駕齊驅⁶⁹。是故從〈旨趣〉一文可知傅斯年心中的語言學研究，不是章太炎式的只限於書本上資料的文獻學研究，而是要擴張研究的材料和新的研究工具，因為傅斯年眼中語言學的典範學者高本漢，正是因著活的方言資料的調查及研究工具，而

濟和傅斯年在合作中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也頗為憤怒，之後李濟就辭去佛利爾藝術館駐中國考古隊的職務，參考岱峻，《李濟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頁 81-82。

⁶⁸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 255-256；266。

⁶⁹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所著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是綜合西方語言學、方音研究的方法和中國傳統等韻之學，對於漢語史的重建和奠基的工作影響深遠，這部份論述，可參見，馬悅然著，李之義譯，《我的老師高本漢》（長春：吉林出版公司，2009），頁 183-238。而趙元任曾與李方桂、羅常培合力翻譯此書為中文。趙元任也深受高本漢的語言學研究之影響。

對中國傳統語文學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而史語所這種新語言學研究的實踐，其開端仍來自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資源趙元任，1928年史語所成立那年，趙元任發表了《現代吳語的研究》。《現代吳語的研究》的出版在中國語言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這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五四運動前後，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輸入中國以後，趙元任這本著作的實踐，奠定語言學發展的基礎，畢竟以往漢語研究曾經在較長的時間內，無法擺脫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老是在「考本字」、「探語源」的天地裡打轉，而趙元任引進現代語言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把漢語研究工作推上科學化的新道路。在清華國學院第一年時，趙元任開設「方言學」、「普通語言學」、「音韻學」等課程，並且指導學員進行專題研究範圍是「中國音韻學」、「中國樂譜樂調」、「中國現代方言」，而1927年起趙元任主持以清華國學研究院為名義的吳語方言調查，並在1928年編寫出《現代吳語的研究》，趙元任這種新的語言學研究，自然是傅斯年所要的新的研究工具，並得以據此擴大史料的範圍。

是以趙元任1928年8月在上海會見了傅斯年和康乃爾大學老同事楊杏佛，並與他們多次商討中研院史語所建立語言組事宜，趙元任後來接受中研院史語所聘請，主持語言組的工作，他認為語言學是他的最大的興趣，史語所語言組的工作將是他畢生的事業，此後到中研院史語所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兩廣（粵語）方言調查⁷⁰。趙元任所從事的語言學研究，實際上正是傅斯年〈工

⁷⁰ 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133、146-150、155。

作之旨趣〉一文中所欲超出中國傳統的樸學小學，而趙元任師法高本漢的新的語言學則為中國帶進新的學術知識和研究方法，進而可以實踐傅斯年新的史學思想。



第四節 結語

近代中國在甲骨學上繼「甲骨四堂」：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之後，胡厚宣堪稱是甲骨學的大家，他是北大歷史系出身，對於當時 1930 年起在北大求學過程學風的回憶，於了解當時的學術狀況很有幫助。胡厚宣回憶那時北大史學系主任是章太炎的學生朱希祖，後來是陳受頤，其間曾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而當時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語所剛由廣州遷到北京，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請所內研究員、專家來北大兼課。如傅斯年開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從上古史選擇一些重要問題來做研究；李濟、梁思永兩先生合開考古學、人類學導論；董作賓開甲骨文字研究，董去安陽殷墟，則由唐蘭代課；徐中舒開殷周史料考訂。胡厚宣都去聽這些課程，胡厚宣認為他們講課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就是發揮王國維的「古史二重證據法」思想，要用地下發現的新史料來考證古史學。胡厚宣也接受這種思想，並用這種方法，寫作了論文，本科一年級就曾寫有《匈奴源流考》。由於王國維的影響和史語所發掘殷墟，「大龜四版」、「大龜七版」不斷發現，古文字之學大倡。甲骨文字頓時成爲一科熱門之學。那時在北大教甲骨文的教授有好幾位，常常幾門甲骨文課在中文、史學兩系同開。此外容庚在燕京，商承祚在師大，輔仁有于省吾，清華有吳其昌，北京圖書館有劉節，一流的學者，幾乎雲集北京，經常在中山公園水榭聚會，高年級的學生有時也參加，轟轟烈烈，盛極一時⁷¹。胡厚宣以他當年在北大求學的經

⁷¹ 胡厚宣，〈我和甲骨文〉，收錄在氏著，《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昆明：雲南

驗，說明當時傅斯年及曾由中研院來北大兼課的老師，大致上都遵循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來治學，相當程度反映當時中研院史語所的學風，而又透過這些老師在北大授課，延續著這種治學方法。

曾經歷當時中國 1920、30 年代學術界發展的錢穆，在進入當時中國學術界新漢學的主流後，復又離開主流，後來寫成的《師友雜憶》中，有段對中國當代學術思潮的感受，很能呈現一個時代的重要歷史圖像。他以爲：

孟真所主，…其以歷史語言二者兼舉，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無此根據。即在西方，亦僅德國某一派之主張。大體言之，西方史學並不同持此觀念。其在中國，尤屬創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語所，其時尚僅有地下發掘與龜甲研究兩門，皆確然示人以新觀念，新路向。⁷²

依據錢穆的觀察，傅斯年的史語所著重在語言與歷史的結合，係一不同於中國傳統學術風氣的新學術之路，錢穆說傅斯年受到德國某一派之主張，當指德國的蘭克史學。然傅斯年這一主張，據〈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最後的呼籲：「我們

人民出版社，2005），頁 111。胡厚宣這段回憶，提到傅斯年曾兼任北大史學系系主任，略有錯誤，其餘文中提及中研院史語所研究人員在北大兼課、授課狀況是正確的。又史語所與北大史學系的關係，透過傅斯年有著重要的影響，相關的討論請參見，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31-32、183-199。

⁷²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146。

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⁷³，就是因為當時在傅斯年心中的漢學正統是在巴黎⁷⁴，故傅斯年史語所的學術典範，主要是以歐洲的漢學、東方學（法國巴黎當時則是其中心）為其師法的對象。王國維的龜甲甲骨文的研究、陳寅恪的比較語文考證學、李濟的地下發掘考古學、趙元任的西方新語言學的工具，都具有西方（歐洲）東方學、漢學的風格，故也都成為傅斯年史語所所要汲取建構其學術傳統的史學核心組成。

從前文的分析論述中，希望大致上將清華國學研究院與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傳統建立之關係，有較清楚的釐清。

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大致上以王國維的影響最為巨大，而實際上王國維的學術風格、治學取向是當時新派（新漢學派）學者所欣賞的，1922年8月22日胡適的日記表露了某些在1920年代之初，中國學術思潮風向轉變的訊息，在當天的日記，胡適記下：

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只有王

⁷³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266。

⁷⁴ 1929年2月在〈傅斯年致陳垣〉函中，傅斯年提及：「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並漢地之歷史言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參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頁190。

國維最有希望。⁷⁵

實際上二十世紀中國新派的代表學者胡適、傅斯年、顧頡剛都曾在學術上受到章太炎的深刻影響，然而他們終究在章太炎的啓蒙基礎上超越章太炎的藩籬，而另創自己的學術取徑⁷⁶。是以在 1920 年代之初，當「整理國故」的運動已然形成當時中國學術界的風潮，各地國學研究機構紛紛成立，而胡適所在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更是這一運動的大本營，1923 年胡適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則是這一運動的正式宣言。

然而北大國學門實際上仍在章太炎學派的籠罩下，主其事者仍是章門弟子，胡適在北大與章門弟子在學術上必然要作相當的妥協，然他已然在 1922 年之際就對晚清民初以來的，當時國學界的最高權威章太炎有所不滿，而轉向心儀王國維的新學術風格。惟章太炎終究是晚清以來最具有活力、最激進的學術思潮，章氏雖然仍屬於經學家，但他的「六經歷史文獻化」是讓整個傳統經學與現代史學的過渡點⁷⁷，所以章太炎對中國學術的現代化是作出重要的貢獻，而章門弟子於此學術傳統下帶領著北大國學門在現代學術上建樹也頗多，然而當時中國學的研究，在歐洲的漢學家、東方學家手中發展得太快了，高本漢、伯希和都對中國

⁷⁵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四冊，1922 年 8 月 28 日條，頁 734。

⁷⁶ 關於章太炎對胡適、傅斯年和顧頡剛的影響，可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2 初版二刷），頁 213-217。

⁷⁷ 關於章太炎的「六經歷史文獻化」，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頁 189-199。

胡適、傅斯年這些新派的學者產生重大的衝擊和影響，步歐洲之後的日本京都漢學家隨後跟上，《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及歐美日本學術界的成績可以供我們參考，這其實已標誌了他們新的學術天平標準就是西方的漢學、東方學研究⁷⁸。於是在當時胡適這位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學者眼光中，也只有王國維代表當時中國學術界與世界（歐洲、日本）的漢學、東方學的水準最為接近，並能與之接軌的少數中國學人之一，此時的章太炎、章門弟子已經追不到當時世界研究中國的學術腳步，胡適無能為力在當時北大國學門使得北大跟上當時歐洲漢學、東方學的水準，但是稍後1926年回到中國的胡適另一大弟子傅斯年，就眼光精準的看到王國維，並稱讚在「慚中土之搖落」之際，惟獨王國維與陳垣是可與國際東方學、漢學並駕齊驅的中國學者，所謂「幸中國遺訓不絕，經典猶在，靜庵先生馳譽海東於前，先生（案：指陳垣）鷹揚河朔於後⁷⁹」。

是以傅斯年稱許王國維的學術取徑，也能對幾位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們所形塑的學風，放在當時世界研究中國學術領域的意義和地位了然於心，於是當他能作主建構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時，他就全面擺脫章太炎某些過時的學術取徑，將清華國學院所存的三位導師（講師）及清華的學風帶入史語所，實踐他的史學理念。傅斯年當時心中中國學術研究的典範大致上是以當時西方漢學、東方學家高本漢和伯希和為典範的⁸⁰，這在他留學歐

⁷⁸ 或再加上日本的漢學，惟傅斯年因文化民族主義的關係，甚少提及日本漢學。

⁷⁹ 參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傅斯年致陳垣〉函，1929年2月，頁190。

⁸⁰ 羅家倫曾說傅斯年「他對於外國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中最佩服的只有兩個

洲德國最後階段（1925 年到 1926 年）時，就轉向比較語言學可以看出端倪，此時他開始購買有關梵文、藏文、緬甸文等方面的書，甚至有西洋研究中國語言音韻方面的書，尤其大量購買高本漢的著作⁸¹。是以當他要在中國成立新的學術機構史語所時，就如同顧頡剛的觀察「傅在歐久，甚欲步歐洲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⁸²」，而放眼當時 1928 年的中國學術圈，也只有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們，如陳寅恪具有歐洲東方學掌握多語文工具的研究方法及最能繼承王國維的學術精神⁸³、李濟的考古學和趙元任語言學新的學科知識研究工具能擴張史料，這些研究取徑正是符合傅斯年新學術之路所要的學術憑藉。是以這批清華指標性的導師進入新成立的史語所，也為這新的學術機構學風提供最重形塑的學術動力。

人，...一個是瑞典的高本漢，講中國語音學的專家；一個是法國的伯希和，講中國唐史、中央亞細亞研究的專家。這兩個人對於中國學問的科學性的造詣，給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見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錄在王為松編，《傅斯年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 11。

⁸¹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系譜》，頁 490。

⁸²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店，2011），頁 171。

⁸³ 在清華時期，陳寅恪與王國維最為相知相惜，這在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已可看出，參見氏著，〈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9-220。所以王國維的學風不僅影響清華學子，連清華導師陳寅恪身上亦相當程度濡染發展王國維的學術精神，這一點日本漢學家倉石武四郎與羅振玉的觀察或可補充說明。1930 年代倉石武四郎在中國留學時，曾對見過面的陳寅恪有段記載：「陳氏論如利刃斷亂麻，不愧靜庵先生後起矣。」，見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1930 年 5 月 27 日條日記，頁 153；又羅振玉稱陳寅恪為「忠慤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見〈羅雪堂先生寄陳寅恪書〉，《國學論叢》，第 1 卷第 3 期，1928 年，頁 239。

究實而言，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傅斯年史學思想有兩個最重要核心因素在精神上同構，一是對史料的態度，這牽涉到對當時顧頡剛疑古學派的史學思想的質疑，從前文分析中可知，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國維、陳寅恪皆反對疑古學派的史學思想，此與轉變後的傅斯年對疑古學派的批判，從而重視擴張史料去重建歷史事實，在精神上是一致地，另外傅斯年提倡應用各種新的科學研究工具治史，正好由李濟的考古學和趙元任的語言學充分提供傅斯年史學理論實踐的操作典範，而在治史概念的直接影響上，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及「多元古史觀」更是對傅斯年有著直接影響，當然傅斯年也在王國維所奠定的基礎上，更推陳出新的更上一層了。

傅斯年所創建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術傳統，其來源當然是多元的，絕非只是侷限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觀點之中，傅斯年早年與胡適、顧頡剛的學術互動密切，自然影響著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形成，而傅斯年從較早的疑古立場，到後來轉變為積極重建中國古代的信史，最後建立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要的一個挑戰是來自於顧頡剛疑古史學的挑戰，以及王國維論著的某些影響。傅斯年質疑疑古學派，畢竟只是消極層面，在積極層面傅斯年則發展出要用更多的史料去重建歷史事實，而傅斯年在歐洲留學之際，受到德國蘭克史學解讀國家檔案及莫母森（Theodor Mommsen）以考釋古羅馬碑銘之影響，而使傅斯年提倡利用新的材料⁸⁴，以及新的科學治史工具，這些自然也是傅斯

⁸⁴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第 116 期，頁 10-29。

年之所以形成他史學革命思想的西方學術資源，但要具體實現他的史學革命，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人才正好與傅斯年結合而推動了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這一史學革命運動。

傅斯年是難得的學術人才，在學術上屢有創見，且有開創性，早年從受顧頡剛、胡適影響原是屬於「疑古的傅斯年」，後來轉向「重建的傅斯年」，而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誕生，就是為實現他的史學思想及理想而設，而史語所的史學研究方向、意義可以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具體得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史料觀，及其運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治史允為史語所最核心理念。然而傅斯年深刻體會到現代的史學研究工作是「集眾事業」，故儘管傅斯年再有著多大的超人才華，倘若集眾的研究團隊未能就定位，僅憑傅斯年個人的單打獨鬥，也恐怕難以具體實踐他的史學理想，最後具體幫助傅斯年去完成這一史學革命的最核心成員，就是來自於同時期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學者，因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諸位導師的史學精神，正是影響（如王國維、梁啟超）或提供（如陳寅恪、李濟、趙元任）傅斯年史語所史學革命的思想資源，這亦是何以史語所成立不久則從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人員為主體，轉變為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幾位導師為主體的原因。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在給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的信中提及：

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係。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鬥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清

華的台，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
狼狽為善，（狼狽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⁸⁵

而這一「狼狽為善」的結果，從史學史和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清華國學研究院雖然在 1929 年，有形制度上的學術機構已不復存在，但無形的學術精神，仍然隨著這些清華導師，在當時中國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語所史學研究傳統之建構中，作出他們獨特的歷史貢獻。



⁸⁵ 參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傅斯年致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函，1928年10月6日，頁153。

第五章 清華國學研究院學風之延續：以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及姜亮夫為例

清華國學研究院對近代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在導師一輩中，自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典範意義，但是近五年的清華國學院所培養的七十多位學生，後來很多都在中國的文史學界居於領導的地位，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之前，北大先在 1922 年先成立了研究所國學門，然而精於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陳平原則指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名氣遠不如清華國學研究院，他認為從幾個方面可以看出來。一是北大的經費不如清華，老師大都是兼職地；二是同一時期的北大研究生參與新文化運動，先後辦了《新潮》、《國故》、《國民》刊物，主要是文化啓蒙，走向社會，參與實際政治，學術成績不大。而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刊物，一個是《實學月刊》，一個是《國學月報》，還有他們在《學衡》、《國學論叢》上常發表學術論文，北大的《國故月刊》辦起來，但被比下去，國學成績不如清華。¹

除學生輩外，當時北大主持研究所國學門的是沈兼士，基本上是以章太炎的門人為主體²，但沈兼士這些太炎門人在學術上，顯然無法與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相比的。重新於 2009

¹ 此據陳平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紀念清華學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討論會〉中發言，該研討論會紀要，刊在《博覽群書》，2005 年第 8 期，頁 4-17；陳平原發言，見頁 5。

² 有關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細緻精采的分析，請參考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年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就指出，沈兼士等太炎門人比起章太炎，有他們進步的一面，比如對白話文運動的推廣，對民俗文化的重視，都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合流，但是章太炎在國學研究上有他的限制，例如章太炎就很反對甲骨文研究³，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國維則是以甲骨文研究名震中外的權威。而清華國學研究院所走的就是當時歐洲和日本的漢學研究，當時胡適、陳垣都已很著急中國國學研究的落後⁴，而傅斯年成立史語所更是「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⁵，此正反映當時的東方學正統是在歐洲。

1925 級的周傳儒在自傳中就提及，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招生四班，前後七十餘人，其中十餘人皆列學術前茅。如徐中舒，擅長甲骨、鐘鼎學，在川大。謝國楨，擅長明清史，在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力，擅長音韻學，在北大。姜亮夫，擅長楚辭、古典文學及敦煌學，在杭大。王靜如，擅長西夏文，在社會科學院。高亨，擅長小學及周秦諸子，在山東大學。蔣天樞，擅長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在復旦大學。戴家祥，擅長契文金文學，在華東師大。朱芳圃，擅長甲骨考古之學，在河南師大，諸人皆屬中國史第一流學者⁶。當然國學院畢業生尚有諸多於中國學術界有重要貢獻的學者，未列其中。

³ 汪榮祖，《章康合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 18-20。

⁴ 陳來，〈新國學之路—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光明日報》，2009 年 10 月 26 日。

⁵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1980）第四冊，頁 266。

⁶ 周傳儒，〈自傳〉，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95-96。

是以本章節則選取國學院畢業學生中，在中國文史學術領域中貢獻卓著的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姜亮夫，及其他值得注意的清華國學院弟子，討論他們如何受到清華國學院導師的影響，及延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風。

第一節 徐中舒（1925 級）

王國維投湖自殺後，徐中舒在記念王的文字〈追憶王靜安先生〉中寫到「民國十四年秋，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成立，延先生講席，余遂決然前往就學，欲以償積年願見而無緣相見之大師焉。…時先生方講《古史新證》，以鐘鼎款識，及甲骨文字中之有關古代史跡者，疏通而證明之，使古史得有地下材料為之根據，此為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蓋取舊作《殷卜辭所見先王先公考》、《續考》、《殷周制度論》諸篇，增定而成。…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經學小學及考古學書籍。此類書籍，其價甚昂，多余在滬時所不能見者。余以研究考古學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⁷」

又徐中舒在 1987 年的〈我的學習之路〉中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年的學習中，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從王國維先生學習古文字，抄寫甲骨文、金文，並採用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將古文字材料與古代的文獻典籍相互印證，互相補充，運用於中國古代史的探索之中。〈從古書上所見的殷周民族〉一

⁷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68。

文，這是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畢業論文，也是我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開端。後來我在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時，便順著這個方向陸續寫出了〈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殷周文化之蠡測〉、〈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等一組文章，逐漸形成了自己對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套看法，同時徐中舒也說：「我在三十年代初根據殷墟的考古發掘資料寫出了〈再論小屯與仰韶〉一文，開始了利用考古資料並結合古代文獻來探索中國古史的嘗試，在此後半個多世紀裡，不斷湧現的新的考古資料成爲我研究中國古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根據，考古學知識也成爲我治史的必不可少的基礎知識了」⁸。

是以在徐中舒的孫子徐亮工所編著的〈徐中舒先生生平編年（未定稿）〉中寫著在1925年9月22日—26日，「研究院學生選定研究題目，…徐中舒《古文字學》。先生在這裡奠定了自己一生學業的基礎，尤其受王國維影響最鉅。⁹」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和利用考古資料是徐中舒治史的基本取徑。實際上徐中舒治學受到王國維與李濟的影響至深，有關王國維與徐中舒的師生關係，向來較爲人所熟悉，但卻比較忽略徐中舒治古史過程中，李濟現代的考古學同樣對徐中舒有著重要的影響。

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所講授的「古史新證」課程，可以說是他一生學術思想最爲成熟的時期，後來這些講授內容成

⁸ 徐中舒，〈我的學習之路〉，收錄在氏著，《先秦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07）中〈代前言〉，頁3。

⁹ 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編年（未定稿）〉，收錄在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主編，《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四川：巴蜀書社，1998），頁314-315。

書為《古史新證》，其中王國維所說的「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以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¹⁰，這種治學理念幾乎支配後來中國古史的研究取徑。徐中舒謹守著王國維這一「二重證據法」，但是卻又有超過王國維之處，因為王國維儘管在中國傳統經史舊學上功力深厚，同時也超越章太炎能夠積極看待地下新出的甲骨文史料和金文史料，但是王國維的認識仍有他的限制，因為他對於一門更先進的西方學術現代考古人類學，顯然是有隔閡地。

1929 年底，李濟主持了安陽小屯殷墟的第三次科學發掘，並寫成了〈小屯與仰韶〉文章¹¹，這篇文章討論了影響中國學術界甚鉅的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的仰韶文化與西亞的安諾（Anau）、特裏波列（Tripolye）彩陶係同出一源的這一學說，這學說自然牽涉到中國文化起源的民族主義問題。而徐中舒則在這一小屯殷墟的第三次科學發掘的基礎上，寫下了〈再論小屯與仰韶〉一文，文中除運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以甲骨文與文獻互證的方法外，同時徐中舒也特別提及李濟的第三次科學考掘所發掘的一片仰韶期的彩陶片，同時考察安特生以來的地下考古發掘實物，結合傳統文獻《左傳》、《史記》、《呂氏春秋》、《吳

¹⁰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3。

¹¹ 李濟，〈小屯與仰韶〉，收錄在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234-241。

越春秋》中夏朝的地望、生活習俗、文化特徵、民族遷徙，推定仰韶文化即是夏朝的文化，雖然徐中舒這一推論，在學術上是有被質疑的，但正如他在文中所說，「小屯與仰韶兩遺址的發掘，在中國考古方面才開始採用最近代的方法。所得的遺物雖然沒有像《毛公鼎》《齊侯罇》鑄刻著那樣典重的文章，可是在中國史方面曾加不少直接可靠的史料，確要以這兩次發掘為最重要」¹²。文章中已透顯著對現代考古學的重視。基本上徐中舒的學術精神是融和著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和李濟的現代「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意義確實是具革命性地，但也有其限制，亦即是侷限在將地下史料（主要是指甲骨文的文字史料）與古代文獻相對證的方法，如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新學問〉中指出「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¹³，從中可知王國維的思想意識中，「新學問」仍著重在文字的史料中。而這一史料觀在另一位近代中國史學的開創者傅斯年思想中，顯然是有所不足地。

如傅斯年即曾經在〈「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對於董作賓、

¹² 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上冊，頁145-181，引文見頁180。

¹³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新學問〉，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上冊，頁175。

李濟等人的殷墟發掘多所稱讚，如考掘中提出具意義的問題，如河道與殷墟的問題，甲骨之地下情形由於沖勢，商代曆法之設想，卜辭工具之舉例，一個字體之「發生式」的演化問題等皆是，而文中傅斯年並說「殷代刻文雖在國維君手中有那麼大的成績，而對待殷墟之整個，這還算是第一次」¹⁴，而另在〈考古學的新方法〉中雖然稱讚王國維將甲骨文應用在歷史方面，如對帝系文字，如王恆王亥，原為史記上所無，現在把他補正；又如商代世系表上外丙之外字係訛誤，也把他訂正了，但是傅斯年也說我們的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法整理，雖有發展和成績，但若用安特生近代西洋考古方法研究，所得自然不只如此。故傅斯年批評：

中國人考古的舊方法，都是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國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做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我們要從全部考古學研究起來，不能抱殘守缺，…我們要用全幅的精神，做全部的觀察，以整個的文化為對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陳規考訂文字要□得多。¹⁵

這些可以看出傅斯年治史上，史料的理解與治史的學科工具都超過王國維，而正是傅斯年與李濟思想接近之處，所以傅斯年後來在史語所成立時就找李濟到所裡擔任考古組主任。

¹⁴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1980），第三冊，頁223-224。

¹⁵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289-298。

而李濟評論王國維時曾說過，「觀堂先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民國初年的一位權威學者，對於經學史學都有巨大的貢獻，尤其是將自北宋以來所提倡的考古學推進了一大步。不過，他對近代考古學雖能瞭解它的重要，卻感覺與他自己研究的範圍仍有些距離；所以他雖以利用新材料而對古文字學有若干極新穎的見解，對於古器物的處理，他以爲這一類的著錄仍應奉《博古圖》和《考古圖》爲準則」，李濟並回憶當年把西陰村發掘所得的陶片與石器等，在清華作一次公開展覽講演時，王國維曾到場參觀，摩娑撫弄，詳細揣測並討論它的可能用途，更與形式類似的銅器比較。這曾給李濟很深的印象，但是王國維就停止在這一階段¹⁶，完全沒有進入現代考古學的「層位學」、「類型學」的階段¹⁷，王國維的古史觀念仍著重於宋代以來的金石學《宣和博古圖》，然而李濟在〈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中，可以看出他對《宣和博古圖》和《考古圖》等宋代以來的金石學，在現代史學研究上的不足之認識¹⁸。

不過後來李濟雖然認爲王國維對於現代考古學的認識有其

¹⁶ 李濟，〈關於王國維的兩點評論〉，收錄在李光謨、李寧編，《李濟學術隨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207。

¹⁷ 實際上王國維的學術思維仍停留在宋代以來的金石學範圍，他對《宣和博古圖》和《考古圖》的史料意義理解與現代考古學的知識相差甚遠，基本上，王國維仍在傳統的中國學術認知中，這點可參考，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收錄在氏著，《古史新證》（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頁 73-77。當年李濟從西陰村考古回來帶了些東西，王國維則跟李濟說你「這陶器分類不對，應該按《宣和博古圖》來分類，怎麼按層位、類型」，從這對話可知李濟與王國維治學上的差異。又見李濟，〈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收錄在李濟著，張光直主編，《李濟文集（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208。

¹⁸ 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頁 60-70。

侷限性，但是他也認為王國維應邀到清華國學院任教中國古文字課時（1925-1926年），他把講授的內容分「書本資料」和「地下資料」兩大部分。這充分說明了地質學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響到受傳統教育的學者¹⁹。

而徐中舒在〈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中，提及殷、周之際，我國民族之分佈，實在經過極劇烈的變遷，而史書言上古的事，雖屬傳說，然而立國建都之地，仍然可以考見。以此證史，固然文獻不足，但以此說明古代民族的分佈，則是絕佳的資料。而王國維稱殷以前帝王京宅，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於西土，其界劃至為明白。然徐中舒認為此東西兩土之民族，是否為同一民族，此問題在人類學地質學未有新發現以前，實不能加以證明。²⁰在此可以得知，徐中舒的以殷、周分屬兩民族的看法，顯然受到王國維在著名的〈殷周制度論〉中，以地理的觀點將殷、周加以東西二分的影響²¹。徐中舒文中鉤稽古典文獻如《世本》、《史記》、《左傳》、《竹書紀年》、《逸周書》等傳統史料的歷史證據，但他

¹⁹ 李濟，《安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57。

²⁰ 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冊，頁26；又此著名文章原是徐中舒在清華國學院的畢業專題論文改寫而成，1926年6月23日研究院辦公室公布「畢業生名單及成績等級表」和「畢業生成績一覽表」。在「畢業生名單及成績等級表」中有「徐中舒甲八」，在「畢業生成績一覽表」中有「徐中舒，殷周民族考、徐安淮夷群舒考」，據徐亮工言，本文始終未發表。文稿徐中舒一直珍藏在自已身邊，封面上有梁啟超本（6月9日親筆對該文的評語「從音訓及金文款識以貫穿傳注，精思獨闢、有左右逢源之樂」，參看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編年（未定稿）〉，《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316。

²¹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下冊，頁128-143。

也認知到古史有些問題「非紙上材料所能斷定」，要借助於「人類學地質學」的新發現，是以徐中舒在治史上雖普遍認為受到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啓發影響，但他同時也受李濟新的考古學知識的啓蒙，而形成學界甚至有稱爲「古史三重證」的治學典範，亦即是紙上文獻、地下所挖實物、考古人類學整體文化觀點這三重證據法的新史學取向。這點在徐中舒的〈再論小屯與仰韶〉、〈夏史初曙〉、〈古代狩獵圖像考〉、〈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²²等論文皆可看出徐中舒治史的這一趨向，而這一治學方法更是當時歐洲和日本漢學最先進的治學方法，徐中舒繼承融和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和李濟的治學所長。後來徐中舒任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期，也將他的學術見解影響著傅斯年，如1930年前引傅斯年寫成〈「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一文後，就交給徐中舒閱讀，徐對該文提出幾點補充，由傅斯年以「補記」的形式收入文內²³。

實際上，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對於中國古代史研究有巨大影響，他將殷周分爲崛起於東西兩地，已經隱含著對傳統中國觀念夏、商、周三代道統相承的觀念的質疑可能性，而徐中舒在清華國學院的畢業專題論文及以此爲題寫作，後來更改寫成的〈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更正式將殷、周視爲兩個民族，當時傅斯年〈夷夏東西說〉²⁴亦在此課題著力甚深，影響很大，這

²²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夏史初曙〉，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冊，頁225-293；下冊，頁1349-1354；〈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收錄在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頁129-172。

²³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傅斯年全集》第三冊，頁267-269。

²⁴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第三冊，頁86-157。

都是在王國維的多元古史觀的論說中。

徐中舒也承繼王國維的古文字之學，在他晚年回顧他文字的考釋方法，所寫的〈怎樣考釋古文字〉一文中，提及：

從前講《說文解字》的人，只講陳舊的六書條例，而從不在條例以外去尋找，所以很多字講不通。…因此考釋古文字，一個字講清楚了，還要聯繫一系列相關的字，考察其相互關係。同時還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產、生活狀況，根據考古資料、民俗學、社會學及歷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狀況，和現在一些文化落後的民族的生活狀況，來探索古代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根據這些東西，探索每個字的字源和語源。這樣考釋古文字，才有根據，也比較正確，而不是憑空懸想、望文生義。²⁵

文中徐中舒多所用甲骨文來考證古文字，也著重文字史料外的生活狀況（如思考到帶黃河流域普遍穴居或半穴居的生活等等），正可見於清華國學院期間受教於王國維古文字學「二重證據法」的治學路徑，且在方法上更臻一層，利用諸多相關學科知識輔助，考古資料的運用也不限於甲骨文的文字史料，而能著重李濟考古學的地下狀況的「整體觀點」思維，徐中舒能同時兼覽並收兩位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和李濟的學術精神，於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中持續發展這種清華國學院的學風。

而徐中舒 1930 年在陳寅恪的推薦下，進入中研院史語所，

²⁵徐中舒，〈怎樣考釋古文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下冊，頁 1434-1435。

而在史語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發表甚多論文，例如〈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耒耜考〉、〈陳侯四器考釋〉、〈古代灌溉工程起源考〉、〈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等，而這些論文與《集刊》上其他諸文屬同一風格，將歷史學的邊緣學科與交叉學科進行科際整合，大大發揚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²⁶，徐中舒可謂在清華國學院的畢業學生，進入中研院史語所的學者中，發揚清華學風最具代表性的。



²⁶ 唐嘉弘，〈從徐中舒的治學看史語所的學風〉，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311-314。

第二節 謝國楨（1926 級）

而清華國學院的畢業生，另一重要的學者謝國楨在〈自述〉中說：

在一九二五年夏天終於考取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承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諸位先生的教誨和指導，從事歷史研究，尤其是明清史和目錄學，得以稍入門徑。從這時起，直到今天，這是我五十多年來一直遵循的道路。²⁷

同時在〈我的治學經歷〉中說：

由於我讀過梁先生（按：指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及江藩《漢學師承記》，因之我曾研究過顧炎武、黃宗羲的學術思想。在這個基礎上，梁先生又給我講明末清初的遺事，我之所以喜歡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就導源於此。²⁸

謝國楨又說：「楨之所以略知史部薄錄之學，纂集《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變』，清初東南沿海遷界，江南園林建築，

²⁷謝國楨，〈自述〉，《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78。

²⁸謝國楨，〈我的治學經歷〉，收錄在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頁 262。

以及南明史跡，粗有輯著，皆由先生啓迪之也」²⁹，謝國楨的學術方向和治學方法受到梁啓超的影響外，生活事業上亦是如此，謝國楨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結業以後，就承梁啓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飲冰室去教他的子女，…並爲中華文化基金會請梁先生主編的《中國圖書大辭典》充當助手。從此以後，我走上了研究歷史科學的征途。」³⁰

而謝國楨一生學術成績，一般把他視爲明清史和版本、目錄學的專家³¹。而在版本目錄學上，謝國楨受梁啓超影響昭昭可見。在爲梁啓超而寫的《論七略別錄與七略》的跋文中，謝國楨寫到：

猶記先生草官書目錄時，楨嘗侍側與抄胥之役，楨未抄畢，而先生之新稿已出，每苦不能相給。既斯稿已畢，乃召楨賜所廢稿，而謂之曰：「此吾第一次之廢稿也，此吾第二次廢稿也；此稿本不足惜，惟可見治學之不易云爾」。於此可知先生治學之精審。³²

如此隨侍梁啓超旁抄錄梁啓超目錄學的稿本時，必然對謝國楨的學術精神有型塑的作用。又如 1927 年時，謝國楨已於清華國學院結業後，館於其師梁啓超的飲冰室，其本職在教梁啓超

²⁹ 謝國楨，〈梁啓超先生少年佚事〉，《明末清初的學風》，頁 260。

³⁰ 謝國楨，〈我的治學經歷〉，《明末清初的學風》，頁 261。

³¹ 有關謝國楨傳略，可以參考韋祖輝，〈皓首盡瘁，史壇垂芳——謝國楨先生傳略〉，《明史研究》，第二輯，1992 年 8 月 25 日，頁 18-26。

³² 謝國楨，〈《論七略別錄與七略》跋〉，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51。

子女讀書，但飲冰室豐富的藏書，給了謝國楨讀書很好的機會，於是就在 1928 年著手晚明史籍的蒐集。在他的《晚明史籍考》的〈自序〉中寫到：

楨之草斯輯也，蓋始於侍先師梁啟超先生飲冰室丈席，先生插架頗富，即于所藏叢書中求之，猶嫌以未足。先生乃介楨于海鹽朱希祖先生、東莞倫明先生，得窺其所藏。江安傅增湘先生並所藏晚明野史，以資閱覽。」之後梁啟超復入北平圖書館就職，「自服務于北平圖書館，命專理其事，俾成完書，館中所藏之書，得悉資批覽。³³

從中可知謝國楨受梁啟超影響提拔，而成爲一代重要的明清版本目錄學專家。

是以謝國楨於明清時期的《清開國史料考》、《晚明史籍考》、《清初開國史料四種》等目錄學著作都有名於學界³⁴。

而在謝國楨明清史的專門著作中，《顧寧人學譜》（1932 年，1957 年改稱顧亭林學譜）、《黃梨州學譜》（1932 年）、《孫夏峰、李二曲學譜》（1932 年）等書，在體例上就類似《明儒學案》，接

³³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中，〈自序〉，頁 32-33。

³⁴ 筆者在台灣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時的業師吳振漢教授，就曾告訴筆者有關謝國楨的學術評價問題，在此值得一提，對於理解謝國楨的學術精神很有助益。振漢師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時，即是著名的漢學學者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的學生，而牟復禮教授曾當面告知振漢師，在中國明清史的學術領域中，謝國楨在明清時期的文獻、版本、目錄學方面的造詣極為深厚。

近於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等學術史的著作；而在《清開國史料考》（1931年）、《晚明史籍考》（1932年）、《清初開國史料四種》（1933年）則基本上是對於史料廣泛的蒐集，如《晚明史籍考》輯錄除了有明一代史乘外，側重萬曆以來至崇禎亡後清廷大一統的野史裨乘，蒐羅廣博，資料翔實。然而謝國楨這一著重傳統中國史學較為忽略的野史筆記，在史料的自覺上，正是體現了其師梁啟超「新史學」的主張。

在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討論史料中，他認為中古及近代之小說，善於治史的人則可以從非事實中找出真的事實，因為書中會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以他對待史料的態度，非復限於傳統的正史、官方檔案，而必須廣及能蒐集史料的極限之中³⁵。而謝國楨這一史學取向在他的《明末清初的學風》、《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考》等論著中隨處可見，此與當時中國另一明清史大家孟森，適成強烈對比。

孟森治史向來偏重在正史的史料，但他也欣賞謝國楨《晚明史籍考》的編輯，孟森說《晚明史籍考》正是：「改正明史、補修南明史，並校訂清代國史館遠於事實之清史，胥於此是賴書名晚明史籍考」³⁶，而謝國楨蒐羅史料，正史、野史、庶民的社會經濟史料皆在他的史學視野中，如他寫的〈明季奴變考〉正是受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時期所著的《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階級下》中，討論遍及江南的奴變問題的影響³⁷，梁啟超在〈新

³⁵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95-96。

³⁶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一書中，孟森「序」，頁1。

³⁷ 謝國楨，〈明季奴變考〉，收錄在氏著，《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175-197，特別是頁175-176中談及受梁啟超著作的影響。

史學〉中批評中國舊有的史學病源，其中正有「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³⁸。所以謝國楨說：「讀正史外，還要從稗官野史中搜輯資料從事訂補考證」³⁹，而謝國楨的明清史的研究取向，正是注重「群體」的研究論著，所以在他早年時期 1928 年編輯晚明史籍時就已經說：「然則野史稗乘不幾可廢乎？曰野史稗乘安可廢耶！考證舊史，訂補正史，多賴稗乘。⁴⁰」，是以在對待史料擴充的觀點方面，以及他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如〈明季奴變考〉就著重群體庶民的面向，這些也都同時體現梁啟超新史學的精神。

謝國楨對於史料的態度，迥異於傳統考證的史學家如孟森，觀察二十世紀中國新的學術發展，往往決定於新的史料發現和新的史學研究視角，孟森的研究大體上皆在傳統的正史等相關的史料，且著眼點也大多是以政治史為主要的研究領域。然而謝國楨有多本史料學、目錄學工具書性質的編輯之作，向來也被認為是著名的各種版本書籍的蒐藏家，所採集的史料廣及正史及傳統史家所忽略的稗官野史、筆記小說，這正是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史料」的看法，而此也與傅斯年所提及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強調對各種史料必須一律平等且竭澤而漁的蒐集，在學術精神上是相同地，在本文第三章論及清華國學院的學術風格，對於史料的擴張是兼及新舊史料，是以謝國楨亦延續這樣的精神。

³⁸ 梁啟超，〈新史學〉，收錄在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5。

³⁹ 謝國楨，〈自述〉，《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82。

⁴⁰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中，〈自序〉，頁 21-22。

一直到了 1980 年代初，謝國楨還寫了一本專論史料的《史料學概論》一書，從其對史料的態度，也充分體現清華國學院學術精神中對待新史料的態度。在書中謝國楨將流傳下來的史料分爲一、地下發現的資料，如古代化石、甲骨、銘器等；二是文字紀載流傳下來的史料。總結來說，最近發現的爲前人所無，或不注意的資料，約分爲四大類：(1)、殷墟甲骨；(2)、漢代木簡、敦煌寫本；(3)、元人雜劇；(4)、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及明清人雜史、筆記。而其中與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中所列舉中國新出的史料 (1)、殷墟甲骨文字；(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4)、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5)、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在史料範圍上幾乎一致，其中謝國楨所提的元雜劇，實際上也就是王國維早年《宋元戲曲史》的重要研究史料。而書中也對地下出土的史料多所論列介紹，如 1965 年山西侯馬出土的石簡《侯馬盟書》，1973 年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書《戰國策》、《地形圖》、《駐軍圖》等，並論及其在史學上的應用範圍。

除之之外，書中論及羅振玉、王國維所著的《殷墟書契考釋》，及王國維利用漢晉簡牘寫成的《簡牘檢畧考》，他能肯定金石學的研究，並認爲要知道金石學的梗概及學習金文甲骨文字，可讀《戩壽堂殷墟文字考釋》，而《觀堂集林》可作爲研究金文甲骨的門徑。並認爲晚清民國初年之際，隨著出土文物的不斷增多，在金石學內容日益豐富的基礎上，史學領域興起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是近代考古學，出現了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諸多著名考古學家。是以擺在史學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是，結合新出土

文物的整理成果，深入開展歷史研究⁴¹。這些論點顯示謝國楨在史料的态度上，能接受地下考古的史料如金文、甲骨文、簡牘史料，在研究方法上，他也大倡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第三章中論及清華國學院的學風中在研究方法上受到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影響至鉅，然「二重證據法」即關涉到對史料的新的認識，謝國楨稱在清華國學院時期，「承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諸位先生的教誨和指導，從事歷史研究」，在他晚年總結史學研究這本史料書的討論著作中，當中論說史學研究的精神內涵，可說是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延續。

而清華國學院除了前面提及的梁啓超新史學所強調要有新的史料眼光外，另外王國維對待地下實物甲骨文的文字史料、陳寅恪的對待新出的敦煌學史料、李濟全新的西方考古人類學所帶來的全新的「地下整體」文化觀點的史料以及趙元任的能以調查各地實際存在活的方言史料，這些大致上形成一種新的學術觀點，而謝國楨無疑具備這種新的學術視角；而在另一方面，謝國楨並非是《食貨》學派的出身，但梁啓超新的史學觀點所強調庶民史的研究，取代傳統英雄、帝王將相的舊史學研究，卻在謝國楨的社會經濟史和庶民史的研究中得到實踐。如謝國楨的〈明季奴變考〉、〈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及其遲緩發展的原因〉、〈記萬曆四十八年平價米票〉、〈略論明代農民起義〉、〈明末農民大起義在江南的影響〉、〈《聊齋誌異》所涉及的清初農民起義事跡補證〉⁴²等論文都是這種史學取徑，謝國楨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確實

⁴¹ 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頁3、4、10、54-56、135-137。

⁴² 這些論文皆收錄在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是一種新的史學研究面向的體現，自然謝國楨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在中共建政之後，或許也受到馬克思社會經濟史學的影響，對他投入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也有影響，但從他在 1925 年進入清華國學院之際，就已經寫就〈明季奴變考〉社會史研究的著作，也大致上他已決定走社會史的研究領域，清華國學院對他的影響不言而喻。



第三節 王力（1926 級）

而在清華國學院的學子中，另一位學術巨匠是語言學家王力，而王力在國學院時期受教於梁啟超與趙元任，尤其是現代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更是形塑王力學術生命的關鍵人物，王力在〈懷念趙元任先生〉一中曾經這樣說：

我在 1926 年考進清華大學研究院，當時我們有四位名教授：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我們同班的 32 位同學只有我一個人跟元任先生學習語言學，所以我和元任先生的關係特別密切。我常常到元任先生家裡看他。有時候正碰上他吃午飯，趙師母笑著對我說：「我們邊吃邊談，不怕你嘴饞。」有一次我看見元任先生正在彈鋼琴，彈的是他自己譜寫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愛元任先生的學問了。…我跟隨元任先生雖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我在學術方法上受元任先生的影響很深。後來我在《中國現代語法》自序上說，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論文上所批的「說有易，說無難」六個字至今成為我的座右銘。事情是這樣的：我在研究生論文《中國古文法》裡講到「反照句」、「綱目句」的時候，加一個〔附言〕說：「反照句、綱目句，在西文罕見。」元任先生批云：「刪附言！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這是對我的當頭棒喝。⁴³

⁴³ 王力，〈懷念趙元任先生〉，收錄在氏著，《龍蟲並雕齋瑣語》（北京：商務印

而王力的研究生論文《中國古文法》，就是由梁啟超指導的，趙元任參加了評議。梁啟超盛讚論文「精思妙悟，可為斯學闢一新途徑」，在眉批中又對具體論點大加稱讚，批上「卓識」、「通極」、「所論二特性真足開拓千古，推倒一時」⁴⁴，而趙元任在論文中不曾對王力此文有褒語，他用鉛筆小字作眉批，專找王力的毛病，其中最嚴厲的一句批評的話，就是「言有易，言無難」這六字後來變成爲王力的座右銘。

王力的語言學研究大致上是接受當時西方的「普通語言學」，並以普通語言學的理論應用到漢語研究上。而王力的「普通語言學」係指世界各民族語言綜合語，就可以打開我們的眼界，使我們懂得我們漢語的特點是什麼。⁴⁵這是王力據以研究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在 1984 年一篇〈我的治學經驗〉中，他還回憶說：

幾十年前，趙元任先生跟我說「什麼是普通語言學？普通語言學是拿世界上的各種語言加以比較研究得出來的結論」。我們如果不懂外語，那麼普通語言學也是不好懂的；單研究漢語，也要懂外語，…我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寫一本《中國語法理論》，講漢語的語法特點。要看出並說明漢語語法的民族特點，就必須用外語和漢語比較。在書中我用了英語、法語來作比較（偶

書館，2002），頁 303-304。

⁴⁴ 王力，《中國古文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一書中樑啟超的批語，頁 111-112。

⁴⁵ 王力，〈積極發展中國的語言學〉，收錄在氏著，《王力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3。

而也引幾段德語，那是抄來的，我不懂），我還憑這點外語知識讀了一些外國出版的語言學書籍和雜誌。⁴⁶

而我們知道趙元任在清華國學院時開的普通演講有：「方言學」、「普通語言學」、「中國音韻學」、「音韻練習」，其中「方言學」非常重視實地調查，曾多次率助教楊時逢去江浙一帶調查吳語，赴兩廣調查粵語。而「普通語言學」則將語言學分描寫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兩大類。「中國音韻學」方面，據王力說趙元任所講的「中國音韻學」是歷史比較法在漢語史上的應用，和清代音韻學家所講的不大同。而「音韻練習」，本學科注重聲紐、韻類，與四聲之練習，以能用反切讀出近古字音與現代音為目標。大致上趙元任的研究有幾個特點：一是提倡實地調查，如各地的方言調查；二是注重古今會通，也就是用新觀點研究舊材料；三是致力於中西文化的融合，即用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語言。⁴⁷。而有關趙元任在清華講學的狀況，姜亮夫在〈憶清華國學研究院〉中也提及趙元任：

他講聲韻學，講法和我在成都高師聽的課完全是兩回事。成都高師先生講的是聲韻考古學，而趙先生講的是描寫語言學（用印度、歐羅巴語系的發音方法運用到漢語的聲韻學）。⁴⁸

⁴⁶ 王力，〈我的治學經驗〉，《龍蟲並雕齋瑣語》，頁 280-281。

⁴⁷ 孫敦恆，《清華國學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頁 93-94。

⁴⁸ 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75。

觀照趙元任與王力的語言學研究，王力的自述與他的後來的學術事業，大致上可看出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趙元任對他的影響，實際上，趙元任的西方語言學研究正是當時最震撼西方及中國的高本漢的漢學研究，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所著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是綜合西方語言學家方音研究的方法和中國傳統等韻之學，對於漢語史研究影響巨大，是以當時中國學術界的領袖都提及這一點。如傅斯年在〈「中國音韻學研究」序〉中說稱此書：

瑞典高本漢先生所著之中國音韻學研究，…，蓋其綜合西方學人方音研究之方法與我國歷來相傳反切等韻之學，實具承前啟後之大力量，而開漢學進展上之一大關鍵也。⁴⁹

實際上 1920、30 年代當時中國文史學術界正面臨一個新舊學術交替的關鍵，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正反映這樣的學術歷史狀況，其中有關語言學的部分，他批評了章太炎及中國傳統音韻文字學的研究，他說：

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作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至於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楊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中國歷來的音韻學者審不了音，所以一部切韻始終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僅僅以統計的方法分類，因為幾個字的牽

⁴⁹傅斯年，〈「中國音韻學研究」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冊，頁 212。

連，使得分類上各家不同，即令這些分類有的對了，也不過能舉其數，不能舉其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錢大昕論輕唇舌上古來無之，乃自重唇舌頭出，此言所是，…但這層道理非現在審音的人不能明白。…若把一個熟習語音學的人和這樣一個無工具的研究者比長短，是沒法子競爭的。⁵⁰

這裡反映了傅斯年對傳統中國文字聲韻語言學研究的不滿，他認爲中國傳統學術正是缺乏工具的語言學之研究，而當時西方的學者（尤其是語言學研究典範高本漢）則是能運用各種工具來從事新的語言學研究，並有重大的突破，對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傳統有革命性的影響，然傅斯年所思考的語言學問題，實際上他的老師胡適也早已發其端。

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也提及：「近時西洋學者Karlgren…，用梵音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⁵¹，並在其他文章也提及：

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Bernhard Karlgren）費了幾年的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珂先生的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

⁵⁰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 255-256、258-259。

⁵¹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頁 143。

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工夫。」⁵²

實際上中國人研究漢語的音韻及方言有遠源流長的傳統，切韻是一部漢語的音節字典，揚雄的《方言》更是漢代方言詞匯的實錄。而音韻學方面，從宋人吳棫、明人陳第、以至於清代諸大師使這門學問有極可觀的成就；方言方面則有章太炎的新方言。然而這些研究嚴格說來只是語文學（Philology）的研究，不是語言學（Linguistics）的研究。語言學科學研究的理論及方法是來自於西方的。把西方的理論及方法跟中國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成爲「中國語言學」的開路人就是瑞典人高本漢、中國人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林語堂等諸位先生。⁵³

而王力的語言學研究也是承繼趙元任語言學的專技，繼續開拓這一中國新學術之路，如在漢語語法上，中國向來缺乏研究，直到十九世紀末，曾在法國留學的馬建忠，才使用拉丁文的語法研究古代漢語，寫出中國第一部系統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他是用印歐語的體系去研究漢語，但漢語與印歐語相差甚遠，故免不了有疏漏之處，王力的語言史研究，大致上既照顧中國學術的傳統，同時也吸收西方新語言學知識，是以他在給研究生上課就指定必需讀清代段玉裁的《說文段注》和馬建忠的《馬

⁵²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頁 356-357。

⁵³丁邦新，〈「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先生〉，收錄在李方桂著，《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204-205。

氏文通》⁵⁴。而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1943年）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細緻描寫了現代漢語的語法結構規律，改變了《馬氏文通》以來模仿西洋語法的面貌。它建立了三分法的漢語句型系統（判斷句、敘述句、描寫句），發掘了多種漢語的特殊句式（能愿式、使成式、處置式、遞系式、緊縮式），都是著重漢語句法的特殊特點，富于創造性。《中國現代語法》是漢語語法研究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而《中國語法理論》是與《中國現代語法》互相配合的，它著重在理論的闡述，王力主要比較了漢語同英語、法語的差別，現代漢語同古代漢語的差別，並涉及到梵語、希臘語、拉丁語、德語、越南語等十多種語言與蘇州話、廣州話、長沙話、昆明話等多種方言的差別。而這可以說是比較語法學，它闡明了語言的民族性、時代性和地域性，論證了依附西方語法來建立漢語語法體系是流弊甚多而且走不通的道路⁵⁵。

而在王力的〈新訓詁學〉一文論及清代學者王念孫、章太炎在訓詁學上擺脫《說文解字》的字型的束縛，從聲韻的通轉去考證字義的通轉。而王力指出這是訓詁學的一大功績，但這個學派流風所播，使得許多考證學家都喜歡拿雙聲疊韻來證明字義的通轉，但是王力批評《文始》的字族的研究，儘管聲音相近甚至相同，而在字義上也不一定是同源。同時王力也舉出章太炎的《新方言》的方法更是危險，因為《新方言》的作者及其同派的學者懷抱著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現代方言裡每一個字都可以從漢以前古書尤其是《說文》裡找出來，而不知有兩種情況是超出古書範圍以外的。第一是古代方言裡有些字，因為只行於一個小地

⁵⁴ 王力，〈談談怎樣讀書〉，《龍蟲並雕齋瑣語》，頁 252-267。

⁵⁵ 郭錫良，〈王力先生的學術道路〉，《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273。

區，很可能不見於經籍的紀載。第二、中國民族複雜，古代更甚，有些詞匯是借用非漢族的，我們若認為現在方言中每字都是古字的遺留，有時候就是指鹿為馬。於是王力他提出新的訓詁學，研究語義，必須要有歷史的觀念，前人所講字的本義和引申假借（朱駿聲所謂轉注假借），固然也是追究字義的來源及其演變，可惜他們只注重在漢代之前，漢代以後就很少提及，新訓詁學應該矯正這個毛病，把語言的歷史的每一個時代看作有同等的價值。漢以前的古義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後新起的意義也同樣值得研究。且必須打破小學為經學的附庸的舊觀念，然後新的訓詁學才真正成為語史學的一個部門。⁵⁶

而王力的語言學研究中，自然也正視著西方漢學大師高本漢的挑戰，在他的《中國語言學史》中，他談到西歐漢學家雖多，但是對中國語言學產生影響的不多，影響最大的只有一個高本漢，高本漢對漢語的中古音和上古音，都有一套音值構擬。這些構擬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很大，於是王力花甚多篇幅在介紹高本漢觀點的優缺點，後來王力的〈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分野及其收音〉就是在批判高本漢把古代的陰聲韻部（歌、魚、侯三部除外），擬成閉音節的觀點。⁵⁷王力的〈黃侃古音學評述〉主要批判黃侃從古本紐証古本韻，又從古本韻論證古本紐的論證方法的陷於論證循環的錯誤⁵⁸。而王力大致上是吸收高本漢的現代音韻學和黃侃的古代音韻學的合理成分，批判他們的錯誤成分，在中國音韻

⁵⁶王力，〈新訓詁學〉，《王力文選》，頁 272-280。

⁵⁷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152-162。

⁵⁸王力，〈黃侃古音學評述〉，收錄在氏著，《龍蟲並雕齋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三冊，頁 385。

學開創一個新的學派。

綜觀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的新學術之路，章太炎、黃侃所繼承開創的清代古音學，雖然是頗有成就，然而他們畢竟仍在傳統中國語文學的範疇中，直到二十世紀歐洲首屈一指的漢學家高本漢用了普通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理論來指導漢語研究，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石破天驚，震撼了東西方的漢學家，於是使得當時中國學術界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都震懾於高本漢的研究方法，亟欲引入這種新的研究方法，而趙元任的語言學一則深入引進當時高本漢式的西方語言學知識，同時在清華國學院時期，培育了王力這位學生，王力畢生中所走的語言學研究取徑，就是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受趙元任語言學的範式啓蒙，而他一生中著述甚富，就是在這一學風（既繼承傳統的樸學，又吸入西方新的語言學），於是在中國更新了語言學的傳統，帶入了一條新的學術之路。

第四節 姜亮夫（1926 級）

姜亮夫是 1926 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他談及：「得侍海寧、新會兩師爲生平一至樂，月尾移入清華園」，並「初請益王先生擬定《詩騷連綿字考》、《詩氏族考》、《先秦成語考》三題。先生命撰《詩騷連綿字考》。且以手稿見假。因遍讀清華園藏書」，而原本姜亮夫頗有意於寫詩，然「余以成都所爲詩集求正先生（案：指梁啓超），以思理過多情感過少相規。復以求教海寧、教誨大義大同，知詩人不可爲。即夜全部焚如。…，此後決意于經史哲學之門。暇則檢清華漢學圖書館西文漢學書記其目」⁵⁹。而在他從詩文志業轉爲決意經史哲學門後，「遂博稽群籍，綜覽傳記；新會之史學，海寧之經術，旁及甲骨、金石、聲音、夷語，莫不玩索，而求其得。」⁶⁰

而在清華國學院時期，除了受教於王國維外，姜亮夫這樣回憶著：

給我們上課的還有梁任公、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之幾位先生。這幾位先生中，只有李濟之先生的「考古學」課不喜歡聽。我後來才發覺，在清華不愛聽李先生的課，是最大的錯誤。後來我發憤去國外學考古，想來彌補這時期的損失。最受益的是梁任公先生的課，其中任公先生講的「古書的真偽和辨真偽方法」

⁵⁹ 姜亮夫，〈自定年譜〉，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401-402。

⁶⁰ 姜亮夫，〈四十自述〉，《姜亮夫文錄》，頁 36-37。

等內容至今都沒忘。「古書的真偽和辨真偽方法」這樣的課程，我在成都讀書時，也聽林山腴先生、龔向農先生講過，這方面知識有點基礎，但沒有系統，而梁任公先生從多方面多角度對先秦古籍來一個全面系統總結。講課中他從校勘、考證、訓詁以及學術系統來分析書的真偽及其年代，而又隨時總結某一問題，總結時，經常拿幾種書來比較，因此我對古書全貌大體了解了，問題也知道，整理古書方法也知道，不僅使我細緻得到讀古書方法，同時打開了讀古書的視界。任公先生另一個長處是經常運用當代日、美、英關於某些問題的見解，使我眼光不僅放在中國學人的觀點上，而且接觸外國一些東西。這是使我廣開學術道路的第一階段。⁶¹

姜亮夫接著更指出，王國維講課，講的是《說文》，用的材料許多是甲骨金文，用三體石經和隸書做比較，這樣一來對漢字的研究方法細密了。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王國維對姜亮夫影響甚鉅，姜亮夫說：「後來我出來教書、做科研工作越來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導對我的幫助很大」⁶²。是以他在《近百年學術年表》序中言「海寧先生之考古創通文字解說殷制，下及元史之整理，戲曲之鉤稽，皆各有發明⁶³」，在《文字樸識》序中言「清之末季，殷墟現寶，龜甲大出，字型之學，日以大明。瑞安孫先

⁶¹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姜亮夫文錄》，頁 172-173。

⁶²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姜亮夫文錄》，頁 173。

⁶³姜亮夫，〈《成均樓論叢》序錄：《近百年學術年表》〉，《姜亮夫文錄》，頁 77。

生原其始，先師海寧王先生承其緒⁶⁴，而姜亮夫此書即受其師王國維著述啓發而補其未備之處，方法仍承「二重證據法」的以甲骨文字證《說文》的取徑。

姜亮夫廣用其師「二重證據法」於其研究中，在《詩騷連綿字考跋》序中提及：

余往為《殷周通史》，授龜甲吉金古器物，以證經史諸子，凡書十二篇，屬草已既，又為《詩書氏族考》，以吉金補李氏之書，又為《古聲考》，以形聲偏旁定古聲，其許氏誤者，以龜甲吉金訂其誤。⁶⁵

姜亮夫走的完全是王國維的古文字學的治學取徑。是以當他在有關研究國故應有的基本知識和應具備的工具書中，在文字學的研究方面，就提及商承祚編輯的《殷墟文字類編》一書，因為此書受羅振玉、王國維的古文字學的影響，依照《說文》的次序，把「甲骨」中所可認識的字排列起來，便於檢查的工具書⁶⁶。

而在史學研究上，姜亮夫也受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影響，去考證中國古代夏殷周民族的重要問題，姜亮夫充分認知到王國維的《殷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證》是從甲骨文發現許多材料對證《史記·殷本記》的古史研究。於是他的《殷周民族考》、《九夏考》也是從古文字中創新「夏為龍族」、「殷為家族」等等的新

⁶⁴姜亮夫，〈《成均樓論叢》序錄：《文字樸識》〉，《姜亮夫文錄》，頁 108。

⁶⁵姜亮夫，〈《成均樓論叢》序錄：《詩騷連綿字考跋》〉，《姜亮夫文錄》，頁 105。

⁶⁶姜亮夫，〈研究國故應有的基本知識與應具備的工具書〉，《姜亮夫文錄》，頁 142。

創⁶⁷，實際上，夏殷周民族問題，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徐中舒的《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直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中心問題⁶⁸，姜亮夫所論是否有當，姑且不論，惟論題的選擇顯受王國維的論著影響，史學方法一貫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的取徑。

姜亮夫治古史就先寫成《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治楚辭先成《楚辭書目五種》，治敦煌學也先成《莫高窟年表》，這是姜亮夫從王國維研究周金文前就先寫了〈金文著錄表〉一事獲得啓發⁶⁹，他說王國維：

先生治學，往往先集資料，而後為之，如《兩宋金文著錄表》、《清代金文著錄表》，皆其徵也。因資料足，故徵驗多而結論切，且尤有過人者，先生不僅能平列資料，以知其然，且能透過資料，而知其所以然，如《殷周制度論》、《明堂考》、《先公先王考》等，皆為人所不能及，頗合於近時科學家所謂綜合研究。故所得結論，極為堅實可靠，鐵錐所不能破。⁷⁰

而姜亮夫為學除受王國維影響外，也與章太炎有所牽涉。姜亮夫曾提及王國維「先生為講《說文》，無驚人奇說，而有驚

⁶⁷姜亮夫，〈中國學術原衍闡微〉，《姜亮夫文錄》，頁133。

⁶⁸對殷周民族這問題深刻的討論，參見王汎森，〈一個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305-320。

⁶⁹姜亮夫，〈自傳〉，《姜亮夫文錄》，頁252。

⁷⁰姜亮夫，〈思師錄〉，《姜亮夫文錄》，頁15-16。

人的證，此最爲難能，…，不僅以甲骨金文爲形證，而能以聲韻爲主證也。」⁷¹，「我在清華從王國維先生學古文字，後來又從章太炎先生問聲韻之學，都是我的真正的根底之學。」⁷²，後來姜亮夫讀了章太炎的《新方言》，似有了了悟，所以撰寫了一部《昭通方言考》⁷³。從這些自述，我們可以知道姜亮夫大體上是繼承乾嘉的聲韻之學，既重視《說文》重字型之學，也吸收清代重音轉的「因音求義」的聲韻之學，甚至連清末對清代聲韻之學有重要的貢獻的章太炎的《新方言》，姜亮夫皆能有所掌握並據以做爲治學的知識，這裡值得進一步深究。

綜觀姜亮夫一生的著作，在語言學部分，他曾經撰寫有《中國聲韻學》、《文字樸識》、《古文字學》、《瀛涯敦煌韻輯》，這些著作自然離現代史學的專業較遠，而是在現代的語言學領域，然而在傳統的國學中，語言（小學）是被認爲進入古典經籍世界的基本訓練，所謂「訓詁明則義理明」的途徑。儘管中國古代史學如司馬遷強調「通古今之變」的史學較少，而個別史實的確立較多，清代乾嘉考證史學更是如此。然語言與歷史的緊密結合，這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風格，姜亮夫說：

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必須具備高度的語文知識。不僅記錄歷史現象必須利用文字，而且歷史所用的材料和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材料是同一件事，二者本質上是一致

⁷¹姜亮夫，〈思師錄〉，《姜亮夫文錄》，頁15。

⁷²姜亮夫，〈史學論文集序〉，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二十一史學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4。

⁷³姜亮夫，〈我為什麼要編《經籍纂音》〉，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漢語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114。

的。…研究歷史的人必須追索當時語言的真義，才能對史料的理解大致不誤，…因而認識語言，特別是歷史上的古代語言，成為認識史料，分析史料，乃至鑑別史料的真偽的不可缺少的工作。⁷⁴

是以語言與歷史的結合是姜亮夫治學的特點，他充分了解他老師王國維的偉大著作《殷周制度論》、《殷禮徵文》、《三代地理小志》、《古史新證》等，基本上都是從語言文字入手的。⁷⁵所以姜亮夫說：「我的學術思想從歐洲回來後，就有一個『野心』，要想在歷史學與語言學方面建立一個自己的、獨立的、客觀的、綜合的體系。」而在他四十歲左右，復受章太炎的一句話「你應該從語言同歷史兩個角度來打定你的樁子，這個樁子打不定、不深固，學術研究始終是漂浮的」，這句話影響姜亮夫很大⁷⁶。

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後，姜亮夫又受到當時中國國學界另一宗師章太炎的學術啓示，然而姜亮夫與章太炎，及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間的學術交涉關係為何，值得一究。姜亮夫是 1931 年在蘇州學術演講會中認識章太炎的，隨後即進入章太炎門下的，而姜亮夫也提及章太炎的學術體系的學風，是從「小學」到「史學」，於是中國學術方面，才算接上「乾嘉」諸老的學術體系，而中國近代學術受章太炎的影響很大⁷⁷。姜亮夫說：「關於

⁷⁴姜亮夫，〈讀史與古漢語知識〉，《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漢語論文集》，頁 181-182。

⁷⁵姜亮夫，〈讀史與古漢語知識〉，《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漢語論文集》，頁 195-196。

⁷⁶姜亮夫，〈謝本師—學術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頁 357、360。

⁷⁷姜亮夫，〈拜師與師說—憶章太炎先生〉，《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頁 296、300。

我研究歷史這件事，同太炎先生有關，同吳檢齋先生、黃季剛先生、靜安先生都有關」⁷⁸，然而儘管章太炎先生與姜亮夫有正式拜師的古禮，兩人有較多私人學術情誼⁷⁹，然而在治學上尤其在史料認知上，姜亮夫則同章太炎有甚大差距，而他仍然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學風同其軌轍。

姜亮夫說章太炎極反對他研究甲骨文，認為研究甲骨文對於整個文化沒有太大的關係，對於姜亮夫把研究甲骨文寫出的文章寄給他後，章太炎笑著說：「亮夫這腦子裡裝的雜七雜八的東西太多了，他這樣來證，不僅甲骨文要被他證成，金文也要被他證成，他就不曉得甲骨文是羅振玉假造的」，對於此，姜亮夫是不同意的，姜亮夫甚至向章太炎解釋說：「先生，羅振玉假造甲骨文可能是有，但我親自到安陽去看過、發掘過、從地質學的觀點來看，甲骨文確是殷代人的東西，並不是後人造的，甲骨文所記載的殷家帝王一個也沒錯，所以甲骨文不僅沒有損傷我們的歷史資料，而且還豐富我們的歷史資料，因此甲骨文應該研究的」，後來姜亮夫的同門孫思昉寫文章批評姜亮夫，對此姜亮夫又連寫三篇文章登載在《國聞周報》反駁孫氏，所以到最後章太炎還是這樣說：「甲骨文可以研究，不過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你既然研究歷史，歷史上還有許多東西多留心深入研究」⁸⁰，眾所周知，用甲骨文對證《史記殷本紀》的「二重證據法」正是姜亮

⁷⁸姜亮夫，〈謝本師－學術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頁 355。

⁷⁹姜亮夫，〈拜師與師說－憶章太炎先生〉，《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頁 296-298、303-305。

⁸⁰姜亮夫，〈謝本師－學術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頁 354-355。

夫另一業師王國維「古史新證」的重要創獲，而「二重證據法」更是爾後中國歷史研究公認影響至鉅的學術道路，章太炎的史學雖有現代化的層面，但在這一點上，卻是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這一更爲現代化的學風呈現差異。姜亮夫雖有拜師於章太炎門下，但畢竟仍與章太炎的學術門派有段距離，這在章太炎的最重要學生黃侃身上，更可以看出其中的異同。

黃侃受業於章太炎，是章太炎弟子中最有成就者，特別在古音韻學方面，世稱「章黃之學」⁸¹，姜亮夫曾描述章太炎「他對黃季剛特別喜歡，只要聽到黃有病或有什麼危難時，他惶惶不可終日，有時黃有病，太炎先生要我送藥方去」⁸²，然黃侃自 1907 年從章太炎遊，二十餘年間執弟子禮始終甚謹，章太炎說黃侃「爲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且「有議及章先生者，〔黃〕先生必盛氣爭之」，然黃侃並沒有墨守師說，在音韻、文字、訓詁都自成家法⁸³，熟悉清代文獻掌故學的名家張舜徽就在筆記中寫到黃侃「一日，杯酒之後，論及太炎學術，乃曰：『小學頗有所得，經學不過爾爾，吾師乃文豪也』」，是以張舜徽認爲章太炎在經學上的功力遠不及黃以周、孫詒讓等人⁸⁴。

黃侃和章太炎一樣都精通《說文》，但黃侃是把《說文》當

⁸¹黃菊英，〈我的丈夫—國學大師黃季剛〉，收錄在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黃侃的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6。

⁸²姜亮夫，〈拜師與師說—憶章太炎先生〉，《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頁 302。

⁸³許嘉璐，〈黃侃先生的小學成就及治學精神〉，收錄在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69-70。

⁸⁴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中〈黃季剛之評斷章太炎〉條，頁 34。

作治文字學的基礎，但他並不排斥金文、甲骨之學，1932年之際，甚至「雖價昂亦不惜」欲購買《殷墟文字存真》一書⁸⁵。而章太炎在寫黃侃的墓文時說，在音韻上，「始從余問，後自成家法」，故張舜徽說「語言文字之學，章特邃于古韻，並力斥晚近所出龜甲爲妄。黃則兼精後世韻書，下及等韻之說，以爲治古音津梁；而於甲骨文字，則稱其資料可寶，亟求其書讀之」⁸⁶。然而儘管章太炎第一大弟子黃侃在某些學術觀點未必全從其師，但正如前文所引吉川幸次郎觀察的黃侃，基本上仍是較著重書本知識甚於甲骨文的地下史料，也應是他向來「執弟子之禮始終甚謹」，而但於甲骨、金文史料觀點，在公開的論說中，仍極力從其師說，並「盛氣爭之」。

所以章太炎及其門人的學術雖具備現代學術的新精神，但相較於當時歐洲及日本的東方學和漢學，則顯然章門的現代學術精神，仍不及清華國學研究院中五位導師（講師），早已能和當時歐洲、日本的漢學接軌。如姜亮夫告知黃侃當時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陳寅恪，此時還在跟人家學西夏文、蒙古文，而姜亮夫則自認弗如之際，黃侃則回答說：

這話你也不必這樣講，我們過去的古人，誰又能夠懂八九國的語言呢？他們難道沒有成績嗎？王念孫雖然一樣外文不懂，難道他不是一個大學者嗎？難道他沒有成績嗎？所以學問的問題，只問你鑽研不鑽研，鑽

⁸⁵陸宗達，〈季剛先生二三事〉，收錄在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與學術》，頁120。

⁸⁶張舜徽，《愛晚廬隨筆》，一書中〈治學不可囿於師說〉條，頁33。

研總是有路子，你不鑽研就什麼路子都沒有，個人要根據各人情況來鑽研。

姜亮夫雖然對於陳寅恪的學問覺得廣博深邃，使得自己一輩子都覺得摸探不著他的底，但是仍覺得：

陳寅恪先生上課真了不起，有些地方雖然我還聽不懂（因為外語基礎差、佛學經典知識亦少），但我硬是堅持聽下去，能記盡量記，課後再與同學對筆記，得到許多治學方法，所以我對寅恪先生極其佩服。⁸⁷

而黃侃確實在某些學術觀點上更甚於章太炎而具現代性，在對甲骨文史料的態度及主張輸入西方科學方法，如他對嘗試引入西方近代語法學原理來研究中國語文文字的《馬氏文通》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⁸⁸。

但是這段對話也反映了一件重要的學術異同，誠然清代學者王念孫者無需懂很多外語亦能有所成就，顯然黃侃亦是同其精神，然而陳寅恪懂得及積極學習多種語言，這正是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的普遍特色，陳寅恪在總結王國維一生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曾舉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三曰

⁸⁷ 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姜亮夫文錄》，頁 173-174。

⁸⁸ 盧毅，《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0。

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⁸⁹。其中「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正是王國維對當時歐洲東方學、漢學的注意。王國維雖然未能如陳寅恪那樣通解很多語言，然而通過日文與英文著作，他對歐洲東方學的發展大勢是相當清楚的，這可從他的《觀堂譯稿》所譯斯坦因、伯希和、津田左右吉、箭內互諸文可知。⁹⁰可以說王國維、陳寅恪等所代表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風，正是當代中國與世界學術的尖端並進的，然而章門在這一部分，卻是不及清華國學院地，余英時先生即以自己幾十年在西方漢學界的體驗說過，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多數中國學人，主要由於語言的隔閡，往往不免以異樣的眼光看待所謂的「漢學」的著作。有些先輩中國學者總覺得中國經典博大精深，文字古典曲折，決不是外國人所通曉的。在他們看來，外國人出於好奇心而研治中國學問，大概像張騫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要領。章炳麟便曾流露出這一傾向，雖然他評論孔子、儒學仍不免受到遠藤隆吉、白河次郎等人的影響⁹¹。

前面提及姜亮夫受梁啟超運用當代日、美、英關於某些問題的見解，使其眼光不僅放在中國學人的觀點上，而且接觸外國一些東西，這是使他廣開學術道路的第一階段，而且在清華國學院時期，姜亮夫亦受陳寅恪的課程衝擊，他說：

⁸⁹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9。

⁹⁰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錄在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 二版），頁 327。

⁹¹劉正，〈圖說漢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中，〈余英時先生序〉，頁 1-2。

陳寅恪先生廣博深邃的學問使我一輩子也摸探不著他的底。他的最大特點：每一種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導，…聽寅恪先生上課，我不由自愧外國文學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許許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⁹²

而實際上當時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所開的課程就是「西人之東方學目錄」、「梵文—金剛經之研究」、「高僧傳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識十二論校讀」，其中「西人之東方學目錄」，講述西洋各國對於東方學之研究，凡西人關於中國國學之重要著述均為之介紹及給予明說，⁹³而這些研究正是余英時所稱陳寅恪史學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第一變，這些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所講授的主要課程佛經翻譯文學、中外關係史研究、年曆學、西方東方學之目錄學，這些專題都建立在十幾年來他在西方耕耘的知識領域上，他所研治的許多有關語文則正是這些新興學術的基礎。亦即是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時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研究，此正是他參預歐洲的「東方學」時期⁹⁴，而陳寅恪也承認他在中西交通史、佛教傳播及中亞史地等領域內，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例如法國的P. Pelliot（伯希和）、德國的F.W.K. Mueller、俄國的W. Barthold等人的影響⁹⁵，對於當時歐洲東方學的熱門研究領域敦煌學，陳寅恪更是很早即體認這種學術的尖端

⁹² 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姜亮夫文錄》，頁 173。

⁹³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頁 92。

⁹⁴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20-326。

⁹⁵ 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9。

性，在 1930 年刊登在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上的〈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陳寅恪即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也。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者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燉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異國，即秘藏於私家。⁹⁶

姜亮夫後來到歐洲留學，當是先前在清華國學院時期所受王國維和陳寅恪的影響，姜亮夫說：「敦煌也發現大批文物，…，到了清華，接觸漸多，尤其靜安先生，經常要介紹羅振玉印行的書」，而後來姜亮夫到巴黎留學，遇到舊友王重民，他正在國民圖書館繼續編伯希和的敦煌卷子目錄，邀請姜亮夫去看敦煌的有關音韻學的卷子；同時向覺民（向達）在倫敦也寫信邀請姜亮夫去英國博物館看卷子⁹⁷，誠然這些都是姜亮夫後來全力投入敦煌學的際遇，然而他在清華國學院之際，受業於導師王國維和陳寅

⁹⁶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36。

⁹⁷ 姜亮夫，〈我與敦煌學〉，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十四—敦煌學論文集》（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429。

恪兩人所帶來的當時歐洲先進的東方學思潮，顯然是也啓蒙姜亮夫爾後決定出國到歐洲去留學，很快即向當時歐洲東方學中的敦煌學靠攏的原因。後來他並有《敦煌雜錄》（多錄之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經籍校錄》之作，以及《西文漢學書目》之作，這些都可說是陳寅恪所說的學術界的「預流」，清華國學院當年與歐洲漢學、東方學接軌的學風，灌注於姜亮夫這個清華學子身上，後來姜亮夫的學術意趣皆源於國學院階段的教育甚明。

另外姜亮夫也說：

從趙元任先生那裡，我也得益匪淺。他講聲韻學，講法和我在成都高師聽的課完全是兩回事，成都高師的先生講的是聲韻考古學，而趙先生講的是描寫語言學（用印度、歐羅巴語系的發音運用到漢語的聲韻學中來）。不過我還是認真聽，並把描寫語言學和聲韻考古學對照，得到很大的啟發。這方面得趙先生之力，是我一生學問基礎的關鍵。他使我知道研究語言學可分兩個大類。這兩大類應互相關聯，互相依存，就是語言考古學和描寫語言學。⁹⁸

然而因為姜亮夫沒有描寫語言學的基礎知識，因此要聽趙元任的課困難很大，因此又從王國維去學習，回到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考古學的路上去，形成姜亮夫研究漢語的基礎，在漢語學研究走聲韻考古學的路，《瀛涯敦煌輯》一書可做為證明⁹⁹。惟在談及「敦煌語言學」時，姜亮夫也將古代西域、中亞

⁹⁸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姜亮夫文錄》，頁175。

⁹⁹姜亮夫，〈漢語語言學研究的補充說明〉，《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漢語論文集》，

地區許多非漢語的民族語言材料也包含其中¹⁰⁰，而這種將吐蕃、西夏、回紇及龜茲、吐火羅、粟特等民族語言做爲納入與漢語的研究的領域中，實際上亦是趙元任所提倡大的研究方向的比較語言學，其實陳寅恪〈與妹書〉中所論的亦是此種比較歷史語言學，在這點上，我們也看到姜亮夫所持續的趙元任、陳寅恪這種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精神，這其實也就是歐洲漢學、東方學所走的治學取徑。姜亮夫誠然在清華國學院之後又投入章太炎門下，正所謂的「帶藝投師」，但是觀諸姜亮夫一生體現的學術風格，從其對待新史料甲骨文和投入敦煌學的研究而論，因爲甲骨學與敦煌學更是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的關鍵¹⁰¹，就此更可看出姜亮夫所延續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風。

頁 215。

¹⁰⁰ 這部分的敦煌古外國語言材料的介紹，可以參看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38-142。

¹⁰¹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台北：風雲時代，2008），頁 54-65。

第五節 其他清華國學院學生

清華國學院的學術風格的塑造，在幾位導師中，以梁啟超和王國維在學生中所獲反應較大，而指導的研究生也最多，陳寅恪因為所授的當時西方最先進的東方學，要具備多種語文的知識，是以當時研究生的迴響較少，然而陳寅恪所帶來的一種中西學術的根底，及帶來西方學術的先進「預流」，如敦煌學的概念，卻滋生在研究院學生心中，後來終於由伏流變成顯學。趙元任新的語言學雖當時在學院中學生鮮有知音者，但高徒王力一人足當語言學的一方重鎮，將國學院的新學術精神發揚光大。而同樣新學術的李濟考古學，在清華國學院中組建了考古學陳列室和開展考古調查發掘，而與美國佛利爾藝術館畢世博合作去山西作考古調查，開啓了現代中國科學考古的先聲，甚而將這種經驗傳承，帶到之後中國學界最重要且成績最卓著的中研院史語所安陽的殷墟挖掘，其成就超過同時期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考古學組。雖然當時在清華國學院時期，與李濟學術的傳承有關的學生不多，除了前文提及半個徐中舒外（徐中舒主要的導師係王國維），另外有兩個學生是吳金鼎和衛聚賢的學術，實際上是受李濟的影響，是以本節中將擇要評介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對於清華國學院學風傳承有重要影響的清華學人。

衛聚賢（1926 級）係在 1926 年考入清華國學院，專研中國上古史。入學之初以所撰《春秋戰國時代之經濟》，請導師王國維審閱，王問其所據，衛聚賢答以《左傳》、《國語》，王國維則說：「此兩書在時代上均有問題，『根之不固，葉將焉附』」，衛聚賢在其指導下，乃決心以統計學原理和方法研究古代史和古籍，

1927年以論文《春秋研究》和《左傳之研究》畢業。¹⁰²而《左傳之研究》文成後轉呈梁啟超于上海，得到讚美之詞，堅定他鑽研學術的信念¹⁰³。

衛聚賢在商校讀書時，開始對史地發生興趣，對史書記載他相信都是對的，於是寫下〈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介子推隱地考〉、〈春秋圖考〉…等考證文章，後入清華國學院受王國維影響而對古籍產生疑問，於是退而用統計學原理和方法，對所用之原始資料進行分類、統計、排比、推理，以驗證《春秋》、《左傳》、《國語》、《穆天子傳》、《山海經》、《禹貢》、《墨子》等書之著作時代、著作地點和作者為誰，書中有無後人摻進的成分，即這些古籍真偽問題，後將其研究成果編為《古史研究》第一、二輯。衛聚賢的治學方法由信而疑，由疑而半信半疑，務求做到去偽存真，辨明真相而后已¹⁰⁴。

然而衛聚賢由室內的圖書考據轉向野外進行考古發掘，是受李濟的影響。李濟 1926 年發掘夏縣西陰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後，出土文物曾在清華國學院展出，衛氏深受啟發，遂認為夏縣同方泉兩地毗鄰，各種石器、彩陶、繩紋陶在孤山之麓甚多，於是有試掘之心¹⁰⁵。

¹⁰²孫敦恆，《清華國學院史話》，頁 186。

¹⁰³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收錄在氏著，《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九冊，頁 5071；衛月望，〈衛聚賢傳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304。

¹⁰⁴衛聚賢，〈我的「胡說」〉，《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298-301；衛月望，〈衛聚賢傳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310-311。

¹⁰⁵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58；衛月望，〈衛聚賢傳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305。

而終其一生，衛聚賢這種熱心考古事業的非專業人士，實際上參與諸多的考古工作。如他任職經濟部門時，公餘時間則發起和組織「吳越史地研究會」並親任會長之職，以北方人來江南考古。在此以前，很少人相信江南有石器時代文化的存在，經他推動和組織發掘，南京栖霞山，常州奄城，浙江金山衛的戚家墩，杭州古蕩，蘇州石湖，南京的焦尾巴洞，湖州的錢山漾，杭縣的良渚等地都發現了石器時代的遺存。由此確定江南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人類居住生息期間，並非洪荒一片。衛聚賢發現了幾個紋陶和黑陶體系與文字，從而論證了吳越民族、南洋土人和殷商人民都是同一源的支脈。在他主持該會期間，曾出版有關書刊多種如：《杭州古蕩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報告》、《金山衛考古記》、《奄城考古記》、《吳越文化論叢》、《南京明故宮發掘報告》、《歷代建都南京的貨幣》等等，為吳越考古起到開拓和奠基作用。1940年4月，衛聚賢與郭沫若共同主持發掘了重慶江北墓葬，出土了一批文物；後來又在南岸的彈子石發掘過，經研究從而證實兩江沿岸的此類墓群均屬漢墓無疑。次年在成都白馬寺得到一批出土的青銅兵器，以其花紋不同於中原，他以對「得心應手」紋式青銅器研究成果寫成著作，從而開拓了「巴蜀文化」研討之風，使此類器物的時代，逐步明朗起來，為以後各家鑽研「巴蜀文化」奠定了基礎。¹⁰⁶

而衛聚賢也寫了兩本介紹中國考古學通論的書，分別是《中國考古小史》（1931年寫成）和《中國考古學史》（1936年寫成）。《中國考古小史》一書前面還有李濟的序言，文中也稱許此書將中國宋人以來的古器物學及新近現代化的科學考古相關的事實

¹⁰⁶衛月望，〈衛聚賢傳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306-307。

彙集起來作一節略，並將相關考古的出版品作個總介紹，是使讀者一閱而知中國考古學的重要事實之作¹⁰⁷。在這本小書中，衛聚賢指出：

現在單就考古而言，在中國目下是很需要的，因為書籍多將神話與事實混合，致使上古無信史可言，由書籍的整理，學術上曾開了一次戰爭，但彼此都跳不出書本上的圈子，故考古的工作一時很為摩登；考古的過去是些甚麼現象？我想一定有不少的同志，要回頭一望。我就趕快寫出這個中國考古小史以應時需。¹⁰⁸

所謂將「將神話與事實混合，致使上古無信史可言，由書籍的整理，學術上曾開了一次戰爭，但彼此都跳不出書本上的圈子」，這完全是指涉 1920、30 年代席捲中國史學界的顧頡剛「古史辨運動」史學革命，然而對此衛聚賢顯然是承繼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清華導師們的對疑古思想的保留，是以他選擇的是用清華另一導師李濟「摩登」的考古學，來修正「致使上古無信史可言」的疑古史學取徑，不管衛聚賢的非專業的考古最終成績，未如專業考古成績斐然，但他在書中對中國考古的「近代的發掘」，介紹石器的遺址、殷周及漢以後的發掘，實際上體現了在對現代考古學的認知上，超越他老師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學問〉和梁啟超〈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的理解高度。而隔了三年他又寫成《中國考古學史》，因前書「略古而

¹⁰⁷ 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一書中李濟的序言，頁 1。

¹⁰⁸ 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一書中衛聚賢的「自序」，頁 1。

詳今」，是以後書則增加很大篇幅寫中國古代考古學。然對「欲知歷史」的方法，衛聚賢特標舉出「則在考證與考古」之路¹⁰⁹，而此乃清華國學院李濟所立下的重要學風。

是以 1921 年到 1949 年是中國考古學誕生和發展期，中國考古學從無到有，取得長足的發展，推動這一發展主要有一主一輔兩支力量，主力軍廣為人知，是以李濟、梁思永、裴文中等為主的學院派，他們受過良好的專業訓練，供職於專門或與之相關的研究機構（主要是中研院史語所，也包括地質調查所、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等），無論發掘還是研究，都成績斐然。另外一支輔助力量，就是熱心考古事業的一些非專業人士，他們雖然不專門從事考古事業，但在考古學草創時期，同樣對考古學的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在考古學史上的貢獻，漸漸引起人們關注，而衛聚賢就是他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¹¹⁰。

而吳金鼎（1926 級）則可以說是李濟在清華國學院正式的指導學生。1926 級的清華國學院學生戴家祥 1989 年 2 月 27 日給李光謨的信中可知吳金鼎走入考古學的過程，信中寫到：

李老師所講的考古學與我們過去所講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實在相去十萬八千里。在第二屆同學中只吳金鼎一個人選擇這門專業。吳金鼎山東人，畢業齊魯大學，看樣子實在是個木訥君子，整天拿著本巨型的外文書。據寅恪先生背地對我說：「吳金鼎英

¹⁰⁹ 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一書中的「序」，頁 1-2。

¹¹⁰ 劉斌、張婷，〈衛聚賢與中國考古學〉，《南方文物》，2009 年第 1 期，頁 99。

文好極了！」可是他沒有寫出論文，1927 年暑假沒有拿到畢業證書。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找不到一個考古發掘的現場。¹¹¹

之後吳金鼎於 1933 年到 1937 年到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博士，而吳金鼎在 1938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國史前陶器》的引言中，透露出他醉心考古學的心願是植根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並受到李濟的影響，因為當李濟在夏縣史前遺址進行發掘時，吳金鼎正就讀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李濟將其發掘所得的遺物帶回清華。從典型器物的展覽以至李濟及袁復禮在茶話會中關於發掘工作的演說都十分生動有趣，並給吳金鼎不自覺地想像有一天能夠發現一個遺址，研究它；發掘它；並撰寫它的歷史。而李光謨也說，李濟一直把吳金鼎當作自己學術工作的接替者看待，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所建立的一段師生情誼，亦趨使吳金鼎以李濟為自己終生學習的對象。不論是《山東人體質之研究》的完成；龍山城子崖遺址與黑陶文化的發現；《城子崖》發掘報告的撰寫；安陽殷墟發掘的參與以至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古調查工作，吳金鼎都得到李濟的支持和鼓勵¹¹²。

而李濟也在名著《安陽》提及到

1930 年，當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田野考古移向山

¹¹¹ 請參看李濟著，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一書中〈戴家祥致李光謨〉函，頁 171-172。

¹¹² 林錦源、陳淑玲，〈吳金鼎在中國史前考古學上的貢獻〉，《考古與文物》，2003 年第 3 期，頁 71、74。

東省時，安陽發掘停止了一年。在靠近山東省城濟南的一個地方，吳金鼎發現了一個新的新石器文化—黑陶龍山文化。吳是我指導的清華國學院的畢業生。考古組的田野工作人員到濟南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一個季度的發掘。華北首次發現黑陶的文化，不僅打動了那些對古代中國有濃厚興趣的學者，而且鼓舞了新一代的田野考古學家，特別是那些一直密切注視安陽出土物及發掘情況的人。…戰爭初期，研究所定居昆明時恢復了一些研究工作。…我對安陽陶器的形制和紋飾進行詳細研究，並在吳金鼎博士的全力協助下，對全部典型標本進行了審查。吳博士這時剛從倫敦回國加入我們的研究工作，而後又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在抗戰時我仍是該院的負責人）。¹¹³

而城子崖遺址的挖掘後來成書為《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李濟在序言中稱初稿大部分是吳金鼎預備出來的，他是城子崖的發現者，田野工作他費力最多，而這一遺址的重大意義是發現了一個以黑陶為主的文化層，這是中國境內首次發現的。在二十世紀 30 年代初的中國，這項發現更是具有震撼的影響力。因為當時中國的考古學界，正為中國文化的起源及中國文化西來說爭論不休，又自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於 1921 年在中國河南省發現了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後，不少考古學家更以彩陶為特徵的紋飾與西方古代文明所生產的陶器紋飾相似，便斷言仰韶文化是源自西方或受西方文化影響。而中國古代

¹¹³ 李濟，《安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57、100。

文化的發展亦是由西至東傳播過來。這些說法雖受質疑及反駁，但苦無考古證據的支持下，中國文化西來說仍然十分盛行。然而此時的吳金鼎在中國的東方山東地區發現一個全新的文化遺址，該遺址的先民能製造出精美的黑色陶器。雖然黑陶在年代上比彩陶要晚，但卻與河南小屯出土的殷墟文化，在年代的傳承上有著更密切的關係，吳金鼎的發現為反對中國文化西來說者，提供嚴謹的考古證據，激勵更多考古學家探求中國文化的起源¹¹⁴。

而實際上「中國文化西來說」是當時中國學術界一個重要課題，源於西方考古學家提出的理論，後來又因為瑞典安特生發掘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強，當時連中國第一流學人章太炎、劉師培都篤信不移，而這一問題一直到1970年代，錢穆仍在注意中國大陸考古對於甘肅彩陶的問題得到什麼樣新的結論，可見錢氏仍在關心「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問題¹¹⁵，而遠在1927年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的現代考古報告，在「挖掘的經過」中就提及瑞典安特生的考古工作的發現和結論，然李濟認為此問題極複雜且安特生的解釋沒有切實的證據，故對此是有所保留的，李濟認為要得到關於這文化明瞭的觀念，需更多細密的研究，而「這文化的來源以及它與歷史期間中國文化的關係是我們所最想要知道的」¹¹⁶。是以如李濟、吳金鼎的考古學挖掘，實際上也從科學的考古學來回應當代中國學界的這一重要的學術與現實的關懷。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最重要的考古學領導者夏鼐就曾提

¹¹⁴ 林錦源、陳淑玲，〈吳金鼎在中國史前考古學上的貢獻〉，《考古與文物》，頁72-73。

¹¹⁵ 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收錄在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麟—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5再版），頁22、27。

¹¹⁶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李濟與清華》，頁35-36。

及：

梁思永先生曾經說過：「像吳禹銘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學的正統派，著重田野考古而輕視故紙堆中的研究」，我很同意梁先生的話，並且覺得在中國剛正發軔的時代，像吳先生這樣正統派的田野考古學家，尤為需要。只有多作田野工作，多發現新材料，然後才能進一步作切實可靠的綜合工作。¹¹⁷

從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來看，吳金鼎後來也加入李濟在史語所的殷墟發掘工作，兩個師徒聯手將清華國學院時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考古學知識和實際田野調查經驗，帶進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中，無形中也延續了清華國學院的學風¹¹⁸。

另劉盼遂（1925 級）少年時治文字訓詁之學，亦辨聲韻，宗許慎的《說文》之旨，能為魏晉之文，欽慕章太炎的學風，惟 1925 年考取清華後，以其記聞淹雅，考證精湛，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所賞識¹¹⁹，後來劉氏極推崇清華諸師，如談起王國維用甲骨文、金文研究社會歷史是在歷史研究方面的一個開創¹²⁰，

¹¹⁷ 夏鼐，〈追悼考古學家吳禹銘先生〉，《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267-268。

¹¹⁸ 現存有三封李濟與吳金鼎往返的信函，從中可知兩人日後在考古工作上，彼此會互通考古所得的知識和訊息，互動頻繁，情誼真誠，請參見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一書中所收錄的〈吳金鼎致李濟〉函兩封，1941 年 11 月 26 日、1942 年 9 月某日；〈李濟致吳金鼎〉函一封，1943 年 9 月 11 日，頁 312-313、316-317、319-320。

¹¹⁹ 謝國楨，〈記清華四同學〉，《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8。

¹²⁰ 聶時樵、鄧魁英，〈懷念劉盼遂先生〉，《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2。

是以當王國維在國學院講授《尚書》、《禮記》、及《說文練習》的上課筆記都由劉盼遂擔任，其中《說文練習筆記》中，王國維多所使用金文、甲骨文來證《說文》之旨，係由劉盼遂筆記之，故他當熟知王國維的學術精神¹²¹，也或改其早年宗章太炎只據《說文》之旨的學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於清華弟子中誠是其治學的圭臬。

而吳其昌（1925 級）入清華國學院後，從王國維治甲骨金文及古史（三代鼎彝及殷墟龜契之學），復從梁啟超治文化學術史，1932 年，始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益肆力于甲骨金文之學，著有《殷（墟書）契解詁》十卷、《金文歷朔疏證》四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證》六卷、《金文世族譜》四卷、《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墟書契前後編疏證》，擬撰而未成者有《金文方國疏證》、《金文職官疏證》、《金文禮制疏證》、《金文習語疏證》等若干種¹²²。

從吳其昌的著作可以了解，吳氏的學術大致受王國維古文字學影響至鉅，古史的撰述甚至承王國維所開發的課題而來。在武漢大學時，吳其昌講授《古代文字學》（含甲骨文、金文）《商周史》、《中國通史》，以後又輪換講授《中國文化史》、《宋元明清學術史》，他認為中國古史過去建立在「古經籍」的基礎上，然而典籍多經過秦漢間人篡改偽造，不足徵信，故主張在新出土之彝器文物上，重建中國古史統系。此階段他的研究重點放在先

¹²¹ 劉盼遂，〈觀堂學書記〉、〈觀堂學禮記〉、〈說文練習筆記〉，皆收錄在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頁 259-299、313-321、322-331。

¹²² 方壯猷，〈吳其昌教授事略〉、王蘧常，《吳子馨教授傳》，皆收錄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23、25-26。

秦史料疏證方面，寫下〈從碎甲骨金石文中所含殷曆推證〉、〈駁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金文曆朔疏證〉、〈金文名象疏證〉、〈金文書契解詁〉、〈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等著作，這些學術工作都可看出，吳其昌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古文字學和殷商史的研究方法上去發論。以致時人說，王國維的學問，吳其昌得之最多，或稱吳其昌研究學術，繼承了王國維的衣鉢，所以連小學大家楊樹達從湖南大學寄來《關於甲骨文札記》一文，也徵求吳其昌意見，從此可見吳其昌於此領域的學養¹²³。當年王國維在國學院所講授的《尚書》、《儀禮》並由吳其昌筆記¹²⁴。可惜吳其昌四十歲即已過世，後來能全面繼承起王國維的學術精神者實則以徐中舒為最。

方壯猷（1925 級）早年治學方向受其導師王國維的影響較深，著重研究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語言和史地，赴日赴法留學亦專攻東方民族史。主要論文有〈室韋考〉、〈契丹民族考〉、〈韃靼起源考〉、〈匈奴王號考〉、〈匈奴語言考〉、〈鮮卑語言考〉、〈三種古西域語之發現及其考釋〉，還將日本著名的漢學家白鳥庫吉的《東胡民族考》一書翻譯成中文¹²⁵。從方壯猷的經歷，大致可知他研究的範圍就是王國維晚年蒙元史、邊疆史地的研究，實際上這也是歐洲漢學、東方學的研究重心。清華學子畢業後繼續發展在校時的這種與世界漢學、東方學研究課題接軌的史學論著，接壤其師的研究傳統。

¹²³ 吳令華，〈沸血胸中自往來—追憶父親吳其昌教授〉，《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36、41、45。

¹²⁴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王觀堂先生儀禮講授記〉，收錄在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頁 231-258、300-312。

¹²⁵ 岳華，〈方壯猷傳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04。

高亨（1925 級）在自傳中寫到，在中學五年時即已在張文澍老師指導下學習許慎的《說文解字》，然到「大學生活，特別是清華研究院的生活，給我以很大的影響。當時有傑出的學者梁啓超、王國維擔任研究院的導師。」然「自少年時代就學習《說文》，後來又研究金石甲骨文字，寫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箋》凡幾十萬字，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古文自學的參考書¹²⁶」，而《金石甲骨文字通箋》是一部從《說文》入手考釋金甲刻石文字的專著，¹²⁷ 少年時依從《說文解字》，後來寫成的《金石甲骨文字通箋》，以甲骨金文「二重證據法」研治古文字學，毋寧又是王國維古文字學的研究方法。

杜鋼百（1925 級）早歲崇敬廖平的今文經學派，1925 年入清華國學院後，受教於王國維經史與甲骨學講座，梁啓超的史學講座，趙元任的語言學講座，期間雖曾受胡適學派的影響，但頗不以爲然，認爲胡適等以所謂「實證主義」觀點對待中國先民文化，乃歷史虛無主義，而於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極爲佩服，在清華一年，即寫成論文《先秦經學發微》，通過審查畢業。杜鋼百治經，雖曾師承廖平，但亦能突破師法，博採諸家，融會貫通，如廖平宗今文家，而杜鋼百則通今古文而治之，認爲今古文各有是非，不可偏執。如他對《周禮》一書，認爲是西周初期總結夏殷以前統治政教學之結晶品，其爲周制之可見者，確有古史史料根據。是以杜鋼百批判古史辨派，認爲彼輩承今文學派餘緒，動輒言某某爲僞經，某某爲僞書，一味否定中國民族傳統史料，鄙視中國民族優良傳統之經學，砍掉中國三千年歷史，否定

¹²⁶ 高亨，〈高亨自傳〉，《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09-110。

¹²⁷ 董治安，〈高亨先生傳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14。

中國古代文化，實為民族虛無主義者¹²⁸。

是以杜鋼百從廖平今文學的立場出發，到後來持平看待今文經學，甚而批評受今文經影響而起的疑古派史學，其中最重要的知識轉折點，大致上是受清華國學院王國維的經史與甲骨學講座影響，前文已分析，清華國學院諸位導師，對於導致近代中國疑古派史學的思想淵源今文經學其實都有諸多的批評，清華國學院的學術風格，非走疑古的路線，而是走謹慎的考證各項史料，並用王國維當時劃時代的「二重證據法」的學術取徑，去擴大史料的研究範圍建立中國可信的歷史，杜鋼百從今文經學的信徒，轉而批評疑古學派，其思想的轉變，當是由清華國學院的學風所致。

劉節（1926 級）則是參與古史辨辯論的人，他在清華國學院中，對業師王國維、梁啟超是至為尊重地。劉節治學思想的形成，他後來自己有過追述，他承認早年受胡適、顧頡剛的影響較大，如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後，就否定金履祥的《通鑑前編》。當顧頡剛與柳翼謀、劉棻黎討論古史時，劉節則認為顧氏的見解，很能廓清古史中的迷霧，隱隱約約有建立一套科學的、實證的古代史的意思。然而進入清華國學院後，王國維的治學對劉節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劉節讀過王國維的《古史新證》，才感到認識古史的真面目。他還說學會了甲骨文和金文，就不相信三皇五帝的說法。後來在 1934 年劉節為《古史辨》第五冊寫過一篇「序言」，對他的治學思想有所表述，劉節認為上古史料最感到麻煩的是其中夾雜著傳說的成分太多，主張要下決心把這些傳說成分提煉出來，然後正確上古史才能發現，由於他

¹²⁸ 趙彥青，〈杜鋼百傳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31-137。

不滿足於在幾部有限的古籍中翻來覆去地輾轉傳述，故又向殷墟書契同兩周金文來開拓出新的境地，這是他轉向研究甲骨、金文的原因。劉節自認他自己研究古史是有破有立¹²⁹，故劉節研究古史的「有破」自是受到胡適、顧頡剛疑古學派的影響，然他終究於古史研究是走「重建史實」的「有立」路線，其方法則是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用甲骨文、金文證古代文獻的取徑，並據以擺脫疑古學派的籠罩，這是很典型的清華國學院學風。

朱芳圃（1926 級）於清華國學院時期，從王國維習訓詁學，趙元任習音韻學，梁啟超習歷史學，陳寅恪習梵文，李濟之習考古學，然後致力於金石文字學和古代史的研究工作。1961 年寫成《殷周文字釋叢》，他在該書前言說：

在考古學上之功用，視地下發掘之遺跡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吾國現存文字，以殷代之甲骨，兩周之吉金為最古，距離創造時期雖已遙遠，然由流溯源，參互比證，先民制作之初意，固歷歷可考也。¹³⁰

此為王國維的古文字學的流風餘緒，而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亦是啓發近代中國文字、訓詁、聲韻學大家楊樹達的著作¹³¹。

戴家祥（1926 級）生平最敬佩王國維，早年就已讀過《觀

¹²⁹ 李錦全，〈劉節先生生平及其治學述略〉，《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188-190。

¹³⁰ 陳紀祥，〈中國古文字學家朱芳圃〉，《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 228-229、233。

¹³¹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934 年 7 月 17 日條，頁 59。

堂集林》，進入清華國學院後，王國維鼓勵他專攻古文字學，這正是他生平之願，他回憶每當王國維上課時，不僅研究生，而且連本科生和大學助教也來聆聽。王國維講《儀禮》、《說文舉例》，用他研究的金文、甲骨文來證明許慎著的《說文解字》的錯誤之處，這對他的治學起了極為關鍵的啓迪作用¹³²。戴家祥認為王國維引殷商制度，創造性地解讀甲骨文字，融會貫通文字的偏旁組合，剖析孳乳繁化的文字，歸納比較其發展變化的規律；闡明一形簡繁的特殊變化和兩字合書的通則，用甲骨文考察金文，再由金文糾正許慎的《說文解字》，創造、理通文字變化的規則，探索、發掘其中的奧妙，實為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真學問。所以戴家祥自投奔王國維的門下，才得以探賾索引，潛心撰述¹³³。

1928年時他寫了〈釋千〉、〈釋百〉、〈釋甫〉、〈釋皂〉刊登在陳寅恪主編的《國學論叢》上，這些文章大致上是遵循王國維的古文字學的「二重證據法」的取徑，廣用甲骨文字來釋證《說文解字》¹³⁴，戴家祥認為人們重視金文、甲骨文之研究，不是為了獵奇。因為學會古文字，是打開殷周史料寶庫的一把鑰匙，鑰匙對不上號，史料寶庫的門檻是跨不進的¹³⁵。戴家祥一生的學術志業大致上都遵循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在古文字學領域研究方法，晚年並成金文研究的大作《金文大字典》一書。

王靜如（1927級）1923年中學畢業後，他借錢到北京入民

¹³² 戴家祥著，〈人生和學術〉，收錄在王文耀整理，《戴家祥學述》（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9-11。

¹³³ 戴家祥著，〈釋字〉，《戴家祥學述》，頁104。

¹³⁴ 戴家祥，〈釋皂〉、〈釋甫〉、〈釋百〉、〈釋千〉，《國學論叢》，第一卷第四期，1928年，頁13-64。

¹³⁵ 戴家祥著，〈論甲骨文字學〉，《戴家祥學述》，頁75。

國大學語文系學習，爲了爭取公費曾經報考了幾所國立大學，都未能如願。於是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廣泛汲取知識。選修了邱椿、聞一多、黃侃和黎錦熙等先生講授的課程，開始接觸到漢語音韻和印歐語言方面的書籍，翻譯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研究漢語音韻的文章，並得到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等知名學者的指導與鼓勵，逐漸認識到語言學在研究工作的重要作用。自此對語言學產生濃厚的興趣，終於在 1927 年考入清華國學院，從師于趙元任，攻讀語言學專業，同時向陳寅恪和李濟學習歷史和考古。1929 年畢業後即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1933 年受研究所委派以海外研究員名義赴法、英、德等國進行語言學、中亞史語、印歐語比較語言學以及古代歐洲社會經濟史與藝術史等方面的研究。

王靜如在學術上涉獵廣泛，長期從事語言學、音韻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等領域的研究工作，在漢語音韻、秦漢史、古代與現代少數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鞏、吐番、達斡爾、土家、苗等民族的歷史、語言和文字，以及古代生產工具等學科的研究方面成效卓著。特別是在西夏的研究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1932 年到 1933 年撰著的《西夏研究》（共三輯）是他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品，主要內容是：1、對西夏語作多方面的探索與論述。2、對西夏文佛經雕版做了系統的研究論述。3、書中用較多的篇幅對四部西夏文佛經做了逐字對譯，辨識了四千多個西夏文字，並且列出了漢、藏兩種文字對照，這是重要的貢獻。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和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爲此書作序，稱讚他是使西夏研究走上科學道路的首創者，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也大爲稱

讚他使西夏研究走上高峰，1936年獲得法國院士會授予的東方學「茹蓮（S.Julien）獎金」。《西夏研究》以其豐富的內容與學術價值，從三十年代起至今都是中外學者從事西夏研究必備的參考書與教科書。另外王靜如在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卓有建樹。1930年發表〈跋高本漢的古漢語中的幾個問題並論冬蒸兩部〉，1941年發表的〈論開合口〉，以及1948年發表〈論古漢語之腭介音〉，後兩篇論文中充分肯定瑞典高本漢對中國音韻學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對通行了二十多年的高本漢學說也提出了某些懷疑，並論證了自己的見解。另外在中國少數民族歷史和語言、文字的研究及古代史和科技史的研究也有相關的論著¹³⁶。

從上面簡要敘述王靜如的學術歷程，首先是他的西夏研究，大致上可說是與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所開設研究的東方學研究領域相同，同時王靜如也能具有多種語言，在比較歷史語言學上，從印歐語歷史比較語言學、普通語音學、漢藏系語言比較、中亞史地語文去研究音韻學¹³⁷，這些知識領域與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所提到的「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及吐蕃，藏文之

¹³⁶ 冀宇，〈王靜如教授小傳〉，《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頁376-384。

¹³⁷ 王靜如在漢語音韻學的治學方法和意義，可參見馮蒸，〈大匠示人以規矩—從王靜如先生教我音韻學看王先生的治學方法〉，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下冊，頁565-583。

關係不待言。一佛教。¹³⁸」，這正是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所開設的東方學課程，及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的展現。在這研究領域上王靜如正是有所傳承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所開設的歐洲東方學的比較歷史語言學，並上攀歷史（西夏）的研究。

故陳寅恪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文中，推崇王靜如：

治吾國語言之學，必研究與吾國語言同系之他種語言，以資比較解釋，此不易之道。西夏語為支那語同系語言之一，吾國治其學者絕少，即有之，亦不過以往日讀金石刻辭之例，推測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較語言學之方法，於其同系語言中，考辨其音韻同異，探討其源流變遷，與吾國語言互相印證發明者。有之，…吾國人中蓋自王君靜如始。然則即此一卷佛母孔雀明王經之考釋，…要已足開風氣之先，而示國人以治國語之正軌，洵可稱近日吾國學術界之重要著述矣。¹³⁹

而在陳寅恪另一文〈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中，稱許王靜如將卷帙很少的西夏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

¹³⁸陳寅恪，〈與妹書〉，收錄在氏著，《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2。

¹³⁹陳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198。

本予以釋證，且「略有發明，斯固治西夏學者之一快也¹⁴⁰」。在學術領域（東方學的範疇）及研究方法使用比較歷史語言學，王靜如都似乎能傳其師陳寅恪在當時中國學術界少有的絕技，是由陳寅恪為學生寫了兩篇序文，確實少見。

又王靜如的研究課題可以說是整個清華國學院弟子中最與西方漢學、東方學接軌的學者。是以他所以會為中研院史語所網羅，應是基於這樣的學術背景考量。



¹⁴⁰陳寅恪，〈斯坦因 Khara-Khoto 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187。

(六)、小結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立時間雖只有短暫四、五年，惟辦學經費頗為寬裕，且網羅近代中國學術界典範性的學人作為導師（和講師），同時有著極具特色結合中西教育制度之長的書院制度，所培養的七十多位學生中，其中多位都成為近代中國文史學術界的重要人物，放在同時期的國學研究機構來比較，清華國學研究院都是其中最佳者。故對清華國學院學術的理解，除了導師輩所形塑的清華學風必須探究外，學生輩如何承先啓後繼續發展清華國學院的學術傳統，同樣是重要地。

本章盡可能蒐集這些清華學子的相關史料，並對其於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有影響者來加以評介。

而從以上考察清華國學院所培養的學者之學術可知，雖然他們每人的學術專業領域不盡相同，但某些層面仍然可以看出他們延續清華國學院幾位導師所形塑的治學精神，如（一）對西學的接受；（二）與歐洲和日本的東方學、漢學的接軌；（三）對疑古史學的批評；（四）新史料觀與「二重證據法」等。

在對西學的接受方面，清華國學院的學子在校時間即已受到國學院的導師（講師）的西學知識薰陶，而其中對於西學，則以對西方的中國及亞洲研究的東方學和漢學，以及西方新興的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學科知識最為關注。實際上，這也正是胡適「整理國故」運動中的重要學術主張，以此觀照當時清華國學院的學子，儘管他們於中國傳統舊學都有一定的修養，然處於 1920、30 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界全面向西方文化、學術開放吸收的階段，亦即是處於主流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激盪下，當時中國的國學研究

機構，也都是必須正視西方學術思潮的發展，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師法西方所長。

而同時期胡適、顧頡剛所引發的疑古史學也對中國學術界的傳統中國古史觀念形成重大的衝擊，因應這一新的學術發展，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也都對疑古史學對中國古史研究所引發的破壞性，作一學術的回應。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在史料上的自覺意識，其實與當時歐洲、日本的東方學、漢學在對待地下實物、檔案史料上的擴充態度，在學術精神上是一致地，他們都是想用更多樣多元的史料來建構更可靠的中國古代信史，或研治中國的古文字學，並進而對疑古史學和當時仍有極大影響力的「章黃學派」的修正。

是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在後來李濟引入西方新興的考古學，並擴展更多樣的史料及整體史料的新思維來研究中國歷史的對照下，不免有其不足之處，但「二重證據法」背後隱涵著史學研究方法中，對史料擴張的自覺意識、不限於傳統中國學術界只重書本文獻史料的觀念，以及對疑古史學過激之處的修正，其實已成為清華國學院的師生所形塑而成的重要治學風格，這必須放在當時中國史學界還多所懷疑「二重證據法」的學術氛圍中（如章太炎、錢穆、張爾田），方能求得更深的理解。

在新的史料觀和「二重證據法」上，清華國學院的學生中，徐中舒、謝國楨、姜亮夫、劉盼遂、吳其昌、高亨、杜鋼百、劉節、朱芳圃、戴家祥皆能延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來研治中國古史和古文字學，並進而修正疑古學派對中國古史的過激觀點和破壞，以及謝國楨延續梁啟超新史學的「史料觀」。而其中尤以徐中舒為最，他雖未直接從事現代考古學的田野工作，然他同

時受到李濟的影響，研究中已能使用田野考古所發掘的史料，進而形成所謂的「三重證據法」（「二重證據法」的文獻資料和甲骨文史料，外加考古學的「整體」史料觀點）；而在接受西學以及與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的接軌方面，如姜亮夫在敦煌學研究上接軌當時國際「敦煌學」研究的學術思潮；王靜如在西夏學研究方面已能融入西方的東方學主流的研究領域；而吳金鼎更是受李濟影響而投入現代考古的工作，後來更遠赴英國接受現代考古學的專業學術訓練，回到中國後更參與中研院及其他的田野考古工作，在龍山文化城子崖的考古部分更是有極重要的貢獻；而衛聚賢半業餘的田野考古也為二十世紀中國新興的考古事業提供另一值得注意的貢獻；而王力在趙元任的啟蒙下學習現代西方新的語言學知識，革新了中國傳統的語言學傳統，並為二十世紀中國新的語言學研究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是以清華國學院這些學子在學術的傳承過程中，著實延續了其師的學術方法和精神，對於處於 1920、30 年代中國的「整理國故」運動及疑古思潮之下，他們一方面能體現了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所揭櫫的向西方學術、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的學習方向，汲取其中新的研究方法、理念；然另一方面則又能在疑古學派衝擊中國學術界之際，不跟從其對中國古史研究過激之處的觀點，而轉以承繼清華國學院導師們所形塑的學風，審慎地去開發更多元的史料、研究工具和知識理念的態度（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梁啟超「新史學」的對待史料的態度，陳寅恪的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的比較歷史語言學方法，李濟和趙元任引入西方新的考古學和語言學的學科知識等等），並據以來重建中國古代的信史。

綜觀清華國學院的第一代導師（講師）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於國學院結束後，就投入當時傅斯年領導開創的中研院史語所新學術傳統的建構，而第二代學生輩的徐中舒、王靜如、吳金鼎也進入中研院工作，而其他學子則分散於中國各文史研究機構中，他們各自的學術努力與成就，實際上已將清華國學院的學風散佈深根於二十世紀中國新學術傳統的建構中，使得清華國學院的學風以另一形式持續著他的生命發光發亮。



結論

2012 年之際，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位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講師李濟和國學院的主任吳宓都早已經過世多年了，而在 1925 到 1929 年那四年國學院所培養的七十多位學員，截至目前為止也都不在人間了，然而這個距今業已消逝八、九十年的國學研究院，反而在中國大陸，引起了諸多的懷念，甚至在 2009 年 11 月 1 日中國大陸的清華大學又重新以同樣的國學研究院名義成立（或說復活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而與當年同時期最重要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目前已爲人所淡忘而言，懷想清華國學研究院這個現象，背後當蘊含著某種在近代中國學術史或思想史的重要意義。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就提到：

我們是要總結歷史經驗，繼承老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那種新國學研究的精神和方法…。今天為什麼要叫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院當然是繼承清華的老品牌，是它的精神上的延續。¹

這種想要將 1920、30 年代的清華國學院傳統予以恢復，自然代表著這一老傳統的難能可貴。

以一個只存在四年餘時間左右的學術機構，卻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獲得與其成立時間不成比例的聲望和影響力，自然有其

¹ 〈新國學之路—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光明日報》，2009 年 10 月 26 日。

值得探究之處。國學院的四位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講師李濟、主任吳宓，誠然是讓清華國學院成爲傳奇的最重要因素，因爲這些人的背後，都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某些重要文化和學術的典範，然而國學院並非只靠師長就能成就巨大的聲望，那四年多所教育而成的學子，後來在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界，很多都佔有引領一方學術風潮的佼佼者，如以收錄頗豐的《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大辭典》(高增德主編，書海出版社 1994 年版)爲據，列有條目的清華國學院同學共二十七人，所分布的學科大體爲：

歷史學：周傳儒、方狀猷、謝國楨、劉節、陳守寔、衛聚賢、藍文徵

歷史地理學：王庸

考古學：吳其昌、朱芳圃、吳金鼎

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徐中舒

考古學、古文字學：余永梁

金文甲骨學：戴家祥

經學、歷史學：杜鋼百

中國哲學史：高亨

目錄學、歷史學：姚名達

目錄學：劉紀澤

民族學、民族語言學：王靜如

語言學：黃淬伯、王力、姜亮夫

音韻學：裴學海

古典文學研究、語言學：劉盼遂

古典文學研究：陸侃如

文學批評史：羅根澤

法律史學：楊鴻烈²

這些已接近全部清華國學院畢業同學一半了，而這些學生畢業後狀況，依據藍文徵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中提及：

研究院同學…先後留學英、法、日本的，有陸侃如、周傳儒、王力、姜亮夫、劉節、虞君質、張昌圻、楊鴻烈、黃綬、宋玉嘉及筆者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約五十餘人；留學諸人於抗戰前，也均返國任教。抗戰期中，同學在各大學任教務長、訓導長、院長、研究所主任及文、史兩系主任的，約有十七八人，被譽為好教授的，為數更多。³

從這兩個資料檢視清華國學院畢業學生七十餘人而言，這種成就誠然是輝煌的。

精研中國教育史的陳平原更舉出同時期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來作比較，他以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建立，標誌著中國的研究生教育逐漸走上正軌。教授的業績不錯，學生的情況卻很不樂觀，最主要的原因是經費太少了。據 1923 年底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概略》可知，到那年年底，北大經過學術委員會審查

² 轉引自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一書中夏曉虹〈緣起〉，頁 3-4。而其中的分類，有些不能盡學者之所長，如姜亮夫在音韻、古文字學、史學也都有著述；另如朱芳圃、吳其昌也在古文字學、金文甲骨上都有所長。

³ 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先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144-145。

合格的研究生，總共只有十六人，其中提交研究報告的是五人六種，包括羅庸的《尹文子校釋》、容庚的《金文編》、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編》等。這些都是不錯的著作，可是兩年多才培養這幾個學生，未免太少了。另外到了 1927 年底，整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審查合格的研究生，也只有四十六名，其中好些還是「通訊研究者」。研究所整整辦了五年，總共才十人正式提交了十四種論著，實在說不過去。而當年清華的規模效應，很快就顯示出來了。

清華國學院第一年錄取新生 33 名，實際報到 29 人。第二年 36 名，第三年 24 名，第四年 13 名，研究院規定，第一年學完，有研究成果，表現優秀的可以再申請一年，因此，其中有些是重疊的。當年清華研究院是給學生發獎學金的，學生當然願意繼續研究。合起來四屆學生中，真正完成學業的，共有 74 人，其中表現出色的，是前兩屆，即 1925、1926 年入學那兩屆。陳平原比較北大與清華兩校的國學研究所成績後，認為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北大的經費遠不及清華，能花在研究所的錢很少⁴。

陳平原從經費層面去分析當時中國兩所最重要的國學研究所，何以辦學成績有高下之別，誠然有其意義，畢竟從前文的分析，清華因為庚子賠款的經費充足穩定，此與北大仍需受限於北洋政府（後來是國民政府）的教育部經費預算的不足，是以在辦學績效上呈現差異。然從學術層面、文化層面而言，清華國學院因緣際會的聚集了五位導師（及講師），如何炳棣先生所說的是

⁴ 陳平原，〈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收錄在氏著，《大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36-37。

「富可敵國」的教師陣容⁵，這對於創造清華國學院的傳奇必然是其中的關鍵。

2009年11月1日中國的清華大學重新建立新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時，余英時先生有一短文〈賀清華國學院浴火重生〉，其中指出清華國學院兩個重要的現代特色。一、是國學院對於多元觀點所表現的兼容並包的精神，導師之所以受聘，是基於一流的專業成就，不因政治或文化取向的不合時宜而有所影響。這精神與蔡元培辦學北大及五四的精神一致；二是向世界最新學術保持完全開放的態度。如王、梁二導師在此是開風氣者，陳寅恪的引進西方研究（東方學），趙元任的普通語言學、方言學、音韻學，李濟的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等皆是⁶。余先生文章因限於賀文性質，所論較短，但卻指出清華國學院最重要的學風。在此可以從本論文前面的分析再予以佐證說明。

當1925年清華國學院成立之初，校長曹雲祥即徵求胡適的意見，並想找胡適來主持院務，後來雖未成行，但胡適從制度的構想到教授聘請，都積極參與其事，而1925年之際，當時中國學術界已先由胡適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作為「新思潮的意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而後因應這種「整理國故」的主張，北京大學首先在1922年成立了研究所國學門，1923年1月胡適在國學門所辦的正式刊物《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新國學研究綱領，此時在中國各地已掀起了國學研究的熱

⁵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序言〉，頁6

⁶余英時，〈賀清華國學院浴火重生〉，收錄在氏著，《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頁110。

潮。而「整理國故」強調的「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主張，其取徑則是在中國清代具有科學精神的考證學上，再援引西方具有實驗主義的科學精神，而其師法的則是以當時西方漢學、東方學為典範（如高本漢、伯希和），這基本上是這股新國學運動最核心的觀念，⁷ 而這一思潮再加上之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賽先生」（科學）的崇拜，在中國學術界中，造成「價值」與「事實」分離的民國新史學的學風，當時的學人（如張蔭麟）就稱此學風是「新漢學」，而同時在正式建制性的學術機構中，這種新漢學的研究學風可以說是評價學人最高的「價值層級」。而胡適是在清華國學院創建過程中的重要幕後者，在他給清華曹雲祥校長的建議中，就完全是以學術上的成就，而不是文化和政治的理念去思考聘請導師。

是以循此原則，在整理國故的思潮下，政治、文化態度保守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雖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馳，但仍然受聘到清華國學院中，畢竟梁啟超早先時期所倡導的「新史學」，在理論上開啓了中國現代史學的先聲；而王國維則以嚴密具「科學精神」的「二重證據法」在殷商古史和古文字學研究上，具體的實踐「新史學」的精神；而陳寅恪長期在歐美留學，學習當時胡適新文化派、新漢學派最推崇的歐洲漢學、東方學，雖他當時著述還少，但早在留學生圈及學界頗有聲名，所以也在吳宓力薦下受聘任教。而另外李濟與趙元任倒是比

⁷ 「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主張而言，就算治學風格仍在傳統中國學術範疇的東南大學國學研究院，他們在〈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中，對於如何規劃國學的研究，仍勉強的提出「以科學理董國故」的方法，雖然在計劃書中不免有所懷疑科學能否治理國故，然仍然必須要面對當時中國主流學界所提出的這一治學主張。

較像現代型的學人，沒有傳統中國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負擔，在西方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最能體會西方學術中的科學精神，於是專注於客觀的學術研究領域。故這五位導師（講師），不因他們的文化、政治觀點的差異，而有所影響清華國學院的學術研究，因為他們畢竟在「價值」與「事實」分離的新史學研究風氣之中，在學術上謹守其學術紀律。而兼容並包的精神，也使得清華國學院有最大的學術自由，不必受任何意識型態所干擾。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稱許王國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⁸，或允為清華國學院的無形精神資源。

另外清華國學院在向世界最新學術保持完全開放的態度上，在當時中國多個國學研究機構中，是最為成功的。梁啟超對西學的認識或來自於日本轉譯的西學，而王國維已能用英文、日文來接觸當時西學及日本所接受的西學，在前文中都已經有所分析，在中國史學現代化的過程中，梁啟超的啓蒙之功，和王國維的實踐之業，都開啓了清華國學院追求中國學術現代化的方向，稍後回國的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都直接長期在西方受西學的薰陶，回國之後全力推動西學的新學問在清華國學院中，誠然當時的北大國學門也積極想要與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借鏡⁹，然或是因為北大國學門成員混雜，且受日本東洋學（新式漢學）的影響甚于西洋的東方學，¹⁰且沈兼士一派的章門弟子仍然在北大

⁸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18。

⁹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政大歷史系，1999），頁 177-220。

¹⁰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 392。

國學門居最重要的勢力，胡適並不是主其事的人，而這些章門弟子在治學取向上確實與當時國際學界歐洲的漢學、東方學有所隔閡，儘管他們也聘請當時歐洲的漢學家伯希和、衛禮賢（Dr. R. Wilhelm）等人為通信研究員，且《國學季刊》上有諸多的國外東方學論著的登載，但這與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直接在清華國學院課堂的演講中，將當時西學（歐洲的漢學、東方學）和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現身說法傳授給學生的方式，有所不同。放眼當時北大國學門的章門弟子實際上並沒有像清華這幾位導師的學問知識和研究取徑，是以清華國學院得以在當時中國國學研究領域中居於一種特殊的地位，後來中國現代史學最重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的時候，就幾乎完全借用清華國學院這幾位預世界學術之流的導師，來建立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學術之路。

最後我們試圖從中國近代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待清華國學院的定位。清華國學院的產生是在 1920、30 年代中國「整理國故」的風潮之下建立，而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上的新國學研究綱領，幾個主要的內涵，包括結合中國清代考證學的方法和精義，以及最重要的歐洲漢學、東方學的比較歷史語言學、新的史料的運用（例如敦煌學簡牘等新發現的史料）、新的語言學（方言學）、新的科學考古學，既有新的學科知識，又有新的史料，同時且有新的研究工具，這些學術主張在清華國學院中，一則透過學校課程制度的安排來實現「整理國故」的主張；二則清華國學院的幾位老師多少都懷有新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的特長，所以使得一個看來在文化、政治取向保守的國學研究院，反而在治學的方法和觀念上，都呈現最現代化的一面，國學院的導

師們在學術理論與實踐上，很多層面都與「整理國故」的一些重要學術主張相契合，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不見得會去強調「整理國故」的口號。

而〈《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要求國學家先在專史上建立起一個基本架構，然後綜合成一部「中國文化史」的總系統，這是「整理國故」的中心意義之所在¹¹，以此來分別看清華國學院導師們，和後來這些學子在學術的領域表現，大致上他們都在專史上有所表現，是以清華國學院是 1920、1930 年代中國「整理國故」的新學術運動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在「整理國故」運動之際，清華國學院也有其特有的學術立場，或許它沒有像北大國學門有〈《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以及之後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這些醒目的宣言式文章，足以震動學界，然而清華國學院雖在「整理國故」運動的氛圍下成立，且顧頡剛《古史辨》引起的「疑古派」史學，實際上也是屬於「整理國故」運動下的分支，同時是當時影響中國最大的學術思潮，是以清華國學院自然同時也面臨疑古史學的衝擊。於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學院中最重要的導師王國維，所開設的「古史新證」的課程，其實正以著新的史料觀點，運用「二重證據法」來考證建立中國古代可靠的「信史」，雖然清華國學院沒有宣言式的文章，來大張旗鼓提倡他們的學術見解，並反駁疑古史學對中國史學的破壞¹²，但是透過老師輩以及學生輩兩個世代一篇又一篇的論文或著作，具體的以「二重證據法」來建立中國上古信史，實際上

¹¹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1994），頁 240-242。

¹² 當然疑古史學在史料的鑑定，及史學思想和方法上都有突破傳統中國史學的一面，對中國史學的現代化有重要的貢獻，但疑古過甚也帶來某些負面的影響。

是對疑古史學過激的地方予以修正，同時也是對晚清民國以來「章黃學派」保守傳統的書本資料主義的治學方法的超越，在「章黃學派」的保守治學，和「疑古學派」的激進治學中間，毋寧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及學生透過謹慎的考證史料，同時又運用多種史料，來建立可靠的歷史圖像，他們取得了中間的平衡點。

又清華國學院的學風不斷的進步，如李濟的考古學所考量「整體的」史料觀點，是比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更上一層，是以「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的清華國學院，雖然在中國學術的現代化過程中，必須作專業的分科制度，故在 1929 年結束了約四年多的國學院運作後，有形的教育制度雖然不見了，但是隨著這四年所教育而成的學子散落在中國各地的學術界，持續使得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得以延續下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國學院的三位導師（講師）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位進入了傅斯年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語所中，擔任各分組的領導人，其他國學院的學子徐中舒、吳金鼎、王靜如也參與這一新學術機構學術傳統的建構，故清華國學院的學術精神，也在中研院史語所的新學術之路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學術資源於其學術精神的形塑中，而其他的清華學子畢業後也廣佈於中國眾多的文史學術機構中，持續將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化成中國學術現代化過程中最不可忽略的學術動力之一。

徵引書目

一、中文專書：

《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週年演講會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2000)。

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
中華書局，2010)。

王力，《中國古文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王力，《王力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王力，《龍蟲並雕齋瑣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3
初版二刷)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台北：時

- 報出版公司，1992 初版二刷)。
-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一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 王爲松編，《傅斯年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 王國維，《古史新證》(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 王國維著，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上、下冊，(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 王國維講述，吳其昌、劉盼遂記，《觀堂授書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
- 王啓龍、鄧小咏，《鋼和泰學術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王晴佳，《台灣史學 50 年—傳承、方法、趨向》(台北：麥田，2002)。
-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
- 司馬朝軍、王文暉合撰，《黃侃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主編，《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四川：巴蜀書社，1998)。
- 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 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 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牟潤孫，《海遺雜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0）。
-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
-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 余建偉、沈松平，《馬衡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台北：時報出版公司，2010）。
-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八刷）。
-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1997 二版三刷）。
-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
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 余英時，《余英時文集（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台北：聯經
出版公司，2004）。
- 余英時，《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
2010），頁 110。
-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
二版）。
-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麟－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
書局，1995 再版）。
- 余英時，《會友集（上）》（台北：三民，2010）。
-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台北：
東大，1996）。
-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87）。
- 余英時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

- 經出版公司，2008)。
- 吳宓，《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三冊及第四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
-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2月重印)。
- 吳宓著，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三刷)。
- 吳學昭整理、校注、翻譯，《吳宓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台北：華世出版社影印，1985)。
- 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
- 李又寧編，《胡適與他的朋友》(台北：紐約天外出版社，1990)。
- 李方桂著，《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 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97)。
- 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 李賦寧等選，《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6)。
- 李濟，《安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李濟著，李光謨、李寧編，《李濟學術隨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李濟著，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 李濟著，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李濟著，張光直主編，《李濟文集（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1996）。
-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2004）。
-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上、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84）。
-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沈衛威，《吳宓傳》（台北：立緒文化公司，2000）。
-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 汪榮祖，《章康合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 汪榮祖主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 周予同著，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二刷）。
- 尙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岱峻，《李濟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二版二刷）。
- 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 邵盈午，《清華四大導師》（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 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 姜亮夫，《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十四—敦煌學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漢語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二十一—史學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 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 施耐德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
- 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 段昌國等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
- 胡守爲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 胡適，《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1994）。
- 胡適，《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台北：遠流，1986）。

- 胡適，《胡適作品集 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台北：遠流，1986）。
-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遠流，2005）。
- 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
- 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
- 孫永如，《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 孫敦恆，《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 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 孫敦恆等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 120 週年學術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 徐中舒，《先秦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徐中舒，《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1999）。
- 馬克鋒編，《國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0)。
- 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 馬悅然著，李之義譯，《我的老師高本漢》(長春：吉林出版公司，2009)。
- 馬衡，《馬衡講金石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 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
- 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 張湧泉編，《漢語史學報》，第三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張舜徽，《清儒學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黃侃的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
-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四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合刊)》(臺北：里仁書局，1984)。
-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收錄在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合刊)》(台北：里仁書局，1984)。
-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九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書店，2008)。
-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輯，《清華大學史料選編》，4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1994)。
- 清華大學校史組編輯，《清華人物志》，3輯，(北京：清華大學

- 出版社，1983-1995)。
- 清華大學校史編輯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新華書局出版，1981)。
-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台北：唐山，1987)。
-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 陳平原，《大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 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
- 陳洪波，《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1928-192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一)—韓柳堂集(合編)》(台北：里仁書局，1980)。
-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合編)》(台北：里仁書局，1981)。
-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0)。
- 章太炎，《國學略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尙書(初刻本 重訂本)》(香港：三聯書店，1998)。
- 傅宏星，《吳宓評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二、三、四冊，(臺北：聯經，1980)。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再版）。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台北：麥田，2002）。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

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

黃侃著，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第中、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黃清連編，《結網集》（台北：東大，1998）。

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2）。

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台北：大塊文化，2005）。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台北：桂冠出版社，2000）。

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 1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 2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 3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齊家瑩編撰，孫敦恒審校，《清華人文學科年譜》（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劉正，《圖說漢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劉東，《道術與天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台北：風雲時代，2008）。
-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二刷）。
- 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 鄭家建，《清華國學院論述》（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0）。
- 盧毅，《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三版）。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90）。
-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再版）。
- 戴家祥著，王文耀整理，《戴家祥學述》（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5）。
-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 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三聯書店，2003）。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羅崗、陳春艷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 嚴耕望，《治史答問》（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 三版）。
-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
- 嚴紹盪，《日本中國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 蘇雲峰，《抗戰前的清華大學 1928-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店，2011）。
-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二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 顧頡剛，《顧頡剛書信集》，五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

二、史料、論文

- 〈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事〉，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358-361。
- 〈研究院章程〉，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下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665-670。
-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劃書〉，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331-339。
- 《實學》，第一期，1926 年 4 月，「本刊啓事」（未標頁數）。
- 《學衡》雜誌簡章，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

- 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352-353。
- 丁邦新，〈「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先生〉，收錄在李方桂著，《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195-210。
- 毛子水，〈國故與科學的精神〉，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文末所附的〈傅斯年附識〉，頁 264-265。
- 毛子水，〈國故與科學的精神〉，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249-263。
- 方壯猷，〈吳其昌教授事略〉，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2-24。
- 卞趙如蘭，〈趙元任和史語所〉，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95-102。
- 王力，〈我的治學經驗〉，收錄在氏著，《龍蟲並雕齋瑣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273-286。
- 王力，〈黃侃古音學評述〉，收錄在氏著，《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63-398。
- 王力，〈新訓詁學〉，收錄在氏著，《王力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2-280。
- 王力，〈談談怎樣讀書〉，收錄在氏著，《龍蟲並雕齋瑣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252-267。
- 王力，〈積極發展中國的語言學〉，收錄在氏著，《王力文選》（北

-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15。
- 王力，〈懷念趙元任先生〉，收錄在氏著，《龍蟲並雕齋瑣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303-306。
- 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463-488。
- 王汎森，〈一個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05-320。
-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爲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收錄在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157-209。
-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489-516。
- 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收錄在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109-156。
- 王汎森，〈陳寅恪與傅斯年〉，《聯合報·副刊》，37 版，1995 年 12 月 14 日-15 日。
- 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21-340。
- 王汎森，〈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

- 公司，2003)，頁 517-525。
-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77-462。
- 王汎森，〈錢穆與民國學風〉，收錄在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11-270。
- 王汎森編註，《陳寅恪的未刊往來書信》，《當代》，第 123 期，1997 年 11 月，頁 64-68；及第 124 期，1997 年 12 月，頁 52-61。
- 王國華，〈《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2。
-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208-212。同時收錄在馬克鋒編，《國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0），頁 273-274。
-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收錄在氏著，《古史新證》（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頁 73-78。
-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下冊，（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 128-143。
-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新學問〉，收錄在干春松等編，《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上冊，（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 175-180。
- 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裘錫圭，〈前言〉，頁 1-18。
- 王國維講述，吳其昌、劉盼遂記，《觀堂授書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頁 113-124。

- 王森然，〈梁啓超先生評傳（節錄）〉，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9-34。
- 王道還，〈史語所的體質人類學家—李濟、史祿國、吳定良、楊希牧、余錦泉〉，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163-187。
- 王蘧常，《吳子馨教授傳》，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5-27。
-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張永堂譯，〈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收錄在段昌國等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頁 1-20。
- 白壽彝，〈悼念顧頡剛先生〉，《歷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頁 99-103。
- 朱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收錄在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87-97。
- 牟潤孫，〈論清代史學衰落的原因〉，收錄在氏著，《海遺雜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0），頁 69-76。
- 伯希和，〈王國維〉，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52-354。
- 何炳棣，〈清華史學對我影響深遠〉，《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頁 1-3。
- 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八刷），頁 77-91。
- 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收錄在氏著，《人文與民主》

- (台北：時報出版公司，2010)，頁 39-64。
- 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收錄在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麟—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5 再版)，頁 17-29。
- 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錄在氏著，《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1997 二版三刷)，頁 93-107。
-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收錄在氏著，《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 二版三刷)，頁 1-29。
-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啓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錄在氏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483-512。
-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錄在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頁 247-270。
- 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收錄在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87)，頁 47-75。
- 余英時，〈明明直照吾家路〉，收錄在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2011 二版一刷)，頁 43-52。
- 余英時，〈記吳宓的「殉道」精神〉，收錄在氏著，《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頁 133-139。
- 余英時，〈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收錄在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2011 二版一刷)，頁 3-68。
- 余英時，〈賀清華國學院浴火重生〉，收錄在氏著，《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頁 108-111。
-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錄在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2011 二版一刷)，頁 315-358。

余英時，〈學術思想史的創建及流變〉，收錄在氏著，《余英時文集（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363-372。

吳令華，〈沸血胸中自往來—追憶父親吳其昌教授〉，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4-46。

吳其昌，〈王靜安先生學述〉，《國學論叢（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頁 181-198。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收錄在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頁 231-258。

吳宓，〈空軒詩話十一：王國維詠史詩〉，收錄在氏著，《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192-193。

吳宓，〈空軒詩話十七：柳翼謀詒徵〉，收錄在氏著，《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201-203。

吳宓，〈空軒詩話十二：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收錄在氏著，《吳宓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193-196。

吳宓，〈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收錄在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 183-192。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收錄在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 173-182。

吳宓，〈論白璧德·穆爾〉，收錄在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 24-32。

吳宓，〈論新文化運動〉，收錄在徐葆耕編選，《會通派如是說—

- 吳宓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 3-23。
- 吳振漢，〈吳宓與毛彥文—鉅變時代下的兩性關係〉，《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23 期，2001 年 6 月，頁 235-267。
- 吳懷祺，〈王國維古史新證和二重證據法〉，收錄在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頁 232-246。
- 杜正勝，〈史語所過去、現在與未來〉，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1-22。
-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第 116 期，1995 年 12 月，頁 10-29。
-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收錄在氏著，《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2004)，頁 119-156。
-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1-41。
- 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李濟〉，收錄在氏著，《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2004)，頁 174-215。
- 杜正勝，〈舊典範與新典範〉，收錄在《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週年演講會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 15-41。
- 李光謨，〈李濟先生學術年表〉，收錄在氏著，《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頁 353-358。

李光謨，〈晉南之旅和西陰村遺址的發現〉，收錄在氏著，《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88-92。

李光謨，〈從梁任公的家書看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軔〉，收錄在氏著，《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6-10。

杜維運，〈傅孟真與中國新史學〉，《當代》，第 116 期，1995 年 12 月 1 日，頁 54-63。

李學勤，〈談王國維先生古史新證〉，收錄在孫敦恒等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 120 週年學術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2-9。

李澤厚，〈梁啟超王國維簡論〉，收錄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 441-460。

李錦全，〈劉節先生生平及其治學述略〉，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84-198。

李濟，〈小屯與仰韶〉，收錄在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234-241。

李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19-28。

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收錄在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60-70。

李濟，〈中國最近發現之新史料〉，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 92-96。

- 李濟，〈回憶中的蔣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雙橡園〉，收錄在氏著，《李濟文集》，卷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223-226。
- 李濟，〈考古學〉，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88-91。
-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 33-79。
- 李濟，〈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9-32。
- 李濟，〈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收錄在氏著，《李濟文集》，卷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207-215。
- 李濟，〈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收錄在氏著，《李濟文集》，卷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3-6。
- 李濟，〈新鄭的骨〉，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 3-18。
- 李濟，〈關於王國維的兩點評論〉，收錄在李光謨、李寧編，《李濟學術隨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206-208。
- 沈兼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報告〉，收錄在氏著，《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67-368。
- 沈兼士，〈籌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經費建議書〉，收錄在氏著，《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62-364。
- 沈衛威，〈學分南北與東南學風—現代大學學術的南北差異〉，收錄在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編，《新國學研究》，第 4 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 240-290。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錄在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513-573。

周傳儒，〈王靜安先生傳略〉，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42-258。

周傳儒，〈自傳〉，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88-101。

周樑楷，〈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歷史觀點—從西方學術背景所作的討論（1880-1930）〉，《台大歷史學報》，第 20 期，1996 年 11 月，頁 101-127。

岳華，〈方壯猷傳略〉，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02-108。

林毓生，〈中國人文的重建〉，收錄在氏著，《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二版二刷），頁 3-55。

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玄學論爭」的省察〉，收錄在氏著，《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 277-302。

林錦源、陳淑玲，〈吳金鼎在中國史前考古學上的貢獻〉，《考古與文物》，2003 年第 3 期，頁 69-80。

林麗月，〈梅光迪與新文化運動〉，收錄在汪榮祖主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383-402。

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1-13。

姜亮夫，〈《成均樓論叢》序錄：《文字樸識》〉，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07-109。

姜亮夫，〈《成均樓論叢》序錄：《近百年學術年表》〉，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76-77。

姜亮夫，〈中國學術原衍闡微〉，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31-133。

姜亮夫，〈四十自述〉，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34-45。

姜亮夫，〈史學論文集序〉，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二十-史學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1-22。

姜亮夫，〈自定年譜〉，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399-420。

姜亮夫，〈自傳〉，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248-253。

姜亮夫，〈我為什麼要編《經籍纂音》〉，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漢語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114-117。

姜亮夫，〈我與敦煌學〉，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十四—敦煌學論文集》（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429-432。

姜亮夫，〈拜師與師說—憶章太炎先生〉，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296-305。

姜亮夫，〈思師錄〉，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0-25。

姜亮夫，〈研究國故應有的基本知識與應具備的工具書〉，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34-150。

姜亮夫，〈漢語語言學研究的補充說明〉，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漢語論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215-220。

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收錄在氏著，《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68-180。

姜亮夫，〈謝本師—學術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回憶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353-361。

姜亮夫，〈讀史與古漢語知識〉，收錄在氏著，《姜亮夫全集十八—回憶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181-120。

柳詒徵，〈講國學宜先講史學〉，收錄在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468-474。

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先生〉，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92-297。

胡厚宣，〈我和甲骨文〉，收錄在氏著，《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 107-126。

胡偉希，〈多元文化的選擇與尋求—論清華學派的文化觀〉，《學術月刊》，1993 年第 10 期，頁 14-20。

胡偉希，〈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三論清華學派的文化觀〉，《學術月刊》，1995 年第 11 期，頁 15-19。

胡偉希，〈清華學派的日神精神—兼論 20 世紀中國的學術類型〉，《學術月刊》，1998 年第 1 期，頁 30-37。

胡偉希，〈清華學派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四論清華學派〉，《學術月刊》，1996 年第 6 期，頁 3-10。

- 胡偉希，〈傳統與現代性—再論清華學派的文化觀〉，《學術月刊》，1994 年第 8 期，頁 3-10。
-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1994），頁 229—245。
- 胡適，〈再談整理國故〉，馬克鋒編，《國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406-408。
-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頁 345-358。同時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 143-156。
- 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347-351。
-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台北：遠流，1994），頁 155-185。
-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2—胡適文選》（台北：遠流，1994），頁 41-50。
- 胡適，〈實驗主義〉，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 61-112。
-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收錄在氏著，《胡適作品集 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台北：遠流，1986），頁 157-161。
- 韋祖輝，〈皓首盡瘁，史壇垂芳—謝國楨先生傳略〉，《明史研究》，第二輯，1992 年 8 月 25 日，頁 18-26。
- 唐嘉弘，〈從徐中舒的治學看史語所的學風〉，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上 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1998），頁 311-318。

夏鼐，〈追悼考古學家吳禹銘先生〉，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64-268。

孫敦恒，〈吳宓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收錄在李賦寧等選編，《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 63-86。

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2 期，1997 年，頁 14-20。

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生情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1 期，1997 年，頁 5-12。

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收錄在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一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67-340。

孫敦恒，〈淺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0 卷第 1 期，1995 年，頁 13-20。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25-293。

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收錄在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9-172。

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45-181。

徐中舒，〈我的學習之路〉，收錄在氏著，《先秦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07）中〈代前言〉，頁 1-4。

- 徐中舒，〈怎樣考釋古文字〉，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434-1442。
- 徐中舒，〈夏史初曙〉，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349-1354。
- 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67-170。
- 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收錄在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6-32。
- 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編年（未定稿）〉，收錄在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主編，《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四川：巴蜀書社，1998），頁 307-378。
- 桑兵，〈梁啟超的國學研究與日本〉，收錄在氏著，《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243-258。
- 桑兵，〈陳寅恪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歷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頁 129-143。本文又收錄在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36-160。
- 素癡（張蔭麟），〈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84-89。
- 高亨，〈高亨自傳〉，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09-112。
- 馬衡，〈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收錄在氏著，《馬衡講金石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 235-238。
- 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編者後記〉，收錄在氏著，《中國

- 考古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 311-332。
- 張光直，〈人類學派的古史學家－李濟先生〉，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 195-201。
-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收錄在李又寧編，《胡適與他的朋友》(台北：紐約天外出版社，1990)，頁 19-69。
- 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收錄在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210-220。
- 張爾田，〈雁塔寒音(書札六通)－嗚呼亡友死不瞑目矣張孟劬復黃晦聞書〉，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80-83。
- 張蔭麟，〈跋《梁任公別錄》〉，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17-119。
- 梅光迪致胡適的四十六封信函，可參見羅崗、陳春艷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 111-182。
- 梅祖麟，〈中國語言學的傳統與創新〉，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475-500。
- 梁啟超，〈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收錄在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 374-388。
-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收錄在氏著，《梁啟超全集》，第

- 九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5009-5078。
- 梁啓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收錄在馬克鋒編，《國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90-195。
- 梁啓超，〈梁先生北海談話集〉，收錄在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607-610。
- 章太炎，〈小學略說〉，收錄在氏著，《國學略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 3-36。
- 許倬雲，〈尋真理的李濟先生〉，收錄在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178-180。
- 許嘉璐，〈黃侃先生的小學成就及治學精神〉，收錄在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45-82。
- 陳力，〈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究〉，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319-329。
- 陳以愛，〈「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收錄在黃清連編，《結網集》(台北：東大，1998)，頁 519-571。
- 陳平原，〈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收錄在氏著，《大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21-50。
- 陳平原，〈清華國學研究院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紀念清華學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討論會〉中發言，《博覽群書》，2005 年第 8 期，頁 4-17。

陳守寔，〈記梁啓超、陳寅恪諸師事〉，收錄在張杰、楊燕麗選編，
《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頁
41-49。

陳來，〈近代「國學」的發生與演變－以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典
範意義為視角〉，《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3期，頁24-35。

陳來，〈啓蒙批判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變奏－整理國故運動中的胡
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頁5-11。

陳來，〈新國學之路－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光明
日報》，2009年10月26日。

陸宗達，〈我所見到的黃季剛先生〉，收錄在程千帆、唐文編，《量
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
頁107-116。

陸宗達，〈季剛先生二三事〉，收錄在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
學記－黃侃的生平與學術》，頁117-121。

陳紀祥，〈中國古文字學家朱芳圃〉，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
《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26-235。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
（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219-220。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
文集（一）－寒柳堂集（合編）》（台北：里仁書局，1980），
頁6-11。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

(一) —寒柳堂集(合編)》(台北：里仁書局，1980)(台北：里仁，1980)，頁 144-145。

陳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198-199。

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18。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38-239。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36-237。

陳寅恪，〈斯坦因 Khara-Khoto 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187-191。

陳寅恪，〈童受喻鬢論梵文殘本跋〉，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07-211。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47-249。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50-252。

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32-233。

陳寅恪，〈與妹書〉，收錄在氏著，《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2。

陳寅恪，〈劉叔雅莊子補正序〉，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二）-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1981），頁 229。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後〉，收錄在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寒柳堂集》（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 148-150。

郭錫良，〈王力先生的學術道路〉，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269-280。

傅傑，〈姜亮夫先生傳略〉，收錄在張湧泉編，《漢語史學報》，第三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頁 1-5。

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四冊，（台北：聯經，1980），頁 354-356。

傅斯年，〈《殷曆譜》序〉，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三冊，（台北：聯經，1980），頁 215-222。

傅斯年，〈「中國音韻學研究」序〉，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三冊，（台北：聯經，1980），頁 212-214。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三冊，（台北：聯經，1980），頁 223-269。

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一冊，（台北：聯經，1980），頁 1-182。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二冊，（台北：聯經，1980），第二冊，頁 1-60。

-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三冊，（台北：聯經，1980），《傅斯年全集》，頁 86-157。
-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四冊，（台北：聯經，1980），頁 289-299。
-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四冊，（台北：聯經，1980），頁 253-266。
-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收錄在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二冊，（台北：聯經，1980），頁 159-404。
- 黃菊英，〈我的丈夫—國學大師黃季剛〉，收錄在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黃侃的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6-18。
- 馮蒸，〈大匠示人以規矩—從王靜如先生教我音韻學看王先生的治學方法〉，收錄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565-583。
- 楊聯陞，〈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29-34。
- 葛兆光輯，〈王國維致內藤湖南佚札〉，收錄在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 3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頁 1-7。
- 葉兆言，〈閱讀吳宓〉，收錄在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62-81。
- 董治安，〈高亨先生傳略〉，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13-130。
- 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

-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 23-27。
- 趙彥青，〈杜綱百傳略〉，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31-137。
- 劉東，〈寬正·沉潛·廣大·高明－關於清華國學院的訪談〉，收錄在氏著，《道術與天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76-186。
- 劉俐娜，〈王國維治史思想、方法與古史辨派〉，收錄在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頁 260-275。
- 劉盼遂，〈觀堂學書記〉、〈觀堂學禮記〉、〈說文練習筆記〉，皆收錄在王國維著，宋韜編，《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59-299、313-321、322-331。
- 劉斌、張婷，〈衛聚賢與中國考古學〉，《南方文物》，2009 年第 1 期，頁 99-107。
- 衛月望，〈衛聚賢傳略〉，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03-315。
- 衛聚賢，〈我的「胡說」〉，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98-302。
- 魯迅，〈估《學衡》〉，收錄在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解析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639-641。
- 冀宇，〈王靜如教授小傳〉，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03-315。
- 錢基博，〈今日之國學論〉，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

- 版社，2012)，頁 819-836。
- 錢甌輯，〈致鈴木虎雄—王國維佚札七通〉，收錄在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 2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 129-135。
- 戴家祥，〈人生和學術〉，收錄在王文耀整理，《戴家祥學述》（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9-11。
- 戴家祥，〈論甲骨文字學〉，收錄在王文耀整理，《戴家祥學述》（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67-88。
- 戴家祥，〈釋字〉，收錄在王文耀整理，《戴家祥學述》（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102-133。
- 戴家祥，〈釋皂〉、〈釋甫〉、〈釋百〉、〈釋千〉，《國學論叢》，第一卷第四期，1928 年，頁 13-64。
- 繆鳳林，〈悼梁卓如先生〉，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98-102。
- 謝國楨，〈《論七略別錄與七略》跋〉，收錄在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50-351。
- 謝國楨，〈自述〉，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77-183。
- 謝國楨，〈我的治學經歷〉，收錄在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頁 261-264。
- 謝國楨，〈明季奴變考〉，收錄在氏著，《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175-197。
- 謝國楨，〈記清華四同學〉，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3-10。
- 謝國楨，〈梁啓超先生少年佚事〉，收錄在氏著，《明末清初的學

- 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頁 256-260。
- 聶時樵、鄧魁英，〈懷念劉盼遂先生〉，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
《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1-21。
- 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收錄在俞大維等著，《談
陳寅恪先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139-147。
同時收錄在夏曉虹、吳令華編，《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北
京：三聯書店，2009)，頁 387-388。
- 羅志田，〈《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1
年第 1 期，頁 181-192。
- 羅志田，〈一次寧靜的革命：清華國學院的獨特追求〉，《清華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5-13。
-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北伐前後中國新史
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
週年研討會編輯委員會編，《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台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91-107。
- 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收錄在氏
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302-341。
-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錄在王為松編，《傅斯年印象》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 2-16。
- 羅振玉，〈《海寧王忠愍公傳》序〉，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
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6-9。
- 羅振玉，〈羅雪堂先生寄陳寅恪書〉，《國學論叢》，第 1 卷第 3 期，
1928 年，頁 239。
- 嚴耕望，〈史學二陳〉，收錄在氏著，《治史答問》(台北：商務印

書館，1988 三版)，頁 79-87。

顧實，〈《國學研究會演講錄》序〉，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436-441。

顧實，〈《國學輯林》序〉，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下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722-723。

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收錄在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313-321。

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收錄在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683-697。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收錄在陳平原、王鳳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11-117。

三、英文專書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

Fan-shen Wang, *Fu Sse-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

Thomas A. Metzger,*Escape from predicament :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Yü-sheng Lin,*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Wisconsin :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

